

#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三卷

下册

第二国际

1889—1914

[英] G.D.H. 柯尔著

商务印书馆

#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三卷 下册

第二国际

1889—1914年

〔英〕G. D. H. 柯尔 著

何 慕 李 译

奚瑞森 俞元开 校

商务印书馆

1986年·北京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ume III, Part II**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

By G. D. H. COLE

LONDON, MACMILLAN, 1956

根据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伦敦 1956 年版译出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三卷 下册

〔英〕G. D. H. 柯尔 著

何 蕤 李 译

吴瑞森 俞元开 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4 3/4 印张 341 千字

1985 年 7 月第 1 版 195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303 册

统一书号: 3017·367 定价: 2.35 元

# 目 录

<b>第十二章</b>	<b>奥地利</b> .....	<b>1</b>
	本章 附录: 西奥多·赫尔茨卡	
<b>第十三章</b>	<b>匈牙利</b> .....	<b>47</b>
<b>第十四章</b>	<b>巴尔干半岛各国</b> .....	<b>67</b>
	(一) 概论。(二) 保加利亚。(三) 罗马尼亚。(四) 塞尔维亚。 (五) 希腊。(六) 土耳其和亚美尼亚。	
<b>第十五章</b>	<b>瑞士</b> .....	<b>89</b>
<b>第十六章</b>	<b>比利时: 社会民主党的困境</b> .....	<b>98</b>
<b>第十七章</b>	<b>荷兰</b> .....	<b>135</b>
<b>第十八章</b>	<b>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b> .....	<b>147</b>
	(一) 丹麦。(二) 瑞典。(三) 挪威。(四) 芬兰。	
<b>第十九章</b>	<b>意大利</b> .....	<b>187</b>
<b>第二十章</b>	<b>西班牙</b> .....	<b>221</b>
<b>第二十一章</b>	<b>美国: 加拿大</b> .....	<b>252</b>
<b>第二十二章</b>	<b>拉丁美洲: 墨西哥革命</b> .....	<b>298</b>
<b>第二十三章</b>	<b>澳大利亚的工党和社会主义</b> .....	<b>329</b>
<b>第二十四章</b>	<b>新西兰</b> .....	<b>360</b>
<b>第二十五章</b>	<b>南非</b> .....	<b>383</b>
<b>第二十六章</b>	<b>中国: 孙逸仙</b> .....	<b>388</b>
<b>第二十七章</b>	<b>日本</b> .....	<b>402</b>
<b>第二十八章</b>	<b>结束语。改良和革命</b> .....	<b>413</b>
	附: 主要人物表.....	<b>449</b>

## 奥地利

在第二国际中，以维克多·阿德勒为首的奥地利社会党人占有非常重要而倍受尊敬的地位。就许多方面来说，奥地利党都是一个模范党：奥地利社会党人不但热情很高，而且纪律严明；他们同工会的关系大体上令人满意；他们尽管在民族问题上困难重重，却根本没有左翼或右翼反对派的派别纷争。此外，他们的党是一个有高度教养的党；他们的主要报纸《工人报》素以坚持原则的高标准著称，而且是当之无愧的；他们的文化活动既普遍又热烈。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或帝国的困难而复杂的条件下生存，在奔赴自己的目标的过程中显示出高度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就奥地利社会党人本身来说，他们对自己的党深感自豪，而他们的自豪感主要来自他们的国际主义。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党看作是隶属于大范围的第二国际的一个“小国际”，而且喜欢这样称呼自己的党。他们非常满意地指出，党成功地团结了构成奥匈帝国的一——或者不如说构成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的——所有民族集团中的社会党人。在党内，就如同在广大的奥地利国内一样，有日耳曼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小俄罗斯人——奥地利统治下五方杂处的民族的代表。每个集团都有权在广泛的团结下建立自己的民族组织。奥地利党为自己几乎本能地就具备国际主义性质而感到自豪；其他国家的党不得不学习如何超越民族的界限，而奥地利党则发现，在日常的斗争中它早已具备这种知识。

这种自豪感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奥地利社会党自始至终基本上是一个受日耳曼人思想鼓舞的党，尽管党内有许多其他民族集团的成分。党的领导主要是日耳曼人，党的思想和文化也是日耳曼人的，而且受到了奥匈帝国边界以外的更大的德国社会党的强有力的影响。奥地利党对社会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这一问题的看法，其本身就是一种日耳曼人的看法，只是作了修改以适应多民族国家的条件，并且考虑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能够唤起境内人民对其本身或对国民精神热诚效忠的社会单位。

德国的日耳曼人，包括德国社会党人或其中的大多数人，虽然对俾斯麦以普鲁士邦为领导而统一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展开斗争，但毕竟把这个国家当作日耳曼民族成就的象征而感到自豪，而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则跟奥地利统治下的所有其他民族集团一样，对奥地利帝国并不感到自豪。1866年战争以后，虽然奥地利在政治上是大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这一问题已不复存在，虽然哈布斯堡王朝帝国的存在当时已作为一个事实而得到承认，但除了特权阶级以外，奥地利各族人民并没有属于这个帝国的感觉。奥地利境内的工人阶级有必要找出团结共存的办法，以便同统治者和剥削者展开斗争；但是这种团结是建立在权宜和必要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属于共同的国家或拥有共同的文化这种情感意识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团结往往就很难维持，就如同奥地利帝国本身的团结很难维持一样。可以肯定，奥地利社会党人有一方面的工作是比哈布斯堡王朝容易做的。他们无需同匈牙利人或是奥地利统治下的各民族集团建立共同的组织。匈牙利人在马扎尔贵族阶层的高压统治下所允许他们的活动限度内，建立了本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奥地利社会党人对这个运动所必须做的就是随时伸出支援之手而已。但是，即使没有匈牙利人、没有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没有特兰西瓦尼亚人以及匈牙利的马扎尔帝国统治下

的其他少数民族，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的民族就已经十分复杂，足以构成非常麻烦的问题，特别是在日耳曼人和捷克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这两个民族集团虽然在奥地利境内各有其乡土，但是在许多地区却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并形成一支统一的劳动力量，只要能避免内部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争执，这支力量就有保护住自己的希望。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有辽阔的日耳曼人居住区；还有一些日耳曼人和捷克人杂居的地区——例如布拉格城本身就是这样；在维也纳和其他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城市里，住有大批捷克族劳动人民。加利西亚的波兰人比较自成一体，但是那里除了波兰人和被奴役的小俄罗斯人以外，也有日耳曼人和捷克人；在维也纳，也有波兰人，特别是波兰籍犹太人。此外，波兰人还分居在奥地利、德意志和俄罗斯三个帝国里；因此波兰人的社会主义运动便分裂成为几个独立的运动，每个运动都不得不在各自的统治者所强加的条件下开展工作，而且每个运动也都一面希望实现民族团结，一面又不得不同所在国的其他民族工人进行共同的斗争。

实际上，在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内，只有日耳曼、捷克和波兰这三个民族集团才占有重要地位。斯洛伐克人和小俄罗斯人都没有进步到足以响应社会主义的号召或推选出自己的领袖。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也都没有起重大的作用。意大利人之所以没有起重大作用，是由于他们人数很少，而且他们所注意的是意大利；而南部斯拉夫人，则是由于他们很落后，并分居在奥匈帝国的两个地区中。奥地利社会党人的主要问题是日耳曼人和捷克人合作的条件问题，以及这两种人同络绎入境的波兰人的关系问题，不过后者倒不是一个根本条件，而是一个使情况复杂化的因素。在本章所探讨的时期中，随着捷克民族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更为民主的运动，日耳曼人同捷克人的关系问题也越来越难于解决了。虽然许多“老捷克人”主张承认，波希米亚是一

522 个本身就有权利成为王国并沿袭其古老制度的国家，同时希望它象匈牙利一样取得独立的、鼎足而立的地位，也同样有权压迫下层阶级，但是由于在波希米亚的贵族阶级和普通人民中间捷克人和日耳曼人是混然杂处的，因而不可能希望完全取得这种地位。捷克和日耳曼贵族，在奥地利国家作为阶级特权的维护者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利益。捷克和日耳曼贵族，包括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日耳曼人，在宫廷和官僚统治机构中占有很高的地位。统治阶级中兼有日耳曼人和捷克人这一点，倒使社会党人组织共同的运动去反对他们这一工作变得简单了，但是后来在波希米亚形成了一个反贵族统治的捷克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在捷克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中找到它的领导。这些“青年捷克”民族主义者打垮了“老捷克”政治领袖的那种贵族的半民族主义基础，同时提出了一个使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感到棘手的问题。捷克族社会党人分裂成为两派，一派仍然忠于建立共同组织同时给予民族集团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一主张；而另一派在建立其本身的独立民族运动的愿望方面则不准备落后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队伍中的这一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捷克人为主的地区跟日耳曼人地区以及两种民族杂居地区之间的分裂。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问题在工会运动方面特别严重，因为以安东宁·涅米克（1858—1926年）为首的捷克族社会党人在更大的全奥地利党的联合组织内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党，然后又声称他们也有权建立自己的工会。这种作法不仅在波希米亚，而且在捷克工人和其他民族的工人并肩劳动的地方，都将使产业工人运动有发生分裂的危险。不过，这一挑战直到相当晚的时候才发展到严重地步——主要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在奥地利全境引起很大骚乱以后，尤其是在奥地利继

523 这一重大事件很快又赢得成年男子选举权以后。奥地利社会党建立的时候，奥匈帝国的瓦解虽然认定迟早会发生，但看来仍然是一



件非常遥远的事情，不足以构成当时进行政治联合——或发生分裂——的基础。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捷克族社会党人准备在一个主要受日耳曼人影响和领导的联合的奥地利党内起作用；只要捷克族和日耳曼族社会党人能够共同行动而不发生很大摩擦，其他民族集团，除了波兰人以外，就不可能造成严重困难，或者起任何非常重要的作用。

至于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则深深知道，在奥地利的统治下，要比在俄国甚至德国的统治下好得多。在十九世纪后期，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人在自己贵族的内部统治下，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当他们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时，就远比捷克人更易于自行其是，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区紧凑，远不象捷克人和日耳曼人那样混杂，只是同小俄罗斯农民杂处而已，而对于俄罗斯人的要求，这三个先进民族，尤其是波兰人，都不大注意。日耳曼人、奥地利人和俄罗斯人统治下的波兰社会党人内部各集团之间的争吵，远远超过了他们同奥地利的社会党同志所发生的争吵，不过1905年以后，后者在俄国大动乱的刺激下也变得不那么好对付了。

奥地利社会党不同于德国社会党，必须在一个工人不久前才得到政治权利的社会里打开一条出路。在1896年以前先后生效的几部奥地利宪法下，工人阶级根本没有投票权。那一年的选举改革保留了按等级分别投票的旧制度，但建立了一个新的等级，其中的产业工人和农民都有权投票，但为个人或为封建主服役的工人则不在其内。新的选民等级在议会中享有的代表人数很少，议会仍然为上层阶级所控制。直到1906年才在平等选举权的基础上把投票权扩大到几乎所有的等级，同时取消了按等级投票的制度。

从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的那一年起直到1906年，在整个时期中，奥地利社会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

事实上,在第二国际于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成立以前几个月,他们已经统一了自己的党,并开始了这一斗争。在这以前,他们是分裂的。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运动最初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形成的,当时是德国的运动,主要受德国的影响。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维也纳成立了一个分会,用以反对另一些人按照舒尔采-德里奇的自由主义原则成立工人互助会联盟的企图。1866年普奥战争以后,当奥地利被明确地排除出德意志联邦的时候,这些运动已开始沿着更加独立的方向发展。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声中建立起来的互助论集团这时大部分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个联合的运动虽然遭到了相当严重的压制,却从1867年的宪法改革中得到了鼓舞。当时匈牙利取得了奥匈帝国统治下独立自主的权利,因而有必要为帝国的奥地利部分建立某种形式的代议制。在1867年改组后的议会中,工人阶级没有取得选举权,甚至也没有任何直接的选举制。议会议员由奥地利帝国各地的地方议会选出,而这些地方议会本身仍然是通过分等级投票的制度进行选举的,这种制度使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尽管如此,一定形式的立宪制度的建立毕竟鼓舞了政治上的讨论。社会党人,特别是维也纳方面的社会党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与一部分拉萨尔的分裂派合并的基础上,同1869年在德国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新成立的社会党建立了联系。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代表实际上参加了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建立德国党的工作。以海因里希·奥伯温德(1846—?)  
525 为首的维也纳社会党人在日内瓦同马克思的朋友约翰·菲利浦·贝克尔合作,在苏黎世和其他瑞士城市同德国社会党人以及瑞士德语区的社会党人合作,参加了第一国际后期的活动,特别是在1873年日内瓦举行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的“残余”代表大会上,帮助贝克尔凑成了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数。但是,对立的“反权威主

义的”国际在奥地利，特别是在维也纳，也有它的支持者，于是1869年联合起来的运动不久就分裂了。

组织工会的权利在1866年实际上已经在名义上得到了承认；在获得承认之后，接着就发生了上述“自助派”同“国家帮助派”之间——也就是互助论者同拉萨尔派之间——的斗争。但是当拉萨尔派刚刚占了上风，并开始在维也纳和其他大城市组织大规模工人示威运动的时候，政府马上就逮捕了他们的领袖，并且取消了由于奥地利被普鲁士人击败而承认的组织工会的权利。1869年在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个关键性的年头。这一年，维也纳工人在议会大厦前面举行了历史性的示威，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承认公共集会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带头组织这个运动的人数不多的社会民主党是1867年主要在拉萨尔派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1869年，赫尔曼·哈通(1842—?)创办了《人民之声》杂志，作为新运动的机关刊物。奥地利在其军队在萨多瓦被俾斯麦战败的前夕建立了代议制政府，而这次大示威就是代议制政府引起的。这是一次抗议，反对为推行1867年新宪法而成立的所谓自由党内阁，不顾工会名义上的合法化，继续迫害工人阶级运动。

1870年，组织工会的权利曾短时期在名义上得到恢复，但是在举行大规模示威的时候仍然逮捕了許多人，警方仍企图消灭这个运动。新的斗争继续进行到1873年的经济危机时期，这次危机几乎摧毁了工会，迫使工会的残余力量转入地下。

在发生经济危机的那一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派别：一派以海因里希·奥伯温德为首，称为“稳健派”；一派以安德里阿斯和约瑟夫·施尤兄弟为首，称为“激进派”。正是这个安德里阿斯·施尤(1844—1927年)后来定居爱丁堡，接着又迁居伦敦，在英国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联盟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激进派”受到德国人约翰·莫斯特很大影响，他后来成

了无政府主义者，1880年前后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莫斯特被驱逐出德国以后，先后在苏黎世和伦敦设法创办自己的刊物《自由》，接着在1882年将他的总部迁往美国。不久以后，莫斯特的影响由于波希米亚人无政府主义者约瑟夫·波伊克特（1855—1910年）的加入而增强，波伊克特于1879年在维也纳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前途》。他是一位口才很好的演说家，在奥地利工人中间大力展开宣传，但是施尤兄弟以及奥伯温德和“稳健派”都怀疑他是警察的一名坐探。无论如何，在他发挥作用的时期，维也纳发生了若干起无政府主义暴乱事件，遭到了警方的武力镇压，受株连的既有社会党人和工会，也有小规模无政府主义者团体。在这场危机达到最严重的阶段以前，奥伯温德于1878年离开了奥地利，回到他的出生地德国。他在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的历史中没有再起作用。波伊克特本人在1884年制定取缔无政府主义者的非常法时离开了奥地利。他到了德国，同新教反犹太运动的创始者斯托克牧师携手联合。后来，他在巴黎逗留了一个时期就移居美国，1910年死于芝加哥。

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残余力量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以后，便分裂成“稳健派”和“激进派”两个尖锐对立的集团。后者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之所以得到加强是由于整个工人阶级没有投票权，而且在公开建立政治和经济组织方面又存在着困难。

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非常法的压制，其性质同俾斯麦后来在德国所实行的相类似。1866年制定的一直到1881年还有效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严厉地限制了集会和结社的权利。1884年，为了反击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又增定了一项同英国的停止人身保护法相类似的非常法（紧急措施法）。这就使得维也纳和维也纳新城在1891年以前一直处于警方的紧急管制

之下，这些措施确曾使发展遭到困难，但是并没有能阻止社会主义运动从 1884 年所受的镇压下逐渐恢复过来。

在这一时期，奥地利宪法曾作了某种修改。在帝国议会议员由地方议会选出的制度下，任何心怀不满的民族集团都可以拒绝选出规定的议员名额，从而使中央政府为难，然后再宣称，不经过他们这个地区的代表同意，议会的措施就不能合法地在他们的地区贯彻；甚至声称，议会的整个议程由于不足法定人数而全部无效。1868 年，中央政府采取对策回敬这种作法，规定如果地方议会未能选出中央议会议员，就可以根据仍然给予上层阶级控制权的等级选举制下令进行直接选举。拒不服从的地方议会倒是选出了自己的中央议会代表，但指示他们不出席会议，于是便轻而易举地挫败了这一措施。1873 年，这一情况导致了另一项法律的制定。这项法律完全剥夺了地方议会选举奥地利议会议员的权利，并规定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制，但是投票资格并没有改变，代表权的等级制仍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种制度一直维持到 1882 年；这一年，一项新选举法扩大了选举权，把所有直接纳税 5 戈尔登（约合 10 先令）以上的人都包括进去，使新选民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各个“等级”选区里取得了选举权。这一改革使很大一批富裕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包括犹太人——都成了选民。自从 1873 年发生经济危机以来，这批犹太人一直受着日益嚣张的天主教反犹运动的迫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卡尔·鲁艾格尔为首的反犹运动促使犹太人同其他反天主教会统治的集团联合起来。

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在维也纳人的领导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复兴。1886 年，维也纳医生维克多·阿德勒（1852—1918 年）创办了周刊《平等》，作为把对立的社会主义派别——可能派和革命派——重新统一成为一个党的工具。阿德勒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当时他已经开始以精神病医生著称。1895

年,《平等》周刊发展成为《工人报》。在这家著名的日报于1934年被多尔弗斯查封以前,它一直是党的意见的主要喉舌。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运动既有了这个开端以后,条件在10年之内就已经成熟,可以成立一个统一的党,旨在效法和赶上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出生于奥地利的卡尔·考茨基会同阿德勒拟定了党纲和政策声明;1888年12月和1889年1月,这些文件在海因菲尔德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新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组织和纲领以德国党的组织和纲领为基础,当时德国党仍然处于俾斯麦的非常法的压制之下。因此,新党的意图在于组成一个集中的党,同名义上与之无关而实际上接受共同领导的工会运动进行密切的协作。党成立的时候,面对选举上的重重限制,简直无法希望在奥地利议会中赢得议席,但是成立后不久,波希米亚的事态发展就使局势大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整个时期,奥地利议会中的捷克族代表权几乎完全为“老捷克”党所垄断,而这个党则受波希米亚贵族的控制,支持奥地利国内的保守力量。这个党主张奉行贵族联邦制的政策,反对大多数日耳曼族议员所拥护的资产阶级立宪主义集权政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个“老捷克”党一直受到“青年捷克”民族主义者日益严厉的攻击,后者既反对“老捷克”党的贵族特征,也反对它对维也纳和帝国统治集团的屈从。1896年,事态发展到高潮,首相冯·塔夫伯爵就解决波希米亚问题的折衷方案;同波希米亚的日耳曼人和“老捷克”人双方商谈条件,而这些条件则会严重妨碍“青年捷克”人实现自己的要求:在“三元君主国”内实行民主自治,准许波希米亚各省成立类似匈牙利的独立政府。冯·塔夫伯爵的这一行动是皇帝为纠集比较保守的集团来支持中央政权以巩固其本身地位的企图的一部分。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波希米亚遭到了十分激烈的反对,因而不得不弃之一旁。在这一步失败以后,塔夫解散了奥地利议会,吁请全部稳

健势力联合起来支持政府，以反对两个方面的激进集团。在波希米亚，这一策略遭到了惨败。尽管选举权受到限制，但老捷克党实际上仍被它的“青年捷克”对手所击败，后者不论在地方议会中，还是在奥地利议会里都占优势，顽强地奉行民主的民族主义纲领。

我们决不要以为，这种新的捷克民族主义在任何意义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或以为有强大的工人阶级支持作为基础。这主要是捷克族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集团的运动。实际上，塔夫曾力图提出一项改革选举的议案，以反击青年捷克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奥地利其他地区类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发展。塔夫的这项改革建议原会把4个选举等级中的2个——即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投票权财产条件取消，同时又原封不动地保持住地主阶级的特权地位，并给予商会以特别代表权。他希望在大批增加新选民后，就能够把资产阶级立宪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淹没掉，而贵族则由于享有不同的代表权，仍然能得到充分的保障。然而贵族却认为这一切是难于接受的，于是这个建议就只好撤回了。塔夫于1893年辞职；接着出现一个短期的不稳定均势，政府更迭频繁，直到1895年，出身于波兰贵族的首相巴德尼伯爵完成了一项改革选举的议案，才第一次让大批工人和贫农获得选举权。

1895年的选举法是一项非常奇怪的法律。巴德尼不但没有530废除分等级进行投票的制度，或是象塔夫打算做的那样，扩大当时的城市和农区等级的选民人数，反而把整个等级投票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只是在已有的贵族、商会、城市和农区4个等级之外又增加了第五个等级，凡没有特别取消投票资格的成年男子都可以列入这个等级。主要的例外是“私人的仆役”，其中包括地主田庄上的仆人。把这些人排除在外的托词是他们不是自由人；这当然也是尊重贵族意见的结果。新的第五等级包括不属于其他4个

等级的一切选民，人数远远居第一位，但在奥地利议会的总议席中所占比例却最小——在 425 个议席中只占 72 席；而地主这个等级则有 85 席，城市和商会共有 139 席，农区 129 席；后面所提到的这几个集团仍然是根据限制选举权的旧法律选出的。不过在 1895 年以后，社会党人实际上却有可能在第五个等级中赢得议席，虽然数目很有限。在根据新法律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他们赢得了 14 席。1897 年社会党的胜利主要是在党的两个坚强据点——波希米亚和维也纳——赢得的。在 1901 年举行的下一次选举中，由于在维也纳失利，议席减少到 10 席。1897 年，主要由于选举法，社会党决定彻底改组。只要工人阶级没有选举权，它就有可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斗争，团结全体成员支持普选权的要求，并在贵族和资产阶级政党那种四分五裂的民族派别面前夸耀其巩固的统一战线。但是当它一旦发现自己能够在各个地区进行竞选的时候，它就不得不考虑自己队伍中所存在的民族差别，否则就会使选民转而支持维护民族要求的其他政党。因此，在 1899 年的布伦纳代表大会上，奥地利社会党人把他们的党几乎变成了 7 个民族派别的联合集团，由 7 个派别选出的代表组成联合执行机构，并且规定党

531 在奥地利议会中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采取行动。这 7 个派别的民族是：日耳曼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小俄罗斯人。每一个派别有自己的地方和地区组织，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有自主权；当然，在各民族杂居的地方，无论在选举中还是在日常的社会主义宣传工作中，都应该采取共同行动。凡是在一个民族完整地生活在一起的地区，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活动起来倒也相当简便，但是在一些民族杂居的地方，所引起的问题就要复杂得多，比如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部分地区、在斯洛文尼亚地区、在维也纳以及其他一些工业中心就是这样。

1899 年的布伦纳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新纲领，其中的一项要



求是,把奥地利改组成为一个各组成民族的民主联邦。纲领主张,成立一些民族自治区,以取代与民族的划分不相一致的古老省分。每一个自治区都应设立一个议会,通过平等的直接普选选出,对各该地区的民族和文化事务享有独立的立法和行政权。纲领指出要用这些民族议会来取代旧的地方议会。同一民族居住的几个地区应组成民族联盟;每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权利则由代表整个奥地利的议会制定法律加以保障。既然不承认任何一个民族享有优越的地位,因而没有共同的国语。每个民族都可以自由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来举行公共集会,并且根据语言自主的原则来组织文化活动。

奥地利日耳曼族社会党人勉强地接受了新组织,他们非常赞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种统一的形式和集中的权力,但是他们认识到,除了在波希米亚和加利西亚——即使不在其他地区——成立完全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取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党的工作始终存在摩擦,但是在1907年争取到成年男子选举权以前,争取平等普选权的斗争则起了很大作用,促使党团结一致去共同反对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尽管存在民族分歧,也能联合起来抵制社会党的发展。由于有必要以民族作为党内组织的基础,于是奥地利社会党人便不得不慎重考虑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并设法把民族主义的要求同超越民族界限的凌驾一切之上的工人阶级大团结的概念调和起来。 532

在这方面,他们的任务很艰巨,因为奥地利帝国内的某些民族集团不仅极力想维护自己的自治权,而且还想维护高于其他民族的优越地位;在这些民族集团看来,有些民族是比较落后的。在奥匈帝国的另一半地区,马扎尔民族主义者简直毫无顾忌地统治着斯洛文尼亚人、罗马尼亚人或特兰西尼亚的日耳曼人,而且凡是能办到的地方,还进而统治1848年曾参与击败匈牙利革命的克罗地

亚人。在奥地利从来还没有人象在匈牙利那样肆无忌惮地要求民族权利。这主要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捷克人都要求取得优越的地位并在文化方面起领导作用，同时这两个民族又杂居在一起，以至不能象大部分波兰人那样，把自己的愿望同所居住的地区结合起来。毫无疑问，“青年捷克”要求建立一个自治的波希米亚王国，这个王国同奥匈帝国其余地区的唯一联系是他们拥戴一个共同的君主。但是如果由捷克家族和日耳曼家族混合组成的波希米亚贵族的主要部分反对他们，如果布拉格以及波希米亚许多其他地区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日耳曼少数民族也反对他们，他们就没有实现——或接近于实现——这一要求的希望。社会民主党内的捷克人集团必须尽最大努力同日耳曼人妥协，而日耳曼族社会党人也不能没有捷克人的支持。由于日耳曼人的队伍中，特别是在维也纳，有许多犹太人，从而引起了反犹情绪，所以他们就更加需要这种支持。日耳曼族社会党人在反对这一强大的反犹运动的斗争中，需要尽量得到其他民族集团的支持；这个反犹运动力图在城市工人之间以及农村地区，建立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行业组织和政治组织。

533 社会党领袖在接受社会党以各民族的联合为基础这一原则的同时，坚决反对在工会运动中也采用按民族划分的作法。他们的理由是：不仅在同一种工业中，而且在同一种工厂中或同一地区的互相竞争的各个工厂中，都广泛地雇用不同民族的工人，如果按民族把他们分成独立的集团，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顾法律上的重重障碍，早在1890年就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工会代表大会，由此产生了一个同德国的工会委员会相类似的中央工会委员会，并按照不同的工业或职业分别成立了一些工会。这个中央机构同社会民主党的中央组织进行密切合作。当党按照民族的划分进行改组时，有人要求同样改组工会。工会运动的社

会党领导人(主要是维也纳的)准备同意在各个地区成立民族小组委员会,由全奥地利工会的地方分会组成,而且准备同意在适合的情况下在特定地区的工会下设立按语言划分的分会。他们所不愿接受的是:在每种工业或行业中为每个民族分别成立独立的工会,并让每个这样的工会参加本身的全国工会中心,然后再由各民族的工会运动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共同的最高委员会。

这种形势又由于捷克族社会党人——或者不如说他们中的一部分——提出要求而变得复杂了。他们不仅要求在波希米亚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会运动,直接隶属于捷克族社会党组织,而且要求承认属于布拉格的捷克族中央组织的各工会有权在奥地利和其他地区登记捷克族工人为会员。这批民族主义者一如既往,总想两方面都得到满足:一方面想在波希米亚境内建立自己的工会运动,一方面又要求管辖不论在什么地方工作的捷克族工人的权利。日耳曼人不可能承认这种双重权利,也不愿意单独承认其中的第一部分,理由是:在属于奥地利的整个领土上,工会必须在共同的控制和领导下采取行动。而捷克族社会党领袖不喜欢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这样做同他们要求得到所有捷克族工人的民族忠心的主张相违背,而且也是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建立一个以维也纳为中心的主要受日耳曼人影响的工会运动。 534

1907年,当这个通过直接谈判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既提交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又提交国际工会代表大会进行讨论的时候,奥地利社会党和全奥地利工会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发言人是它的强有力人物安东·胡伯尔[1861—1935年])得到了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主义者为首的其他国家的代表们的压倒多数的支持。工会国际的德国书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工会代表卡尔·列金严厉谴责了捷克的分裂主义者。会上指出,波希米亚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捷克族工会会员事实上一直是属于全奥地利中

央工会委员会的,并且认为在波希米亚成立一个小组委员会,同时有权在全奥地利工会内部成立按语言划分的分会,就已经足够了。以安托宁·涅米克为首的大多数捷克族社会党人反对这一观点,拒绝承认国际有任何权利对他们发号施令,并且根据已被接受的理论,主张每个国家的工会运动的组织都应该同社会党紧密协作。他们说,这意味着,捷克族社会党,即使作为一个自治的机构在一个广泛的、联合性质的全奥地利党内进行工作,也必须有同它直接发生关系的自己的工会,而不服从于设在维也纳的工会官僚机构,也不直接同中央集权的全奥地利工会委员会发生关系。这一争执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它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完全脱离奥地利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为止。

如前所述,在 1906—1907 年以前,奥地利工人阶级运动虽非完全地也是主要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上,从而使这个运动的分裂倾向得到了遏制。这场斗争使这一运动变成了一个共同的讨伐运动。在这场耗费时日的斗争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集团不仅必须紧密合作,而且党的中央组织也必须得到整个工  
535 会运动的可靠支持。只要社会党人没有取得投票权,只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虽已赢得投票权,但分等级的投票制度仍使他们得不到奥地利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席,他们就不得不主要利用非议会方法在施加压力,而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举行政治性的总罢工。当然,这就要倚靠工会的支持;而且即使不采取罢工行动,社会党人也很需要依靠工会去号召工人团结一致地走上街头去举行群众示威。从 1893 到 1907 年,社会党人为争取普选权而进行的鼓动是持续不断的,并且在党的活动中占有中心地位。由于要求工人通过他们的产业组织大规模地参与政治事务,反复利用罢工这一武器,这就有助于使工会更加靠拢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号召工会在党的工作中发挥任何类似的积极作用,因而德国工会在

接受党的领导方面要消极得多，而不是积极的；在党和工会的关系上，工会所起的作用也小得多。当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在持续进行的时候，奥地利似乎已经建立了一种党和工会的统一组织和统一行动的模范制度；但事实上，这主要是由于缺乏民主的选举制，而不是由于奥地利劳工运动的组织或基本思想具备什么内在因素。我们将要看到，在比利时和瑞典，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也具有多少相似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法国和德国，普选权——不如说成年男子选举权——并不是由于社会党人进行了成功的鼓动而实现的，而是掌握在非社会党人的手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力量，这种选举制是俾斯麦最初在北德意志邦联，然后又为统一的德国的帝国议会而实行的。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拉萨尔派着手建立德国社会党，以成年选举权作为它的首要目标，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很快达到要求，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而是由于俾斯麦本人希望以此作为工具来巩固和革新在他自己控制下的德意志国家。1870年以后，德国社会党人主要致力于争取支持者——这些人如果是男子，就已经是选民，同时致力于利用选举力量去作动人的炫耀。由于他们缺乏政治表达的手段，因而也就无需乞助于工会去施加劳工方面的压力；既然他们本身用不着总罢工，他们也就往往对其他人利用总罢工侧目而视。至于法国，由于害怕“农村人民”，并且对拿破仑第三利用民意表决一举把旧秩序推翻，因而人们也不认为争取普选权的呼声会产生什么魔力，虽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路易·勃朗的宣传中，普选权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在法国，广泛的选举权或受限制的选举权并不是把社会党人同其他政党分开的大问题；这是共和政治中的一个视为当然的权利，而不是一个需要为之斗争的革命变革；由于选举权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在1871年就象在1848年以后一样，法国工人阶

级的舆论——至少是其中的一大部分——往往瞧不起民主的议会制度，同时认为总罢工不是一种加强政党地位的手段，而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武器，可以用来教育无产者进行革命，甚至使革命实现。

另一方面，对奥地利人来说，争取普选权的要求既是一个反对反动的大体上依然是封建的国家的战斗口号，也是一个团结各族社会主义集团来支持一个共同纲领的手段。德国社会党人渴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德国，法国社会党人渴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国，但是简直就没有人希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奥地利帝国，至多也不过把它当作一种可能的过渡。许多奥地利社会党人都把全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当作反对奥地利国家的武器，而不是当作使奥地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手段并利用它作为永久性社会主义秩序的基础。即使奥地利社会党人为奥地利“小国际”的联合统一感到自豪，而且认定这种统一（由于它具有国际性）要比把奥地利分裂成为一些分别由各个特定民族统治的独立国家更为明智，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是没有热情的，希望在社会主义于欧洲取得预期的胜利以后，“小国际”能够并入大国际。在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中间，已经有许多人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奥地利的日耳曼区同一个改造了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帝国重新合并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当条件成熟时，它将随着波兰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和一个南部斯拉夫大国的出现而来到。关于波希米亚，由于那里的日耳曼人同捷克人杂居在一起，因而他们的预测远不是那么肯定。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波希米亚也会同意参加社会主义的大德国；但是就大部分人说来，他们不完全知道将来会是什么局面，甚至不完全知道该抱什么希望。就当时来说，他们知道德奥合并不是现实的政治问题；因而可以不去考虑它所牵涉到的复杂因素。

尽管对奥地利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缺乏热情，或不抱最后希望，奥地利社会党人暂时仍然不仅愿意在它的内部工作，而且也愿

意为维护它的存在而努力，哪怕这仅仅是因为就实际情况来看，不发生战争，它就不可能分裂。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在它的中心维也纳，是竭力追求和平和反军国主义的，这不仅是出于对和平的爱好，而且也是因为战争很容易使奥地利的处境恶化，从而有利于俄国。维也纳人的这种态度得到奥地利的波兰人的大力支持，这些波兰人知道自己比他们的俄属波兰邻居的生活好得多，不希望落入沙皇的统治。维也纳人还得到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帝国其他地区的日耳曼人的支持；甚至连要求完全独立的捷克人大都也不希望由于断绝同奥地利的一切政治关系，而面临被另一个大国兼并的危险。因此，连同比较落后的在社会党的意见中不起多大作用的斯拉夫集团一起，奥地利社会党内的各民族集团继续勉强地过下去，尽管争执很多，但毕竟没有分道扬镳。不过 1905 年以后，他们的团结更加岌岌可危了。这一年，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中欧和东欧触发一系列革命，于是奥匈帝国分裂的问题就被提到了重要地位，而每一个民族集团也不得不考虑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它应采取什么态度。此后，俄国革命的失败又使整个问题拖延下去，但是它对奥地利国内的情绪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奥地利人团结一致的一个重大因素是对俄国的恐惧。巴尔干战争时期，这种恐惧情绪大大增强，这场战争使沙皇俄国同奥匈帝国在东南欧的对立达到严重阶段。但是 1905 年以后，俄国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再也不能被排除；人们普遍认为，这场革命同奥匈帝国继续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存在，或者是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存在，都是不相容的。

此外，奥地利人成功地赢得选举权这一事实也必然削弱那种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意识。他们共同纲领中的主要条款既经取消，再要找出另外一个条款来代替它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既然他们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会政党，他们所强调的自然就侧重

于争取社会和经济改良的斗争，特别是争取改良那些控制就业条件的劳工法，同时争取以德国为楷模，发展社会服务事业。但是这些都是很不高明的代替措施，一则因为这往往会使社会党蜕变为改良主义的党，需要在奥地利议会和地方立法机构中同其他政党妥协；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现行的制度内追求改良往往会使社会党同奥地利国家混然不分，从而使党丧失革命力量，而这种力量一直是强大的团结纽带。

诚然，当初如果单单由奥地利社会党人提出选举权的要求，那么成年男子选举权和废除等级投票制度的事就不会实现。1907年选举法的制定，既是由于社会党施加了压力，也同样是由于政府本身有此愿望。政府原希望，增加大批新选民，剥夺特权阶级垄断大多数议席的权利，就能构成一个坚强的多数，支持它去反对社会党人，反对那些使政府无法稳定的互相竞争的民族政党。在选举法改变的前几年中，奥地利议会的工作陷于一团混乱，其主要原因是捷克民族主义者采取了阻挠策略，同时也是由于有关奥匈关系的争执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政府迫不得已，只好以未征得议会同意的皇室法令处理事务，其合法性是非常可疑的；新的选举法的目的既在于安抚民族集团，同时也在于消除各集团间发生冲突的一些原因。

新的选举法的确是一项奇特的法律。它用新的划分民族选区的做法取代把选民划分为等级的做法。各个地区的每个民族都将分别选举自己的代表；选区是这样安排的：每个民族所拥有的议员人数是固定的。因此，日耳曼族进步党人可以同日耳曼族保守党人竞选，也可以跟日耳曼族基督教社会党人或日耳曼族社会民主党人竞选；青年捷克派可能同老捷克派或捷克社会党人竞选；但是日耳曼人不得同捷克人竞选，其他民族的情况也是一样。各民族集团的议席同人口不成比例，是根据各种各样的因素分配的。除



了人口因素以外,还包括政治和经济发展因素,而且还受各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种种花招的重大影响。这项法律的最后形式显然有利于日耳曼人,其次有利于捷克人,而不利于其他斯拉夫民族。在全部 516 个议席中,法律规定日耳曼人占 233 席,捷克人占 108 席,波兰人占 80 席,只给其余的人留下 95 席。

这种选举制度在特别承认捷克人和波兰人的权利的同时,旨在尽量保持日耳曼人的优越地位。这势所必然地不利于社会党的团结。在民族杂居地区的竞选上,党原先以超越民族的差别为目标。特别是在波希米亚,实行这一制度意味着捷克族和日耳曼族社会党人的区别更加明显,他们不得不在不同的选区分别竞选。于是这就加强了一种势头,促使奥地利党逐步向各民族党的联合体转变,而不再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党。在少数选区,要求团结的情绪很高,足以促使当地的党组织提出并非本民族的候选人,但是这只是十分罕见的情况。一般说来,民族主义的趋势加强了,社会党也更难于团结一致了。制度上的新安排对于党同工会运动的关系也有一些影响。

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社会党人同以安东·胡伯尔和海因 540  
利希·比尔为首的冶金工人工会,曾进行过最有效的合作。他们进行合作的最高潮表现在 1896 年产生新选民等级以前所举行的总罢工中,也表现在 1905 年所举行的 24 小时总罢工中。后一次总罢工,是那一年俄国革命的消息传到正在开会的奥地利党代表大会,由大会决定的。1905 年的罢工之所以只限于一天,主要是维克多·阿德勒的主张。阿德勒的策略不是发起一个必然会使罢工工人同军警发生激烈冲突的运动,而是先举行公众集会,使工人有所准备,然后在维也纳和其他城市接连举行声势越来越大的有秩序的示威,为时一天的罢工只作为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因此,罢工本身仅仅是在劳动时间内而不是在周末举行的规模特别大的

一次示威而已；但是这种示威也包含着威胁：除非满足他们的平等投票权的要求，否则就会再举行罢工，而且罢工的时间并不一定只限于一天。在 1905 年的俄国事件所煽起的激动情绪中，阿德勒医生要说服党满足于这个纲领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他在党内的威望极高，他的主张终于占了上风。当政府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第二年便再一次提出了罢工的警告；于是政府最后决定完全放弃等级投票制，分别在各民族选区实施成年男子选举制，从 24 岁起算。这并没有满足社会党人的要求，他们的要求中还包括妇女选举权和降低选举年龄。但是政府的让步毕竟是巨大的，足以使斗争暂时告一段落。1907 年，根据新选举法，社会党人在奥地利议会的全部 501 个议席中赢得了 87 席，而在 1900 年的选举中仅仅得到 10 席，从这里就看到了新选举法所产生的直接效果。在 87 个议席中，日耳曼人占 50 席，捷克人占 24 席；其余是波兰人 6 席、意大利人 5 席，小俄罗斯人 2 席。但是日耳曼基督教社会党人——反犹运动的头头们——则得到了 96 席；作为一个独立的党竞选的捷克民族社会党人得到 9 席。

541 在争取普选权斗争的两个主要阶段之间，奥地利社会党在 1901 年找到了修改党纲的时间，这个纲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 1891 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代替 1875 年的哥达纲领前不久拟定的。德国人在爱尔福特开会时删去了纲领中的拉萨尔因素，强调完全拥护马克思主义。接着就发生了修正主义的论争，结果否决了伯恩斯坦从渐进论观点来改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企图。我们已经谈过，这场论争中的主人公之一卡尔·考茨基是奥地利出生的，在草拟 1889 年奥地利社会党的最初纲领时，曾起过主导作用。1901 年修订纲领时，他的影响仍然很大，这个纲领仍然主要以德国的纲领为榜样，只是大大减少了强调在全国实行集权制的成分。奥地利人就象德国的日耳曼人一样，有一个要求制定社会立法和

工业立法的当前纲领，用以补充旨在全面夺取政权和改造国家的根本纲领；而在 1907 年以后，随着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的增加，他们又能把那些在现行制度内进行改良的要求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然而，他们在奥地利所面对的天主教社会运动比德国人所面对的要广泛得多；由于这个运动同奥地利国家内的封建人物有联系，所以性质更加反动。<sup>①</sup>而且奥地利当时又没有发生过德国的那场文化斗争，<sup>②</sup>因而任何时候都无法使天主教运动成为可能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奥地利的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是密切相关的，根本不存在德国在冯·凯特勒及其信从者的影响下所出现的那种自由主义趋势。特别是在维也纳，犹太人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深受反犹主义影响的基督教社会运动斗争得非常激烈。基督教社会党人在卡尔·鲁艾格尔的领导下控制了维也纳市议会，并且在操德语的农村地区迅速取得发展。

正是由于斗争激烈，才使得维也纳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强烈的文化色彩。更甚于德国，社会主义在奥地利，特别是在维也纳，已形成一种生活方式，它在知识和艺术领域中都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组织。维也纳是一个音乐才华得到高度发展的中心城市，爱好音乐的热忱特别强烈，社会主义在这里也有自己的音乐。它的教育设施延伸很广；它的主要报纸《工人日报》在弗里德里希·奥斯特里茨(1862—1931 年)的主编下，与其说是一个报导新闻的刊物，倒不如说是一个对各种各样的当代问题从理论上作无尽无休的阐述和讨论的工具。奥地利的社会党人，至少是维也纳的社会党人，

---

① 关于奥地利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初期情况，参看本书中译本第二卷第 258 页及以下。

② 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俾斯麦同德国天主教会的一场斗争，参看本书中译本第二卷第 253 页。——译注

成了全世界无产者当中文化修养最高、最有知识的一批人；而且总的说来，他们也能设法使自己的知识和文化成为团结的手段，而没有使它们成为破坏性的宗派主义的渊源。他们喜欢集体行动；他们喜欢举行群众性示威和庆祝活动；他们对同志式的行为具有高度的意识。1890年，当各国的劳工运动开始庆祝五一节，并且利用这一天来团结自己的力量，对既定的制度进行挑战时，他们对工人事业中的这一新象征表现得最为热烈。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始终不大喜欢五一节，认为其后果可能是同当局发生冲突，并且会把罢工这一武器用到政治上去。与此相反，奥地利人却最充分地利用五一节来进行示威，这不仅是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制和其他当前的内政改良，而且也是为了反对战争——以国际工人阶级大团结的名义来反对战争。

奥地利的“小国际”对于自己在广泛的范围内忠于国际主义事业这一点的确感到非常自豪。当欧洲的战云密布由于帝国主义的对立而日益严重的时候，奥地利人便积极地投入了争取和平的斗争。对他们来说，特别危险的地带是巴尔干半岛，俄国和奥地利的扩张野心在这里狭路相逢，而且德国向近东的发展使形势复杂化了。奥地利社会党人，特别是日耳曼和波兰党员，主要为反对沙皇俄国的敌对情绪所左右，但是他们也迫切希望制止奥地利政府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去干冒险的勾当，制止它继续把自己同塞尔维亚的争执推向极端，它指责塞尔维亚在奥地利南部的斯拉夫人中间制造纠纷。当巴尔干半岛战争爆发的时候，奥地利社会党就在第二国际带头争取结束这场战争，至少也要防止战争扩大，以免大国卷入。1912年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奥地利社会党人在会上表现突出，大力支持巴尔干各社会党不顾互相争斗的国家之间的对立而显示出国际的团结。他们支持社会党提出的成立巴尔干联邦的要求，积极反对分裂主义的民族扩张主义。最

后,当1914年的萨拉热窝暗杀案<sup>①</sup>使欧洲濒临战争边缘的时候,他们竭尽全力阻止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以免点燃战火。

因此,当奥地利社会党在欧战真正爆发之际以保卫祖国为由而全力支持奥匈帝国的时候,许多社会党人都大为震惊。他们在萨拉热窝暗杀事件以后所采取的方针已经宣布,奥地利政府有权要求塞尔维亚人提出保证,并且预示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可能采取什么态度。但是在战争实际爆发以前,他们都始终坚持争端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他们宣言中的弦外之音并没有为人充分领会到。战争爆发之际,他们宣布社会党人必须保卫自己的祖国以抵抗外来的攻击,并且用俄国入侵的威胁来为他们支持战争的立场辩护。他们还力图以同样的论点去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辩护。德国社会党人在第二国际的辩论中始终坚持说:由于每个民族都有权保卫自己,因而任何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有权在一场防御性的战争中支持自己的政府。战争爆发以后,德国和奥地利的多数派都辩解道,战争对他们的民族来说是保卫祖国的问题。关于这个论点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谈到。在这里只想谈谈奥地利社会党人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根本原因。除了战争时期 544 始终存在着强大的力量,鼓励发扬全国团结一致的热情这一点以外,无疑还有以下两大因素影响他们:第一,对俄国专制统治的憎恨;第二,奥地利党的主要部分贯穿着强烈的日耳曼团结的意识。1914年,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奥地利社会党是怎样一个从根本上受日耳曼人鼓舞和日耳曼人领导的党。此外,在这个问题上,日耳曼族奥地利人还得到了奥地利波兰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持。后者不仅憎恨俄国人,而且还看到可以趁战争之机利用加利西亚

<sup>①</sup>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夫妇在这里被塞尔维亚青年暗杀,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译者

作为根据地去进取俄属波兰的机会。约瑟夫·皮尔苏茨基迅速动起手来,以波兰社会党的名义,为此目的在奥地利的领土上建立了一支波兰军队。

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有些人对奥地利党的领袖们所采取的路线持异议。维克多·阿德勒本人率先支持战争,但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同另外一些人则一致认为,德国和奥地利党的态度背叛了国际主义。奥地利党书记罗伯特·丹涅伯格持类似的见解。事实上,小阿德勒后来在他那深为不安的良心的驱使下采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行为——暗杀了首相施迪尔克伯爵以抗议战争政策。但是在1914年,党的主体随着老一辈领袖们接受了维克多·阿德勒的说法:这场战争是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这样,奥地利人就象大多数交战国的绝大多数社会党人一样,也抛弃了第二国际在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所宣布的政策,而倒向他们的传统敌人奥匈帝国以及德国人的一边去了。

我认为,有一点必须承认:从1907年实行成年男子选举权的时刻起,奥地利社会党的锐气就大部丧失了,而且从此就不清楚号召全党的共同口号究竟是什么。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主要是超议会的十字军变成了一个议会政党;党内天生的稳健派以及  
545 在党内得到尊重的老年领袖们,终于得到了他们以前一直没有得到的机会,从内部来影响国家。1907年以后,奥地利议会和中央组织中的党的主体迅速向右转;左右两翼之间的分歧甚至在1914年以前就有日趋尖锐之虑,但是当时由于有必要对巴尔干半岛战争采取一致行动,这种分歧才得到遏制。1914年,他们的统一告吹了,只是告吹到什么程度一时还看不出。原先一直在批评老一辈领袖们的青年人,大都应征服兵役去了,暂时不能有所作为。而捷克人和波兰人则日益关心怎样去设想和规划自己的民族社会的前途,而不那么关心继续同奥地利的“小国际”合作。党内的论调愈

来愈混乱不清了，直到可以显然看出，奥匈帝国的命运已经指日可数，未来的奥地利党的活动领域仅仅是它昔日的活动范围——多民族国家——残留下来的一小部分而已。

在本章所涉及的整个时期内，维克多·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中无容置疑的领袖，威望极高。在第二国际中，他是同倍倍尔、王德威尔德、饶勒斯并驾齐驱的大人物；他所持的始终是调和派的论调，大力强调团结的必要性，并把自己的党当作一个在特别难于维持国际主义团结的国家内需要维持团结的典型例子提出。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论争中，维克多·阿德勒是站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边的。他反对伯恩斯坦，因为他认为，伯恩斯坦所谓的改良主义会使一切拥护改良主义的政党忘记社会主义的目标。他赞成改良，但是不赞成改良主义。他说：“我们必须记住，只有联系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这一点来看，目前我们逐日所从事的劳累不堪的工作才具有神圣性和尊严。”他的这种见解以及许多其他见解都跟卡尔·考茨基的很接近。但是他始终不愿意把他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推向极端。他始终承认修正主义者是真诚的，而且谋求同他们达成协议的妥协道路。他之所以深愿妥协，是由于他生性是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只是德意志和奥地利国家顽固的专制制度才迫使他违背自己的意愿，在理论上持革命论。1907年以后，甚至连这种理论上的革命主义也变了样，只是始终没有完全放弃罢了。正象考茨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体一样，阿德勒也曾设法使改良主义的实际活动同口头上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

维克多·阿德勒虽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但对社会主义思想却没有作出伟大的贡献。他是一位组织者和政治领袖，而不是理论家，只偶然搞搞理论而已。在解决社会党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实现团结的实际问题上，他曾经起过很大作用，但是对于制定民族问

题的理论则没有什么贡献，这项工作留给了奥托·鲍威尔。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维克多·阿德勒也没有作出任何重要的补充；这套理论是他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中现成地接受过来的。他在演说和偶尔写出的文章中显示出既有热情又合乎常理，可是没有实质性的创见。事实上，在奥托·鲍威尔和马克斯·阿德勒成为重要人物以前，奥地利社会党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贡献，基本上是为德国人而不是奥地利人作出的，如前所述，卡尔·考茨基是奥地利出生的；鲁道夫·希法亭也是这样，希法亭所著的《金融资本》是从二十世纪的角度重新阐释《资本论》的经济理论的主要著作之一。除开他以外，在奥地利社会主义的第一代领袖中间，恩格尔伯特·佩纳斯托费尔(1850—1918年)以主张大日耳曼团结著称；威廉·艾伦波根(1863—1947年)是奥地利-比利时式的政治性总罢工理论的杰出代表人物；但是两人都算不上有创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

事实上，在1914年以前，奥地利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独特贡献，除了奥托·鲍威尔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以外，都不容易同德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思潮分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那个时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词在当时所发生的论争中曾流行一时，这主要是联系到认识论方面的争执而产生的，而俄国在这方面的争论要比其他国家激烈得多。普列汉诺夫和后来的列宁都曾指责奥地利的和俄国的“经验批判论者”如波格丹诺夫等人，说他们不该把根本哲学建立在康德的理论上，从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中的一条——唯物主义决定论，同时责备他们不该把黑格尔哲学当作“死狗”，从而抛弃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德国，伯恩施坦则步备受辱骂的F.A.朗格的后尘，打起康德的旗号来支持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列宁又攻击伯恩施坦的死对头考茨基，指责他不该说社会主义者在这种哲学争论中不一定非表明



立场不可，力图也给他打上背叛真正唯物主义的烙印。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发挥自己的观点的刊物，主要是奥托·鲍威尔、卡尔·伦纳尔和阿道夫·布劳恩在1907年创办的《斗争》杂志，以及从1904年开始以《马克思研究丛书》的总名称出版的一系列著作。除了鲍威尔、伦纳尔和布劳恩以外，在考虑1914年以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必须一提的其他杰出人物有：维克多·阿德勒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马克斯·阿德勒和古斯塔夫·爱克施坦。

事实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派提出过一种一致的特殊学说。倒不如说，他们是一批智慧很高的人，从一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出发，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应用到一些具体问题上去，而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马克思未曾考虑到，或者是没有能解决——其中有一些是因为在马克思生前解决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甚至还没有成其为问题。于是，奥托·鲍威尔便主要致力于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同社会主义观点中的基本国际主义有何关系。卡尔·伦纳尔关心的是私法理论以及法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马克斯·阿德勒在所著《因果关系和目的论》中，企图把马克思的哲学概念同康德的哲学概念重新调和起来。鲁道夫·希法亭在所著《金融资本》中，力图根据资本主义从产业阶段向后来的金融阶段的发展，来发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状况的理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金融阶段，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物已经不再是产业雇主本身，而是大金融资本家，他们的利益分布在一大批分立的企业中，主要关心的并不是生产任何具 548  
体的商品，而是如何通过金融垄断并向日益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施加金融高压以榨取纯剩余价值。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爱克施坦在《马克思研究丛书》中所发表的著作，这主要是根据他对日本家庭法的研究而写出的一本关于家庭社会学著作。

上述理论活动的集体产物很难说是一个共同的理论体系。如果说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这个共同点就在于他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容修改的或完整的体系，并决心利用它作为一个起点去提出对当代问题有实际意义的新思想。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1年)是《马克思研究丛书》的编辑之一，1907年从维也纳移居柏林，在该城担任《前进报》的社论撰稿人，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影响的人物。1914年，他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金融资本》。1914年，他加入少数派一边，反对社会党人投票赞成战争预算，后来参加了反战集团。1918年，他成了德国公民，在战后德国国内的斗争中，他作为《自由》杂志的编辑(1918—1922年)反对共产党人，并成为独立社会党人的领袖，这批人于1922年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党多数派。1923年，他曾在施特列斯曼的政府中短期担任财政部长，后来又于1928年再度在弥勒政府中担任此职。1910年以后，他被公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要财政专家。

卡尔·伦纳尔(1870—1950年)后来在1946年担任奥地利共和国总统。他是一个摩拉维亚农民的儿子，曾经在奥地利议会中担任图书馆管理员，1907年当选为议员，这时他立刻开始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起领导作用。他同奥托·鲍威尔一道，大力主张给予组成奥匈帝国的各民族以文化自治权，并把这个问题的法律和行政方面当作自己的专门研究课题。伦纳尔虽然在1914年以前的年代里曾经是奥地利党的前进派分子，但生性是一个稳健派。1918年，他担任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在基督教社会党于549 1920年重新执政以后，他出任议会主席。他所著的《奥匈帝国的基础和发展目标》于1906年出版；这本书力图最全面地根据民族自治的原则为重新建立奥匈帝国提供一个基础。后来他又写了《奥地利的复兴》(1919年)和《经济规划与社会化》(1924年)等著作。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生于1879年)是1914年以前奥地利社

会党领袖的儿子，学的是物理，从1907年到1911年在苏黎世大学担任物理学讲师，并在那里同瑞士社会党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11年，他作为社会民主党的书记回到奥地利，接任《战斗》杂志的编辑。1914年，他是反对战争的社会党人之一。第二国际的瓦解使他深为苦恼。1916年10月，为了抗议奥地利的战争政策，他枪杀了奥地利首相施迪尔克伯爵，并利用审讯的机会发表了一篇强有力的国际主义反战演说。他被判处死刑，但得到缓刑，后来减刑为18年监禁，战争的结束又使他得到释放。阿德勒后来担任新奥地利共和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并担任“维也纳国际联盟”的书记。“维也纳国际联盟”更常见的名称是“第二个半”国际，这个组织企图把互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国际和共产主义国际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一努力失败后，他成为劳工和社会主义国际的书记。1923年，这个国际使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联盟中的各个党联合了起来。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苏黎世的时候，讲授奥地利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1836—1916年)的哲学理论，后来又在监狱里写了一部关于这些理论的著作，叫做《恩斯特·马赫对于机械唯物论的征服》(1918年)。马赫同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关系，但是列宁和其他维护辩证唯物论的人士则认为，主要是他推动了一股潮流，妄图破坏对物质的最后实在性的信念，其方式是让人们回到康德那里去，并在康德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认识论。这种理论虽然摒弃一切形而上学概念，但同时又直截了当地反对唯物论，认为它本身就需要肯定“物质”的实在性，而这一点却无法从感官经验中推演出来，也无法通过任何科学的观察过程加以证实。马赫生于摩拉维亚，曾先后在格拉茨和布拉格担任教授，制定了他所谓的“经济原则”作为科学方法的一条法则：他的意思是研究者始终应该选择最简单的方法去研究问题，并且应该排斥一切对于解决问题并非必要

的、使情况复杂的因素。根据这个原则，马赫排斥了康德把必然处于人类经验范畴之外的“自在之物”当作感觉的基础的看法，马赫认为感觉提供了人类知识的全部内容。他说假定人类所体验到的感觉后面存在着实体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他所根据的是一种不涉及形而上学假定的“实证论的”认识论。这种观点必然要否认真正“物质”的存在，或者不如说必然要否认物质的存在能够被认识到。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都极力反对马赫的这种说法，因为他们认为，怀疑物质的实在性就是堕落到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而且是攻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先有物质、然后才有关于物质的概念的学说。说得更具体一些，马赫断言：所谓的科学定律确切地说来不应该被当作定律看待，而应该仅仅当作解决问题的便利方法看待，因此科学定律便只能结合问题的性质来对待，而不能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认为它们是真实的或正确的。列宁认为，这一见解有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这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普遍性，而把它贬为一种单纯的研究工具。此外，马赫的方法在应用于社会研究时看来是要通过经验的感官内容，从心理方面着手，而不是通过整个物质世界去研究。列宁斥责这种方法必然要运用纯粹的“主观主义”，而不是运用马克思的那种实质上是客观的方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主要是攻击这一学说在俄国的代表人物的，而其中猛烈攻击“马赫主义”的许多说法今天看来是极为粗糙而不得要领的，因为现代的相对论和现代物理学的总趋势显然基本上是按照马赫的路线发展的。我们今天仍很难理解，为什么列宁如此强烈地感到，怀疑物质作为一种“自在之物”实际存在于人类经验之外这一假定的必要性便是一种十恶不赦的罪恶。马赫的真正错误倒不在这里，而在于混淆了以下两种根本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是以感觉的形式取得的”，另一种说法是“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感觉”。肯定后一

种说法，确乎需要具备完全的主观性，并且要否定存在于我们身外的任何世界有任何可以认识的实在性；而肯定前一种说法，则不需要否定这样一点：我们通过感觉确实经验到的外在世界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且我们认识到它同我们对它的感觉不能混为一谈。

看来，马赫研究问题的方法对于1907年以后在《马克思研究丛书》中抒发己见的那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并没有任何影响。毫无疑问，这种方法倒的确影响了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但是他论述马赫学说的著作直到1918年才问世，而且以前他关于马赫的讲学则几乎不为人所知。康德哲学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影响要广泛得多，奥托·鲍威尔就曾受到显著的影响，他的民族理论的提法就受到了这种哲学的作用。

1914年以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集团中最重要的的人物无疑是奥托·鲍威尔(1881—1938年)，他所著的《民族问题与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最初发表在《马克思研究丛书》中，这一著作对各民族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进行合作的问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鲍威尔出生于维也纳，26岁就担任社会党奥地利议会党团书记，当时几乎立刻就被公认为党的首要理论家之一。战争爆发时他被征入伍，在俄国成了战俘；俄国革命期间他一直留在那里，这次革命加强了他的左派思想。回到奥地利后，他被任命为共和国第一届政府的外交部次长，维克多·阿德勒去世后他几乎立刻就担任了外交部长。在战后的年代里，奥地利社会党的新政策主要是由他负责制定的。他所写的小册子《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20年)大致明确了党要走的路线；接着他又出版了两部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一部是《森林和牧场的斗争》(1925年)，另一部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26年)，此外还发表了一部进一步阐述党的总纲领的著作(1926年)。他还根据第一手资料写了《奥地利革命》(1923年)一书，以及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两

部短著,还有一部研究战后资本主义的著作(1925年)。由此可见,除了研究民族问题的著作以外,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问世的,因而不得不留待本书的下一卷去讨论。

然而,鲍威尔关于民族问题的见解却属于本卷范围。奥地利社会党人在重整自己的运动时,为响应民族的要求,曾采取了一定的政策,而力图把党的实际政策以理论形式提出的,就主要是鲍威尔和伦纳尔这两位著作家。他们俩的见解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又不尽相同。两人都深受一个愿望的影响,那就是尽可能不让奥地利分裂成为一些各自以民族团结为基础而完全独立的国家,而且两人都由于这一点而强调民族的文化方面和个人方面,不强调政治或经济方面。但是伦纳尔在这一点上比鲍威尔走得更远,力图确定这样一种可能性:把社会的文化方面和政治经济方面明确地区分开来,旨在建立一种极端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同时保留统一的经济结构和一个代表公民的共同因素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政治权威。鲍威尔至少认识到,要在文化和政治因素之间作出这种鲜明的区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于是便更加深入了一步,分析构成民族的各种因素。

根据鲍威尔的看法,民族实质上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不是建立在种族、语言之类的任何单一的因素上,而是建立在以许多因素为基础的统一的生活传统上,它要求能自由地进行共同传统中所包含的一切活动。在这些因素中,共同的语言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个因素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一个民族。有一种见解认为,单单是语言就构成民族的有效基础。持这种见解的一个后果是,可以把民族主义的要求延伸到所有操同一种语言的人的身上去。这就牵涉到奥地利社会党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希望避免的泛日耳曼主义之类的概念。他们之所以希望避免,其部分原因是需要额外承认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塞尔维亚人等其他语言集团的类似权

利。鲍威尔的看法与此相反,他认为共同语言是民族的一个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的标准;凡是事实上使一大群人或家族同另一大群人或家族区别开来的因素他都愿意考虑。换句话说,他主要是从社会学家称之为“文化”或“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理解民族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便主要从文化自治这一点着眼去考虑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这就是说,他所考虑的是,作出一些安排,让每个民族在它占优势的地区用自己的语言并按自己的风俗去处理一切主要同自己的特有行为方式有关的问题,尤其是在教育、艺术、宗教领域,以及在社会礼仪和社会关系中。但是这立刻就引起了居住在以另一个民族为主的地区中的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根据文化权利的总概念,就必须让这样的少数民族尽可能获得类似的权利,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学校和文化机构,同主要民族的学校和文化机构同时并存。当然,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这种承认权利的过程究竟到哪里才止步呢?就一定地区而言,一个少数民族究竟需要有多少人才能享有文化自治的权利呢?总的说来,伦纳尔所持的极端见解是:民族性应该被当作个人的一种属性看待,每个人在本民族的文化体制中应该享有自己的地位,这种地位向他个人提供享受民族自由和民族自我表现的手段。伦纳尔辩解说,文化因素把众人联合成为一个民族,而不涉及任何阶级对立的因素,阶级观念只应该同社会的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发生关系,而不应该同它的文化模式发生关系。鲍威尔不能接受伦纳尔的上述见解。鲍威尔认为,文化因素同经济和政治因素无法这样分开,但是他也认为,民族具有一种没有被阶级斗争所破坏的因素存在,并且希望这种 554 因素得到承认。

如前所述,社会民主党在 1899 年制定的正式政策中主张用一些新的地区单位去代替奥地利的传统的省区,每个新地区单位都应当尽可能只让一个民族占优势,而且每个地区单位在民族和文

化事务上应当享有立法和行政自治权。如果一个以上的地区单位主要由同一个民族集团居住，那么这些地区就应当组成民族联区来统筹它们的活动；多民族国家的一项职权是制定法律，为所有自治区的少数民族规定文化权利。到此为止，这个方案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它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样的问题应该算作“民族和文化问题”，因而应该由各区按自治的原则去处理；什么样的问题应该算作属于中央管辖范围的共同问题。奥地利日耳曼区的社会党人希望尽可能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当作整个国家的共同问题，但是其他主要民族，特别是捷克人和波兰人，决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哪怕当时他们仍然愿意暂时在奥地利国家的大范围内工作下去。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他们更加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因为他们开始相信奥匈帝国多半会迅速崩溃，而且相信自己有希望建立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

但是奥匈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却远远不象捷克人和波兰人那样有发言权和有民族意识。鲍威尔在他的著作中把民族分为“历史性的”和“非历史性的”；所谓“历史性的”民族大致说来是指那些本身具有层次分明的阶级结构的民族，他们有本民族的贵族、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许还有与一般人民不同的手艺人 and 农民群体；而“非历史性的”民族则是指这样的群体：他们在丧失自主权<sup>555</sup>之后，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集团，从而沦为臣属和受剥削的群众，主要为不同民族的统治阶级的利润服务。鲍威尔看到，这些受压迫的“非历史性”民族中有一些人正在逐渐恢复民族意识；他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出现这种情况的过程是，中坚分子将作为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日益壮大起来。他认为，奥地利国家如果要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存在下去，就必须认识到“非历史性的”民族中间这种民族意识的发展。但是由于他也希望保持经济统一的格局，于是就象日耳曼族的其他奥地利社会党



人一样，他也认为，在宣传上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竞争，自己必然要处于劣势，因为他们可以煽起仇外情绪，而这正是主张多民族团结的人不得不回避的。当然，奥地利社会党人可以强调工人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经济利益，以唤起阶级团结的情绪去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往往发现，在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成员同雇主和其他上层集团属于同一民族的地区，这种号召并不起作用。实际上，文化、经济和政治问题是无法彼此分开的。虽然在党的各民族成员偶尔举行的全奥代表大会上，以及在各民族社会民主党奥地利议会党团的某些合作中，仍然有多民族的全奥社会民主党这个影子存在，但是随着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由于不得不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不那么受压制的民族主义宣传展开竞争，从而在民族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就日趋瓦解了。

当然，俄国人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列宁在所写的题为《论民族自决权》的一组论文中，也力图解决这个问题。这些论文发表于1914年，主要是答复罗莎·卢森堡的。列宁在这些文章中特别提到奥托·鲍威尔，并且指出为什么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一心想维护和发展整个奥地利国家的无产阶级团结，以文化自决这一概念为掩护，力求避免承认政治自决权。列宁说，政治自决权的含意是**有权脱离原来所属的体制，另建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是民族主义者，或是希望大国分裂成为独立的民族主权单位。他倒的确坚持，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民族自决权，包括从原来所属的体制脱离出去的权利，而不能任意地停留在仅仅承认文化自治权这一点上。对列宁说来，在原则上支持一种权利并不等于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实际行使那种权利都是适宜的。在他看来，一切“权利”都只有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才是实际有效的；他的民族独立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为依据的。对列宁来

说,在作出这些判断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对国际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强调,每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在向前发展的阶段,都必然要建立一个自治的民族国家作为本身的政治表现,这一点已经证明是历史的必然性。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这就曾经是一个特点,但是在东欧,先进的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的资产阶级革命则仍在酝酿中,因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仍处于上升阶段,社会党人必须同这种民族主义运动结成联盟,承认这里的民族可以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机行使其权利,脱离原来所隶属的统治国而自行建立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说,行使这种权利是可取的,因为这一点必须同促进无产阶级的国际合作这一主要要求调和起来。不过社会党人不论是否愿意看到这种权利在具体情况下得到行使,都必须支持这种权利,否则就会助长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的民族主义要求,粗暴地压迫被奴役民族的无产阶级。列宁并没有否认“文化”民族主义,但是他强调这种民族主义立论不足,同时强调

557 如果它还包含否定政治自决权直到反对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内容,那么它骨子里就藏有反对的含意。列宁本着这种精神为挪威人脱离瑞典的“权利”辩护,并且赞扬瑞典社会党人给予挪威人的支持。他说,这种支持非但远远没有使瑞典人同挪威的工人阶级断绝关系,实际上反而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去反对两国资产阶级的压迫。

在奥匈帝国多民族的奥地利这半部分中,奥地利社会党人面对着积重难返的民族冲突问题,没有能够找出一种可以让人接受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受保持奥地利国家体制的统一这一概念的束缚,以求维持全奥工人阶级的阶级团结。然而他们在力图解决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倒的确对民族理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尽管他们没有能为一个民主的奥地利联邦规划出一种行之有效的组织结构,但是他们确曾为那些民族分裂

的力量不那么强大的国家处理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自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于帮助俄国人在多民族的苏联这一总的结构中解决民族自决问题，奥地利的民族理论的贡献尤其大。

在 1914 年以前的年代里，在重要的奥地利社会主义理论家中，尚待一提的是马克斯·阿德勒(1873—1940 年，或 1941 年)。他跟上面已经谈过的更为著名的维克多与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父子没有关系。关于社会主义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的理论和现实，马克斯·阿德勒的著述很多。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因果关系和目的论》是鲍威尔—希法亭等人所出版的《马克思研究丛书》中的一部。在这个阶段，马克斯·阿德勒主要的企图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康德哲学调和起来。1914 年，马克斯·阿德勒加入国际主义反对派一边，反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战争政策。在 1918 年以后问世的后期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企图在共产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筑起一道桥梁。他致力于研究现代世界上阶级结构的实际发展，并且得出结论说：大规模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同马克思时代的小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新兴的薪金无产阶级，因而就必须从如下角度去重新阐释阶级斗争的理论：必须承认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有必要进行合作；同时必须特别强调在二十世纪的先进经济社会中，体力劳动者已经不再能够单独进行社会革命，而必须带着其他阶层跟自己一道前进，否则这些阶层就会投向法西斯主义一边。

558

谈到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奥托·鲍威尔以及马克斯·阿德勒都把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区别开来，并且断言政权虽然可以由工人通过一次革命的胜利而一举获得，但是经济权力则不然，这要求在工商业管理的任务中进行长期的训练，因而只有通过逐步渐进的方法才能取得。这两种见解本身都没有创造性，重要的倒是在制定社会主义政策的时候对这两种看法的重视。特别是其中的

第二种看法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革命行动。但是这种看法并不排除革命在政治领域中是单独一次行动的概念，这个行动会一下子推翻资本主义国家，而不会一下子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特性。

这两种看法的充分发挥，是 1917 年俄国革命以后那个时期的事；当时西欧的左翼社会党人力图表明他们同右翼社会党人有什么分歧，同那些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共产党又有什么分歧。因此，这两种看法最好是留待本书后面——也就是等到我们讨论俄国革命和西欧的战争动乱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引起冲突的时候——再去讨论。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不得不提，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同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 1914 年以前就发生了争执。

## 本章 附录：西奥多·赫尔茨卡

559 我们在前面叙述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没有提到自由主义新闻记者西奥多·赫尔茨卡在 1890 年所发起的一个运动。有一个时期不仅在奥地利，而且也在其他国家，他都赢得了很多信奉者，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就一般的意义说来，赫尔茨卡决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跟社会民主党或工人阶级运动都没有关系。然而他的《乌托邦》却非凡地把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同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了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文献；在我所涉猎过的文献中，以这份更能代表人们的这样一种愿望：不通过阶级斗争而逃避资本主义，并通过明智之士所取得的协议，而不是通过革命，甚至也不是通过政治斗争，来建设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赫尔茨卡否认阶级对立的必然性，相信通过开明而善良的人们的行动，就有可能使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他对现存社会关系中的无能和道德败坏的状况感到吃惊，于是便号召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分阶

级,采取步骤去建立一个新社会,但并不是要求政府使之实现,也不是组织暴乱去推翻现存制度,而是选定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制度尚未开发的地区,率领一批开拓者到那里去建立一个崭新的共和国,把自由企业的优点同社会管理的长处结合起来。号召有识之士率领一批信徒,离开不道德的旧世界,前往一个没有被腐化而能建立新社区的社会环境中去建立乌托邦;这当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赫尔茨卡的乌托邦的新颖之处在于,他非但没有否定自由企业和竞争性生产的原则,反而力图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他的社区,让这些原则普遍发生作用,并使劳工获得资本主义制度不允许他们享受的自由。

1890年,赫尔茨卡(1845—1924年)发表了他的乌托邦小说《自由之邦》;小说第二年就被译成了英文。赫尔茨卡父母亲是犹太人,生于布达佩斯,但是他的记者生涯却是在维也纳开始的。从1872年到1879年,他担任《新自由报》的经济编辑。1879年他创办了《维也纳总汇报》,并一直主编该报到1886年。后来他又创办了一家周刊,名为《国家经济和国民经济杂志》。1901年,他回到匈牙利,担任布达佩斯的一家日报的编辑。这一时期,他已经出版了一些关于经济和货币问题的著作。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社会问题》于1912年在柏林问世。

《自由之邦》一书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最完整地发挥了那种把经济自由主义同社会主义思想混合在一起的社会学说。赫尔茨卡是研究古典经济学说的大学者,对自由竞争的企业优点深具信心。他希望建立一种经济制度,尽量保证人人都能按照他对生产所作的贡献大小得到报酬,或者说按照他对社会所提供的劳务的价值得到报酬。他认为,这一点只有让劳资双方在对市场需求作出反应时绝对保持自由才能办到。但是他也同样强调,市场的需求除了受生产力的限制以外,不应受任何其他力量的限制,而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市场的需求却由于大众的贫困而受到限制。尽管生产的技术力量有巨大的加速的发展，但大众的收入却仍然保持在或接近于仅能维持生活的水平。事实上，他是一个消费不足论者，认为经济危机和争夺市场的现象之所以出现，是由于维持生计的工资的法则发生作用，使群众的消费力受到人为的限制。他把这条法则的普遍发生作用归咎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种制度一方面使有产阶级能够榨取工人生产产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诱使他们限制产量，以避免市场上商品过剩。因此，他主张所有土地都应归社会公有，国家应该向所有需要的人发放无息贷款，但是如果贷款不再用在指定的用途上，则应偿还。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向任何希望耕种土地的人出借土地。赫尔茨卡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和资本的需求，将主要来自合作组织，其管理人员将以民主方式任命，并将共同对国家负责，保证偿还交给他们的资本。他也想到向私人发放一些贷款去作小规模经营，但是他认为既然工人在合作社里入股比赚工资更好，因而资本家就找不到愿为工资而干活的工人，于是资本主义企业也就会消灭了。大规模企业应由国家本身举办，比如修建铁路、码头和其他公共工程等；使用这类公用事业应当完全不收费。国家银行在向有需要的人提供资本的时候，除了保证用于生产以外，不应该对款项的用途进行任何控制。赫尔茨卡相信，只要进入任何行业都完全不加限制，只要充分的竞争得到保证，这种控制便是不必要的。他说，如果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扩大某种生产而远远超过他种生产，那么竞争很快就会使收益减少，从而驱使剩余劳动和资本转用于其他方面。为了使垄断企业无从发展，生产合作社应该向每一个愿意按平等合伙的条件入社的新来者敞开大门。

在这个社会里，既然无需支付租金或利息，因而除了用于原料和燃料的成本以外，并没有其他生产成本可言，因为包括经营管理

工作在内的劳动都不计入成本项下，而是人社者分享纯收入的依据。这里也不会有工资，而只会根据每个企业的纯收入分享红利，经理人员和熟练工人的所得会比较高，其比例由每个组织自由决定。不过，国家会对每个企业的收入征收赋税，征税所得用于三大方面：（1）支付政府的费用以及支付免费提供公用事业的开支；（2）为新的投资提供基金，以便用于国营企业并为有意借款的人提供无息贷款；（3）按生产者的生活标准支付非生产者的生活维持费，这笔费用将因生产者的平均收入而异。赫尔茨卡论证说，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主要是先辈的发明才能和精力所创造的成果，应该当作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看待，并应用来满足全面的社会保险的需要。因此，赫尔茨卡主张从公共基金中拨出一笔钱来津贴所有儿童、老年人以及丧失工作能力的人；除此以外，他还打算为所有的妇女支付津贴，除非她们愿意离开家庭参加别的工作；他认为，除了艺术和自由职业（特别是教学和看护工作），妇女几乎不会愿意出外工作。 562

赫尔茨卡说，如果按上面所建议的制度办事，人人都会深受鼓舞，愿尽一切可能提高生产，因为生产的每一步提高，都会通过收入的平均化过程而反映在每个人的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上，这个平均化过程由于劳动和资本的充分流动而得到保证。他具有无限的信心，深信无限制地应用每一种技术设备，就有可能提高生产；深信为几乎没有限制的市场进行大规模生产具有取得经济效果的潜力；深信竞赛能有效地鼓舞各级人员从事创造发明并发挥工作效率。除了主要的公共工程以外，他强烈反对集中规划和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

在政治上，赫尔茨卡主张不分男女同样享受彻底的民主权利。但是他的政府概念基本上是多元论的。他不主张成立单一的议会，而希望建立许多平行的职能参议会，它们全都由普选产生，每

个选民都能自由地决定在哪一种选举中投票。他深信议会政府会导致一无专长的人而不是有识之士决定方针大计，同时力陈他所提出的职能制度能保证人民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项投票，从而能选出最优秀的代表。在工业方面，他主张经理人员一旦以民主方式选出以后就应当把大权交给他们，但经理人员又可以通过普遍投票的方式予以撤换，从而使他们对合作组织负责。

赫尔茨卡非常强调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也强调艺术的地位。他还大力主张维护家庭生活，不过他认为婚姻只有在双方自愿的  
563 时候才能结合并且维持下去。他深信不疑，自由生产的限制一旦取消之后，财富就会迅速增加，这样就不仅能使先进国家人人都过上康乐的生活，而且能使整个世界都做到这一点。

赫尔茨卡为《自由之邦》一书中所描述的乌托邦选择了肯尼亚高地作为地址。他说这个乌托邦是一个国际组织建立的，该组织之所以选择那个地区，是由于那儿宜于白种人移民，而且由于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矿藏丰富，因而便于大规模发展经济。他描述他的合作组织是依靠那些希望在新移民区中定居的人乐捐而建立起来的。十分奇怪的是，根据他的描绘，这些人占有这个选定的地区，不久以后又大大地向外扩张，竟没有受到任何大国的干涉，同时也没有遭到当地居民的激烈反抗，尽管在一开始不得不稍稍使用精良的武器吓唬他们一下。赫尔茨卡决不是不考虑当地土著的利益，但是他认为非洲大陆能够养活大批移民而不会侵犯当地人的任何权益，事实上移民对当地人还会大有好处。自由之邦的人不仅向他们传授文明和生产技术，而且只要他们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还愿意一视同仁，承认他们是正式公民。当他们起来反对这一开化工作的时候，就很快把他们解决掉。赫尔茨卡的那本书叙述了自由之邦在阿比西尼亚皇帝的军队进攻它的领土时，怎样彻底击溃了这支军队。赫尔茨卡毫不怀疑西方文明是优越的，也毫



不怀疑他的移民有权占领“最黑暗的非洲”这一片几乎渺无人烟的土地，哪怕必要时动用武力。

在赫尔茨卡的小说中，自由之邦由于它的自由制度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和最有教养的国家。书中最后叙述了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情况，代表由全世界各国选派，大会决定把自由之邦的制度推广到各地去。甚至连最反动的国家的代表也认识到，<sup>564</sup>国内人民的态度不容自己作其他选择。于是，大会就有必要决定如何处理各国有产阶级的既得利益的问题。自由之邦本身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它原先是在一个无人占领的地区——至少也是在一个拥有充分的土地与资源可供利用的地区——白手起家的。赫尔茨卡说，世界代表大会根据自由之邦的代表的意见，赞成对所有业主的财产损失进行补偿；偿金（在某些国家，对任何人都<sup>有一个最高限额</sup>）可以一次付给或分期付款。他指出，接受偿金的人可以任意处理他所得到的钱，但无法利用这些钱去牟取利润或利息，因为既然可以从国家得到无息资金，谁也不会愿意支付利息，既然可以参加自己所选择的任何生产合作组织，谁也不会愿意受雇于人。因此，接受偿金的人不是把钱化掉，就是捐献出去。

这个出色的乌托邦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典型的例证。赫尔茨卡完全站在穷人一边而反对剥削者，而且他谴责资本主义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任何社会主义者，后者所希望做到的也不过如此。但是他绝口不谈任何阶级斗争的概念，也不愿意乞求阶级团结。他相信，通过少数人的理智的说服工作，加上成功地证明他的计划是实际可行的，就完全有可能和平地进入乌托邦。他的观点既是伦理的，又是从经济出发的。他提出如下两点理由为自己的论点辩护：他的计划能结束人类的痛苦并能保障社会的正义；他的计划能解放受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巨大生产力。从根本上说，他的观点是伦理性的：权要人物的

愚蠢固然使他感到吃惊,而更能打动他,使他深感不安的则是大众的痛苦。

当然,选择中非洲作为自由之邦的所在地并不是偶然的。赫尔茨卡在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各大国正在迅速瓜分非洲,但内地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被占领。当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已经召  
565 开了会议,并于1876年成立了非洲开发与开化国际协会,这个协会又在1882年成为刚果国际协会。到1890年出版《自由之邦》的时候,利奥波德已经按照一条同赫尔茨卡所提倡的方针完全不同的路线大大发展了他的刚果自由邦。<sup>①</sup>他正打算对阿拉伯人以及企图抵抗他的剥削的当地部落发动一系列战争。他的措施当时虽然还没有引起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这场运动到后来终于迫使他把自己的庞大帝国的政权交给比利时国家),但是当时已经看得很清楚,刚果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成为社会更生的榜样的地区。

有一个时期,赫尔茨卡赢得了很多信从者。在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的某些国家都成立了自由之邦协会。据说,威廉·兰恩就是受了赫尔茨卡这部著作的影响,才带领他那些命运不济的追随者到巴拉圭去<sup>②</sup>,并打算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尽管兰恩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成份要比赫尔茨卡多得多。后来,赫尔茨卡的许多概念又在“自由社会主义”中引起共鸣,后者是德国社会学家弗朗兹·奥本海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提倡的。但是自由之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今天也很少有人读这本书。这是深可惋惜的事,因为其中有大量正确的经济观点。

---

① 参看本卷下册第115页及以下。

② 参看本卷下册第338页。

### 匈 牙 利

匈牙利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短时期当政，在这以前，社会主义始终是一个受压制的运动。匈牙利的运动没有产生过十分重要的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堪与奥地利人相比拟的广大群众的支持。如果说它没有象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那样为民族分歧和坚持分别建立各民族政党的问题所困扰，那只是因为它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部分的非马扎尔人居住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北部的斯洛伐克人和小俄罗斯人、东部的罗马尼亚人和南部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中间，社会主义运动的追随者一直寥寥无几。匈牙利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始终在布达佩斯，而在匈牙利中部平原的农村劳动者中只有很少的一点力量。这些农村劳动者是马扎尔人，而在布达佩斯，社会主义信从者的国籍很复杂，其中包括许多日耳曼人，特别是在领导人中，犹太人占很大一部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深受奥地利党的影响。这就是说，基本上受以维也纳为主要基地的占优势的日耳曼人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情况，1890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才整个地采纳了奥地利党的海因菲尔德新纲领。后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还同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合作，共同反对在匈牙利北部推行的匈牙利的马扎尔化运动。

决不要忘记，奥匈帝国时代的匈牙利是一个比今日匈牙利大得多的国家。除了中部的马扎尔地区以外，它还包括：北部和东北部的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一小俄罗斯，东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和主

要是日耳曼人居住的特梅斯瓦尔地区,以及西南部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伏伊伏迪纳。马扎尔人,包括彻底马扎尔化的非马扎尔人血统的种族在内,虽然实际上完全垄断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只有克罗地亚一地除外),但是他们的人数却不到总人口的一半,只是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上层阶级对本身的优越性有强烈的信念,而且毫不怀疑有权坚持自身的民族要求,同时也有权压制受其奴役的民族和自己同族的下层阶级。只有克罗地亚才享有马扎尔人无法触动的自治权利;克罗地亚曾帮助奥匈帝国皇帝粉碎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即使在克罗地亚,当地长官也是由布达佩斯任命的,并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严厉对待任何颠覆运动。至于其余的民族,他们——特别是如果他们有钱的话——取得种族优越地位的唯一途径,就在于采用马扎尔人的语言及其生活和思想方式,并且改变自己的名字和习惯,与马扎尔人同化,从而成为马扎尔人。决不是所有马扎尔的热心民族主义者都出自马扎尔祖先,丝毫也没有混杂。日耳曼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承认为不属于被统治的种族而无需放弃他们的民族习惯或语言,也无需改变他们的名字;事实上,长期定居在匈牙利中部和北部的日耳曼人——施瓦本人——往往就是热心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并在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武装部队中占许多领导位置。然而,除非他们已经马扎尔化,否则仍要受到怀疑。犹太人控制着金融和财政,在这些行业和商业界基本上居支配地位,但是只要他们保持原有的名字和宗教,他们就是另一个被容忍的集团。有些犹太人完全马扎尔化了;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富有的犹太家族的成员变成了基督徒,而且改变了自己的名字,为的是使自己的家庭取得做生意和得到社会承认所必需的那种地位和影响。事实上,犹太人除了几乎完全控制财政和大规模工业以外,不仅领导着社会党反对派,而且还至少在同等程度上领导着中产阶级反对派;他们构成包括自由职业者

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很大一部分。犹太人在左翼居领导地位这一事实，自然就被他们的反对者充分利用，借以诋毁左派，这批反对者所用的伎俩就如同奥地利的基督教反犹太组织所用的伎俩一样。

不过必须注意，不要误认为马扎尔人单纯是一个压制其他民族的统治民族。马扎尔人的主体是一些拥有很少耕地的农村劳动者和农民，受压迫的情况同其他民族的劳动者和农民差不多。马扎尔贵族丝毫也不愿意承认，穷苦的马扎尔人有资格分享自己的政治权力，或者应该比下层阶级的其他成员受到较好的经济待遇。在马扎尔贵族的眼里，民族权利和民族传统体现在地主阶级或那些出自贵族祖先的马扎尔身上；但与此同时，他们通常在事实上也乐意吸收为数有限的被同化了的富人作为“荣誉”马扎尔人。

比起匈牙利统治下的斯拉夫或罗马尼亚劳动者或者农民来，受压迫的马扎尔劳动者和小农比较容易为社会主义的号召所唤醒，因为他们不愿接受同其他阶级的同胞联合起来去抵抗外国压迫的号召。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马扎尔同胞的压迫，而同他们地位相等的斯拉夫人或罗马尼亚人，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往往受民族主义运动的吸引，而同匈牙利边界那边的本族同胞联合起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匈牙利的巨大农村骚乱，大多发生在马扎尔地区，而当这些骚乱蔓延时，则大多蔓延到巴纳特的日耳曼人中间去，而不是蔓延到任何其他种族中间去。

另一方面，在产业工人运动中，有很大一部分非马扎尔人；而在工业界的雇佣和经理阶级中，非马扎尔人也很多。上层阶级的马扎尔人看不起工商业，因而使那些不能依靠地产收入维持生活的人纷纷涌向公务员行列，成为贵族议会和地方选举的郡权力机关的重要助手；马扎尔人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而郡权力机关则由他们一手操纵。因此，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都清一色地掌握在马扎尔人的手里；而在工业方面，不论是在高级职员中还是在熟

练工人中，日耳曼人都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非熟练工人的成分就复杂得多，其中有来自许多不同种族的涌到城市找工作的城市化了的农村人。产业工人阶级的这种多种族的结构使它具备了接受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福音的条件。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工会同社会民主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说明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为什么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观点。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一直处于原始状态的匈牙利工业，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有了很大发展。匈牙利的工业基本上靠外国投资，也几乎完全由非马扎尔人管理，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犹太人。在它的熟练工人中有很多日耳曼人；另一方面，不熟练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来自斯洛伐克和其他人口稠密的农业地区的非马扎尔人构成的。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工业中心，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在欧洲算得是最坏的，一条鸿沟把少数熟练工人同其余的城市无产阶级分开了。在城市就如同在农村一样，尽管工业技术有了发展，但是由于物价上涨而货币工资却未作相应的增加，因而大部分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不熟练的劳动力从农业地区不断流入城市，这就造成这种劳动力的供过于求的持续趋势。

这种涌向城市的现象，与其说是由于工业发展具有吸引力，倒不如说是农村人口增加的后果。当时流行的农业制度是，上层贵族拥有大田庄（许多田庄的确很大），人数特别多的绅士阶级拥有小田庄，土地一部分由农民占有者或佃户在通常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耕作，但大部分则由工资劳动者耕作，这些人甚至在正式解放以后仍然处于半奴隶状态。这里还有一个农民阶级，大部分由日耳曼人组成，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其中有一小批富裕农民（有一些非常富裕）。但是这个农民耕作者阶级人数比较少，而且由于存在着把土地分给儿子的习惯，所以他们大多数人的经济地位往往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每况愈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兴修河

道和运河，恢复了一些被水淹没的土地，耕地面积有一个时期得到了迅速扩展。这种土地大部分为投机家购得，他们雇用大批移民工人加以整顿，然后再以高价售出。这种活动帮助制造了无产阶级，其中一部分人在整顿土地的工作结束后涌向城市，另外一部分人则回到农村传播新思想。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向外移民为农村的很大一部分剩余人口找到了出路——主要是到美国去。这主要是从匈牙利北部的斯洛伐克人中间开始的，后来扩大到其他部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移民人数增加很快，这有助于巩固城市工人的地位，同时也牵制了——虽不能防止——农村条件的恶化。不过问题虽然减轻了，但并没有得到解决。不论在不熟练工人中间，还是在农业方面，匈牙利仍然是一个失业现象严重的国家，只有在工业的繁荣时期和农业地区的收割忙季节，才需要较多的额外劳动力。熟练的产业工人是比较少的，他们所受的痛苦比不熟练工人小得多，城市中受苦最深的是那些从农村迁来的居住条件极其恶劣的人，他们形成了庞大的游民无产阶级，尤其是在布达佩斯。农村骚乱往往在收割季节发生——这种情况与农业国家完全不同，在农业国家，农村骚乱往往发生在夏种和秋收之间的农闲季节。

从政治上看来，在1914年以前，条件仍然完全不适合任何能够有效利用议会方法的社会党的成长。当时的条件也不容许代表少数民族的政党采用这种党在奥地利帝国成长的那种方式去建立党。1867年的所谓“妥协方案”恢复了匈牙利的自治地位，在这以后经过改组的匈牙利议会甚至都不是——而且也不打算是——整个匈牙利的各上层阶级的代议机构。它仍然是受马扎尔人统治的贵族议会，非马扎尔人通常只有在承认马扎尔人的优越地位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议席。不仅城市工人和农业无产阶级（即使他们是马扎尔人）没有选举权，而且所制定的选举制度实际上也几乎把斯

拉夫人和其他劣等种族排除在外。在主要是非马扎尔人居住的地区,许多地方实际上是“居民零落的选区”,在这里一小撮被批准的选民都选举早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的可靠支持者。马扎尔人的选区的选民比较多,真正进行竞选的机会也要多一些,但是总的说来,编制选民名单和根据产业进行不公平的选举就是一套复杂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法,这首先就使政府得以篡改名单以保证贵族和马扎尔人的优势,其次又可以任意剥夺名单上出现的任何可疑选民的投票资格。最重要的是,公开投票提供了进行恫吓的大好机会。在编制名单的最初阶段,有一条原则是,把每一个被认为不是处于“自由”地位的人排除在外;于是这条原则就被解释成为,不但不准许地主田庄上的仆人投票,而且以此类推,也不准许任何工业中的“雇工”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体力劳动者投票。这种选举制甚至远比 1867 年以后的奥地利选举制还要不开明,因为它不仅是针对下层阶级的,而且也是针对一切被视为马扎尔统治的实际反对者和可能反对者的。

这就说明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不仅是匈牙利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支持选举制的改革,支持改革的还有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以及奥地利方面的朋友,他们维护“1867 年的妥协方案”,反对那些主张给予匈牙利较大程度的独立或者完全独立的人。在 1848 年匈牙利革命失败以后,这个国家有一个时期丧失了内部自治的地位,屈从于帝国的统治。1867 年,帝国由于被普鲁士击败而遭到了削弱,奥地利也被赶出德意志邦联,这时马扎尔人已处于坚强的地位,足以要求恢复他们的“历史性权利”。于是匈牙利再次成为独立的国家,同奥地利的关系是共有一个国王,在国王下面有一支联军,匈牙利必须为这支军队提供兵员和一部分军费;但是马扎尔人坚持他们有权投票通过——或者否决——兵员和军费,也有权保持一支第二线的本土军,并在本土军中使用马扎尔语。此外,奥



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关系还在于共有一位外交大臣和一项贸易协定。这项协定旨在使匈牙利的市场向奥地利的工业开放，奥地利的市场向匈牙利的食粮开放。在服兵役的条件上、有待表决的兵员和军费上以及贸易协定的条款上，双方经常发生争执。匈牙利的政治主要是“1867年派”同“1848年派”之间的争执；前者准备使“妥协方案”生效，后者则想改变这个方案，使匈牙利在较大程度上摆脱帝国政府。在马扎尔上层阶级的大多数人中，1867年的妥协是很不受欢迎的。事实上，这种妥协在其他民族集团的上层阶级中间倒得到较大的支持，这些上层阶级赞成同奥地利建立联系以反对马扎尔人的彻底统治，并且认为在联合军队中，特别是在帝国军队中，有发展的机会。每当“1848年派”压力过大时，帝国政府就偏向斯拉夫族，并且威胁要改革选举制和采取其他措施，使马扎尔人和其他民族集团更接近于平等。每当“1867年派”过份迁就以迎合帝国政府（当然，这个政府往往是日耳曼人占优势）的愿望时，“1848年派”就进行活动，煽动马扎尔人的民族情绪反对同奥地利所建立的关系。不过，大多数马扎尔贵族即使愿意采取比1867年妥协更高明的措施，也不想完全中断同奥地利的关系，因为他们害怕俄国，对于不依靠奥地利的帮助自己是否有能力维持住对斯拉夫臣民的统治是抱有怀疑的。而奥地利人则需要匈牙利作为自己军事力量的来源和维持奥地利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工具。

1848年，匈牙利的革命遭到了破坏，这不仅是由于克罗地亚人反对革命暴动和杰拉西斯军队的人侵（事实上，这两者所起作用很小），而且也是由于俄国派出军队帮助奥匈帝国的皇帝以及革命内部发生了分歧。路易·科苏特是一个抱有进步社会观点的左翼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同马扎尔贵族以及匈牙利的斯拉夫人有争执，后两者造成了他的失败。在1867年以前，马扎尔的民族主义倾向

于团结起来反对奥地利的统治；而在妥协以后，主张反对奥地利干涉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同马扎尔贵族经常发生冲突，后者害怕科苏特所主张的民主，因而宁愿赞成妥协方案，也不愿支持任何有可能帮助恢复民主的骚动。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而混乱的局面：帝国政府常常支持匈牙利的斯拉夫人，为此目的有时还赞成进行选举制的改革，而它在匈牙利的最好的朋友——马扎尔保守派——却正是这种改革的最坚决的反对者。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扩大匈牙利选举权的斗争就不可能主要采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反对贵族的运动的形式。这场斗争还具有完全另外一种性质，它恰似一把达摩克里斯的利剑<sup>①</sup>，悬挂在希望保持对马扎尔臣民和非马扎尔臣民的垄断统治的马扎尔贵族的头上。当然，社会党人和中产阶级激进分子是要求得到成年男子选举权的，但是在高度贵族化的马扎尔议会中，这两个集团都无法取得稳固的立足点，也都很难同被粗暴地剥夺了议会代表权的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主义集团联合起来。

同包括波兰在内的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豪感更是发展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难于逾越的障碍。反日耳曼主义、反斯拉夫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在煽动反对社会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国际主义运动中都起了作用。由于农村居民和一部分城市居民抱有强烈的宗教偏见，反犹太主义就成了对付社会主义者的一张最有效的王牌。面对着所有这些障碍，实际上仍然掀起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特别是在布达佩斯；有一个时期，农村社会主义看来也很可能在农业地区，至少在匈牙利中部，获得一个立足点。但是直到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

<sup>①</sup> 古希腊王迪奥尼西为了满足宠臣达摩克里斯追求虚荣热中权势的贪欲，把宫殿交给他，让他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当达摩克里斯坐在王座上举行盛宴时，忽然发现自己头上有一把用马鬃悬着的利剑，眼看就要落下来，于是他吓得离席而逃。这里用剑比喻对贪图权势的危险。——译者

大战结束时分崩离析，马扎尔人对非马扎尔人的统治也随之完蛋，社会主义运动才在面临失败的时刻，一度成为真正强大的力量，然而即使到了这时它也终于被马扎尔贵族的反革命力量的白色恐怖所粉碎。

有记载可查的第一个工会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在匈牙利出现，直到 1867 年以后才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布达佩斯的排字工人早在 1861 年就建立了某种行业组织。1867 年，印刷业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用德文和意大利文进行议程。因此，就象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排字工人似乎是先驱者。其他工会接踵出现；1869 年，在维克多·丘尔弗尔迪(1844—1894 年)的领导下，成立了总工会。他在 1868 年就已创办了《工人杂志》，这个杂志就成了总工会的机关报。第二年，1848 年的老战士米哈伊·塔姆斯西克斯创办了一个更鲜明的社会主义刊物《金色的号角》，但是这个刊物不久就遭到了警方的干涉而被封闭了。直到这时，社会主义思想在匈牙利的主要鼓吹者是约瑟夫·克里托维奇斯，他的学说主要继承路易·勃朗。他主张“工作权利”和建立自己管理的民族工厂，由国家供给资本，采用成年男子选举制使工厂民主化。这个纲领当然也是拉萨尔的纲领；六十年代后期，拉萨尔派的影响相当大，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雅诺斯·拉比。后来，拉萨尔派社会党人同主张成立友好互助社的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种社团是以受舒尔采-德里奇的影响而在德国成立的团体为蓝本，为促进共同福利和社会和平而建立起来的。1870 年，两个集团发生了分裂。1867 年以前，结社权受奥地利法律的管制，法律严格限制集会权，而且不准许罢工。以后几年，法律立场摇摆不定；因此，工会得以在没有严重干扰的情况下有所发展，不过它们通常都以友好互助活动为掩护，并且通过辅助性团体半秘密地举行会议。1872 年的法律承认结社权，甚至也承认罢工权，但是规定煽动罢工是犯罪行

为，并为取得官方承认附加了许多限制。实际上，1872年的法律旨在把工会引入和平的互助活动中去，按照舒尔采·德里奇的原则同雇主合作，从而使他们脱离革命思想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对于示威和公共集会权利的限制实际上是加强了；至于农业工人则根本没有授予结社权。

1872年以前，匈牙利工人根本没有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历次代表大会；1869年，协会的一个使者威廉·拉斯普在布达佩斯出现，但是很快就被逮捕了。不过，匈牙利的一位代表——卡洛伊·法卡斯——出席了1872年的海牙会议，并同马克思多数派的代表一道投票反对巴枯宁的追随者。看来他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温和派，主要以主张疾病保险著称。早在这以前，匈牙利政府就取缔了总工会，并以叛国罪控告它的领袖，结果是工会瓦解而不复存在了。然而，工人运动却保存下来了。1873年，维克多·丘尔弗尔迪（真姓名为雅各布·梅耶）和雅各布·施莱辛格创办了《工人纪事周刊》；丘尔弗尔迪又同安塔尔·伊林格一道成立工人党。党遭到了压制，但是刊物却设法保全了下来，尽管常常同警察发生纠纷。

直到此时，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在匈牙利还非常小，虽然《共产党宣言》被翻译了过来（但遭到取缔），而且工人刊物还发表过第一国际的一些宣言。但是在1875年，巴黎公社委员列奥·弗兰克尔（1844—1896年）回到了匈牙利，立刻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弗兰克尔生于布达佩斯，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住在国外；巴黎公社时期，他在巴黎，负责劳工和就业政策。<sup>①</sup>巴黎公社失败后，他逃往伦敦，在那里会见了马克思，接受了他的思想。弗兰克尔没有参加过国际的任何会议，但是非常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着手按照刚刚在哥达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统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576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153页及以下。

模型,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从1876年到1881年,他在布达佩斯主编《工人纪事周刊》,很快就同丘尔弗尔迪发生了争执。丘尔弗尔迪在1877年出狱以后,就创办了对立的刊物《人民的呼声》。同年,弗兰克尔作为匈牙利的代表,参加了在根特举行的社会主义统一代表大会;1880年,匈牙利人自己设法召开了一次劳工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大致是社会主义的纲领。第二年,弗兰克尔由于发表了关于军队的言论以煽动叛乱罪被捕下狱。当他身系囹圄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执愈演愈烈。在整个八十年代,两者之间争执继续支配着每一个运动。与此同时,温和派则为争取社会保险立法和对劳动时间过长加以某种限制而继续开展自己的运动。1884年,关于工人结社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放宽;随着工业的高速发展,工会也发展得非常快。1885年,工会发动了一个废除星期日劳动的运动;1891年,法律规定了这一条。两年,国家实行了一项以德国法律为蓝本的疾病保险计划;两年以后,又实行了意外事故保险制。

在此期间,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一直在衰退,大多数工会都处于社会党——主要是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下。到了1889年,工会已经能够公开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事实上,这主要是一次布达佩斯的代表大会;同年,弗兰克尔作为匈牙利社会党代表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弗兰克尔回来的时候情绪很热烈,因为代表大会决定以1890年5月1日作为每一个国家举行群众示威的日子,主要是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这时候,奥地利社会党人刚刚联合起来支持海因菲尔德纲领;1890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各个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统一的运动,并整个地采纳了奥地利社会党人

577

组织。表面上，它们是友好互助社团，以经过修订的于 1884 年重新颁布的 1872 年的法律为依据。这个公开组织为两个秘密组织提供掩护，为它们向全体会员征收会费。其中的一个秘密组织是为了进行工人运动，另一个是为了支持社会民主党；事实上，工会是社会民主党的支部。直到此时，工人运动完全是城市性质的；但是到了 1890 年，有少数农村代表出席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党和工会开始了吸收农业工人为成员的运动。1891 年，匈牙利中部在收割季节发生了一些农村骚乱，主要是为了收割工资的问题。这些骚乱遭到了血腥的镇压，但是三年以后再度以更大的规模爆发出来。这一次又被极其残酷地镇压下去。以后几年，农村骚乱连续发生，于 1896 和 1897 年达到最高峰，不过主要仍然发生在中部地区的马扎尔人中间，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到其他地区，特别是扩展到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布达佩斯也发生多次罢工，结果遭到了强烈的镇压，一些领袖被放逐到农村地区。在那里，他们帮助煽动了农村无产阶级的骚乱。

这时，社会党也发生了分裂。1896 年，伊斯特万·瓦尔康尼（1852—1916 年）成立了独立社会党。这个党主要从农业地区得到支持，并且吸取了许多小农和农业劳动者。

伊斯特万·瓦尔康尼是切格勒德的一个马贩子，从马车运输和其他合同中发了一笔小财。小农和农业劳动者的悲惨处境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参加社会民主党，着手在农村地区争取对党的支持。不久，他受到了主张和平的无政府主义者尤金·海因里希·施米特博士的影响，开始宣扬一种以施米特的思想为基础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学说。根据施米特的学说，每一个人，哪怕是最坏的坏人，都具有一种神圣的火花，能够以对同胞的兄弟般的爱照亮自己的整个人生，而且无需凭借强力就能诱导他过美满的生活和建立美好的社会。但是这种善良的天性一方面为长期的苦难传统

所掩盖,另一方面为压迫所掩盖,而且从这些传统产生出来的恶习在那些受尽压迫和苦难的人们中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去掉的,或者不能从根本上去掉。因此,再生的第一步是唤起那些能够作出反应的人的神圣精神,在他们的带动下着手改善物质生活。瓦尔康尼把这种判断特别应用于匈牙利北部的小农和无地劳动者身上,同时号召那些不属于压迫阶级的状况较好的人出面要求改革,以提高农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通过这一做法,使他们能够发挥出他们的高尚天性。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瓦尔康尼脱离了社会民主党,于1896年创建了农民社会党,而且有一个时期,吸引了很多信从者。拥有土地的集团对农民的普遍起义怀有恐惧。瓦尔康尼的党遭到了法律的取缔,但继续秘密存在,同对农民积极展开宣传的社会民主党人分庭抗礼。瓦尔康尼的社会主义同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不是以坚持工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的。它直接以农业工人为对象,与斯拉夫国家的民粹主义颇有共同之处。它的神秘的半宗教性的因素引起了农村居民的宗教情感的共鸣。瓦尔康尼有时候被指责为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事实上他不过是一种类型的农村鼓动者,这种类型在不发达的国家里是常见的。

农村地区的运动尽管遭到了严厉的镇压,但实际上仍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1896和1897年,收割工资大大增加,在发生骚乱的地区,正常的工资率也大大提高。不过这些成就仅仅使当局更加热衷于逮捕运动的领袖和迫害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以期把运动镇压。1897年以后,面对着当局的镇压,农村的骚乱沉寂了一个时期,直到1905年才再次大规模爆发。当时,随着俄国起义而出现的普遍骚乱扩大到匈牙利,影响了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也影响了马扎尔人和日耳曼人。 579

面对着1896和1897年的农业骚乱,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

措施。政府并不满足于破坏农民的集会和严禁瓦尔康尼的党进行活动，它还制定了新的镇压法律。1898年，一般称作“奴役法”的一项新法律付诸实施。这项法律禁止一切罢工，严厉惩处“煽动罢工”的罪行，它还规定了对付农业工人的非常措施，不仅禁止他们以任何形式结社，而且要他们从事强迫性劳动。法律规定农业劳动者不为庄园主干活是犯法行为，并把强制执行的权限交给了县当局，而县当局则完全处于当地地主的控制之下。同时，政府对社会主义政党和城市工会也采取了新的镇压行动，把这些组织进一步赶入地下，尽管如此，它们仍在继续壮大。1900年，以维尔摩斯·麦佐菲为首的第二批农民社会党人脱党而去，成立了“改组派社会党”。1903年，社会民主党本身也改组了，仍以与工会结成的亲密联盟为基础；1905年，城市工人在俄国革命爆发后掀起的大罢工运动中起了充分的作用。

1905年的广泛的农民起义以及俄国革命所触发的骚乱，其后果之一是发生了这样一件近乎奇迹的事情：三位农民社会党人——瓦尔康尼、麦佐菲和安迪奥斯·阿钦——当选为匈牙利议会议员。阿钦几乎立刻就被暗杀了，但是其他两位却仍留在议会里替农民说话（常常因此而被喝下台去），并且在此后几年的改革斗争中起了作用。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在1914年以前竟无一人被选为议员。

在当局进行镇压的同时，整个这一时期也有人效法奥地利的作法，在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对抗运动，以对付社会主义的发展。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基督教人民党；1904年又出现了一个同改组后的社会民主党相抗衡的基督教工人党。这些运动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反犹太主义，以资产阶级激进派和社会党人为反对目标。匈牙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宗教的基础上对倡导互助和建立合作社出过一些力，而且提出了一个温情



主义的社会改革纲领，但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出现的那种激进派。它实质上就象维也纳的鲁艾格尔运动一样，是一个战斗的反犹太主义的右翼组织，旨在维护教会的权威，煽起敌对情绪，反对在社会主义和激进派中起很大作用的犹太人和外国人。

在本章所论述的整个时期中，匈牙利宪法一直没有修改。如前所述，工人没有选举权，很大部分中产阶级也没有选举权。在非马扎尔地区，许多选区实际上是“居民零落的选区”，几乎没有任何选举人，而马扎尔地区的选民则比较多，但大部分受制于贵族。无论在什么地方，至少也得马扎尔化了，才有当选的可能。下议院同上议院一样，也是贵族专有的领域，只有极少数外界人士得以进入。这种情况并没有妨碍带有左翼色彩的集团在传统的马扎尔党派中出现，因为这些党派的流动性始终很大，组织也很松散；但是这种情况倒的确排除了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议会政党——甚至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激进党——的全部可能性。在强大的警察控制之下，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都不得不把在议会外进行煽动当作主要手段。左翼所发起的选举权运动，最初主要是由社会民主党人发动的，他们同以奥斯卡尔·雅齐(生于1875年)为首的中产阶级激进党结成非正式的联盟，组织了这个运动。雅齐是历史学家，后来写有匈牙利革命史，革命失败后定居美国，担任奥柏林学院的教授。在议会内部，这些政党从独立党的左派——即“1848年派”得到一些支持。这一派逐渐摆脱了贵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倾向于同那些反对帝国政府和奥匈联系的非马扎尔人结成联盟。<sup>581</sup>不久以后，独立党左派就接受了持不同意见的贵族米哈伊·卡罗利(1875—1955年)伯爵的领导，他赞同农业改革和发展合作运动。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即使是马扎尔人左派，也是非常排外的，对其他民族集团具有传统的优越感。

然而，匈牙利的既有秩序毕竟受到 1905 年俄国革命的不断冲击，而且两年以后奥地利又实行了成年男子选举制，因而匈牙利的形势也大大改观了。后一发展意味着，奥地利的社会党在奥地利帝国突然之间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庞大集团。不过，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这一发展却伴随着这样一个事实：这个联邦社会党竟瓦解成为日耳曼人、捷克人、波兰人和少数民族的民族政党，斯拉夫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迅速增长起来。如前所述，奥地利的工会运动，特别是在波希米亚，也受到了影响。看来，这种分裂趋势不是有肢解奥地利的危险，就是有破坏重新把奥地利建成民族国家联盟的危险，二者必居其一。这种趋势也必然要影响匈牙利，特别是影响连接波希米亚的斯洛伐克地区，还有整个非马扎尔人地区。这种趋势也必然会加强马扎尔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造成右派和左派分子的分裂。人们普遍认为，对选举制度作某种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在“妥协派”（即“1867 年派”）中间，大多数人越来越愿意接受某种形式的成年男子选举制，并希望辅之以复选和其他办法，以防止匈牙利王国的瓦解。但是亲帝国集团的强有力人物伊斯特万·提萨伯爵仍然坚决反对成年男子选举权。在独立派中间，其右翼也强烈反对可能威胁马扎尔人优越地位的任何改变，而其左翼则希望给予比较贫困的马扎尔人以选举权，并且希望摧毁“1867 年派”的坚固据点——非马扎尔人的“居民零落的选区”，同时也坚决反对可能把权力移交给非马扎尔族的多数人民的任何改变。因此，政治形势变得极其混乱，但是面对越来越强烈的人民骚动，不有所表示又是不可能的。于是一系列选举权法案便应运而生了，不过后来都断送在委员会的手里，或者随着提出法案的政府的垮台而消失。1905—1906 年，一个代表“1867 年派”的政府试图通过一项法案，给予工人阶级和斯拉夫人某种赢得席位的希望，然而民族主义的反对派却成功地阻挠了它的进展。这时发生了一场斗

争，争论的是国王是否有权增加武装部队的人数以及要求匈牙利增加新兵和提供更多的款项。皇帝面临反对党的联合力量，无法使这两项要求中的任何一项得到通过，于是便在取得不破坏 1867 年妥协方案的秘密保证以后，准许这些政党组织政府。新联合政府在 1908 年提出了一项以复选制为基础的选举权法案，通过大大压缩工人阶级和非马扎尔人的选举权，以抵消选举人的大量增加。社会党人带头组织了巨大的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布达佩斯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但照例遭到了狂暴的镇压。联合政府保证不破坏 1867 年解决方案的诺言被泄露出去，引起了自己支持者的不满，非常不得人心。于是皇帝解散了这届政府。“1867 年派”重新当政，提出了一项新的选举法案，体现了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原则；但这项法案在议会讨论的过程中经过了很大修改，以致显然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由于议员们顽固地拒绝任何威胁贵族或马扎尔人的优越地位的法案，又一个政府垮了台，又一个法案遭到了否决。议员们对秘密投票反对尤烈，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为实行公开投票地主就可以施加非常强大的压力。马扎尔人还决心保持议席和选民的分配限额，以保证他们的民族对其他民族集团继续占有优势，并压制城市代表权及其想选出社会党或激进党议员的倾向。事实真象是，到关键时刻，两个主要集团都不想真正改革选举制；不过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已经发展成为群众性运动，哪一方也不敢把它放下不管。

583

在选举制改革上发生上述争执的同时，在兵役问题上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匈牙利议会声称，不经过它的批准，国王无权在匈牙利领土上征兵或超过它所准备批准的名额。当时同德国结盟的维也纳政府，希望按照它同德国人达成的协定增加军队的人数，而匈牙利人则拒绝批准征召更多的人员，或负担更多的军费。1912 年，克罗地亚发生严重骚乱，那里的议会被勒令休会，民族主义运

动遭到了严厉的镇压。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混乱局面，伊斯特万·提萨伯爵再次当权。他是“1867年派”中反对成年男子选举权的主要人物，最初担任下院议长，后来担任首相，在一片反对声中用武力把持反对态度的议员赶出下院，强行通过了陆军法案。被驱逐的议员之一吉利拉·科瓦契于被逐以后又回到议院，企图枪杀提萨，没有打中，结果自杀了。后来，首相鲁卡斯同一件财政舞弊案发生了牵连，被迫辞职。提萨继任首相，于1913年用同样的高压手段通过了鲁卡斯选举法，但是新法律并没有使任何人——哪怕是法律的制定者——感到满意，骚乱继续在发展，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达到了顶点。

可以看出，在本章所探讨的整个期间，匈牙利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通过议会活动找到任何实际的出路，议会中不偏不倚的社会党人非常少，而且他们是孤立的不起作用的人物。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当选过。雅齐领导的激进党人，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这两个集团都不得不依靠议会外的活动——依靠报纸刊物、依靠口头的宣传，依靠街头的示威游行。在议会中，至少为了某些目的，这两个集团同比较先进的独立党人士——“1848年派”——结成盟友；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是国际主义者，激进党人又反对马扎尔人垄断权力，而“1848年派”则是马扎尔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们持有先进的社会主义观点。不过，这种局面在1914年以前的几年里有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因为独立党人的左翼更远离民族主义的右翼，发展成为一个以米哈伊·卡罗利伯爵为首的真正独立的党。卡罗利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因参与支持农业改良的活动而成了名。由于从事这些活动，他对合作运动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的一个年事较长的亲属山道尔·卡罗利伯爵就是合作运动的一名先驱者。匈牙利的合作运动，一直以农业信贷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这两种主要形式发展着。在农业地区，这些合作社既供应农业必需品，也供

应家用什物。米哈伊·卡罗利在担任了一个时期的中央地主联盟(这个团体主要是保护大地主的利益,但是也介绍经过改良的农业方法)的主席以后,担任主要的合作团体“蚂蚁”的主席,在国内赢得了很多拥护者。后来,他逐渐转向左翼,成了独立党内比较激进的一派的中心人物,大战期间又带领信从者脱离了独立党,并同激进党人、社会党人一道于战争结束时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不过在1914年以前,他仍然不过是议会左翼的一名政客,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煽动家,而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则对他深为怀疑,因为他同马扎尔贵族有联系。在此期间,社会党人找不到杰出的领袖来代替列奥·弗兰克尔。他们最出名的人物是:马鞍匠欧诺·加拉米(1876—1935年),后来他成了1918年卡罗利内阁的阁员,当共产党人后来接掌政权时逃到了奥地利;朱利乌斯·皮德尔,工会领袖,曾在贝拉·库恩倒台以后短期存在的有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政府中任总理;雅科布·威尔特纳尔,杰出的工会人物,他是木匠,1907和1910年社会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齐格蒙德·库恩菲(1879—1930年),学校教师,原来是激进派,1914年以前加入社会党,成为卡罗利内阁的阁员,后来领导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但是后来又强烈反对贝拉·库恩的政权;亚历山大·加尔巴伊,石匠,后来成为贝拉·库恩共和国的总统;德西勒尔·博卡尼(另一个石匠)和马克斯·格罗斯曼(屠宰工会领袖),这两人都是第二国际的著名人物;最后还有路易斯·卡萨克(生于1887年),他是铁匠、诗人和小说家,无产阶级运动文化方面的中心人物。

在马扎尔人以及在构成大部分城市知识分子的日耳曼人和犹太人中间,这个文化方面的阵容是很坚强的。在1914年以前的岁月中,社会主义运动对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特别是通过伽利略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最初是科学研究团体,后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

运动的强有力的附属组织。这个俱乐部在 1918 年终于遭到了镇压，它的大多数领袖(其中有许多人曾经被关进监狱)在战争结束后的革命运动中又以活跃人物的姿态出现。

### 巴尔干半岛各国

#### (一) 概论

巴尔干半岛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土耳其——的社会主义运动，在 1914 年以前声势始终很小。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工业无产阶级还不够强大，不足以为工会的巨大发展提供基础；虽然社会主义者力图在农村地区争取支持，但取得的成就仍然非常有限。在大部分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形式仍然是非常原始的小农耕作。除了在罗马尼亚以外，大地主简直不存在，无地的农业劳动者也不多。农民的状况各地大有差别；但是不论他们的状况是好是坏，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持生活而耕种小块土地，只有在很少地区，例如在种植烟草的马其顿地区，经济作物才居于重要地位。城市工业主要是以手工艺——在小作坊里经营的手工业生产——为基础，只有为数很少的工厂，这些工厂大都是外国资本经营的，主要生产纺织品。不过，除了在罗马尼亚一国以外，外国资本并不是重要的因素，1950 年以后，罗马尼亚的石油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多数巴尔干半岛国家，矿藏一直没有开发。即使在农业方面，小麦种植面积也在减少，它的地位主要为玉米所代替，玉米成了牲畜和人的主食。供应出口市场的专门农产品只有很小的规模。生活水平非常低，而且没有保障。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地方，收税人对农民横征暴敛，而罗马尼亚的农民又多一层地主的剥削。

在这种情况下，地力很容易耗尽，收成一般都很低。人口过剩 587

造成了严重的就业不足现象，特别是在冬季的几个里。大规模的移民部分地缓和了这种现象，这些国家不仅向美国移民，而且向南俄罗斯移民；就希腊来说，还向埃及、甚至向苏丹移民。不过，富农阶级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富农用放债作为剥削贫农的手段；这些比较富裕的村民的子弟，尤其是在塞尔维亚，打入了武装部队的军官阶层，成了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1903年以后。保加利亚也存在类似的趋势，不过由于存在一个反对军事冒险的真正农民党，这种趋势部分得到了遏制。

不过，由于不存在地主贵族阶级，特别是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农民的苦难得到了减轻。这个阶级之所以不存在，主要是由于在各国相继取得政治独立（哪怕是在名义上仍然保持土耳其统治的地方）的过程中，土耳其的上层阶级，或亲土耳其的上层阶级，被赶走了。上层阶级被赶走以后，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的贫困，主要是由于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来耕种土地造成的。事实上，农业合作事业有了一些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是大规模的，而且主要是对较富裕的人而不是对一般农民有利。在某些地区，共同生产的原始村社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是这些形式也正在逐渐为个体耕作所代替。

必须记住，所有巴尔干国家都是在土耳其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国家在同土耳其进行清算的时候不一再受到欧洲各大国的干涉。尤应记住的是，巴尔干地区是俄国同奥匈帝国不断发生冲突的战场，而其他大国又进行干涉，其目的大都不是为了正义和自由的事业，而是为了阻止敌对双方不能如愿以偿。在某些历史性场合中，例如在著名的保加利亚暴行事件中，虽然所打的旗号是保卫基督徒以对付异教徒，但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本身却远远没有团结一致，他们既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也在从事激烈的宗教冲突。希腊正教教会同其对手之间的斗争使民族问题不



断复杂化。此外，所有新国家都有互相冲突的领土和民族主义要求，而这些要求又都以对早已成为过去的帝国的生动记忆为基础，于是土耳其政府便不难在它还保持任何权力的时候进行挑拨，使各个集团彼此对立，以坐收渔人之利。这正是各大国能够而且事实上也在玩弄的把戏。因此，巴尔干地区往往在这个或那个大国的煽动下，不是兄弟阋墙，互相残杀，就是密谋参加这种战争。

就某种意义来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都是民主国家，因为它们没有大地主贵族阶级。但是它们的民主制简直就越不出农村事务的范围，而且从是否能控制政客这一角度来衡量，这种民主制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在这方面，只有在出现如下情况的时候，这种制度才起作用：高涨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推翻了政府或统治者，迫使国家采取往往是招致本身毁灭的极端民族主义方针，对一个邻邦或几个邻邦轻启战端。战争的结局照例是由大国来决定的，因而其解决办法只是为了迎合或迁就大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巴尔干各国人民的利益。大国的舰队总是轰击或扬言要轰击某个国家；俄国或奥地利的军队总是进军或扬言要进军某个地方。外国的统治者或外国的专员常常被指定来强行解决争端。解决方案如果不是由大国强行规定的（有时即使是由大国强行规定的）往往就遭到破坏，或者事实上根本不予执行。

幸而本书无需探究扑朔迷离的巴尔干政局或大国在巴尔干地区的阴谋和干涉。我之所以谈到这些问题主要是把它们当作背景，用来说明巴尔干半岛的社会主义必然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在舞台上的。1914年以前，在所有巴尔干国家，也许除了门的内哥罗，都已经发展了某种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在所有地方，社会主义都没有重大影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第一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最接近于第一流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是克里提安·拉科夫斯基博士（生于1873年）。他本人是一个国际人物，生于保加利亚，在多布罗加长 589

大，当那个地区划归罗马尼亚的时候，成了罗马尼亚人。他在学生时代就在保加利亚开始从事社会主义活动，并且因此而没有能受到高等教育。他的双亲把他送到日内瓦，在那里他会见了普列汉诺夫，受到了此人的影响。拉科夫斯基又从日内瓦前往德国，在那里遇见了李卜克内西，受到了德国运动的影响。1894年他从普鲁士被驱逐出境，前往法国，在蒙彼利埃获医学博士学位。1897年，他回到保加利亚，在那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居领导地位，力图把运动中争执激烈的各派协调起来。1898年，他在保加利亚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俄国和东方》，猛烈抨击沙皇的政治野心。他又从保加利亚去到多布罗加，1900年在罗马尼亚军队中当军医。1907年，罗马尼亚农民起义，罗马尼亚当局以他根本不是罗马尼亚公民为借口，把他驱逐出境。这一年，他代表罗马尼亚参加了斯图加特社会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以前，他曾作为塞尔维亚代表，参加过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在以后的几年中，拉科夫斯基时而在这个国家，时而又去那个国家，还曾多次秘密地在罗马尼亚逗留。1911年，他作为社会主义者国际的使者回到保加利亚，再一次想使争吵不休的各社会主义政党重新联合起来。1912年，他获准回到罗马尼亚，但是在罗马尼亚参战以后，被监禁了起来，1917年5月，才被俄国人释放出狱。后来，他参加了苏维埃革命，成了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布尔什维克委派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同乌克兰议会交涉；1919年，他成为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主席。1924年，他代表苏联前往伦敦，同第一届工党政府谈判英苏条约未成。1926到1927年，他担任苏联驻巴黎大使，1927年奉召回国，成为反对斯大林的一派的积极领袖，不久便被开除出共产党，并被放逐到斯大林格勒。1934年，他表示改变主张，获准回莫斯科，但是1938年，他再度被免职。他是1938年3月受审讯的“二十一人”之一。他被判处死刑，但未予执行。他的命运是在监

禁中服劳役。他最初是为维护乌克兰的权利而同斯大林发生争执的，后来在苏联的对华政策和同西方的关系上，又同斯大林有分歧，最后就象其他同斯大林意见相左的人一样，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事实上，拉科夫斯基是一个有教养的、能独立思考的革命家，能够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对西方的社会主义和东方的社会主义都了解。他虽然出生于贵族家庭，却继承了革命传统，其中还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实际上，他觉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算作他的祖国，因而他是一个热烈的国际主义者，但与此同时他大力鼓吹巴尔干团结，以此作为手段去抵制各大国所结成的对立的联盟主宰巴尔干事务，同时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反对各自的压迫者。他用好几种文字写了许多著作，包括历史和经济著作，还有许多报道作品，以及一些关于当代政治的书籍。他的一些著作是以莫萨罗夫的笔名出版的，其中有《梅特涅及其时代》和《现代法兰西》，这两部研究著作都是在俄国出版的。他还写有医学和犯罪学方面的作品。

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象拉科夫斯基那样在巴尔干半岛奔波过；也没有任何其他人在重要性上同他相比，哪怕是在半岛上的一个国家内。自然，在斯拉夫人居主要地位的国家内，俄国的影响是首要的，其中包括民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普列汉诺夫，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有不少巴尔干社会党人到过瑞士，在那里同普列汉诺夫集团有过接触。这种关系一般说来同罗马尼亚最密切。在罗马尼亚，存在着与普列汉诺夫影响相匹敌的法国社会主义的影响，因为有许多罗马尼亚人去巴黎求过学，回国时就带来了法国式的西方思想。德国之所以有影响，与其说是由于个人的直接联系，倒不如说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实际上也就是在全世界，名声都很大。奥地利社会党的影响并不很大，尽管奥地利或匈牙利统治下的南部斯拉夫人同巴尔 591

干的斯拉夫人之间自然有密切的联系。意大利社会党的影响无足轻重。至于英国人,在希腊以外的地方,除对保加利亚的稳健分子萨卡索夫外,是没有影响的。

## (二)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人现在认为,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先驱是诗人克里斯托·波特夫(1848—1876年),他15岁前往俄国,17岁因进行革命活动而被俄国驱逐出境。他在比萨拉比亚教了两年书以后,于1867年回国继续任教。同年,由于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演说,他不得不离开保加利亚。他到了罗马尼亚,当印刷工人和校对来维持生活,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俄国的时候,他吸收了民粹派理论,这使他相信有可能实现农民社会主义;他还同涅恰也夫的信从者接触。1871年,他从当时的工作所在地加拉茨拍了一份贺电给巴黎公社;他在加拉茨写了《保加利亚公社的信条》,这是保加利亚第一个社会主义宣言。他企图在加拉茨成立一个公社,但因此而不得不离开该地。在布勒伊拉,他创办了一家以保加利亚流亡者为对象的报纸,但出了5期就停刊了。后来他移居布加勒斯特,与朱布拉·卡拉维洛夫共同创办了另一个刊物,作为独立民主的保加利亚国家运动的机关报,这个刊物最初叫《自由》,后来改名为《独立》。这两个刊物都被罗马尼亚政府查封了。在此后几年内,他同列夫斯基和卡拉维洛夫在保加利亚积极组织革命团体。1873年,在企图经办讽刺性刊物《警钟》未成以后,他重执教鞭;第二年,他继1873年被枪毙的列夫斯基担任秘密的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书记,而且很快就成为该组织的领袖。他力图利用这个机构在保加利亚掀起一次起义,在几度失败以后,一次颇具声势的起义确实在1876年爆发了。当时,波特夫及其追随者劫持了一艘奥地

利轮船，强迫船长把他们送到保加利亚，这一年5月，他在战斗中阵亡。在《警钟》以后，波特夫曾编过几种其他刊物，并在1875年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这些诗既有民主色彩，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绪。 592

波特夫的诗现在很受欢迎，但是他算不上一个有创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他是一个受到俄国虚无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影响的，民主的民族主义革命家，但是从任何深刻的意义上说来，他并没有成为虚无主义者，甚至也没有成为民粹派。他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早期把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传入巴尔干半岛的人中间，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不过，他并没有为后人留下社会主义运动。在为保加利亚的独立和统一进行斗争的那些年代里，那里并不存在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有一些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左派。由于剥削农民的富有地主阶级并不存在，作为一种政治因素的社会问题也就几乎不存在了。所存在的问题是：民族问题；摆脱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教会的宗教独立问题；以及实现政治民主，反对俄国或各大国通过勾结从外部施加统治的问题。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才出现某种社会主义组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国外回来的两个人（他们后来为领导权发生了争执）以及拉科夫斯基的活动为此铺平了道路。这两人中的第一人是谁米特·布拉戈耶夫（1856—1924年），他在六十年代初期是俄国的一个极端革命团体的领袖，在那里出版秘密刊物《工人报》，作为这个团体的机关报。1886年，这个团体被沙皇的警察破获，布拉戈耶夫回到他的出生地保加利亚，在那里继续出版他的刊物。另一位先驱人物是学者伊安科·萨卡索夫（1860—1941年），他前往伦敦进修，深受西方思想——特别是英国思想——的影响而归。特别是在达尔文主义者以及赫胥黎和斯宾塞的影响下，他倾向于社会有机体的概念和社会发展的进化概念。他的渐进主义很快就使他同布拉戈耶夫不妥协的革命主义发生了激烈冲突。1891年，布拉戈耶夫出版

了一本小册子，概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概念。同年，他和青年律师尼古拉·加布罗夫斯基（1864—1925年）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组织，最初在室内举行秘密集会，后来在山顶上举行较大的集会，以躲避警察的耳目。但是新运动几乎立刻就分裂成对立的派别。一派有人认为，鉴于保加利亚工人阶级还不成熟，要建立政党未免为时过早，应该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首先组织工会和农民团体，向所有工人开放。另一个主要集团，以布拉戈耶夫为首，则要求成立一个革命政党，虽然赞成建立工会，但坚持工会只允许完全接受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人参加。此外还有第三个集团，由拉科夫斯基的信从者组成，拉科夫斯基本人则已被赶出国门；这个集团力图使其他两个派别和解。每个集团都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头两个集团还成立了对立的组织：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这是1892年的事。

两年以后，保加利亚一度倾向革命的实际统治者斯坦布洛夫垮台了。他曾残酷地镇压进步运动，并曾建立起实际的独裁统治。随着他的垮台，社会主义者就有可能比较公开地进行组织，工会也有可能比较公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件事的头一个效果是各个对立的社会主义派别再次联合起来，而且着手于组织工会和农民团体。第二年，重新统一的党在议会中赢得了两席，都是农村地区赢得的；在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相当迅速。1899年，党赢得了6席；但是同年，部分由于它所取得的胜利，一个对立的土地联盟建立了起来，联盟所根据的是一个非社会主义的纯农民民主纲领。于是社会党人从此丧失了一大部分农村追随者。1901年，社会党仅仅保持了1个议席。这时，内部再次爆发严重的分歧。1899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议会中的社会党人是否应该奉行一种严格独立的政策，仅仅把他们的代表权用于宣传的目的，还是应该同其他民主政党合作，以推进立法改

革，把一个民主政府拥上台？1900年，萨卡索夫创办了一个新刊物《共同的事业》，主张奉行第二种政策。1901年，在丹涅夫教授的领导下，一个进步党政府就职；同时一个强有力的新人物亚历山大·斯丹保里斯基（1879—1923年），以《土地旗帜》的编辑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这个刊物是农民的全国农业联盟的喉舌。在选举中，社会党人赢得了8个议席，有几个是在城市里，有几个是在农村中赢得的。当时还发生了多次罢工，这是工会力量日益强大的迹象。但是这些胜利的后果却是社会党左右两翼的断然分裂。布拉戈耶夫派以瓦西尔·科拉洛夫（1877—1950年，后来在共产党内很活跃）为主要发言人，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议案，旨在反对“通敌分子”，并责成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在萨卡索夫的追随者占多数的索菲亚，布拉戈耶夫的追随者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并且要求左派占多数的中央委员会给予支持。于是中央委员会便把原有的索菲亚支部和右翼领袖开除出党；被开除出党的集团进行反击，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党，而且以主要站在它这一方的议会党团为中心，成立了一个新组织。此外，每一派都着手建立自己的工会联合会，一个采取广泛的方针，什么人都可以参加，另一个则建立在严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194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未来领袖——于1902年参加了印刷工人工会，不久就成了布拉戈耶夫领导下的工会运动的领导人物。加富里尔·基奥尔基耶夫、古斯塔夫·基尔科夫和瓦西尔·科拉洛夫也都是布拉戈耶夫党的创始者。从此他们就被称为“狭隘的”社会民主党人，而萨卡索夫的追随者则被称作“开明的”社会民主党人。每一派都自称是社会民主党；每一派都派代表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并说对方的代表资格有问题。“狭隘的”社会民主党人通过书面和口头不断对他们的对手大施诽谤之词。

但是 1903 年的分裂并不是问题的终结。布拉戈耶夫的僵硬的教条主义政策,使他的党不可能同群众建立有效的接触,实际上是把很少几个工会的大部分的控制权交给了对手,因而不久也就在“狭隘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争执。1905 年,一派自称为“自由”社会党人的人在尼古拉·哈拉科夫(1874—1927 年)的领导下退党而去;三年以后,又发生了一次分裂,这一次是尼古拉·萨卡洛夫(1881—1943 年)退了党,另组“进步”社会党。第二年,退党分子同“开明”派联合,组成“统一的”社会民主党,仍同“狭隘”派尖锐对立。

在这以前,在 1906 年,曾经发生过新的声势颇大的罢工运动,特别是在铁路和矿山方面。1908 年,当奥匈帝国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时候,保加利亚曾宣布成立王国;由于这一地区普遍发生了骚动,由于巴尔干各国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各社会党曾召开了一次联合代表大会,谴责军事联盟和大国阴谋,同时号召组成巴尔干联邦,进行联防和争取独立。于是,采取联合行动的必要性就成了努力消除内部分歧的强有力的理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接连派出使者前往保加利亚,调解对立的党派联合起来。在这些使者中间有拉科夫斯基,他在 1911 年创办了一家日报《前进报》,宣传团结和共同的国际行动。国际工会联合会派出它的书记和德国工会运动领袖卡尔·列金带着同样的使命前往游说保加利亚各工会,但是分裂仍然存在。在 1911 年选出的特别议会中,“开明”派赢得了 5 席,“狭隘”派只得了 1 席。在以后选出的正常议会中,只有一名社会党人当选。这位代表就是萨卡索夫;当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于 1912 年爆发的时候,他单枪匹马地力陈社会党反对战争的立场。到了 1913 年,根据新选举法,两党都赢得了巨大胜利;但是此后,随着欧战的爆发,事态对“狭隘”派有利。科拉洛夫代表这一派参加了 1917 年举行的齐美瓦尔德会议。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



这一派成了保加利亚共产党。

但是在1914年以前的年代里，由于斯丹保里斯基的农民党的壮大，“开明”“狭隘”两派都越来越黯然失色。斯丹保里斯基到了1908年才当选为议员，在此以前，他主要是在议会政治的范围以外建立自己的势力。1909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主要著作《是政党还是阶级组织？》，提出了他在1918年以后作为保加利亚的实际统治者以及“绿色国际”的所谓鼓舞者所应用的学说。他论证说，未来并不掌握在以意识形态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政党手里，而是掌握在以友好和共同经济利益为民主基础而组织起来的阶级集团手里，前者必然会成为官僚和寻求自我利益的人的牺牲品。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这意味着，权力应该为强大的农民运动所掌握，而不是掌握在工业无产阶级或党的职业政客手里。斯丹保里斯基的运动，跟大多数民族土地运动不同，肯定是一个左派的运动，依靠支配保加利亚经济生活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支持。这个运动使社会民主党的左右两翼想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农村运动的希望破灭，使它们更多地把精力集中在城市工人身上，而且由于它们的政治活动领域如此受到限制，它们的内部争吵也就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激烈了。1915年，“开明派”社会党人和农民党人临时联合起来，发表了一项宣言，反对保加利亚参加德国一方作战。后来，两党以及“狭隘派”都被赶入地下，直到俄国发生革命和同盟国崩溃以后才再次出现。

### (三)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是一个小农国家，小农占有自己的土地，虽然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很低，却几乎完全不受封建的压迫，而罗马尼亚却是一个私人拥有大地产的国家，农民备受苛捐杂税之苦，而且还

必须在地主的庄园上进行无偿劳动。此外，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随着先进农业技术的引进以及现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油井方面），罗马尼亚的生产力虽然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但是农民不但没有得到这些发展的任何好处，反而越来越贫困了，这是由于他们所购买的必需品涨价了，而且他们的落后生产又无从同大庄园的提高了的生产力相竞争。土地改革确实是经常谈论的话题，政客们——不论是自由党人还是青年保守党人——都声言决心为占地日少的农民提供更多的土地。但是，实际上通过的土地法却从未使普通的农民得到土地，倒是方便了现有地主或拥有资本的人购买土地。这无疑使售出的土地用之于生产，但是农民的疾苦却完全没有得到解救。此外，合作运动也主要是使占地较多的农民和地主而不是一般农民得到好处，这一运动在维萨里安·罗曼、曾经短期担任首相的M. P. S. 奥勒里安和华西里·库加尔尼西努这些进步地主的赞助下曾有过相当大的发展。

大多数农民所过的半奴隶生活，地主及其代表对地方事务的全盘控制，以及把知识阶级同广大人民分开的巨大文化鸿沟等因素，使罗马尼亚几乎不可能象克罗地亚、保加利亚以及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那样掀起一个农民运动。农民本身的生活太困苦，所受的压迫太深，不可能掀起这样一个运动；知识分子离开他们太远，无法提供所需要的领导，即使不存在任何这样的企图必然会碰到的严厉镇压，知识分子也是无能为力的。在当时普遍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一个农民党，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真正的社会党。1866年的宪法，主要以1831年的比利时宪法为蓝本，从形式上看是开明的，因为它规定了一些美好的原则——比如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等等。但是其中的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宪法有关选举的规定只是保证了富有阶级的支配地位。投票是按等级进行的，而且仅限于纳税

人；穷苦的选民是间接投票的，而且代表人数大大不足。甚至在 1884 年的改革以后，这种选举制实质上仍没有改变。它准许各职业阶层在城市里得到有限的代表权，但并不是作为有权参加选择的任何广泛的社会集团的维护者。

在这些情况下，如下事实就不足为奇了：罗马尼亚同巴尔干半岛其他地方相比，虽然对西方的文化影响比较开放，而且由于拥有油田，工业也比较发达，但是在 1914 年以前并没有建立起有实力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确出现过一系列社会主义团体，这些团体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在工人阶级内简直没有追随者。其中一些团体受到主要来自法国和瑞士的西方思想的启发；另外一些团体则受到来自俄国的逃亡者的影响。在后者中间，杰出的人物是道布罗古奴·热里亚，他是罗马尼亚唯一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除非我们把拉科夫斯基也算在内，但是拉科夫斯基是保加利亚出生的人，并且就他的行动来看，基本上是一个国际人物。热里亚写了一本关于罗马尼亚土地问题的重要著作，在 1914 年以前，一直是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内的活跃人物。但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拥护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脱离了社会主义，参加了资产阶级左翼政党，其中有些人到了晚年竟成了社会主义和激进的农民运动的最积极的反对者。他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活动中心是评论性刊物《新世界》。该刊的编辑纳杰日德和 V. 摩尔岑都是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又都成了自由党的领导人物，并且带走了很多其他人，这些人分别被任命担任各种政府职务。其中有安西亚·阿塔纳修，他 1896 年曾是参加社会主义者国际伦敦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后来成了一名政府领导官员，在镇压 1907 年的农民起义以及同起义有关的工人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社会党的另一个创始人康斯坦丁·米勒也脱离了社会党，成了一个有影响的激进派新闻记者。到了 1900 年，

主要由于这些人的变节，同时由于一些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流亡者被赶出了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社会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599 如前所述，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社会党主要是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后来，由于在城市工人中得不到任何支持，它最后只好向倍受剥削的农业工人进行宣传。它组织了一个农民运动，成立了一些农村俱乐部，提出了一种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和改善社会条件的温和的纲领。这一运动遭到了手段严酷的镇压。尽管农村俱乐部的领袖人小心翼翼，采取完全合法的手段，但是俱乐部仍然遭到警方的破坏，运动的领袖被捕下狱，其中有社会党的两个杰出人物邦格黑安奴和辛森斯库。这些强硬措施对于破坏社会党的残余力量是有效的，结果只剩下了少数的孤立的地下团体。

此后几年，随着工会的壮大，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了复兴，这部分是由于现代工业开始发展起来，部分也是由于政府采取的防范步骤本身。在中、小规模工业中，政府建立了一种把雇主和工人都包括在内的混合劳资协会的制度，规定劳资双方都必须入会。通过这些协会，政府实行了强制性的工作证办法，不取得工作证，就不能合法地就业。这种办法使劳资协会非常不得人心，很多人便参加了在社会党领导下秘密组织起来的工会。罢工爆发了；尽管政府进行压制，罢工仍然得到相当大的成功，特别是在码头工人和缺乏劳动力的技术性行业中间。这时正是国家经济开始起步取得迅速发展的时期，许多雇主宁肯让步，以避免面对不断的停工。工会除组织罢工外，不久就在社会党的影响下开始参加政治斗争，组织示威游行来争取选举改革和反对劳资协会制度。社会党人和工会紧密联合，通过成立地方政治集团着手改组党的组织，而没有在全国规模上重新建立公开的社会党。在这项政治组织工作中，克里斯琴·拉科夫斯基起了领导作用，曾陪同他作为代表参加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A·康斯坦丁·尼斯库则领导了工

会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时候重新发动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由于 1907 年的农民大起义，遭到了新的灾难。农民的自发暴动开始于摩尔达维亚，后来迅速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毫无疑问，这些暴动在一定程度上是 1905 年波兰和俄罗斯农民暴动引起的农民广泛动荡的延续表现。它们甚至比俄国的暴动更加没有统一的领导或者共同的纲领。这些暴动纯粹是为了反对不能忍受的压迫，锋芒指向农民能够看到的造成他们日益贫困的那些人。骚乱开始时主要是反犹太性质的，这是因为犹太商人和放债人不得人心，人们指责他们抬高物价和重利盘剥。的确反犹太主义在罗马尼亚农民和统治阶级中间都是根深蒂固的。犹太居民人数相当多，大部分从事零售商业和手工业，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犹太人随时可以被当局武断地加以逮捕；任何触犯了当局的犹太人都可能被驱逐出境，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如果农民在 1907 年只是屠杀犹太人的话，当局大概不会那样极力约束他们。但是，农民在袭击犹太人以后，又进而袭击大地主的房屋产业，烧毁了许多富豪的宅第，还对他们的代理人施以暴力。统治阶级震惊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根本就没有意料到农民的动乱会严重地蔓延到罗马尼亚；所有的党派一致联合起来镇压动乱。保守党人辞了职，自由党人上台来应付局势，任命阿维尔斯库将军为陆军部长。阿维尔斯库动员了一支几万人的军队来镇压只有最简陋武器的农民。整个国家分成了一些战区，投入了骑兵队和炮兵队，命令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村庄被炮弹摧毁；企图抵抗的农民队伍遭到屠杀；拒绝向敌人开火的农民士兵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不多几天内，十多万农民被屠杀，广大地区被洗劫，藉此给叛乱者一个教训。与此同时，确实颁布了一道敕令，许诺要平息农民的一些怨恨。但是，统治阶级巩固了他们的胜利以后，就忘记了敕令中提出的条件。

社会党人在农民起义中采取的唯一行动是发表了一个宣言，号召农民克制自己不要采取暴力，只能进行合法的鼓动来达到他们的要求——这不是个多么实惠的意见，因为农民以任何方式进行鼓动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准许集会自由的宪法条文，即便真的  
601 在执行着，也不足以作为社会党人的根据；因为宪法明文禁止在户外举行集会，而户外集会却是农村居民唯一可能的集会方式。社会党人在农村地区几乎没有追随者。产业工人举行的许多罢工确实受到了农村全面动荡的影响，但是这些罢工同农民起义并没有其他关系。然而，统治阶级却无心加以区分。当局镇压了罢工，逮捕了大多数著名的社会党领袖，其中一些非罗马尼亚公民被递解出境。被递解出境的社会党领袖有克里斯琴·拉科夫斯基，他以前在加拉茨的一次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时曾经被人开枪击伤。拉科夫斯基曾经作为医生在罗马尼亚军队中服役，当时仍是后备役军官，而且他的父亲也曾数次在地方政府中担任只有公民才能担任的官职。可是，因为他生于保加利亚，当局很容易地就裁定他没有资格作为罗马尼亚公民。社会党人就这样失去了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于1900年崩溃以后一直主要负责重建任务的杰出领袖。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再次完全崩溃，是因为工会已经在城市工人中间大大发展，足以在遭受镇压之后仍然存在下去。但是，它却不得不隐蔽到工会后面，并且刚刚开始把自己重新建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1914年的战争就爆发了。

农民起义使统治阶级感到十分恐慌，连那些鼓励合作社发展的进步地主也受到了怀疑。华西里·库加尔尼西努也是被捕者之一，而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他本人同农民运动肯定毫无关系。被捕者当中还有一些曾经著文主张土地改革的教授以及其他被怀疑为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诗人巴布·拉亚安努则是被递解出境的一个。

就是这样，农民运动震惊了上层阶级，使罗马尼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陷于反动。但是，与此同时，经济的持续迅速发展扩大了工业无产阶级的队伍，促进了工会的壮大。富有农民的人数增加了，而农民的主体仍然过着悲惨的半奴隶生活。城市工人力量很强大，足以在1905年以后的几年里不顾警方禁止，组织大规模示威。广大民众居住的农村地区却已经饱尝了教训。

602

#### (四) 塞尔维亚

关于其他巴尔干国家不需要谈得太多。塞尔维亚象保加利亚一样，是个小农国家，1910—1911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称塞尔维亚为“没有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国家”。它几乎没有工业，也没有大批无地劳动者。塞尔维亚不过是一个小国，有许多塞尔维亚人住在它的边界以外仍然被土耳其或奥地利统治的领土上。仍然被土耳其统治、但由奥地利军队占领着的新帕扎尔的桑德贾克地区同另一个塞尔维亚居民的独立国家门的内哥罗分隔开来。它同保加利亚和希腊竞相提出了对马其顿的主权要求，还计划把奥地利人赶出波斯尼亚<sup>①</sup>和达尔马提亚海岸，以重新建立它的古代帝国。它是一个非常好战的小国家；它的国内政治由于王朝的连绵纷争而复杂化。所以社会问题很少有机会占居重要地位。

在十九世纪终了以前，很难说塞尔维亚有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俄国民粹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塞尔维亚的激进主义产生了一些影响。1872年，激进党领袖斯维托萨耳·马可维奇出版了一本书，

---

<sup>①</sup>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还有一个小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布基科·里萨福维奇(生于1879年)为首，还有一个与之合作的总工会委员会。但是它们同奥地利的运动比同塞尔维亚的运动关系更为密切。

主张巴尔干各民族成立民主联邦。1883年，在激进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被镇压下去，一些领袖被处决。此后，激进党变得比较温和，抛弃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由律师和其他知识分子领导的、人们熟悉的巴尔干类型的农民党。社会主义消失了；但是，1900年左右，一些工会在同社会党人颇为密切的合作下建立了起来，社会主义这时又在贝尔格莱德开始复兴了。不过，工联主义必然是非常软弱的。1903年，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在塞尔维亚议会中得到一个议席，1905年又增加了1席。但是，在1904年，社会民主党向社会主义者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说，它“主要是由欧洲各地的流亡者的团体组成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代表社会民主党的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那个到处抛头露面的拉科夫斯基。党设法派了一个代表——赫尔曼·科西尼亚参加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得以向大会报告了在  
603 地方政府选举中取得的一些胜利。到了1912年，社会民主党拥有2,000名党员，成立了一个同它密切联系的工会联合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是它的两个议会代表——J·卡克列罗维奇（生于1879年）和拉普切维奇（1864—?），还有它的书记杜昌·波波维奇（1884—1918年）。社会民主党没有杰出的理论家，也没有很多知识分子的支持。

## （五） 希腊

希腊的社会主义比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历史长一些，但是这只是因为它造就了一个有些知识分子气质的人物。希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刊物《阿登》于1885年在雅典出版。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普拉东·德拉科里斯活跃起来的时候，才开始有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德拉科里斯曾就学于西方。他在社会主义者国际



的活动的激发下，于1893年组织了希腊的第一次五一节示威。1895年，他竞选希腊议会议员，得到4,000张选票。当时，由于1895年的克里特岛暴动以及民族协会进行的爱国鼓动，希腊人民的情绪正在日趋激昂。民族协会是以少壮军官为主发起组织的，它不仅在希腊本土，而且在一切希腊居民聚居的地方建立了分会。民族协会当然是支持克里特岛暴动的；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在马其顿鼓动暴动。在马其顿，代表保加利亚利益的宣传人员非常活跃，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暴动已经迫在眉睫。这些民族主义的激烈情绪大大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1897年，克里特岛再次发生暴动，希腊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帮助暴动者因而引起了同土耳其的战争，希腊军队遭到惨败。各大国进行干预，就和平条件进行了斡旋；但是，在希腊国内，战争失败引起了人民的剧烈不满，在种植无核葡萄地区发生的人民起义就是其表现之一。但是，社会主义者力量太弱，不可能发挥任何重大作用。

1901年，德拉科里斯创办了《研究》杂志，率先建立了希腊工人阶级联盟——希腊第一个较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德拉科里斯当选为议员。但是，人民的注意力仍然主要集中在鼓吹军事扩张上。希腊势力在马其顿重新活动起来，再一次出现了同土耳其发生战争的危险，后来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前夕，真正爆发了战争。1908年，克里特岛议会宣布重新并入希腊；但是，希腊政府采取了604小心翼翼的方针，于是在1909年的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1910年初，军事领袖们把克里特岛的杰出人物文尼泽洛斯请到希腊担任顾问。文尼泽洛斯建议召集一次国民议会来修改宪法，并于1911年执政，主持通过了一项新宪法，又在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下改组了武装部队。

社会党人在1909年的动乱中支持了军事领袖，1911年又把他们的工人阶级联盟改组成社会党。社会党人还试图建立一个同

社会党联系的独树一帜的工会运动；但是，在 1914 年以前，主要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工联主义力量一直非常软弱。社会党的主要追随者是比雷埃夫的码头工人。

## (六) 土耳其和亚美尼亚

1890 年，在俄国和土耳其分治下的亚美尼亚成立了一个叫做达希尼亚克斯的革命联合会，在土耳其统治和俄国统治的两个地区都进行活动，其政治态度大体是民粹派性质的。在 1905 年的俄国革命时，革命联合会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运动，一个同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类似，另一个运动态度更接近社会革命党的右翼。还有一个完全独立的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该党完全或者主要在俄国领土内活动，但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关系。我记得，就是这个党派了两名代表——E. 帕里安和 J. 贝克参加了 1904 年的社会主义者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亚美尼亚没有派代表参加 1907 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但是 1910 年，由亚美尼亚土耳其统治区的派了两名代表——M. 瓦兰廷和 A. 巴塞吉安——参加哥本哈根的代表大会。这两个人都是达希尼克斯派出的。除了这两个人以外，达希尼亚克斯的著名领袖还有法塔克斯·佐拉布和诗人阿哈罗尼安。在土耳其统治的欧洲领土上，社会主义活动的主要中心是萨洛尼卡，这个地方也是著名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诞生地。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是在 1894 年到 1896 年之间，由两位杰出的青年教师达米安·格鲁耶夫（1871—1906 年）和戈特齐·德尔切夫（1872—1903 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两个人绝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者，虽然德尔切夫曾因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被索菲亚的保加利亚军事学院开除。这里所以提到他们，是因为他们建立的马其顿解放运动毫无大多数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特有的那种排

外的种族限制和宗教限制。

毗邻马其顿的三个已经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都垂涎于 1911 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前大部分处在土耳其统治下的马其顿。马其顿是一个种族杂居的国家，同所有这三个国家都有血亲关系，一直是由于利害冲突而产生骚乱的中心。其中保加利亚人最积极于设法煽动叛乱以兼并马其顿。格鲁耶夫同德尔切夫反对所有的对立的兼并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由境内各民族共有的独立的马其顿国家，不受任何相互对立的教会统制——许多对立的兼并主义活动就是通过这些教会进行的。因此，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进行的是一场既针对土耳其人，也针对保加利亚的“至上主义党”——兼并主义者的党——和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的激烈斗争。格鲁耶夫和德尔切夫共同努力建立起一个最出色的地下组织，活动了好几年。土耳其政府的法令在驻有军队的城市以外几乎不起作用。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在农村建立了实际上并立的政府，自己征税，有自己的法庭。革命政权不断被土耳其军队集中兵力从一个地区赶出来，可是它又在另一个地区建立起来。1897 年，为了镇压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土耳其人展开了大规模的行动。许多支持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人在战斗中阵亡，或者在被俘后处决，一些村庄也被烧毁。但是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运动仍然存在，一俟军队撤走就重新控制了广大地区。1901 年，格鲁耶夫被捕入狱，德尔切夫继续进行活动。1903 年，青年马其顿恐怖主义者团体进行了一些爆炸活动，炸毁了萨洛尼卡的土耳其银行，使动乱达到了最高潮。这一年，保加利亚人企图举行总暴动，派遣武装部队越过边界就地发动起义。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参加了行动，但声明反对兼并政策。德尔切夫在战斗中阵亡，暴动遭到镇压，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却一直存在下去，在分裂的马其顿后来发生的每一次动乱中都起了作用。马其顿在巴尔干战争中两

次被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被重新瓜分一次，1945年又被瓜分了一次。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本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但是它的大部分领袖是社会主义者，马其顿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也大部分属于这个组织。在萨洛尼卡本身，有一个人数不多的隶属于社会主义国际的社会主义团体。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以后，萨洛尼卡的这个团体——马其顿社会主义者派其领袖季米塔尔·伏拉霍夫（？—1954年）参加了新的土耳其议会。希腊政府在1913年把伏拉霍夫从萨洛尼卡驱逐出境，但是他继续进行活动。他的追随者包括许多不同国家和不同种族的人，在一个共同的运动中友好合作。伏拉霍夫早年就信仰了共产主义。他在伦敦、巴黎和莫斯科流亡数年，以后回来担任南斯拉夫国家主席团中的马其顿代表，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他去世。在君士坦丁堡也有一个社会主义教育组织，用希腊文出版一种刊物《工人》。这个组织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叫做古佩特的法国人。俄籍德国社会党人帕维斯<sup>①</sup>也在君士坦丁堡住过一个时期，并且有一些人拥护他。但是在1914年以前，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小规模的。最强大的亚美尼亚组织实际上主要是民族主义的，没有多少社会主义性质。

---

<sup>①</sup> 见本卷下册第427页。

## 第十五章

608

### 瑞 士

如我们在本书第二卷所看到的，在瑞士始终存在种种流亡者和难民的团体，有的定居在那里，有的利用比较自由的条件为争取回归自己的国家进行策划或密谋；这些团体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与此有关而更为重要的是操德语的手工业工人的运动；他们在“漂泊的年代”里，常常在瑞士各城市，特别是在苏黎世，做一个时期的工作。这些人来自奥地利以及德国的不同地区；有些人留在瑞士，成了瑞士公民。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主要是在这些移民手工业工人中间开始成立工人阶级组织，但是很快就在操德语地区的当地瑞士人中间发展起来。在初期，它主要采取了德国所特有的工人教育协会的形式。1838年，出现了著名的格留特利联盟，这是超出地方政治联合组织的第一次尝试。这个联盟除了吸收雇佣工人以外，也吸收小业主和商人。格留特利联盟后来在1878年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纲领，然而在一开始的时候却是互助协会与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激进压力集团的混合组织。在1847年的内战和通过1848年新的民主的联邦宪法以后，激进党控制了联邦政治和各州的政治；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团体主要是在激进党内部活动，或者同它结成紧密的联盟。

迄今为止，我们所叙述的主要是瑞士的操德语地区——这是最大的组成部分——以及德国的或者操德语的移民或难民的情况。在操法语地区，制表工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组织起来。日内瓦早就是一个许多国籍的人杂处的城市，它的非熟练工人许

609 多来自其他地区,有从俄国和其他斯拉夫国家吸引来的外国侨民,也有许多法国人和少数意大利人。如我们在1868年日内瓦建筑工人的著名罢工中所看到的,这些建筑工人是一个国籍特别混杂的集团;他们非常容易接受左翼的宣传,同常常在政治上和激进党人结成联盟的“工厂”的熟练手工业工人截然不同<sup>①</sup>。在卢加诺和其他地方,除了俄国人的团体外,还有意大利流亡者的团体。在德国和法国流亡者于1848年以后开始大批涌入瑞士之前许久,马志尼就利用这个国家作为他的民族主义共和运动的根据地。他的影响在以后的日子里仍然很强大。

1848年的瑞士宪法保证了结社权利。虽然瑞士人有时不能不作出妥协,同意把一些其他国家觉得特别讨厌的人驱逐出境,但大体说来,即使面对着强大的外国政府,比如实行反社会主义法时期的俾斯麦政府,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其党组织和出版机构转移到瑞士领土时,给予政治难民的避难权仍然得到了精心的维护;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相继失败的时候,第一批政治难民涌入瑞士。这些难民中最著名的是约翰·菲力普·贝克尔(1800—1886年)。他在巴登参加了内战以后,定居在日内瓦,成为那个地区操德语的瑞士人的领袖,并且是早期国际工人协会瑞士支部拥护马克思的主要组织者。国际工人协会于1866年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此后,如我们看到的,瑞士、尤其是日内瓦,成了第一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同巴枯宁的追随者交锋的战场——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在那里力量很强大,而是因为瑞士的激进的工人阶级团体即使大多数不同意马克思反对同中产阶级的激进党人结盟的立场,也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有一个时期,甚至贝克尔也同马克思决裂了;但是,在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他又回心转意,组织1873年的所谓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100页。

日内瓦马克思主义代表大会，以支援马克思<sup>①</sup>。

就在那一年，瑞士工人阶级团体以各主要工业地区的工会组织为基础，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瑞士劳动联盟；苏黎世的赫尔曼·格雷利希（1842—1925年）成为这个联盟的领袖人物（他是1865年从德国来的）。从那时起，格雷利希便接踵成为瑞士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杰出人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的杂志《日哨》是操德语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机关刊物；为建立有效的全国性组织所作的接二连三的努力，主要是他的成就。那个时期另一位杰出人物也在苏黎世，但并不是一位工人。他是制革厂业主兼工人卡尔·毕尔克利（1823—1901年），在1858年率先成立了苏黎世消费合作社——这是在瑞士的操德语地区发展起来的强大的消费者运动的先驱。毕尔克利曾积极参加第一国际的活动，出席过它在1869年以前举行的历次代表大会；但是，在大论战达到严重关头以前，他退出了第一国际。他是傅立叶的追随者，写过许多阐述傅立叶主义和合作运动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穷人的福音》。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仍然很活跃。第三个重要人物是海因里希·谢勒尔（1847—1919年），他是格留特利联盟的主席，对于这个团体转向社会主义起了很大作用。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早期先驱人物是约翰·特莱克列尔（1822—1906年），他同苏黎世的合作运动也有密切关系。在瑞士的操法语地区，如我们在前一卷中看到的，拉绍德封的皮埃尔·库勒里博士（1819—1903年）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合作运动和温和社会主义的一位先驱者。早在1863年，他就同比利时人一道试图成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1863年时曾为此目的到布鲁塞尔去。他的杂志《未来的声音》于1865年问世。一开始时，他还参加了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但是，他由于竭力主张同激进党人结盟，并且强烈反对在拉控制着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203页。

第一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就退出了这个组织，主要致力于进行社会改革和农村合作运动。

611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一谈瑞士社会的结构以及瑞士社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变化。瑞士农村总的说来都是小农庄，没有很大的庄园或拥有地产的贵族。在十九世纪中叶，它的工业的主要基础是手工业，大工厂很少。它没有煤，在出现电力以前不适于大规模发展工厂生产。它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都有一大部分是在自己家里或相当小的作坊里做工。当工厂真正出现的时候，为了接近水源，工厂往往分布在乡下，而不是集中在城市里。手艺人有一些是独立的，另外一些实际上是城市商人或转包中间商的雇工。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工厂产品起初主要在国外、后来在国内的竞争逐渐加剧，特别是在制表业以及纺织和成衣业方面，威胁到手工艺人的生活水平和就业前景，因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特别是汝拉的工人为反对大规模生产钟表的新方法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们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斗争精神主要可以从斗争条件的恶化上得到说明。这些手工业者中许多人——大部分都是乡间——占有小片土地，用农产品来补充他们工业收入的不足，并且在没有工业方面工作的时候，完全以此为生；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本来不可能长期持续进行抵抗。

这种手工工业和土地耕作相结合的情况在瑞士居于主导地位，它严重地妨碍了瑞士工联主义的发展；在很长时期中，瑞士的工联主义差不多只存在于城市里的技术行业团体中。在城市和农村里，这种情况往往促成激进主义的发展，因为这种激进主义以手工业者和不十分富有的自产自销集团以及小自耕农、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联合为基础，其目的与其说是反对地主贵族，不如说是反对作为瑞士保守主义主要代表的富有的商人、中间商和金融家。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分布在农村地区的工厂工人和大城市——



特别是日内瓦一一里的技术熟练程度较差的移民中间促成了强烈反对激进联盟的左翼运动的发展；这些集团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后来的所谓工团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德国类型的工联主义。<sup>612</sup>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工厂制度日益侵害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逐渐消失。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在七十年代一直很活跃，这一部分是由于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和在沙皇加紧镇压（在此以前是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早期的短暂“开明”时期）以后，有大批法国和俄国难民进入瑞士。在法国恢复了它的自由环境以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中心迁移到了那里：当俾斯麦搜捕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一批新的德国流亡者到了瑞士，在瑞士操德语的城市里，传播他们那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瑞士劳动联盟，在帮助赢得了工厂法（1877年以公民投票方式通过）以后，在1879—1880年的经济衰退中解体，许多工会也随着瓦解了。不过，格留特利联盟仍然存在，并且已经开始转向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前进。残存下来的工会在1880年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央联合会；但是，很没有力量。1886—1887年，改良主义者再一次在公民投票以后，通过了一项把酒类贸易收归国有的议案，但是这是一项禁酒的议案，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的迹象。不过，同时在苏黎世爆发了一场严重的与锁匠罢工有关的劳资双方的斗争。市政委员会调来了军队镇压支持罢工的示威游行；其他城市的抗议浪潮风起云涌。工会联合会和格留特利联盟采取共同行动，决定建立一个劳动总储备基金会，用来支持罢工或被解雇的工人，基金来源是两个团体成员的捐款。这就引起了格留特利联盟内部的分裂，如我们看到的，这个联盟虽然主要由工人组成，其中也有小业主和商人参加。某些成员退出了联盟；但是大多数人留了下来，联盟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立场了。当时并没有联邦规模的社会党，虽然在

一些城市里存在社会民主集团。1888年，这些团体联合起来，以德国的类型为蓝本，组成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但是只有很少的追随者。

613 在设立总储备基金会的同时，出现了第二个重要的新发展。那就是成立了一个名为劳工书记处的组织，其职责是收集资料，进行有关劳工问题的研究，包括劳资立法在内，并且在有关劳工保护和劳资关系的措施上，向联邦政府提供谘询。书记处不完全是一个政府机构：它是由工人阶级团体管理的，领导人也是由工人阶级团体任命的。但是，它是在同政府协议下建立的；赫尔曼·格雷利希被任命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而毋需放弃他同工会的联系。它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团体，同劳工立法后来在瑞士的发展以及瑞士人以后在争取国际劳工立法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很有关系。格雷利希和海因里希·谢勒尔主要负责组织1897年在瑞士举行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次会议。劳工书记处的建立也倾向于促使瑞士社会主义向改良主义方向发展。

时隔不久，在劳工总储备基金会的业务方面发生了困难；这主要是由于有些较大工会认为，它们提供了太多的捐款来支持本身没有经费的小工会所组织的罢工，一部分也是由于格留特利联盟内部有人反对。1891年，格留特利联盟退出了，整个基金会交由工会联合会管理。不过，格留特利联盟的社会主义性质继续发展，越发强烈，在1893年，通过了一个新的、主要是社会民主党性质的纲领。第二年，社会主义团体和劳工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了一次关于“工作权利”的公民投票，它们力图通过这次投票使联邦政府负有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义务；但是，选民拒绝了这个建议。四年以前，公民投票批准实行疾病和意外事故保险计划；1898年，一次新的公民投票批准将铁路收归国有——这主要是因为，在私营企业管理下，在拟议中新建通过阿尔卑斯山的艰险线路问题上

许多诈骗行为和局部的争执。最后，在1901年，格留特利联盟和<sup>614</sup>力量不断壮大的社会民主党人合并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在党内，联盟作为一个进行友好和社会活动的附属团体继续存在。这次合并加强了瑞士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改良主义倾向，这一运动此后直到1914年一直是站在第二国际的极右翼，虽然在运动内部，特别是在瑞士的操法语地区，仍有一个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东山再起的左翼。

毫无疑问，造成瑞士社会主义主要部分所特有的改良主义态度的一个因素，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强大影响。这种趋势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苏黎世大学教授里昂纳德·拉加茨(1868—1945年)。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象它在其他讲德语的国家那样在瑞士获得坚固的阵地，这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力量大有关系。整个说来，瑞士社会主义更关心的是劳资立法和社会改革，而不是社会主义理论。它在争取国际劳工立法的运动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主要应该归功于曾担任国际劳工法协会书记多年的斯提芬·鲍威尔(1865—1934年)，此外还应该归功于格雷利希和谢勒尔。

在成立统一的社会民主党以后，工会立即进行了新的改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一些工业和行业，全国性的工会渐趋强大；当这些工会开始筹措自己的基金的时候，就越来越不愿意向工会联合会的总储备基金会提供捐款。从1902年举行奥尔顿代表大会时候开始，总储备基金会实际上完全靠较小工会维持，并且也完全是为它们谋福利；1906年，总储备基金会终于结束。1902年以后，经过改组的联合会按照格雷利希拟定的一个总的组织计划，采取积极步骤，主要按产业体系促进工会的合并；由于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结果会员人数迅速增加。

在这些年里，工人阶级运动的困难主要来自城市和各州当局不断调来军队破坏罢工。由于瑞士宪法禁止设立常备军，武装部<sup>615</sup>

队都是民兵，所以这件事更加令人愤慨。1906年，工人阶级团体举行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抗议使用军队对付罢工工人。如果政府拒绝取缔这种做法，代表大会就建议军队拒绝服从命令，并且答应给予那些在这样做了以后可能被罚款的人以赔偿，如果他们被捕下狱，就赡养他们的家庭。为此目的，筹措了一笔特别经费。政府进行了报复，将有些发表大会记录的报刊编辑以及某些在军队中间散发宣传品的社会主义者监禁起来，并且处以罚款，但是，在1912年以前，没有进行决定性的较量。那一年，苏黎世的锁匠和油漆工人举行了罢工；雇主使用了破坏罢工的王贼，并且调来军队保护他们。苏黎世工人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罢工作为报复，但是没有使政府作出任何让步。此后，左倾的趋势开始在工会中得势，但是，由于发生了战争，这种趋势在1918年以前没有明朗化，在这一年，奥地利和德国的崩溃，继俄国革命所引起的骚乱以后，使问题突然发生了危机——又是在苏黎世。那一年，工会已经通过了一个新的、更有战斗性的奥尔顿行动纲领；在举行示威，庆祝俄国革命纪念日的时候，当局又调来了军队，瑞士各地工会举行总罢工以示报复，这次罢工使制造业、铁路和公用事业都陷于停顿。政府采取了强硬的对策，下令工人立即复工，并且扬言要给予罢工工人严厉的法律惩处——特别是铁路工人和其他公务人员，以及所有那些要求军队拒不服从要他们破坏罢工或者破坏工人示威的命令的人。总罢工由于遭到农村地区的强烈反对，有切断城市食粮供应之虑，只持续了三天。后来政府主要对那些在奥尔顿代表大会所发布的告军人书上签字的领袖进行了控告；有一些人被捕下

616 狱，大多数人只判了短期徒刑，另外有一些人被罚了款。但是，尽管有这一次失败，在第二年（1919年）根据新的比例代表制进行的大选中，社会党人在联邦议会的总共189席中获得的议席，从战前的18席增加到41席。

在第二国际的工作中，瑞士人经常起作用；但是除了在讨论劳工立法的问题时，或者在第二国际辩论它的赞同成立民兵队以取代常备军的提案时以外，它并没有作出特别积极的或者突出的贡献。在讨论后一提案时，他们总是提醒代表们说，瑞士的军队虽然是民兵，可是决没有妨碍当局使用武装部队来驱散示威者和破坏罢工，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似乎期待民兵能起这种作用。在第二国际的历届代表大会上，瑞士代表大部分来自操德语的地区。格雷利希是杰出的发言人，还有日内瓦的让·锡格——他是主要的讲法语的代表——，苏黎世的约翰·锡格和奥托·朗（1863—1936年），伯尔尼的卡尔·莫尔和工会的奥古斯特·墨尔克。在1910年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瑞士代表有当时的苏黎世大学讲师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瑞士运动的未来领袖罗伯特·格里姆（生于1881年）也第一次在会上出现。

### 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的困境

本书在第二卷里曾提到比利时人——尤其是西萨尔·德·巴普——在第一国际中所起的作用和比利时工党在1893年通过的纲领，就在这一年，由于改革了选举权，它第一次能够提出自己的具有当选希望的议员候选人。我们看到，在第一国际中，比利时人，或者至少是西萨尔·德·巴普本人，处于一种使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和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截然不同的地位；我们还看到，德·巴普就未来社会中的公用事业的管理事宜向国际提出的报告企图认真地以职能主义和地方分权两个原则为基础来系统说明一个组织计划。如我们所见，1893年的比利时工党纲领中又出现了这些原则，因而使这一纲领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两年前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期满以后所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截然不同。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与德国人不同，他们非常强调公社，认为这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基本单位；他们与彻底的巴枯宁分子也不同，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规模上组织某些必不可少的服务事业，并在区域性的规模上，组织其他一些服务事业。与德国人相反，他们特别强调有必要把社会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委托给用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职能机构，而不是委托给国家或者议会，这些机构将对每一种特定事业的管理工作负责，在地方上只受公社、在全国只受议会的统一调配。

在强调职能方面的地方分权的同时，还有一种与之相应的关于劳工运动本身的概念。对于比利时人说来，党从来也不是这样  
618 一种整体机构：其主要宗旨是作为一种可靠的工具来夺取政权，并

在政治斗争中把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团体当作仅仅是它的助手来利用。在比利时人看来，党毋宁说是一个以工人的经济和社会组合为基础的，并从中产生的联合组织；在它的组织和控制方面，合作社、工会和互济会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使它不仅成为一个政党，而且同时能在工人集体活动的每一方面表达他们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决定把党称为工党，而不称之为社会党的部分原因——并不是因为象英国工党早期那样对于该党的社会主义性质有任何怀疑，而是因为它的领袖希望强调它不仅是在工人的政治斗争中，而且是在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导者的无所不包的性质。

比利时工党只是在以前的一系列努力遭到部分失败以后，在1885年，才具有了明显的全国性组织的形式。如我们看到的，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国际工人协会就有一个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比利时支部，它的杰出领袖是德·巴普。但是这个松散的联合主要是以各大城市的当地的和地区的工会联合会以及在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积极活动期间建立的许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的，因而它在1872年第一国际本身于海牙分裂以后解散时瓦解了。海牙分裂后，主要是巴枯宁分子的国际继续存在了几年；比利时人继续在这个国际中发挥了某些作用。有一些比利时代表参加了1877年的根特社会党统一代表大会，其中有来自根特本地的安塞尔和范·奥佛伦以及来自布鲁塞尔的路易·贝特朗。德·巴普本人也参加了大会，但是他代表的的是一个美国的团体。不过这时全国性的运动已经解体，只在华龙地区留下一个强有力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布鲁塞尔、根特和少数其他大城市有一些活跃的地方性运动。

实际上，比利时社会主义已经开始沿着新的路线发展。由于选举权限制很大，所以没有机会出现一个工人阶级的能参加选举的政党，社会主义只有通过附属于自由党的强烈反教会的左翼的

中产阶级同情者，才能在议会政治中得到表现。在1866年，已经有一群青年人，主要是大学生和大学的青年教师，出版了《工人宣言》这个刊物，提出了关于社会改革和普选权的要求。在这群人中出现了一些人物，比如保罗·詹森(1840—1913年)，他领导着与自由党人分裂以后的左翼进步党；赫克特·丹尼斯，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后来成为社会党议会党团的领袖；还有律师和教育学家埃德蒙·波加尔以及纪尧姆·德·格里夫，他是一位社会学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布鲁塞尔新大学执教。这群人中大多数都受到蒲鲁东学说的强烈影响，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使社会主义运动陷于分裂的大争论中支持蒲鲁东派。他们同理性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互相结合，这些人在柯林斯，在更大程度上在奥古斯特·孔德的影响下，在报刊上和在一些积极讨论哲学和科学的社团中，与天主教会的主导力量展开斗争。七十年代初期，在赫克特·丹尼斯、纪尧姆·德·格里夫和维克多·阿尔诺德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的《自由》这家刊物上，关于私有财产及其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而西萨尔·德·巴普和德西雷·布里斯梅则是蒲鲁东派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集团之间的联系人。

在1871年到1873年之间，主要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而举行的罢工浪潮汹涌澎湃。政府和雇主紧密勾结对这些运动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七十年代中期发生经济萧条后，罢工运动逐渐消声匿迹了，许多新成立的工会和合作社也不复存在了。在布鲁塞尔，西萨尔·德·巴普、路易·贝特朗(1856—1943年)以及巴黎公社的流亡者古斯塔夫·巴赞在1875年重新成立了一个名称为劳工会的地方工会联合会；第二年，主要靠爱德华·安塞尔(1856—1938年)和埃德蒙·范·贝佛伦(1852—1897年)的努力，在根特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团体。它在安特卫普也建立了一个地方工会联合会，这



三个组织联合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讨论建立比利时工会问题。由于华龙地区的代表主要为无政府主义所左右，拒绝参加任何准备从事议会政治活动的团体，这一企图失败了。结果没有成立一个统一的工会，而成立了两个不同的社会党——一个是以根特为中心的弗莱米社会主义工党，另一个是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布拉本松社会党。1879年，这两个党联合起来为普选权进行新的鼓动；但是华龙地区仍然态度冷淡，在国际工人协会最后解散以后，原来与该会有关系的一些工会参加了美国劳工协会，并且以让·绥舌威尔(1846—1918年)为总干事，继续在该协会的领导下反对政治行动。这种奇怪的隶属关系，主要在沙勒尔瓦附近的煤矿地区，实际上继续到1895年，这一年沙勒尔瓦的矿工终于参加了比利时工党及其下属的工会运动。

1830年，安塞尔和他那一批人在根特建立了比利时现代合作社的先驱组织佛鲁伊特，因而使运动得到了新的动力。佛鲁伊特的建立不仅是作为一个消费合作社，而且是作为该地区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共同中心。它为各种各样的工人阶级团体，比如工会、互济会以及种种教育和文化组合提供了一个聚会和集合的地点；它肯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且准备将它的资金用于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它成了其他城市的一些类似中心的榜样——特别是布鲁塞尔有名的“人民之家”——，它的成功给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具有特色的组织模型。具体的结构以及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因地而异，出入很大，但是将各种形式的工人阶级活动集中在一个共同中心里则成了一种习见的做法，这个中心通常包括一个合作商店，一套俱乐部房屋和讲演厅、会议厅，还有各种各样的特定社团的办公室。在许多地方，合作社起主导作用；但是在某些地方，地方互济会，或者联谊会起主导作用；而在另外有一些地方，主动采取行动的是主要以地方工会以及经历过经济萧条

621

风浪的生产合作社为基础的劳工协议会。围绕着一个共同中心建立的这些工人阶级团体的地方性组合，形成了日后成立比利时工党的基础。

比利时工党本身是在根特的佛鲁伊特、布鲁塞尔工人团体联合会和安特卫普同样的联合会于 1885 年 4 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各种各样的地方团体——合作社、互济会、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在会上关于新党的名称和性质都产生了意见分歧。有些人希望称这个党为“社会党”，或者“社会主义工党”；有些人又认为这个党应该只限于工人参加，而将该党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排除在外。表决结果否定了这种排除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议，但是赞成采用一个名称，强调它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的性质，而使它不致于同“社会主义”字样过于密切地等同起来，因为某些工人阶级人士仍然认为这个字眼具有太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涵。不过，关于党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或者关于它意欲作为以普选权作为主要的直接目标的一个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质的党派来进行战斗，却没有发生争执。

比利时工党成立以后不多几个月，华龙地区的社会党领袖阿尔弗雷德·德菲梭(1823—1901 年)出版了一个小册子《人民问答集》，获得十分惊人的成就。特别是在比利时南部的工业地区，这本书销售了成千上万册；它为普选权提出的强有力的要求，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此后发生的事情有多少是由于受到德菲梭的影响，现在还不能肯定，无论如何，在 1886 年，首先在沙勒尔瓦附近地区，后来在列日以及华龙地区各省的许多地方，爆发了多次罢工。罢工是在工资很低，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的矿工中开始的，但是几乎立刻就蔓延到了其工厂散处在各矿区、工资高得多的玻璃工人中间。罢工工人的主要要求是普选权；但是在某些地区也提出了经济要求，还有一些地区，根本弄不清楚到底提出的是些什么要求。看来

这次动乱事先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策划。这是一次自发性的动乱，当罢工的人群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号召仍然在上工的工人罢工时，罢工就在工厂之间蔓延开了。不久以后，当某些地方的工人群众不肯立即参加罢工时，或者是当号召罢工的人群走进一个雇主特别讨厌的工厂时，就发生了骚乱。结果造成了破坏；有一个条件特别恶劣的巨大的玻璃工厂被烧成平地。罢工工人与警察发生了多次冲突，不久以后就调来军队，以镇压骚乱和恢复秩序。接着又大肆逮捕，不仅逮捕罢工工人，而且逮捕罢工所波及地区的工人阶级领袖和社会党领袖。阿尔弗雷德·德菲梭由于他的小册子而被逮捕、受审，但是他逃到了国外。与罢工并无牵连的根特的工人领袖爱德华·安塞尔由于要求军队不要开枪打死罢工工人，而被监禁六个月。在受到扰乱的地区，对于地方领袖判处了多达二十年的苦役，其中包括玻璃工人团体的书记奥斯卡·法卢。

毫无疑问，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在华龙地区很活跃的其他左翼团体参加了 1886 年的罢工运动，并且尽其所能来扩大罢工。但是看来，罢工并不是他们煽动起来的，事实上也不是任何其他团体煽动起来的。它只不过是 在一个劳资关系和劳动条件非常恶劣，而骚乱是家常便饭的地区发生的事情。不过，毫无疑问，下一个行动却是这个地区新成立的工党左翼一手促成的。1887 年，在阿尔弗雷德·德菲梭的兄弟里昂·德菲梭（1840—1906 年）和儿子乔治·德菲梭的领导下，主要在华龙地区，一部分工党追随者脱党后成立了一个对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党，以总罢工作为它的既定政策，并且指责根特和布鲁塞尔工党领袖奉行改良主义和妥协政策。第二 623 年，社会主义共和党人违背了认为这时不适宜于罢工的工党的愿望，宣布为争取普选权进行总罢工，并且发表演说，强烈暗示企图以罢工作为革命暴动的前奏。毫无疑问，这次运动的一些领袖是相信革命的中坚力量有可能夺取政权的布朗基分子，而另有一些

领袖则是一些激怒了的工会主义者，他们领导罢工是对于 1886 年运动遭到暴力镇压的有力反应。不过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是警察的密探和煽动分子，这些人在制定他们后来加以指责的“大阴谋”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大阴谋”被大肆宣扬，因而使得政府很容易再一次进行大规模逮捕。当社会主义共和党的领袖受审时，为他们进行辩护的能干的进步律师指出，至少有一个主要的罢工领袖洛罗亚自始至终是一个警察密探，并指出蓄意的煽动在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被捕的人被无罪开释；由于用来煽起（罢工）运动的方法引起了很大反感，为了改善关系和防止今后再生事端，早先在 1886 年的骚乱中被判刑的人也被释放了。另一个后果是社会主义共和党于 1890 年解散，它的大多数领袖又重返工党，虽然相当多的工会主义者，特别是在矿工中间，仍然采取冷淡态度并保持它同美国劳工协会的关系。不相信政治活动的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团体也置身党外，宣传后来被称作是“工团主义”的理论。但是从 1890 年起，重新统一了的工党逐渐取得了进展。

624 两党重新合并以后，关于党今后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成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工党领袖曾经反对 1888 年的大罢工，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罢工没有成功的希望，而且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工人对罢工也毫无准备。在大多数地区，工会主义的力量仍然薄弱，合作运动也只不过刚开始逐步积聚力量。构成统一运动一部分的互济会员的队伍中只有一小部分工人。天主教派倒有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追随者，甚至在工厂地区，特别是在弗莱米各省；社会党人对于农村居民没有什么控制力量，而在这些省分中，农村居民却占大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希望举行真正的大罢工，或者即使是一次相当广泛，足以使大城市以外的重要工业和服务事业陷于停顿的罢工。另一方面，在现行选举权的范围内，议

会行动也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在来自议会外部的强大压力下，选举权不会有任何扩大——特别是宪法修正案规定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而面对着天主教政党的强有力的反对，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议会内部，社会党人的唯一朋友是进步党人，而进步党人本身也正在退出旧的自由党；自由党虽与天主教政党交替执政，其经济政策的反动却如出一辙。这时候还没有出现左翼的“社会天主教”运动；而自由进步党人中虽然有一些人勉强可算是社会党人，也包括一些激进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实际上激烈反对社会主义，而他们之所以以左翼面貌出现，主要是由于他们反对天主教派的主张。

工党领袖们由于完全不可能依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行之有效的选举方法来取得进展，不得不设法从议会外施加压力，除非他们满足于仅仅将他们自己的运动建立成为一个“国内之国”。事实上他们正在开始这样做，他们正在使他们的合作社和互济会毋需国家帮助，便成为他们的成员的经济和社会保险机构。但是工党领袖们一致认为，象这样在他们自己的运动中建立新的社会组织，虽然是必不可少的，却是不够的。他们要效法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同人，在议会中取得地位，并利用这种地位来促进社会和工业立法，并且使他们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的日子早日到来。他们看不出来，不大大扩大选举权，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看不出来，除了罢工行动外，他们还能够采取什么办法来强迫目前掌握国家机器的阶级扩大选举权。因此他们不能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反对利用大罢工作为政治工具；他们只能坚持必须为大罢工做好充分准备，并驳斥布朗基分子和工团主义者的论点，这些人将他们的信心寄托在人数不多，但有纪律的中坚力量的革命能量上，或者寄托在群众于适当时机到来时的自发行动上。

在与脱党分子重新合并后的第二年——1891年，工党代表大

会在里昂·德菲梭的主持下,决定在原则上赞成大罢工,以之作为迫使议会实行普选权的手段。但是没有规定罢工日期。他们与其说是决定立刻举行罢工,不如说是决定开始准备行动。不过这次运动中又有一部分人拒绝等待,而独断独行起来。在“五一”劳动节时,位于比利时与法国边界的波林纳奇煤田的矿工宣布举行大罢工,这次罢工扩大到了其他煤田。但是国内其余地区拒绝响应。结果罢工工人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

在工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些指责,但是并没有走向极端。矿工的行动显然是违背上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的;尽管有这种情况,工党还是尽最大努力来筹集经费支持罢工工人,并且保护他们免遭报复。这时已可明显看出,议会将不得不同意某种选举权的改革,唯一的问题是它将接受什么样的改革。自由党人,除了保罗·詹森的左翼进步党人集团赞成成年人选举权外,大多数人提出了规定某种附加学历的选举权制度。天主教党,或者毋宁说是他们的议会代表,大多数人完全反对改革,即使他们认为改革不可避免,他们所考虑的也是怎样尽量少让步以及他们能够倡议实行什么保障。事实上他们中间分为两派,一派是仍然反对一切改革的极端教会派,另一派是愿意进行温和改革的资产阶级——资本家集团。但是在议会外面,一个强大的、赞成改革的天主教运动一直在成长,并且正在迅速形成一个正式团体。天主教徒一直在忙于组织各种各样天主教工人团体——从互济会到工人之家,以与社会党的互济会和人民之家分庭抗礼;他们发现,除非允许这些团体通过赞成社会立法和劳资立法以及选举权改革的决议,否则就不能得到它们的拥护——当然,这些运动的某些倡导者是真诚拥护这些决议的。1892年,天主教工人团体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系列与工党提出的要求很相象的制定劳资立法的要求,但是由于拒不同意讨论选举权改革问题,所以没有能够就这

个问题发表意见。可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天主教徒拒绝接受这个禁令，并且公开表示赞成普选权——也就是成年人选举权。于是，一些较老的天主教徒同意接受成年人选举权，但是主张规定选举年龄为二十五岁，而不是社会党人所要求的二十一岁，力图借此来冲淡它的影响。

当然，这种事态发展意味着，社会党人在威胁要举行大罢工以争取普选权时，已经不再是向一个统一的统治阶级挑战。事实上，在有些地方，社会党人和天主教青年甚至共同举行示威游行，两党代表还在游行集会上讲话；而在另外一些地方，虽然分别举行集会，却是互致敬意。这时，议会已经正式决定改革选举权，可是没有说明以什么方式进行改革；并且决定下一次举行大选时，选出一个受权通过新宪法的制宪议会——这是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在这一次按照旧选举制度举行的选举中，工党并没有打算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新议会实际上是旧议会的翻版。有一个时候看起来好象可能完全陷于僵局。在普选权提交委员会讨论时，该委员会以多数票否决了不论是选举年龄为二十一岁还是二十五岁的普选权；在提出的许多对立的建议中，没有一个看来有可能通过。不过天主教党和自由党人的意见逐渐转向将成年人选举权同一人多选区投票权结合起来的建议，那就是将复选权授予所有家  
长，给予产业主和具有明文规定的学历的人以更多投票权。 627

不过，在工党按照它所表明的意图真正举行大罢工以前，一直没有这样做。参加这次罢工的约有 30 万工人，其中包括一些属于左翼天主教党团的人。在这次罢工中，示威者和军警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比起 1886 年、1888 年和 1891 年的更为局部性的骚乱来，使用暴力的情况要少得多。鉴于已明确决定，给予二十五岁（而不是二十一岁）的成年人以选举权，罢工停止了，尽管工党不喜欢较高的选举年龄和附加条件中的某些部分。但是应该指

出，工党并没有反对得到天主教团体强力支持的、给予家长复选权的建议，它所不同意的仅仅是其他形式的一人多选区投票权。

1893年的选举权改革使工党破天荒第一遭能够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竞选议会席位并略有成功的希望；但是由于他们在大多数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力量薄弱，选举权改革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赢得多数议席的希望。在根据新的选举制度举行第一次选举以前，由于以前在进步党内工作的一群社会党知识分子加入工党行列，他们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但是进步党作为一个整体说来，并没有转党，而它的杰出领袖保罗·詹森仍然和剩下的进步党人在一起，以前在旧议会中詹森曾经是普选权的主要鼓吹者。尽管如此，工党确实吸收了一些重要的人物，其中有教育学家里昂·弗尔内芒（1861—1927年）和参议员昂利·拉芳丹（1854—1943年）。在1894年举行的大选中，工党获得了显著胜利，得到了27席。它的议员中有来自根特的爱德华·安塞尔、布鲁塞尔大学的赫克特·丹尼斯教授、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儒尔·戴斯特雷（1863—1936年）以及阿尔弗雷德和里昂·德菲梭。

628 于是从1894年起，比利时工党就成了一个议会政党，就象其他欧洲政党一样，在议会中进行斗争；它非常关注保护劳动条件的劳资立法。不过，比起德国的政党或者法国的任何政党来，它并远远不是一个纯粹的议会党，因为它将合作社、互济会和工会都紧密地结合在党内，并因为它企图将议会行动仅仅当作是促进工人阶级要求的若干有效手段之一。比方说，由于它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福利事业，并且利用这些事业作为手段来吸引成员并且保证他们效忠于党，它要求国家通过社会保险计划的热情就大减。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说来，由于担心国家经营的或者国家资助的事业会落入天主教会的手掌，它对要求国家采取行动畏缩不前，在建立遍布各地的互济会、合作社、社交中心、甚至是工会方面，社会



党人和天主教派之间迅速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局面，因为在 1893 年以后，天主教派认真地开始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堡垒。社会党人在城市里，在发展合作社或者互助医疗福利事业方面获得了特殊成就；它的某些互济会和合作社已在其他领域发展成为十分广泛的社会保险福利体系。他们在改进工会组织方面所作的努力与这些发展以及消费合作事业的壮大比起来，是相当落后的。一直到 1899 年，他们才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会委员会，不仅容许那些愿意成为党的正式成员并且捐助大笔经费的工会参加，而且向那些赞成阶级斗争并且愿意与社会党人合作的工会开放，即使它们不愿意正式参加党。此后，比利时工会主义的组织改善了；但是党的主要支持力量仍然甚至更多地来自获得杰出成就的合作社，而不是来自它下属的工会，1900 年，这些合作社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批发合作社。

在 1894 年时——事实上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工党的一个最显著的弱点就是它没有能够在农村地区逐渐建立起坚强的后盾。他们充分认识到了这个弱点，社会党领袖，尤其是艾米尔·王德威尔得，正如考茨基和沃尔马尔在德国，饶勒斯等人在法国一样，越来越注意农业问题。1896 年，在饶勒斯主持的一次会议上，王德威尔得叙述了比利时工党日后将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政策。王德威尔得首先促使人们注意，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有很大一部分绝不是农民或者农业工人。他说，比利时的劳动人民在土地上工作的不及三分之一。在许多农村地区，到处分布着工厂和其他工业设施；此外，还有许多村民每天到城市里工作。我们绝不要把农村社会主义与农民或者农业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在许多地方，即使丝毫不争取农业劳动者的支持，也完全有可能赢得多数。但是他也指出，农村的工厂发展常常同一些形式的农业的成长密切相关，这些形式的农业需要进行大规模耕作，并且雇用大批农业工资

劳动者,而由于他们的工作条件,这些人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和工会的宣传。他详细叙述了地主向小块土地的佃户勒索高额地租的情况,这些地主们认为象这样出租他们的田地比他们自己耕作或出租给富有农民所获的利润都要大;他谈到了由于没有采用更好的耕作方法所必需的资本,所以只好采用陈旧方法的有地农民的悲惨处境。他着重指出糖甜菜的种植在增加土地所使用的劳动力方面,在要求更多的资本主义方法方面,以及在建立加工工厂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好象预料,在大多数地区糖甜菜种植有更加资本主义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工人一定会发现自己被雇佣的条件与产业工人更加相似,因而也就要更容易接受工会组织和社会主义教育了。他欢迎各种各样的合作组织的发展;认为这有利于农民居住区,有利于特别是奶制品的加工和销售,有利于种籽和其他必需品的购买,有利于机器的共同使用,有利于资本和信贷的提供。但是630 是他并没有任何非常独到的见解,也没有能够提出任何新的方法,使乡村居民转变思想,迅速接受社会主义。事实上他完全认识到,这种思想转变必然是缓慢的,他比考茨基<sup>①</sup> 远为爽快承认,有一些强有力的因素,妨碍农民财产和规模非常小的佃户耕作的消逝,因而也就妨碍最后完全与工业无产阶级同化的农业无产阶级的迅速发展。

比利时劳工运动在选择以其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和互济会组织彼此紧密结合这一原则为基础的结构时,势必要放弃在每一个独立门户的活动领域内建立完全统一的组织的可能性。如果有一些合作社、互济会和工会与工党结合为整体,那就必然有另外一些合作社、互济会和工会反对这种密切的联系,而情愿保持独立,或者同对立的运动联系起来——尤其是同天主教社会运动。事实上,比利时工人阶级组织的整个模式主要是从以社会党人和

<sup>①</sup> 参看本卷上册第 276 页以下。

他们的前身激进党人为一方与以天主教会为另一方的斗争中产生的。如我们以前所见，在社会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以前的时代，政权的主要争夺者是天主教派和自由党人，他们分别与理性主义和共济会有着密切关系。发展成为进步党的自由党左翼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思想，并很受孔德主义以及柯林斯男爵的弟子——特别是路易和阿加松·德·波特尔——所维护的那些思想的强烈影响。以西萨尔·德·巴普为中心人物的社会主义团体也是理性主义者：它在1857年最初的组织形式是德·巴普的岳父、印刷厂业主兼工人德西雷·布里斯梅根据“理性社会主义”建立的团结协会。比利时几乎没有信仰新教的：天主教徒的唯一敌对者是各种派别的理性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扩大选举权的影响之一是使得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独立政党进入议会：另一个几乎同样重要的影响是削弱了自由党人并且加强了天主教派的力量，因为扩大选举权之后增加了大批的农村和小城市的穷苦选民，对于这些人，社会主义者的宣传，或者任何形式的理性主义的宣传都从未产生过影响。这特别适用于弗莱米地区。至于华龙地区，宗教的力量较弱，社会反抗的学说，虽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却有着广泛的吸引力。因此，在扩大选举权之后政治变成了社会党人与教会之间的大规模斗争的时候，弗莱米与华龙地区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就更加严重了。

社会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社会党人与天主教党派之间的永恒斗争，都促使教育成了一个特别的战场，并且使它在社会斗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兴起以前，自由党人，包括他们的进步派在内，是竞争中主张从教会控制下解放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天主教会对于初等教育具有十分牢固的控制力量；但是自由党人在执政期间，特别是在布鲁塞尔和以技术课程著称的列日，建立了一些非教会控制的大学和

高等技术教育中心。布鲁塞尔和列日的自由大学以及各种高等大专院校成了思想进步的教师自由驰骋的天地，成了左翼学生团体之家，这些学生团体常常与自由党人有关系，但是也包括日后投身于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知识分子。如我们所见，赫克特·丹尼斯和纪尧姆·德·格里夫都是大学教授；而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就是学生时代已经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许多人之一。列日大学不仅为比利时社会主义，而且为法国社会主义培养了人材；主要由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材，才有可能发展与劳工运动有关系的医疗互济会。西萨尔·德·巴普本人就是在该校学医的同时在他岳父的印刷厂里作排字工人以维持生活的。

632 1892年，社会党大学生和校友会在布鲁塞尔人民之家举办了一系列的成人训练班，这是社会党人关心工人高等教育之始，这与普通大学生或者技术学校学生的高等教育是不同的。最初的教师包括王德威尔得、路易·德·勃鲁克尔和律师马克斯·哈勒特（1864—1941年）。第二年以王德威尔得和里昂·雷克莱尔为首的布鲁塞尔大学教授以英国的大学附设夜校函授班为蓝本，开展了一个同样的运动，它的教师完全来自大学。在其他大城市也开展了类似的运动；但是在布鲁塞尔由于布鲁塞尔大学拒绝让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埃利塞·莱克留开课，不久就产生了危机。这次的拒绝引起了分裂，一些比较高级的教授和教师退出了，成立了布鲁塞尔新大学；此后就存在两个对立的大学，都是非天主教性质，其中一个自由党居于支配地位，另外一个则大体上都是社会主义者，虽然它也包括一些进步党的左翼分子。在创办新大学的教师中间有著名的社会学家德·格里夫，关于他的思想本章后文将有叙述。该校的教师中还有王德威尔得、德·勃鲁克尔、弗尔内芒、卡米尔、勒费尼埃、埃米尔·韦尔艾伦和保罗·詹森以及莱克留等一些著名的外国教师。一直过了许久，到1911年，工党才主

要依靠这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先驱所做的工作，建立了它自己的工人教育中心，以昂利·德·曼（1885—1953年）为第一任书记，又过了一些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组织才脱胎而成比利时劳工学院。

比利时工党为适应 1893 年的选举权改革所造成的新情况而具有的形式是建立在联合基础上的。它由各地区的二十六个区域联合会组成，每一个联合会都以合作社或者人民之家——根特的佛鲁伊特、布鲁塞尔的人民之家等等地方运动的所有支部的一般聚会场所和家园——为中心，与区域联合会并存的还有一些合作联合会——各行业中的工会、互济会和其他专业团体的全国性组合。各联合会在其内部事务方面都享有高度自主权，并有权派一位代表参加党的总委员会。正式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或者在特别召集时举行，它在制定政策方面有最后决定权。由代表大会而不是由委员会从布鲁塞尔地区选出一个由 9 人组成的执行局，负责日常工作。在 1899 年以前，没有特别的协调机构来负责工会事务，但是在 1899 年，党成立了一个工会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召集凡属不直接属于党的工会都可以参加的工会代表大会。在发生这种变化以前，1898 年政府曾通过一项法令，给予工会法人资格以控制工会。工党反对这个法令的措辞，社会党各工会拒绝根据这一法令进行登记，而情愿将它们的法定权利建立在比利时宪法中保证结社自由的条款上。1900 年以后，社会党各合作组织成立了一个类似的社会党合作社联合会，但是这个组织只限于同工党有关系的合作社参加。事实上许多合作社都是党的区域联合会建立的，而它们又成立了互济会来提供社会服务事业，或者同已有的互济会发生密切关系。一直到 1912 年才建立了独立的、全国性的社会党互济会组织。工人阶级组织的具体模式因地而异，但是主要特点是各地都一样的。

633

在政治方面党本身是权力执行机构，在地方或者省的事务上通过它的区域联合会采取行动。但是在每一个区，都有非正式的政治小组来安排讨论和宣传活动。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党组织。为进行农村工作，区域联合会成立了特别的组织机构：一种广泛使用的活动形式是效法英国的“嘹亮号角侦察队”建立的自行车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派出自行车队到各村落去举行集会、为竞选进行游说和征募会员，并且设法建立工会会员或者合作社社员的农村组织。他们在华龙地区以及根特和布鲁塞尔附近要比在比利时北部所获成就大得多。

634 社会党人对 1893 年的选举法当然绝不满意。他们在议会中和全国各地都积极展开活动争取进一步修改；他们还积极努力取得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天主教派立刻提出了号称“四大耻辱法案”的改革地方选举权的反动议案作为对策。根据 1895 年通过的这一法律，选举年龄提高到三十岁，而且某些富有的选民阶级除了根据 1893 年的法律得到的三次投票权以外，又得到了第四次投票权。就是这一议案也没有能够防止社会党人在地方政府机构得到一些席位——席位之多使它值得成立一个社会党各市代表全国联合会来协调政策；但是这个议案产生了相当坏的影响。1899 年，天主教政府变本加厉，企图将 1895 年的法律扩大到议会选举；但是这个建议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大规模的示威，以致政府只好辞职，这个计划也就此作罢。不过新政府仍然反对一切进行民主改革的计划，并坚持将 1895 年的法律应用于地方选举。工党由于在议会中一事无成，于是发动了新的大规模示威运动。但是政府仍然不为所动。最后在 1902 年，党内情绪十分激烈，领袖们无可奈何，只得同意为争取普选权而举行总罢工，虽然许多位领袖对于罢工前途如何是忧心忡忡的。总罢工的号召引起了广泛反应，虽然面对着天主教大多数团体的坚决反对，还远不是

普遍的。30多万工人举行了罢工，但是政府立场坚定，因此工党只得承认失败，命令罢工工人复工。不久以后举行了大选，社会党人在选举中遭到了挫败。对于工会的影响更为严重，许多工会退出了党，宣布在政治上恪守中立。合作社和互济会也有类似的退党情况；总的说来工党遭到了非常严重的失败。

毫无疑问，所以遭到这种挫败，部分原因是天主教社会运动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对抗组织所作种种努力。以阿拉斯特的议员丹神甫为首的最左翼的天主教集团被赶出了天主教运动，于是这一运动逐渐为教会党所控制。天主教派不断加紧活动来组织基督教合作社和基督教工会以与社会党人对抗，而在他们作不到这一点时，就宣扬在政治上恪守中立的好处。毫无疑问，这些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特别是在1902年的总罢工失败以后。在议会中，一个天主教政府接替另一个天主教政府；社会党人似乎陷于绝境。议会通过了一些法律来保护劳动阶级免遭最恶劣的剥削；但是这一方面的成就非常小，社会党为了争取通过由国家组织社会服务事业而施加的压力没有发生效力。在这一方面所能够取得的最大效果是给予互济会的小额国家补助；而这些补助往往使天主教社团受到超过社会党人受到的好处，社会党人只有在把他们的社会服务活动与他们的政治和合作工作分开的条件下，才能够得到补助。

社会党人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1902年以后，政治争执的主要方面转移到了比起争取普选权的运动或者关于劳资和社会立法的要求来，对他们不是那么有利的另外一些问题。在1902年惨败以后的那个时期，人民和议会的注意力最初转移到了关于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他于非洲为自己建立的私人帝国中的行为所发生的争执，后来又转移到了一个同样困难的问题：天主教会在管理学校制度方面的地位。

实际上，关于刚果的争执主要并不是一个比利时各政党之间的争执问题：这是比利时国家对于比利时国王以另外一种身份：刚果自由邦专制君主作出的坏事应负的责任问题。这件事早在1876年秋就开始了，当时利奥波德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对非洲有兴趣的探险家、教士和商人的秘密大会，表面上是为了取消这个“黑暗大陆”的奴役制度和奴隶买卖，并且通过发展传教事业和贸易，使它接受“文明”。利奥波德最初建立的组织叫作非洲探险开636 化国际协会，最初它与刚果并没有特殊的连系，也不打算组成一个国家。但是利奥波德不久就注意到，如果大国允许他这样做的话，他有可能在刚果盆地地区为自己建立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帝国。1878年，作为原来的协会的分支，他建立了一个新组织，这个组织立即被称之为国际刚果协会。在这个机构的主持下，有名的探险家H. M. 斯丹莱在刚果度过了几年，为贸易和传教事业建立了据点，实际上他从当地的首长那里取得了大片的土地和主权，从而建立了一个国家。恰好在比利时玩弄这些花招的同时，一些欧洲国家也在采取行动来将非洲大陆划分成若干势力范围，后来迅速发展成了殖民帝国。利奥波德在中非看中了大片土地，他认为在那里有可能为所欲为，只要他能够就他们打算建立的帝国的边界，与欧洲国家达成协议。利奥波德自称是传播基督教文明的人，依靠这种手段，并且通过他与欧洲统治家族的家庭联系，充分发挥了他玩弄阴谋的卓越才能。他说服了美国，承认他的刚果协会是一个独立国家，然后依次得到了法国、德国、英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承认。在进行这些谈判的过程中，俾斯麦在1884年4月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对开发非洲感兴趣的国家的会议；结果在1885年年初通过了一个涉及整个刚果盆地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总协议。协议规定，在该地区内，一切国家都有充分的通商自由，并应采取步骤禁止奴隶买卖，保护传教士和探险家。刚果协会被承认为辽阔地区上的



一个独立国家，并成为总协议的一个签字国。此后举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划定了它的边界，实际上是由它与欧洲各大国瓜分了中非的大部分地区。同时，利奥波德得到了比利时议会对于他对刚果自由邦的绝对统治的承认，议会还规定刚果自由邦与比利时的结合“完全是个人性质的”。利奥波德然后着手建立他对拨交给他的广大地区的有效控制。在内地，与阿拉伯人发生了激烈战斗，与当地人也展开了凶猛的斗争，他们的抵抗遭到了残酷镇压。1889年，利奥波德拟就一份遗嘱，表示在他死后，刚果应该是比利时国家的属地，但是他又在刚果划出了一份面积很大的私人地产——王室采邑。他说这是他本人和他的继承人的私人财产。他还给予大资本家公司以许多国家的投资商人都感兴趣的特权；他要求在刚果自由邦转归比利时控制时这些特权以及“王室采邑”应该受到尊重。他在他的帝国得到承认以后，立刻颁布了一项穷凶极恶的敕令，宣布凡是刚果的“空地”无不是刚果自由邦的财产；然后他将这道敕令解释为包括当地居民实际上没有耕种的一切土地在内，也就是说，不仅包括一切丛林和森林以及所有矿山开采权，而且包括当地的游牧部落没有进行永久开垦的一切地区在内。他在他自己的王室采邑内，并代表他给予特权的公司，建立了一种强迫劳动制度，不久，这种制度就同奴役制度难以区分了；他的军队——主要是欧洲军官指挥的在本地募集的兵，对一切企图抗拒他的暴政和剥削的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残酷镇压。他所建立的政权成了国际丑闻——特别是在他为了剥削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特别基金会所控制的橡胶种植地区。1904年，英国驻刚果波里亚领事罗杰·卡斯芒提出了一份报告，揭发了一些到处可见的骇人听闻的暴行；英国政府已经就这个问题照会柏林总协议的所有签字国，它不明确地暗示说，这个问题可能提交海牙法庭。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利奥波德一方面否认这些指责，仍被迫设立一个以比利时著名法官

埃德蒙·詹森斯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承认存在严重的弊病,并建议进行一些改革;但是它认为使用强迫劳动和给予私营公司以特权的制度是正当的。利奥波德接着设立了另一个他自己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个报告,并实行他愿意接受的那些建议;但是他继续坚持认为,他在“王室采邑”中的权利和他所批准的特权都应该受到尊重。

从1901年开始,比利时政府和议会就已经在讨论一项旨在从利奥波德逝世以后刚果成为比利时殖民地的时候起控制刚果事务的法案。由于国王坚持不能接受的条件,没有取得进展。1906年,在委员会提出报告后,利奥波德使情况更为恶化,因为它给予一些主要由外国资本控制的公司以新的特权,希望从而在各大国中得到资本家集团的支持来反对对他的进攻。此后比利时议会中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讨论,同时国外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抗议,因为很明显,利奥波德实行的所谓改革并没有重大效果,在刚果进行的暴力统治和残酷镇压实际上没有改变。英国的自由党政府和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政府加入了要求改革的行列;1907年,利奥波德被迫签订了一个条约,把刚果自由邦让给比利时,将刚果事务交由比利时议会管理。但是,利奥波德仍然坚持“王室采邑”以及在其中建立的基金会应该不受干涉,并且坚持说,基金会活动的大量收入应该继续归他和他的家族所有。这些规定引起了比利时议会以及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新的抗议;1908年,签订了一个新条约,废除了基金会以及利奥波德声称归他所有的大量特权,但是对国王“权利”的损失给了巨额赔偿。比利时国家还被迫承认利奥波德所批准的一些特权,并且答应付给比利时皇族大量的年金。但是比利时议会经过长期的激烈辩论后,终于接受了修改的条约,1908年年底,刚果自由邦不复存在,变成了比利时殖民地。

刚果局势使得比利时社会党人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对

利奥波德没有好感，十分愿意与别人一道指责他的万恶统治和与他结成一伙的、猎取特权的资本家。他们正确地认为刚果自由邦是说明经济帝国主义弊端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并与其他社会党人一道揭露说，帝国主义的成长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可是要设法解决利奥波德为了建立私人帝国所引起的问题，谈何容易。比利时社会党人不希望看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由于获得一个殖民帝国而追随各大国之后进行帝国主义冒险，可是显然比利时却正是在承担义务，从事这种冒险的过程中，至少从利奥波德宣布他有意立遗嘱于死后将刚果自由邦交予比利时的时候起已经进入这种过程。此外，利奥波德为此提出的条件——保有他的私人采邑和坚持继续他给与各开发公司的特权——也是比利时社会党人所完全不能接受的。

从1901年起，比利时议会所面对的是一项规定比利时在利奥波德死后将刚果交予它管理时所应采取的统治形式的法案所引起的问题。根据这一法案的原来形式，应该丝毫也不改变刚果政府的彻底专制制度，而在殖民地事务方面，比利时议会也几乎将完全没有发言权。社会党人对于这一法案自然坚决反对，就象他们反对维持王室采邑，并反对维持给与各公司的特权条件，以对本国人采取警察和军事行动的广泛权力一样。但是许多社会党人的态度比这走得更远，他们反对比利时在任何条件下接收刚果。他们中间有些人希望将刚果自由邦交给国际监督和管理；其中有一些人不愿意在任何条件下与这件肮脏的勾当发生瓜葛，而采取一种纯粹640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同时也不认为有义务提出任何积极的建议。

在指责利奥波德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时，赫克特·丹尼斯和艾米尔·王德威尔得起了重要作用。1906年，在委员会提出报告以及显然没有实现它所建议的即使是温和的改革以后，问题具有了

新面貌,这时,在社会党队伍内产生了严重分歧。这已经不再是在立法上规定在利奥波德有朝一日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而是立即采取行动,来结束一件已经不可容忍的国际丑闻的问题——不仅是社会党人和人道主义者不能容忍,就连许多鼓吹帝国主义政策的人也不能容忍。王德威尔得亲自前往刚果了解实况之后相信,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比利时国家根据这样一些条件来接管刚果自由邦,那就是使比利时议会能控制刚果的事务,并使它有责任制定法律来保障本地人的权利和自由。此外,为了实现这一解决办法,他还准备向国王的漫无节制的要求作出一些如果要达成协议,看来就是不可避免的让步。不过王德威尔得发现在自己的党内,他在这个问题上居于少数。大多数社会党人认为他们正在无可奈何地变成赞同他们所极力反对的经济帝国主义制度的同党。王德威尔得由于自己的建议在党内被否决,主动提出辞去他在党内的职务;但是党拒绝接受他的辞呈,并在他坚持己见时,同意让他继续在议会中发表他的见解。党一方面同意以对利奥波德的要求所作让步不能接受为由投票反对刚果法案,一方面也并不限定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必须反对在任何条件下接收刚果自由邦,从而避免了党的分裂。这一法案经过修改后使比利时议会得到了对于刚果政权的控制权,并且使它有义务通过法律以保护本地人,在通过这一法案时,社会党人都投了反对票,不过他们深知,尽管他们投反对票,这个法案仍然会通过。此后,王德威尔得实际上是

641 达到了目的了;因为当刚果由于比利时议会的作成而成为比利时殖民地时,社会党人不管在原则上多么不喜欢这个政权,除了尽最大努力使这一政权趋于开明,或者默许利奥波德坚持到底的那种剥削继续下去之外,再没有别的选择了。

因此,比利时社会党人在本世纪初期就被迫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必须用比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更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说明

他们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态度；而他们发现，这并不是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理论上说明应该建立一个信誓旦旦说要保护本地居民利益的国际政权，那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十分明显，建立一个由规定它们在刚果盆地行动的条约的签字国主持的这样一个政权，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因为就在那时，这些国家仍在忙于瓜分非洲，忙于在它们所攫取的领土上，批准给予只不过不象利奥波德在刚果给予特权的各公司那样招人反感的公司的特权，忙于“管辖”本地，并以促进非洲开化为借口，夺取他们的土地；虽然这些国家中有一些反对利奥波德的作法，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反对剥削本地人，而只是因为他们相信，手段稍微温和些，也能取得大致同样的、或者更好的效果。实行上不可能建立一个能够为本地人谋福利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国际政权；在那时也不可能将该地区交予任何自治的地方当局。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几乎还不存在；唯有阿拉伯人具有比部落进化的组织，可是，如果允许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使用权力来恢复古老形式的奴隶贸易。因此比利时国家只能采取一种作法，就是接收利奥波德建立的庞大帝国，并且因此承担起管辖这个国家所必须承担的财政责任；由于社会党人在比利时议会中是人数很少的少数派，而且并没有早日成为多数派之望——其实他们实际上是在失势——这就意味着比利时将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来自全世界的资本家特权所有人的利益而统治一个帝国。难怪大多数比利时社会党人畏缩不前，不愿意加入赞成这种发展的行列；但是他们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呢？①

① 有一些国家，组织了抗议（比利时及各大国的）刚果活动的运动。在英国率先采取行动的是埃德蒙·迪恩·莫雷耳（1873—1924年），他在1904年任刚果改革协会秘书。莫雷耳所著的许多著作和小册子——尤其是《利奥波德国王在非洲的统治》（1904年）和《红色的橡胶》（1906年）——在唤起舆论，反对利奥波德的暴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1914年战争爆发之后，在组织民主管制联盟方面，他发挥了主要作用，并且任该联盟秘书。他是《外交学报》的编辑。在1914年之前，他是一个自由党人，但是他后来加入独立工党。1922年，他在选举中击败温斯顿·丘吉尔，成了代表丹迪市的工党议员。在战争期间，有人猛烈地攻击他“亲德”；但是实际上他激烈反对帝国主义和秘密外交，并热烈赞成人类不分肤色或信仰都应该有权利。

刚果事务刚解决——当然将来还有为刚果政府制定新法律的斗争——教育问题就开始成为比利时政治争论的中心。天主教政府打算让私人办的教会学校与公立学校在同等条件下得到公家拨款，从而加强教会对学校控制。自由党人，作为教育“非宗教化”的传统拥护者，在这个问题上又成为了教会人士的主要反对者；面对着议会中的天主教多数，社会党人发现自己被迫与自由党结成反天主教同盟。1911年，天主教政府提出了一个教育法案，迫使地方当局根据同样条件拨款给予天主教学校；社会党人与自由党人联合起来在全国进行鼓动以反对这一法案。政府于是撤回了这一法案，但是解散了议会，诉诸选民来决定是否赞同它的政策，这就使得社会党人处境困难。到这时为止，他们一直坚持必须在不与资产阶级政党发生关系的情况下独立进行斗争，并且坚持绝不同它们结成选举同盟。但是只要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根据目前的选举法彼此继续展开竞争，天主教派对政治权力的掌握显然就是不可动摇的，而且罢工行动也没有能够使选举法得到改变，面对着这两种情况，大多数社会党人领袖改变了看法，认为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应该暂时抛弃分歧，为争取教育的“非宗教化”和选举权的改革而共同进行斗争。这个问题产生时正当国际社会党内部由于发生了“米勒兰事件”而对社会党是否应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问题发生激烈争执。我们知道，当这个政策是保卫法兰西共和国免遭反动势力危害的唯一可以利用的手段时，饶勒斯曾经以这个政策的主要维护者的姿态出现。他没有能够说服国际中的大多数，但是他得以使国际将谴责局限于通过著名的考茨基决议，该决议虽然反对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参加政府，但为了社会党的团结并没有完全把门关死<sup>①</sup>。大多数比利时社会党人由于意识到，除非将天主教派赶下台，他们的运动就有进一步倒退的危险，开始相信情况的

<sup>①</sup> 参看本卷上册第49页及以下。

严重已足以使他们有理由无论如何要在选举中与自由党人合作。以路易·德·勃鲁克尔为首的一部分工党强烈反对这种意见，可是，他们的意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被否决了；尽管他们抱有忧虑，出于对党的忠诚，他们终于让步。事实上，党代表大会并没有同意彻底结盟，这样的联盟是与社会党国际已宣布的政策背道而驰的。总部设在比利时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主席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几乎不可能接受任何与考茨基决议显然矛盾的决议。不过，考茨基决议确实承认，可能出现一种社会党人不得不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情况，在制定比利时的政策时，就充分利用了决议中的这一条款。经过深入讨论之后，结果拟订了自由党与社会党的选举公约，据此两党都表示要为教育“非宗教化”、普选权和一个社会改革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不过并没有对将来承担明确的义务。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斗争的 1912 年大选非但没有推翻天主教派，却反而使他们比以前更强大地回到了议会中。许多中产阶级的自由党人 644 由于对社会主义心存恐惧，都投了天主教派的票；天主教派指责社会党人是宗教的敌人，从而得到了工人阶级的相当多的支持。

第二次挫败在社会党的队伍内引起了深思。与自由党人联盟的政策已经声誉扫地；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不进行选举改革，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取得进一步发展。因而又回到了举行政治性总罢工的政策；党的领袖接受了——在许多情况下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党的积极分子对他们提出的要他们奉行更有战斗性的社会主义政策的要求；但是同时党的领袖又坚持说，总罢工必须比 1902 年准备得更为周密。接着就是一个加紧准备的阶段，包括特别努力来争取更多的工会支持。同时还举行大规模示威来迫使政府让步；但是，在政府采取坚定态度的情况下，社会党人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不承认失败，就必须举行他们扬言要举行的总罢工。他们决定在 1913 年 4 月 14 日举行罢工，到了那一天，罢工得

到的响应比十一年前要大得多。参加罢工的约有45万工人，而1902年只有大约30万人。政府在这种压力下，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选举改革问题，但是拒不作出进行任何修正的诺言；党的领导就根据这种不可靠的让步下令复工了。假如这个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工作，而政府被迫据以采取行动，那时会是什么情况，是难以逆料的。但是，如我们所见，第二年战争爆发，比利时遭到入侵，整个问题暂时烟消云散，直到战争使社会党人与他们的敌人被迫聚首，组成流亡的联合政府后，才在完全不同的气氛中重又提起。不久，在1913年和1914年停止罢工以后，工党内部立即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许多地方积极分子指责他们的全国领袖的懦弱无能。不过，由于战争爆发，这些分歧才没有了下文。

645 在坚决主张与自由党人采取联合行动政策的人中间有两个工党初期领导中的硕果仅存的杰出人物——根特的爱德华·安塞尔和布鲁塞尔“人民之家”的主要创始者路易·贝特朗。这两个人过去与比利时社会主义有重要的联系。贝特朗曾与之密切合作的西萨尔·德·巴普于1890年逝世，与贝特朗在1885年共同创办社会党主要报纸《人民报》的让·沃尔德尔也在1896年继西萨尔·德·巴普之后下世。在运动的议会阶段担任领袖的新人大部分是稳健派，其中有些是本来信仰进步主义后来改变信仰的人，还有一些是热烈参加党的教育工作的学生与教师。当然，党主要由工人组成；但是，在它的全国领导机构中，知识分子所占比重大得过份，由于工会力量比较弱，由于选举制度的性质，知识分子或者中产阶级的候选人就有争取选票的优越条件，因而妨碍了党的领导层次的平衡。在比利时，任何其他宗教集团都不能与天主教会匹敌，因此，反教权主义对于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积极分子中的中坚分子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除了在少数地区之外，对于广大工人的吸引力则较小。工人阶级领袖由于强烈信奉理性主义，对他们存



在着与自由党人联合起来，共同为“非宗教化”斗争的强大吸引力；但是往往使他们，特别是他们之中的知识分子（勃鲁克尔是显著例外）看不见让天主教派指责他们不仅是教权主义的，而且是宗教本身的敌人的危险。因此，由于与自由党人联合而使他们丧失的工人的选票要比他们在中产阶级中间得到的选票多得多。此外，党在九十年代的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之后所陷入的困境往往使人怀疑，那种企图将工会与合作社组织成为工党的一部分，而将那些不愿完全在党内工作的团体拒之门外的政策是否明智。党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在1905年以后，曾尽力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工会联合会，以吸收那些不愿成为党内的合作联合会的工会参加。但是，这个政策开始得太晚，影响不大，同时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根据类似的方针处理合作社问题。事实上，要这样做也是非常困难的，结果很可能是弊多利少。党组织以非常成功的地方合作社作为它的整个地方活动的中心，对于这些合作社，它依赖很深，以致如果使它们与党分开就会给予整个运动以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尽管如此，建立社会党合作社作为工党的组成因素，必然会同时使得非社会党合作社发展起来成为它们的敌手；而天主教党人在合作社与工会方面，也会抓住机会建立一个对抗组织。鉴于天主教会与教会力量反对者之间的斗争激烈，两大对立运动的出现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否如此，它也毫无疑问地会导致一种困境。1914年，社会党人就象他们在1894年时一样，取得政权的希望很渺茫。1914年，曾经尝试过与自由党反教会派结成联盟，但是失败了。在战争给予全国统一的想法以推动的情况下，与天主教党人联盟会有什么作为，还有待分晓。

在本章所论及的整个时期，艾米尔·王德威尔得（1866—1938年）不仅是比利时工党的杰出政治领袖，也是它的主要理论家。在议会以及在许多国家举行的无数次集会与示威中，他是杰出的演

说家，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教育家，并且经常关心不仅是比利时工党，还有第二国际的事务，可是他仍有时间在一些著作中阐述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的德国追随者的正统学说有分歧，而师承西萨·德·巴普以及比利时劳工组织在路易·贝特朗和爱德华·安塞尔掌握中时所具有的实际形式。他由于受到德·巴普的影响，坚持公社在经营公用事业及工业方面的作用，同时强调有必要建立特别的职能机构来进行这些工作，而不是将这些事业的管理交给主要是政治性的机构。他的有关党的概念来自贝特朗和安塞尔，他认为党不是一个整体的政治组织，而是合作社、工会、互济会与其他工人阶级团体的组合，其基础是地方的团结，而不是任何中央指导权力机构。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远不是那么中央集权与独裁，并且在于它反对认为党主要是为进行选举斗争而组织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政党，是工人阶级在一切方面的活动的最高统治者。因此，它在双重意义上与国家主义敌对——不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必定要推翻的敌人，而且将它对于国家主义的敌对态度延续到了将来，坚决反对以国家独裁主义作为手段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王德威尔得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社会主义与国家》；他不仅仅是从工人阶级取得政治权力的角度，而且是从一种在许多方面同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由合作社、工会、文化机构和通过政治行动——的过程的角度来考虑向社会主义的进展。

王德威尔得一生事业开始时是作家，他对比利时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和实际结构以及比利时的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在进行这些研究之后，又对比利时的农业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且参照伯恩斯坦和“独立”学派的法国改良主义者的修正主义批评所挑起的争执来考虑马克思主义学说。经过

这些努力,他写出了他的最著名的著作《集体主义与工业的发展》,此书于1900年出版。接着出版了许多应景之作,如关于农业政策和土地制度的,关于刚果问题和一般的殖民与帝国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艺术和文化面貌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和“中立的”合作社的优劣比较的,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与哲学理论的各个方面的著作。他的下一主要著作《社会主义与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1918年才出版,这一著作使他在全国联合政府中担任了大臣职务。战后,他在为1893年比利时工 648  
党纲领继续有效作辩护的《应该改变我们的纲领吗?》(1923年)一书中,以及除了他的回忆录《一个战斗的社会主义者的回忆》(1939年)之外,在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选择: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民主的社会主义》(1933年)一书中继续发挥了他的主题。在所有这些著作和应景之作中,他采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并且为马克思的主要学说的正确性竭力辩护;但是在同时又一再攻击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说,应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应用于不断在改变中的环境的方法,而不应该认为它是在提供绝对的学说。显然,他从早期开始,就受到伯恩斯坦与饶勒斯的很大影响,但是,在使第二国际陷于分裂的争论中,他总是采取中间态度,到晚年才转向右翼,这一部分是由于他担任大臣时与政府合作的经验,一部分是由于他对布尔什维克的学说与实践的反作用。

就本章内容而言,看来最好主要根据王德威尔得在1918年写出《社会主义与国家》以前的著作来看待他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将他的《集体主义和工业的发展》一书当作主要资料。他在这本书里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社会化”过程的叙述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过程表现为劳动分工日益精细、资本集中以及全国及国际规模的生产过程的相互依赖日益增加。他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大体上正确,因为它认为资本主义建筑在对

劳动的剥削之上；他并不否认必须用暴力革命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他对他的马克思主义作了相当大的修正。与伯恩斯坦一样，他否认小生产者正以接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假定的那种速度被迅速消灭；他促使人们注意农业方面的小规模所有制和耕作所持续表现的活力，注意小规模的工业生产者能够从合作方面得到的帮助。他进一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大规模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日益分离，正形成人数众多的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新阶级，他们所操纵的以及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所控制的资本  
649 资产并不归他们所有；他象伯恩斯坦一样，完全摒弃“日益贫困”和经济阶级两极分化的学说。他认为马克思由于受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实际情况的过分影响，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和阶级关系的影响作出了不正确的概括；他得出结论说，随着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完全有可能提高，许多形式的小规模企业在合作方法的帮助下，也完全有可能无限期地存在下去，以便过渡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反对这样一个概念：一切生产必须按照任何统一的国有化模式实行“社会化”，并且强调多样化在未来的社会控制生产时代的好处。

即使他在这一阶段的思想并不完全反对以暴力手段进行革命，他的态度却基本上是渐进论的。除了在那些反动派力量十分强大，只有暴力才能使他们顺从的国家以外，他主张给予资本家赔偿，补偿由于公众分批接管大企业而使他们丧失的财产；他认为在一个长时期内，将继续承认尽可能与所服劳务的价值相当的收入上的相当大的差别。他效法圣西门派与科林斯派，非常重视限制并最后取消生产资料的继承，以此作为使财产权社会化的手段。他还非常重视以改良主义的立法保护劳动条件和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并且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通过这些手段来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准的可能性作了过于狭隘的限制。

同时,他对于任何完全强调,或者几乎完全强调物质经济因素的历史发展理论都持有异议。他否认马克思有意提出一种社会由不断改变的物质环境来决定,而完全与人们自己的创造作用无关的理论;他热烈地维护伦理的和理想主义的动力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马克思自己的社会概念的根本基础。他身受在比利时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强烈存在着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传统薰陶,着手将这种传统与作为一种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归根结蒂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必然否定理智的创造性作用的任何意义上的宿命论。他对于艺术的敏锐的鉴赏和极大的兴趣使他认为艺术对于社会思想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并且坚决认为无产阶级有必要与发展它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一样发展它的文化。 650

实际上,王德威尔得基本上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他不断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和概念。他总是设法缩小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毫无疑问,这一部分是为了策略;他对于最不同意的问题,往往保持沉默,同时却尽量宣扬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地方。我无意暗示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出现是有意识欺骗。在他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了西欧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极为关键的因素,以致任何想取得特别是国际方面的政治领导的大陆社会主义者不仅几乎有必要,而且也是很自然地要接受普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并且使自己的思想与之适应。伯恩斯坦以不下于王德威尔得的程度这样做了,虽然伯恩斯坦离开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的程度甚至更大一些。王德威尔得住在比利时,而比利时是德法思想交流的要冲,也是在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发展中发挥特别作用的要冲,因此,除非他愿意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并且用马克思主义者的

语言对发生争执的各方说话，否则他就不可能在国际内部互相冲突的集团之间起调和者的作用。米勒兰事件触发了社会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是否应该结成联盟以及社会党人是否应该参加资产阶级控制下的政府的大争执，这场争执爆发在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严肃地面对同样的问题之前，对于作为第二国际领袖的王德威尔得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人们认为，王德威尔得由于他的气质与政治本能，一旦实际发生了这个问题，他必然会成为一个联盟论者。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十分敏锐地认识到，从比利时各政党的形势看来，如果社会党人单独行动，是根本没有早日取得政治权力的希望的：他作为一个社会改革者的热忱也使他对于在政治荒原上长期寄居的前景感到焦急。他的长于批评的精神，他对于教条的不信任以及他的本质性的稳健态度迫使他非但看到他的朋友的主张的短处，而且还看到他的敌人的主张的长处；他认为向社会主义进展需要在若干个不同领域展开“整体化的”活动，而不是需要一个单一的政治运动；这种概念促使他不相信通过党能做到一切，不论党的组织是多么广泛。在1914年以前，他的性格中的这些因素并没有充分表现在他的作为上，虽然在刚果问题上以及为教育问题发生争执期间与自由党人的选举关系问题上，从他的态度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因素。事实上，他在国际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他在其中起的调解作用使他不能不尽量压制这些因素。有一个时期，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后，由于他缺乏社会民主党的教条主义，所以尽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热烈支持死硬派，他对苏联的态度却不象西方他的许多社会党同事那样不友好，虽然后来在苏联领袖看来，他处于第一号公敌的地位。不过我们必须将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的这个方面留待本书的后一部分中讨论。

在我们所讨论的时期内，除了王德威尔得以外，最重要的比利时社会主义理论家是社会学家纪尧姆·德·格里夫（1842—1924

年)。德·格里夫最初是律师和新闻记者,后来担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在邀请埃利赛·莱克留讲学问题上发生纠纷时,他离开自由大学帮助创办了新大学。德·格里夫在八十年代系统地提出了一种社会学体系,这一体系大部分来自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但是与他们的体系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职业集团具有根本重要性,认为它们对于社会行为具有主要的形成影响。他认为 652 社会是由一种集团压力和它们彼此之间互相适应的过程形成的,并认为社会往往从这些压力作为互相冲突的力量而起作用的阶段进入一个通过共同讨论和彼此让步而互相适应的阶段。德·格里夫理论的这一部分与白芝浩认为“讨论”型社会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动因的概念有显著的相像之处;德·格里夫还强调从地位关系向作为梅因社会学说基础的契约关系过渡。不过,他与梅因和白芝浩都有所不同,因为他强调社会压力的职业基础;这就使他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与工团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他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概念中,还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蒲鲁东的影响,他认为社会发展将使由契约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自愿结合占优势,而不是通过一个权威的政治组织来统一社会。德·格里夫继赫伯特·斯宾塞之后,认为进步是一个通过社会的日益分化,而走向没有强迫控制的协调——而不是统一——的过程;但是,与斯宾塞不同的是,他强调它的主要特色是自愿合作而不是冲突。他在世时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很小,虽然对于理论社会学以及在主张职业代表制,而不是地区代表制的人们中间,有一些影响。

德·格里夫在这个特殊方面与他的同事及完全同时代的赫克特·丹尼斯(1842—1913年)意见一致,丹尼斯是布鲁塞尔大学的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后来是议会中的工党领袖。丹尼斯本来信仰进步的自由主义,后来信仰了社会主义,他的意见中常常保持着许多自由主义的唯心论的因素,这使他摒弃正统的马克思主

义,并同时力图通过对于社会事业的归纳性研究来发展他的学说。他在经济学说史和赋税的理论与实践方面著作很多,在这一方面他成了工党的主要专家。象他的密友德·格里夫一样,他深受孔德与蒲鲁东的,而不是马克思的影响;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社会进  
653 化过程的结束而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它只具有相对的价值。他还对于经济危机及其与资本积累的关系进行了特别的研究,他对于王德威尔得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昂利·德·曼的思想有一些影响。

在比利时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路易·德·勃鲁克尔(1870—1951年),在以前的一章中我们曾经看到他向1907年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就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的关系提出报告<sup>①</sup>。在当时看来,德·勃鲁克尔坚决认为社会党、工会与合作社之间应该有密切关系,而且认为,虽然每一种组织各有它的特别任务,而且应该听凭它随意按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任务,也还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任务,需要工人阶级运动的这三个侧翼进行密切合作。勃鲁克尔所反对的是德国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比如法国的盖德派和西班牙的社会党人——所广泛持有的一种观点,即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特殊财产,而工会和合作社则与它没有什么关系,它们的工作应该局限于保护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具有工资收入者与消费者的特殊身分的工人。如我们看到的,德·勃鲁克尔也是比利时工党内主要反对与自由党人采取联合行动的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能够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而不是仅仅在政治方面得到工人拥护的工人阶级运动,这就需要使整个运动密切结合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关心整个“生活方式”,并且在同等程度上关心文化活动以及政治或经济活动。德·勃鲁克尔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教育学家,也是一个多

<sup>①</sup> 参看本卷上册第83页以下。



产作家。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对于十九世纪比利时工人阶级状况的历史性研究；他在继此以后发表的一系列的著作中，具体谈到工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及在为控制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铺平道路方面所起的作用。他还对社会主义哲学作出了贡献，大体上采取的是比王德威尔得要左一些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是显示了与 654 王德威尔得同样的非教条的特性。他就社会主义平等这个概念写了一部重要著作。德·勃鲁克尔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理想家。他不遗余力地献身于工人运动，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社会主义方面最受人崇敬的人物之一。

这四个人——王德威尔得、德·格里夫、丹尼斯和德·勃鲁克尔都没有资格被尊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主要人物；但是，他们全都是令人感兴趣的次要人物，他们的理论符合比利时这个高度工业化的小国的特殊状况，实际上，我们的大部分理论也是从这种状况中产生的。比利时是德、法影响的交汇地点，由于它分裂成为讲弗莱米语与讲法语的集团而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布鲁塞尔，作为一个人口混杂的都市和作为这个国家的首都，是企图调和这些常常互相冲突的因素的中心；他们四人最后都与布鲁塞尔的大学及其知识界发生了关系。如果他们四人的思想道路基本上都是法国的而不是德国的，这种现象也是完全自然的；因为在文化方面，比利时的操法语的集团远远走在弗莱米集团的前边，他们地区的工业发展也远比大多数弗莱米地区为先进。这四个人的社会理论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他们在任何意义上说来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考虑社会主义的时候几乎不是从政治上夺取权力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工人阶级在它的一切联合行动中为社会建设精神所渗透，并通过各种辅助组织自发地采取协调行动建设社会新秩序。这种概念在根特的佛鲁伊特，布鲁塞尔的人民之家和比利时工党作为一个党的全国性结构中得到了表

现。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在天主教会的权威领导之下采取协调的社会行动的对立概念；而在比利时社会分裂成几个集团的状况下，这两种概念之中任何一种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废除另一种概念。它们过去和现在都并肩存在，争夺对于比利时人民的领导权，  
655 可是又时常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因此而形成的社会斗争常常陷于混乱；但是它所表现的特点对于我们了解今天欧洲政治的混乱状况却很有帮助。在整个欧洲，比利时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迅速提高政治影响以后，陷入困境的第一个国家。

## 第十七章

656

### 荷 兰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在荷兰政治中占支配地位的是扬·鲁道夫·索尔贝克(1798—1872年)所领导的自由党人,他解放了天主教徒,并且为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奠定了基础。在他死后,随着有宗教信仰的政党——指的是非常反动的 A. 奎帕尔博士领导的喀尔文教派和就社会观点来说比较激进的神甫夏普曼博士所组织的罗马天主教徒——的发展,自由主义失势了。此后,自由党人和对立的忏悔派各政党联盟交替着掌握政治权力,这些政党是在要求国家对公立学校和忏悔会学校一视同仁,予以支持时联合起来的。不过,在文化方面,一直到 1914 年,全国的领导仍然主要操在自由党人手中。索尔贝克受的是法学家的教育,他写了一些关于法律和宪法问题的重要著作;他的各种概念一直有强烈影响。1901 年,天主教徒在奎帕尔的内阁中与喀尔文教派合作时,放弃了他们的社会激进主义;自由党中的进步派支持社会立法和扩大选举权。

荷兰人在发展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晚于他们的邻居;而在发展的时刻到来时,分歧意见又不断使运动陷于分裂。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而在社会民主党内部,敌对宗派之间的斗争又一再发生。此外,在使工人阶级以及其他阶级陷于分裂的宗教争执中,社会主义遇到强有力的障碍。宗派教育问题与比利时相比,在更大的程度上支配着荷兰的政治,一直到 1919 年才以有利于教会的方式得到解决。

势力强大的新教政党和天主教政党时而彼此对立，时而结成联盟  
657 反对“非宗教化”的鼓吹者，它们分别建立了与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相敌对的独立工会运动；而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也发展了对立的工会中心。此外，还出现了另外两个“中立的”工会运动，其中之一希望完全超然于政治，而另一个则旨在使对立的各宗派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

这些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宗教的和中立的工会运动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才组织成为正式的联合会；不过，联合会的组成分子则早就存在。同样的纷争也阻碍了有组织的消费合作运动的发展。只有完全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农业合作组织才能够大体上不受这些纷争的阻碍而得到发展。1886年建立了第一家合作黄油工厂。此后，逐渐发展起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奶油工厂、腌肉工厂、供销社和信贷机构都在农村取得了强有力的地位。消费合作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得到迅速的发展。

在六十年代后期以前，社会主义几乎没有在荷兰土地上出现。荷兰在第一国际中所起作用甚微。1872年以前，他们没有派代表参加它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在1872年，以荷兰工人阶级运动的先驱人物H. 格尔哈特和维克多·戴夫为首的四个荷兰代表到了海牙，在会议上，特别是在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激烈争论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四个人都支持工联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似乎是在密切配合比利时工联主义者的行动。不过，他们都没有参加残余的“无政府主义者”国际后来举行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在1873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一次非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大会——上，荷兰代表是比利时人范·登·阿比尔，在1876年的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持有荷兰代表委任书的是西萨尔·德·巴普。在1874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77年的佛尔维耶代表大会，或者——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1877年的根特社会党统一

代表大会上,都没有荷兰的代表。

事实上,在这整个时期,荷兰不存在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甚至不存在实际的工会运动。倒是有少数的工会,可是它们受到了严厉的压制。工会和国际的主要促进者 H. 格尔哈特(1829—1886年)是个裁缝,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特别是在成衣业,他建立了一个相当强大的组织。但是在 1872 年以后的反动时期,该组织几乎被消灭了。1878 年,格尔哈特企图东山再起,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成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团体。但是,运动到第二年才开始站稳脚跟,这年斐迪南·杜麦拉·纽文惠斯(1846—1919年)创办了他的刊物《人民权利》,开始了他争取创立具有强烈的伦理、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内容的社会主义信条的进军。纽文惠斯是一位牧师,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他在海牙主持一个会众主要是中等阶级的富有人家的路德教派的教堂。他在信仰社会主义以前,已经是个有名的传道者。他所以信仰社会主义,是由于他热烈希望改善工人的处境,而由于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工会组织,工人的处境是很恶劣的。1879 年,他离开了教会,决定将有生余年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一开始时,他只不过是社会改革家,深信人类应该友爱;并痛恨一切形式的压迫,但是这使他成了强烈的国际主义者和战争以及各种形式军国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纽文惠斯绝不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他的崇高的人格和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使他几乎立即成了荷兰社会主义的杰出领袖。1881 年,四大城市的社会主义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联盟——后来称作社会主义联盟。纽文惠斯和联盟不久就触犯了法律,既是因为他们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也是由于他们努力组织工人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联盟的许多宣传工作者被捕下狱,包括纽文惠斯本人,1886 年,他以对国王大不敬罪,坐了几个月监牢。第二年一条新的选举法将选民总数从 13 万人增加到 30 万人;这次改革以后,虽

然选举权仍然受到重重限制,并且有附加的财产条件,可是使得纽文惠斯有可能在议会中得到了一席,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被监禁引起了同情。从1888年到1891年,他做了三年议员,1891年他落选了。这些年的经验使他成为议会制度的坚定的反对者。他认为,议会完全为反动的资本家权益集团所控制,所以要想利用它来争取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是不可能取得任何可贵成就的。他认为,工人必须加强他们自己的组织,并且必须努力通过产业方面的直接行动实现自身的解放。实际上,他成了一个工团主义者,虽然这个名称当时还没有使用,甚至在他实际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之前,他已经常常被称作是无政府主义者了。在这个阶段,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联盟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在它的内部,除了那些同意纽文惠斯的意见的人以外,还有主张采取议会行动的人,其中大多数人希望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得到鼓舞;此后有几年时间,这些对立的团体一直留在同一个组织中。这个时候,在1891年,在所拟议的进一步扩大选举权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1887年的法律对于在教育条件和其他条件的限制之下,给予另外一些人以选举权问题没有明确规定;自由党领袖塔克·范·波尔特维利艾特根据对这项法律中有关条文的极其不着边际的解释,建议实行几乎等于是成年男子选举权的选举制度。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还有保守党人和一部分自由党人都起来反对这个建议:自由党人下了台,建议也放弃了;但是人们承认,对于进一步扩大选举权必须做出某种让步。

选举权问题使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分歧达到了严重的程度。1893年,联盟在它的格罗宁根代表大会上,以多数票否决了议会行动,而赞成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同时,与它有联系的工会成立了一个它们自己的中央机构荷兰劳工书记处,这一组织继续采取大致是工团主义的路线,虽然它的内部也有不同意这种政策

的工会。格罗宁根决议作出以后，有些议会派退出了社会主义联盟。1894年，一批叫做“十二使徒”的人以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为蓝本，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其纲领大部分取材于1891年的爱 660  
福特纲领。在这一行动的领袖人物中有：老格尔哈特的儿子A. H. 格尔哈特(1858—1948年)；彼得·杰勒斯·特鲁尔斯特拉(1860—1930年)，他担任党的领导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H. H. 范·柯尔(1852—1925年)，他新近才从荷属东印度归来；两个真正的工人：威廉·休伯特·伏列根(1862—1947年)，他同特鲁尔斯特拉和范·柯尔是党出席第二国际历届代表大会的三个主要代表；和主要的组织者昂利·波拉克(1868—1943年)。还有荷兰工会中最强大的、组织最严密的钻石工人工会的苏特芬(生于1863年)。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弗兰克·范·德·戈斯(1861—1939年)，他是荷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是向“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的成长的一代阐述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人。在社会民主党成立以后二年，自由党人范·豪顿的政府通过了一项改革选举权的议案，虽然这一议案还没有达到塔克·范·波尔特维利艾特的计划的要求，却再一次使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从30万人增加到70万人——从而使社会主义者有机会在工业地区得到议席。第二年，即1897年，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3席，在下次选举，也即1901年的选举中，在有100名议员的议会中，他们的议员人数增加到7人。

在此以前，虽然社会民主党人的力量逐步增强，同左派稍有联系的工会大部分却一直在纽文惠斯和劳工书记处的影响之下。接着在1903年，发出了荷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劳资纠纷——在这次纠纷中，社会民主党和工团主义的工人就这一次总算采取了共同行动。纠纷是从铁路工人的罢工开始的；结果立即取得了胜利；但是，政府否认铁路工人有权罢工，调来军队占领了火车站，还

逮捕了一些罢工领袖，因而使局面发生了不利于工人的变化。属于劳工书记处的各工会再次号召举行总罢工支持铁路工人；但是反应冷淡，并且由于政府进行了严厉镇压，整个运动瓦解了。劳工书记处这时只有会员 18,000 名左右，因为许多工会不属于该书记处。在这次失败以后，会员人数在 1908 年减少到 8,000 人，到 1910 年，减少到只有 3,500 人，当时，除了在码头工人中间外，很少有人支持它。铁路工人的左翼领袖亨克·斯尼夫里耶特被解除了职务，移居到爪哇，在那里，他在印度尼西亚人反对荷兰统治的斗争事业中很活跃。同时，在 1905 年，社会民主党人率先成立了一个新团体荷兰工会联合会，第二年就有约 19,000 名会员，1912 年，增加到 52,000 人。它的书记是后来担任国际工会联合会书记的扬·奥德吉斯特（1870—1950 年）。新教徒成立了一个基督教全国行业联合会，与社会党人相对抗，在 1910 年，该联合会约有 6,000 名会员，天主教徒成立了一个行业组织局，约有 1 万名会员。所有这些数字都是很小的。有一些工会拒绝参加任何对立的联合会；而产业工人中的大部分则仍然是完全没有组织的。1910 年以后，工团主义者重又比较得势；但是在 1914 年，他们只有约 9,000 名会员，主要仍然是码头工人。

1903 年的失败对于荷兰工会运动有非常严重的影响，使工会运动中的工团主义优势时期肯定告一段落。此后，主要不再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斗争，而是社会民主党内部激烈派与改良派之间的斗争，以及社会党人与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各对立工会运动之间的斗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在克里斯琴·康奈利逊（1864—1942 年）领导下，在企图会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美国的志同道合的团体建立一个工团主义国际方面继续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荷兰，他们的影响已经大为衰落。康奈利逊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理论家，而不是一位有实



际经验的领袖：当胡伯特·拉加德勒所办的《社会主义运动》成为讨论工团主义理论的主要机关刊物时，他曾经为该刊撰稿。

1908年，社会民主党分裂了。聚集在《论坛》杂志周围的一个人数不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左翼团体对议会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表示反抗，指责这些人对自由党人作了过分的妥协。662  
党代表大会开除了《论坛》集团，这一集团在1909年因其他左翼的分裂分子一道，成立了一个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的领袖有：戴维·维莫库普（1876—1941年），他后来是荷兰共产主义的主要人物；赫尔曼·戈尔特尔（1864—1927年），党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亨利埃特·罗兰-霍斯特（1869—1925年），她是荷兰的伟大诗人之一，是威廉·摩里斯的著作的荷兰文本译者；昂利·波拉克和F. M. 维宝特（1859—1936年），后者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委员会中领导社会党人的一位财政专家。但是，新党只有少数人拥护。在1919—1920年，它的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党员形成了荷兰共产党的核心，维莫库普是荷共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

在除去了左翼以后，社会民主党的主体有一个时期急剧地向右转。摆在它面前的重大问题是：为了将右翼的教权政府赶下台，它是否应该与自由党人联合起来。1905年，当自由党人有可能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成立一个政府时，就实际产生过这个问题。社会党人一直想要把奎帕尔博士的反革命（新教—保守党）政府赶下台，1903年，这个政府破坏了总罢工，并且通过了剥夺铁路工人罢工权利的法律。社会党人在大选中积极活动，反对奎帕尔博士，结果自由党人得的票数使他们足以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刚好取得多数。不过，社会党人在第二国际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态度的影响下，拒绝利用这个机会；在少数派自由党政府执政一个时期以后，一个右翼政府在1908年上台，它虽然不是一个明确的多数派政府，但是得到了右翼自由党人的支持。在下一一次1909年

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的票数大大增加，可是没有增加议席。后来在 1913 年，他们突然从 7 席增加到 19 席，从而发现自己再度处于能够给予自由党以多数的地位，当然，也使他们能够提出比 1905 年实际可能提出的要高得多的参加联合政府的条件。

663 这种形势在党内引起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争执得最厉害的是教会学校问题；在拟议中的劳工立法以及健康保险和养老金的总方案的制定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争执。经过热烈讨论，1913 年的兹伏勒党代表大会以微弱多数（375 票对 320 票）反对参加联合政府，认为这样做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尽管特鲁尔斯特拉持这种主张，他在大会上还发表了他的最著名的演说。后来证明在党的基础上成立任何政府是行不通的，于是以一个著名的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为首的非党政府上了台，这个政府制定了相当数量的社会立法，因为在这方面，荷兰是比其他国家落后的；大体上说来，社会党人支持这个政府。当战争在 1914 年爆发时，社会党人支持政府使荷兰保持中立的政策，在使社会党国际局继续存在以及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为促使争端解决所作的努力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以比利时人卡米尔·惠斯曼斯为书记的社会党国际局从比利时迁移到了荷兰；1917 年，当它暂时迁移到斯德哥尔摩，以便举行拟议中的社会党国际会议，以各国工人阶级的名义呼吁和平时，国际局派驻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的代表——特鲁尔斯特拉、J. W. 阿尔巴达（生于 1877 年）和 H. 范·柯尔，还有候补代表威廉·休伯特·伏列根和 F. M. 维宝特——前往斯德哥尔摩，以便和俄国人一道说服各交战国的社会党人参加会议。

斯德哥尔摩会议注定是开不成的，战争注定要继续下去。当战争结束，1918 年 11 月爆发德国革命的时候，特鲁尔斯特拉在荷兰议会中发表演说，要求政府辞职，以便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果没有引起反应：他自己的党的大部分也反对他，政府及时

采取了措施,防止了发生骚乱的任何可能。实际上,除非西欧大部分地区革命都已成功,否则荷兰就没有发生任何革命的可能。荷兰社会主义运动即使团结一致,也不可能强大到差不多可以进行一次革命;它的大多数领袖也毫无进行革命的愿望。特鲁尔斯特拉也不比例如艾伯特或者谢德曼更适合于担任革命领袖,后面提到的这两个人都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勉强成了革命者。特鲁尔斯特拉由于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进程,更直接地由于德国的事件而暂时受到了影响。他的党拒绝追随他;虽然他在名义上是党的领袖一直到1925年退休,却从来没有对党重新发生影响。 664

在1914年以前,荷兰社会主义的两位杰出人物首先是纽文惠斯,其次是特鲁尔斯特拉。埃多·费芝(1881—1942年)虽然自1905年以后就在工会运动中很活跃,到1916年才成为荷兰工会联合会的书记,到1918年以后才在荷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在纽文惠斯和特鲁尔斯特拉之下,亨利埃特·罗兰-霍斯特,未来的共产党人、极左翼的戴维·维英库普和工团主义者克里斯琴·康奈利逊都是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主要人物。钻石工人波拉克也在知识方面有所贡献,但是主要是作为英国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者和解释者。他将罗伯特·布拉奇福德、H. N. 布莱尔福特以及悉尼与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的著作翻译成了荷兰文。如我们所见,亨利埃特·罗兰-霍斯特翻译了威廉·摩里斯的《乌有乡的消息》和其他著作,并且是一位有广泛影响的著名诗人和有想象力的作家。她的社会主义就象纽文惠斯的社会主义一样,是理想主义的、道德的和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性质的。由于1903年的荷兰总罢工轻易遭到了失败,1905年她为社会党国际写了一篇关于总罢工的著名报告。她的论点是:给公众造成严重不便的总罢工只有满足两个条件之一才能希望得到成功。它必须具有能赢得罢工工人队伍以外的公众广泛支持的有限目标,不然就必须是

革命的前奏。任何其他种类的总罢工都必然要失败，因为它在开始的时候越是成功，它将在中产阶级中间所引起的反抗就越是激烈——实际上除了参加罢工的人以外，在所有的人中间，反抗都会越来越激烈。她写道：

665 现代国家的力量在它的一切不论是政治性质的还是经济性质的物质基础方面都比工人阶级的力量优越。政治性罢工的事实决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工人阶级不能通过挨饿在经济上取得胜利，就象他们不能利用国家所利用的那种力量——也就是通过武力，取得胜利一样。只有一个方面工人阶级比统治阶级绝对优越——那就是它的目的。……〔它〕只能以它的道德上的优越性来打破国家在物质上的优越性。

她的论点的结论是：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道德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以至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强制他们违背自己的意志和良心去服从的时候，总罢工才能希望得到成功。这种见解就其本质说来与纽文惠斯的见解一致，纽文惠斯也宣扬一种道德新生的信条。

纽文惠斯用荷兰文和德文写了很多书。他所著的《我向教会告别》最出色地叙述了他的社会主义信仰的道德基础。他除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未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之外，后来还出版了《耶稣生平》以及其他非正统的民主神学的著作。他趋向于战斗性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大体上说是违背他的本性的，是一种对于在他看来是议会的唇枪舌剑的彻头彻尾的虚伪的反抗。他是一个无法满足的理想主义者。自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以来，他就参加第二国际会议，在反军国主义的战斗里，作为主张反对战争的总罢工的领袖人物，他据有杰出地位；他还热烈主张成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组织，容许从无政府主义到修正主义的各种各样的流派参加。由于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被赶出第二国际以后，他继续在欧洲各地积极宣传反军国主义；1914

年以后，还坚持这一运动。虽然在1903年总罢工以后，他在荷兰丧失了他的大部分追随者，他仍然保持了个人的巨大声誉，仍然是一个深受尊敬的人物，1919年，反对他和支持他的人都参加了他的葬礼，对他表示敬意。

特鲁尔斯特拉也是一位重要人物，但是只一国范围内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演说家，而不是一位有创见的思想家。他也出生于中产阶级，由于希望改善贫困阶级的悲惨生活，而信仰了社会主义——以他来说，他指的贫困阶级不是产业工人，而是他长于斯666的佛里斯兰的农业无产阶级。他开始他的事业时是律师，但他放弃了很发达的律师业务参加了纽文惠斯的社会主义联盟。后来他研究马克思，更具体地说，研究日益上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他成了该党的一个热烈崇拜者。在第二国际的米勒兰事件的争执中，他追随德国人的路线反对社会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同饶勒斯联合起来，要求执行一个切合实际的、渐进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与王德威尔得的马克思主义相似之处在于他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革命的先知，而是一种研究具体问题的方法——需要不断改变以适应条件的变化的方法——的来源。他的气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在同纽文惠斯决裂，按照德国的模式，建立荷兰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后来，他力主与党的左翼展开斗争，并且是1909年开除《论坛》集团的领导人物。他的卓越的演说能力使他在1914年以前的几年里，成了第二国际领袖中的杰出人物；但是，我们不能说他在思想领域中有任何突出的贡献。

在先进国家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党中间，就某些方面说来，荷兰人所面对的任务最艰巨，因为他们既不是没有直接政治影响、人数不多的少数派，也不是一个甚至看起来已经很有希望取得政治权力的大党。他们面对着的形势使工人阶级陷于绝望的分裂：他们

必须同强大的新教以及强大的天主教斗争，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在一个由许多政党组成的议会中设法取得进展，这些政党之间的分界线除了社会问题以外，还有宗教问题。由于工会运动分裂成为互相斗争的派别，他们缺少建立象德国人的那种党所需要的坚固基础，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他们却只能控制少数城市，  
667 这充其量只能使他们在议会中居于重要的少数派地位。当然，主要由于存在这种形势，他们才坚持反议会的倾向，而且每当遭到挫折的议会政治家表示希望与自由党人更密切地联合起来以打破僵局时，左翼集团就要分裂出去。在 1914 年以前，始终不存在与宗教性的政党结成联盟的可能性。自由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在纽文惠斯的追随者中间以及社会民主党中间确实都有强有力的拥护者；但是，新教和天主教的议会党却都是猛烈反对社会主义的和保守的，而在 1914 年以前，有宗教信仰的工会运动中所存在的进步倾向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影响。在议会中，社会党人的选择是：或者是与自由党人结成紧密的联盟，这样可以说服自由党人采纳某些有益的社会改革议案，当然肯定不能说服他们接受任何有社会主义气息的东西；或者在某种情况下置身事外，而这种弃权多半会使权力落入最反动集团之手的。最适合他们的是 1913 年的僵局，当时没有任何政党联盟能够取得多数，荷兰由一个非党联盟统治着，对于这个联盟，社会党人能够施加相当大的压力来争取改善社会立法。但是即使是这种情况也没有使他们更加接近于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福利国家之外的任何东西的话。他们象比利时人一样地处于“困境”，而从这种困境中自拔的希望甚至比比利时人更少。

### 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

#### (一) 丹麦

除了丹麦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与社会主义发生关系都比较晚。在丹麦，接受社会主义的记录是从一个青年医生弗雷德里克·德莱耶尔(1827—1853年)的工作开始的，主要是他，在四十年代后期将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介绍给了丹麦人。德莱耶尔主张成立一个工人党。由于他早死，运动基本上消逝了，一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有真正的复兴。不过有许多丹麦的手艺人在国外度过了他们的“漂泊的年代”；他们中有些人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带回丹麦，为成立第一国际丹麦支部奠定了基础。

在大约1850年和大约1870年之间，没有什么事情可资记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尼古拉·弗雷德里克·格伦德维奇(1783—1872年)的影响下创办的人民中学，就其政治性这一点而言，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但绝不是社会主义的。许久以后，在1910年成立埃斯堡中学时，才创办与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人有联系的工人中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拉斯摩斯·索伦森设想通过人民中学来培养青年农民和农业劳动者，以作为农村舆论和地方政府的领袖；在1848年以前的年代里，还有其他先驱人物具有类似的思想。但是，克里斯顿·科尔德(1816—1870年)——一般认为是倡导格伦德维奇的设想的主要实际人物，是在1851年，在欧洲革命失败以后的政治反动时期中开始工作的；虽然他在某种意义上赞成民主，却着手于使他的学校首先成为在开明的、非教条主义的

基督教义启发之下培养品德的场所，而格伦德维奇就是这种基督教义的伟大代表人物。

1849年，丹麦制定了一部并不民主的宪法，不过与当时西欧大部分其他地区的宪法相比；其中却包括有更多的民主因素，这就使它受到大国的怀疑。这部宪法规定男子家长有选举权，从而为工人和农民参加政治开辟了道路。不过上议院仍然是大地主的禁脔。丹麦由于想把丹麦国王以不同的名义所统治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坦因公国并入丹麦王国，而触犯了德国议会。有一个时期，丹麦国王保持着对这两个公国的统治；但是在这两个公国的治理问题上不断发生纠纷，结果证明将整个王国统一在一个共同的政府之下是行不通的。当局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权宜办法；丹麦的政治家意见分歧，一部分人愿意让这些公国有独立的组织，另外一部分人却坚决主张至少要使整个石勒苏益格接受丹麦民族主义的旗帜。在当时就象后来一样，南石勒苏益格是一个日耳曼人和丹麦人杂居的地区：早期的各中学的一个目标就是使这个地区的丹麦人接受热烈的民族主义。当然，这就引起了日耳曼人方面的对抗性运动；最后，在六十年代，丹麦被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军击败，丧失了公国，而普鲁士在与奥地利翻脸之后，占领了这两个地方。俾斯麦在荷尔施坦因得到了他所需要的通往北海的出海口。丹麦在主动结束战争时曾经得到保证说，南石勒苏益格的命运将由民意表决来确定，这时候发现这一保证分文不值，普鲁士人在那里已经取得了稳固的地位。

这些事实所以与本章的内容有关完全是因为它们形成了以后时期丹麦政治的背景。丹麦在此战败北以后，于1866年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远不如1849年宪法民主。丹麦有一个分为两院的议会——一个是通过广泛的选举选出的下议院，另一个是几乎完全由富有阶级控制的上议院；上下两院在名义上有平等权力，



可是实际上，上议院在身为元首的国王卵翼下占有优势。比较进步的人物根据宪法所能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在下议院中争取多数；但是即使他们取得了多数，他们也不能控制政府，因为，国王同上议院串通起来，仍然能够从他们的反对者中间，任命政府成员。两院以及它们的幕后力量之间的斗争到七十年代才发展到严重阶段，当时左翼政党，包括人数不多的社会党在内，要求建立以下议院的多数为依据的向议会负责的政府。但是，在1901年以前，甚至在名义上也一直没有得到这种让步；此后，斗争一直继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864年一直到1914年以后，这一斗争一直影响着丹麦政治的整个发展。

还有一层，在1864年以后，有一派人准备承认石勒苏益格—荷尔施坦因的丧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另有一派人则梦想用战争来收复失地，这两派人之争吵影响了整个政局。整个说来一直是一个左派运动的民族主义，越来越成为右翼的识别标志，并且具体表现为一场关于军事开支的争吵。左翼政党在下议院成为多数派的时候，拒绝投票通过预算，因为它给予武装部队和要塞工事以巨额拨款。右翼则依仗国王的权力和依靠上议院的支持；不顾下议院的反对，开始征收它所需要的赋税。这一引人注目的形势从1875年到1894年继续了将近二十年；直到被认为是左派的一大部分人主要在对内政策问题上与比较激进的集团发生分裂，并和右派结成联盟时才告一段落。这样一来，在下议院争取多数的程序就必须完全从头开始了。

对于社会党作为一支议会力量的成长来说，这些条件非常不利，对于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舆论的发展来说，也同样非常不利。由于丹麦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除了集中了很大比例的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哥本哈根以外，没有真正的大城市，这些条件就更加不利。哥本哈根能够而且也的确发展了非常强大而统一的工人阶级

671 运动;但是一直到很久以后,它才在全国的其余地区得到了较大的支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期间,在丹麦战败以后缩小了的领土上,开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事情。人民中学迅速发展,通过虽然不是正式的、却是个人的纽带开始同主要代表农民的中产阶级政党发生了密切联系。这个联盟在以后的一些年里加强了:人民中学从来没有吸引过大量的工人阶级学生,或者甚至是大量农业劳动者,它们的学生在多得多的程度上来自土地多的农民和中农,而不是来自小自耕农。但是,中农的人数要比土地多的农民多得多,而且他们的人数无论是绝对地还是相对地都有所增加。在修改宪法之前,1861年在一个自由党政府执政时通过了蒙拉德的租地选举法,从这个时候起,小块土地所有者的人数迅速增加,这与其说是以后由于国家所采取的直接行动,不如说是由于1866年所建立的一个私人团体——希思开垦协会所作的努力,这个协会致力于开垦荒地,并且建立许多新的小农庄。这种做法在1899年的土地分配法下取得了新的进展,从而使丹麦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中农和小农以及小自耕农的国度。在一开始的时候农民主要是玉米种植者;但是当谷物价格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暴跌时,他们开始转而从事后来丹麦以此闻名的高度集约而专门化的农业生产——从事牛奶制酪业和主要供出口的腌肉生产。

一直到社会主义在哥本哈根作了第一次尝试之后很久,才发生了上述情况。在1857年以前,一直存在接受管理的基尔特(行会)的旧制度;后来这个制度取消了,到六十年代中期,在熟练的手艺人,比如印刷工人、面包工人和建筑业工人中间,发展起来了工会。不过,这些先驱工会仍然受到基尔特思想的影响;熟练手艺人的新团体形成了1871年建立的第一国际丹麦支部的基础。丹麦支部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一个青年的邮政工人路易斯·皮奥,他在那

一年出版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社会主义集团》，后来又以此为基础创办了一份刊物《社会主义者》。人们当还记得，那一年在英国机械工人于东北海岸举行罢工期间，雇主曾企图从丹麦输入破坏罢工的工贼，国际工人协会派了住在伦敦的一个丹麦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詹姆斯·科恩到哥本哈根去阻止他们前往英国。同时，在哥本哈根本身，也爆发了一系列的罢工；1872年，国际工人协会丹麦支部全力支持砌砖工人领导的建筑工人大罢工。警察破坏了为支持罢工工人举行的一次群众示威；《社会主义者》的编辑，包括皮奥在内，被捕下狱，同时被捕下狱的还有哈罗德·布里克斯、保尔·格列弗和一些其他领袖；第二年，国际工人协会为法律所取缔，它的组织瓦解了。不过，参加它的一些工会仍然存在；1875年，皮奥被释放以后，恢复了他的活动。在以后几年，丹麦人也未能免于使第一国际的残余发生分裂的争吵。不过，1872年以后，在第一国际的残余力量举行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没有丹麦代表参加。1872年在海牙，来了一名丹麦代表皮尔；但是，在1877年于根特举行的社会党统一代表大会上，被委托担任丹麦代表的是德国人威廉·李卜克内西。这时，在哥本哈根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它是1876年在皮奥担任主席的一次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席会议上成立的；但是当皮奥在第二年同布里克斯和列弗格一道移居美国时，这个组织瓦解了。1878年，曾经在不同的基础上做了一次新的尝试，不过这一次率先行动的是社会民主党人，而不是工会主义者。一个社会民主联盟成立了，最初没有得到工会的很大支持，许多工会与之保持距离，它们不是接受半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便是作为孤立的手艺人组织存在着。在以后几年内，这个新团体慢慢地扎下了根基。后来在1883年，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本哈根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它受到了很大鼓舞，原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德国的反社会主义法，不得不在国外举行会议。第

二年，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在下议院获得两席，自此作为一个议会党，开始稳步取得进展。当工会从七十年代后期的经济衰退中恢复元气时，党得到了更多的工会支持。

673 不过他们的处境与德国人的处境大不相同。他们在进入下议院时发现，得到多数支持的统一左翼联盟正在同得到国王和上议院支持的保守党人埃斯特鲁普的政府进行激烈的斗争；他们的道路自然是要在斗争中与左翼政党联合起来，反对巨大的军事开支和争取宪法改革。不过，在这两场斗争中，他们都不能希望起主导作用；因为到这时为止，在农村地区或者小城市里，他们都没有得到很大支持。至于社会立法，他们当然能够竭力要求制定；但是，到那时为止，这还不是一个使左右两派分庭抗礼的问题。在埃斯特鲁普执政时，于1891年实行了养老金制度，于1892年实行了国家补助的、自愿健康保险制度；为了争取普遍的支持，埃斯特鲁普的政府并非不愿意模仿俾斯麦的社会政策，甚至并非不愿意比这些政策更进一步。这些措施使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中都发生了分歧。

当社会党人设法进入议会时，工会在议会外面正在重建他们的力量。1886年，哥本哈根工会成立了一个虽然是同社会民主党有密切联系的但却是独立于该党之外的新中心；此后，在其他城市，也成立了类似的中心。1898年，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性组织的工会成立了一个全国工会中心，不久以后，就与雇主发生了激烈斗争。这时，左翼政党的团结已经解体。埃斯特鲁普在1894年辞职，代替他的是一个右翼与土地多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富有者的联盟，并设法手下议院中团结多数来支持它。在工业方面，雇主成立了一个对抗的组织来对付工会的挑战；1899年，他们大规模地关厂，来对付一系列的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地区性的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43,000名。政府任命主要的进步工业家卢

德维希·布拉姆森为内政大臣；布拉姆森制定了一个成立仲裁法庭来处理劳资纠纷的计划。不过，雇主决心要消灭工会的力量，坚持不许工人进厂，并且试图强制签订一个要工人放弃工会要求的“文件”。工会一直要求的不仅是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要求“不得雇佣非工会会员做工”。雇主的顽固态度引起了舆论的强烈而广泛的不满，以致面对着得到国外大力帮助的工人们的长期抵抗，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态度。根据名为“九月协议”的解决办法，每一方都同意承认对方有进行组织的权利；雇主同意给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条件是工会应该将它的罢工意图事前通知雇主，并且应该在罢工以前充分利用谈判程序。此外，还将设立一个仲裁法庭，在凡是认为双方一致同意的程序没有得到遵守的情况下，将问题提交该法庭最后解决。但是，它无权对于任何争执问题的实质进行仲裁，它只有权处理被认为是协议被破坏的问题。<sup>674</sup>

这实际上意味着，虽然每一个行业都将分别进行谈判，可是在每一次争执的背后，却潜伏着采取总关厂，或者总罢工的威胁。丹麦的雇主肯定认为，对付工会在它的中央联合会支持之下的地区性罢工行动的有效办法是总关厂，以使罢工工人不可能依靠仍然上工的工人的收入维持下去。如我们在后文所见，几年以后，瑞典的雇主依样效尤。毫无疑问，工会也同样可以宣布总罢工；但是，它们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吗？雇主认为他们没有；而实际情况说明，雇主想得对。诚然，结果不会是劳资之间持久地相安无事；但是这是一种使雇主暂时得到便宜的状况。然而它也促使工人在政治活动上更加积极，同时也促使社会党同左翼政党结成联盟，希望藉此来打破右翼联盟的统治。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研究一下在始终是支配因素的丹麦农村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丹麦的合作运动是十九世纪六十

年代以消费合作运动开始的，但是它同样存在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中间。只是到后来，到八十年代，才出现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和加工合作社这两种形式的农业合作运动。信贷合作社没有发展，因为农民能够与正式的银行作出圆满的安排，并且能从国家得到帮助，使新的田地得到设备。八十年代以后，消费合作运动和农业合作运动并行不悖地得到了迅速发展。将地方消费合作社联结起来的批发合作社成立了，除了供应一般的消费品以外，还供应农业必需品；1896年，各自独立的泽兰批发合作社（成立于1884年）和日德兰批发合作社（成立于1888年）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批发合作社，成了消费合作运动的中央统筹机构。这些发展的主要鼓舞者是塞弗林·约根森（1842—1926年），他是日德兰批发合作社的第一个领袖。同时，随着1880年蛋品输出合作协会的成立，开始建立处理丹麦农业新的专门产品的农民合作社。第二年，成立了第一个奶制品合作社，1887年，比德·波伊森（1828—1929年）成立了第一个腌肉合作工厂。这时，丹麦已经主要是一个小块土地保有者的国家。象斯提勒·安德森和克里斯琴·索恩（1858—1941年）这样的人物在丹麦农业合作运动的发展中都起了主导作用，这个运动深受人民中学所做教育工作的影响。到十九世纪末时，丹麦作为一个合作社会，不仅是在农业方面，而且同样在它的消费合作运动的普遍性方面，成了世界上组织最坚强的国家。这种合作运动的普及，无论作为一种商业运动或者作为一种社会思想的中心，不能不对于政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虽然合作社团体不参加政治方面的正式活动，甚至消费合作运动也没有与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工会发展任何夥伴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控制合作社的都是社会民主主义对之没有吸引力的比较殷实的农民。不过，社会党人在小自耕农和农业劳动者中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因而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并逐渐加强了他们在议

会中的力量。

但是,在弗雷德里克·德莱耶尔之后,丹麦社会主义没有出现杰出的理论家,而德莱耶尔又死得太年轻,因而他的工作没有能在世界范围留下的印象。在第二国际中,丹麦的最杰出的领袖是 P. 诺德森,后来他成了哥本哈根市长。其他领导人物有:女权论者和教育学家妮娜·昂利埃特·温德莱因·本(1866—1928年),她在1924年作为斯道宁内阁的教育大臣,成了第一个妇女内阁大臣;她的丈夫古斯塔夫·本博士,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丹麦的主要解释者,还有索瓦尔德·斯道宁(1873—1942年),他最初是一个雪茄制造工人,后来是雪茄制造工人工会主席,1906年进入下议院,数年以后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后来,斯道宁在1916年参加了战时联合政府,1924年成为社会党内阁的首相。但是,也许除了妮娜·本以外,这些人没有对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任何卓越的贡献。经济条件,特别是技术水平非常高的小规模耕作所占支配地位,形成了丹麦人对于党组织的概念。丹麦社会党的政策在国内事务方面是试验性质的,非常实际,在国际方面则强烈反对军国主义。

在1899年的工会斗争以后,社会党人与左翼政党联合起来,再次企图推翻右派的统治地位,建立一个以下议院对上议院的优势为基础的立宪政府。1901年,以多因泽尔教授为首的一个左翼政党内阁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上了台,拟定了一个改革赋税的计划。但是,这是一个不稳定的联盟,因为资产阶级左翼成份非常复杂,其中有一些人强烈反对社会主义。1903年到1905年之间,关系更形趋于紧张;1905年,当一个左翼内阁在 J. C. 克里斯坦逊领导下上台时,与社会党人决裂了,而非社会党左翼的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左翼的比较先进的一派在 C. J. 查勒(1866—?)的领导下退出政府之后,组成了一个激进党。克里斯坦逊的政府在1907年

677 通过了一个失业保险法案，规定给予工会管理的福利事业以公家补助。在通过这个法案以后，该政府由于它的一个大臣阿尔贝蒂与农业银行的舞弊案有牵连，于 1908 年垮台；接着，查勒的得到社会党支持的为期不长的激进党政府上台。

在克里斯坦逊垮台前，雇主和工会之间在 1908 年发生了第二次严重的冲突。由于工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工资要求，雇主的中央组织采取了它扬言要采取的关厂手段，全国于是面临着两种组织最严密而且显然不可调和的力量的对立。经过相当激烈的斗争之后，拟定了一个新的协议来修正 1899 年的协议，解决了这场争执。双方同意在凡属可能的情况下，努力通过和平的集体谈判来解决他们的分歧，凡属无法取得协议，则应于举行罢工或者关厂之前，在两方中的一方的要求下，将分歧提出以便进行调解。1901 年，由于通过了两项法案，这个自愿的协议得到了加强，一项法案规定成立一个仲裁法庭，受权最后解决由于对所谓集体协议的破坏而引起的任何争执，另一项法案是成立劳资纠纷公共调解人机构，这些发展带来了一个劳资关系的和平时期。已经很强大，而且在以后时期中成长得还要强大得多的工会取得了相当大的让步：事实上，到 1914 年，丹麦工人已经在欧洲工资最高和组织很强的工人之列。工会主要是在行业基础上组成，还有一个独立的总工会是专为不熟练的工人设立的，虽然有一些行业工会也接受不熟练的工人作为会员。在运动内部，有一些人提倡产业工会主义；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到 1914 年以后才达到成熟的程度。

查勒政府在 1910 年倒台；于是社会党人与激进党人联合起来积极进行运动以争取宪法改革。以前人民中学教师克劳斯·伯恩斯顿为首的新政府代表中间派，赞成实行温和的改革，但是上议院否决了它的建议。后来，在 1913 年的大选中，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共同在下议院中获得了明确的多数。上议院仍然进行阻挠，

678



政府于是解散了上议院，这一次改选在上议院中也取得了微弱的多数。这时，国王改变了他的反对态度，从而终于廓清了实行宪法改革的道路。1915年6月，国王签署了一部新宪法，三年以后宪法生效。宪法规定，不论男女，都可以在同等条件下参加议会上下两院的议员选举；而且人民普遍有投票权。但是规定上议院选举的投票年龄为三十五岁，下议院选举的投票年龄则分阶段从三十岁降低到二十五岁。新的下议院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是由单一候选人的选区选出的；但是哥本哈根单独成为一个选区，实行比例代表制，此外还根据各党的总的投票力量额外分配给它们一些议席，以使每一个党都有与它的票数相应的议员。上议院也通过比例代表制选出，不过是间接投票：有一条奇怪的条文规定，上一届的上议院可以指定一些议员担任新的上议院的议员。根据新的选举制度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使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共同在下议院中得到巨大的多数，社会党成了最大的党。在上议院中，保守党和中间派仍然掌握着实际的多数。

因此，在本世纪初叶，丹麦是社会党与资产阶级激进党的合作问题以非常明确的形式出现的国家之一。在组成下议院中间偏左的多数各党中间，1909年合并的改良左派和温和左派主要代表农民，另一方面，激进党人在1905年分裂以后，主要是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的党，但是也得到小农的一些支持。社会党人之中包括人数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他们与激进党人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与改良左派的共同之处，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改良左派是对城市工人的权利要求抱敌对态度的。1898年以后，当仿效英国运动的榜样，展开一个大学附设夜校、函授部运动的时候，教育活动形成了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因为社会党人也着手于开展他们自己的教育工作，来对抗农村人民中学的影响。工会和社会民主联盟在它们于1910年在J. P. 松德波的带领下，

于埃斯堡创办它们自己的人民中学之前很久，就都已经忙于组织学习小组和夜校了。社会党人在埃米尔·维英布拉德于1881年成为他们的主要刊物《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以后，也大大得力于这份刊物。维英布拉德除了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以外，还是一个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的报纸和杂志网奠定了基础。这种宣传形式特别有助于加强社会党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激进党人到1905年以后才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党，他们具有悠久的为民主政府而斗争的传统，这种传统主要来自律师兼新闻记者V.休鲁普，他在1884年创办了非常成功的报纸《政治家》报。在反对埃斯特鲁普和国王的斗争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争取改革的动力；在主张改革的政党的各种各样的统一战线中，他们起了农村和城市工人阶级利益之间的桥梁作用，直到旧秩序开始崩溃。当国王最后在1901年，让一个左派内阁上台时，这些盟友的团结很快就消失了；情况很明显，所谓“温和的左派”——实际上就是土地多的农民的政党——不愿意将宪法问题推进到与国王和上议院发生激烈冲突的地步。激进党人在继休鲁普为领袖的查尔的领导下，以奥夫·罗德为他们的杰出人物，接着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党；社会党人不得不在以下两种做法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是与他们联合起来，为建立民主政府进行决定性的斗争，或者是——如果他们拒绝联合的话——放弃早日实行宪法改革的一切希望。他们并没有象法国的米勒兰那样，与查尔组织联合政府：他们情愿留在激进党的内阁之外，以独立身份给予它支持——这可能是因为，第二国际已在考茨基决议中宣布，除了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反对参加联合政府。但是，他们给了查尔内阁非常

680 彻底的支持，后来，激进党人在战争结束以后，也对两党中较大的党——社会民主党给予支持以作为报答。事实上，激进党人走得更远一些：查尔本人在1929年的斯道宁的联合内阁中担任了司法

部长。

由于执行这种与资产阶级左派联合行动的政策；丹麦社会党人常常在第二国际中受到批评，有时候还被指责为渴望做官，这种政策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反对埃斯特鲁普的斗争。不过，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选择余地，宪法问题必须解决；激进党人是真正的激进党人，他们准备战斗。社会党人除非能够争取到人数相当多的小农和城市工人，否则就没有得到多数的希望；如果他们在下议院中对比较进步的人物采取冷淡态度，他们就会丧失做到这一点的一切机会，从而使成立民主政府的前景破灭。由于农民构成了强有力的中间舆论，丹麦的整个形势与德国或者奥匈帝国存在的形势截然不同。反动的保守力量虽然设法长期保持住了政治权力，他们的力量决不能同奥地利或者德国的反动派相比。从社会意义来说，虽然不是从政治意义来说，至少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丹麦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发生的经济革命不是有利于工业资本主义，而是有利于独立的自己有土地的农民，他们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并向世界市场输出高价产品。没有人能够认为丹麦的农民——或者是丹麦的小自耕农——是一个没落的阶级，或者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落后农民竟然有相似之处。丹麦的农村人民同城市居民一样，家境富裕，很有教养并且有政治觉悟。在丹麦，谈论社会革命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号召力，丹麦的社会主义必须使自己适应这样一个国家的趋势。

## （二） 瑞典

最近，人们常常赞扬瑞典，说它是消费合作运动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模范国家，其实，它在这两个运动中都是后进。在第一国际时代，不存在任何种类的社会主义的活动，虽然斯卡恩的马尔默与哥 681

本哈根不过隔开一个桑德海峡，而且两地之间来往颇为频繁。事实上，在十七世纪以前，斯卡恩是丹麦的一个省份，保持了许多丹麦的特色。甚至直到今天，它还是这样。当瑞典的工人运动终于确实发展起来的时候，斯卡恩、特别是马尔默，自然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多少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瑞典的任何地区，似乎对于路易斯·皮奥和国际工人协会丹麦支部的活动都没有反响。

毫无疑问，原因在于瑞典的工业还不成熟。在七十年代以前，几乎还没有开始工业发展。旧的起调节作用的基尔特制度一直存在到 1864 年，虽然在四十年代，基尔特已经丧失了它们的垄断权，这种基尔特有权力签发证书给学徒期满并按规定拿出“杰作”来的手艺人。在基尔特消失以后，它们留下了——象在丹麦，它们是在 1862 年解散的——行业组织的传统；两个国家中许多这样的组织都变成了互助会，或者为这种互助会所取代，在建筑业和冶金业尤其是如此。比较现代形式的工会，只是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同时，在裁缝奥古斯特·帕尔姆(1849—1922 年)的影响下，开始了一个社会主义运动，他曾经在德国和丹麦做工，1881 年回到瑞典时已经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帕尔姆不久以后就找到了一个卓越的盟友，那就是青年学生阿克西尔·斐迪南·丹尼尔逊(1863—1899 年)，此人帮助他创办了一份社会主义刊物《社会民主党人》，并且帮助他组织了社会主义团体。不久以后，一个甚至更加值得注意的新人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就是乌普萨拉大学的贾尔马·布兰丁(1860—1925 年)，从 1883 年到 1887 年，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的激进党报纸《潮流报》工作，自 1885 年开始主编该报，在 1887 年，他接任《社会民主党人》的主编工作，一直到 1917 年，不久以后，该报就成了社会主义舆论的主要喉舌。丹尼尔逊被《社会民主党人》开除以后，将他的总部迁移到马尔默，在那

里创办了一份新的刊物《劳动》杂志，以极大的精力和辩才努力进行工作。丹尼尔逊非但是一位有才能的新闻记者，还是一位非常出色而且很受欢迎的演说家；他也是一位相当勇敢和顽强的人。他曾经到斯卡恩各地演说，组织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1888年，他拟定了一个社会主义纲领草案，受到了普遍欢迎。在这个时期，丹尼尔逊反对议会行动而赞成以工业方面的阶级组织为基础来采取直接行动。不久以后他触犯了法律，在与法庭几度争执以后，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八个月。释放后，他改变了信仰，成了一个相信议会行动的人，此后，他在布兰丁于1889年领导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内起了积极作用，关于他所起的作用，还常常会引来很大争论。布兰丁本人在1896年任议员；第二年，社会民主党通过了一个正式纲领。在布兰丁的影响下，1897年党的纲领主要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为基础；但是丹尼尔逊的思想对这个纲领也有影响，特别表现在纲领给予工会和工业行动以重要地位这一方面。但是丹尼尔逊在成熟以后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者，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在瑞典南部，他享有很大声誉。如果他活着的话，在为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竞争时，他很可能居于与布兰丁相匹敌的地位。不过，他喜欢争吵，他在工人中间比在其他领导中间更受欢迎，当1899年死亡使这位狂暴的人物消逝时，有一些领袖也许并不感到遗憾。当时他只有三十六岁。一年以后，另一个著名的先驱人物去世了。那就是哥德堡的弗雷德贝格·斯特尔奇，他在1892年创办的《新时代》是瑞典西部工人阶级运动的中心，其重要性几乎不下于布兰丁的《社会民主党人》，或者丹尼尔逊的《劳动》。斯特尔奇除了是一个职业新闻记者以外，也是工会联合会主席，他在组合这个联合会方面起过巨大作用。帕尔姆倒没有死，可是他不是有一个有才干的领袖。1900年以后，瑞典社会主义的几乎是绝对领导地位转移到了能干的贾尔马·布兰丁手里。

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党正式成立于 1889 年——也就是举行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的那一年。它派了两名代表——S. 帕尔姆格林和 O. 阿拉德——参加巴黎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大会，他们还代表总部设在巴黎的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者联盟，事实上与其说他们是新成立的社会党的代表，倒不如说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者联盟的代表。社会民主党在成立时主要以工会为基础。1889 年，瑞典工会仍然主要是地方的行业团体，它们正开始在各行业都能参加的地方劳工会中，而不是在全国性的工会中，联合起来。早在 1883 年，就成立了斯德哥尔摩劳工会。这些地方劳工会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组织，而没有放弃他们的产业方面的职能。每一个属于地方总工会的工会都有责任使它的会员集体参加社会民主党；但是过了不多几年，这就引起了很多纠纷，而不得不用一种规定可以自愿参加、但个人有权利退出合约的制度来代替。即使这样，所属各工会与党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工会都参加了党。

党在成立以后立刻就投入了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激烈斗争，这是该党历史学家的通常的说法，但是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主张议会行动者与主张直接行动者之间的斗争，或者是亲德派与工团主义者之间的斗争。1891 年，它效法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的榜样，击败了所谓无政府主义者，赞成首先通过议会手段采取政治行动。但是，从瑞典普遍存在的条件来看，这不可能意味着它能够希望在彻底改革宪法制度以前，成为一个强大的议会政党。与德国人或者法国人不同，但是和比利时人或者奥地利人一样，它有必要从争取进行议会改革的鼓动开始。不过，它的力量比较弱，没有条件单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这样一场艰巨斗争；因为瑞典主要是一个农业国，显然，单单是城市工人力量可以说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统治着瑞典国家的反动派身上。

事实上，在 1889 年的时候，经济发展已经很迅速。由于西半球大量输入小麦致使价格下跌，瑞典的农业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很不景气。农村地区有大批居民外流，主要移居美洲，但是也有流入城市的。1888 年，为了统治着议会的地主和农场主的利益，放弃了自由贸易制度；在不多几年内，城市雇主也为工业取得了保护。这些变化意味着生活费用的提高，这就给予工会主义和合作运动以推动力，但是由于在工农业的结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的影响减弱了。八十年代以后，瑞典农民越来越多地从种植小麦转而从事畜牧业和牛奶制酪业以及糖甜菜种植；由于对纸浆和纸的需要迅速增加，给了林业的发展以新的动力，林业也有了巨大发展。后一种情况促成了一种新的重要工业的建立；同时，在德国日益需要优质铁的影响下，北部的炼铁工业也有了迅速发展。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财富，其中大部分最初都流进了大农场主、地主和工业雇主的口袋，特别是在北部和新开辟的森林地区，他们能够雇用廉价的劳动力。

在 1866 年以前，瑞典的宪法是以陈旧的产业制度为基础的，议院分为四院，不仅排斥了工人，而且排斥了一大部分中产阶级。1866 年改革了宪法，成立了一个两院的议会，上议院通过按照财产和收入将选举权分级的间接选举选出，以便保证豪华的贵族之家能够控制上议院。下议院以直接选举方式选出；但是这种选举也有财产或收入的限制，而且限制很严格，足以将大多数工人排斥在外，并使在全国占大多数的农村选区的控制权落在农场主的手里。

象丹麦的情况一样，两院有平等的权利；政治主要成了贵族与农场主——他们的农民党控制着下议院——不断进行斗争的问题。在兵役问题上斗争特别激烈。自己有地的农场主说，只要他们缴纳特别征收的土地税作为对国防开支的贡献，他们就有权利

免服兵役。由于德国兴起、六十年代的历次欧洲战争、俄国在芬兰寻衅的行径，对于更好和更多的武器有了强烈的要求；其他问题大部分相形见绌，同时，农场主对于政府的军事政策的反对也逐渐减弱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农场主在保护贸易问题上陷于分裂，两个对立的农民党一直在相互斗争；但是，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他们又重新联合起来，在下议院再一次以稳固的多数出现。大致说来，他们赞成选举改革，不过条件是他们务必要能够继续使农村选区居于支配地位，以便反抗贵族在上议院中的支配地位；由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联合大小农场主，反对城市的要求，他们不可能同城市的改革派联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选举改革的斗争就必然主要在议会外面进行；斗争中要求改革方面的主要人物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还有伐木业的工人以及一部分与农业地区的工资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小农场主。社会民主党人与激进党人在争取这些人拥护时是对手，可是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又必然是盟友。1893年，激进党人仍然是鼓动改革的主要人物。那年，社会民主党人与他们联合起来开展一个运动，争取通过成年男子选举，选出一个非正式的人民院，以便集中要求改革，并且动员舆论作为它的后盾——说得确切些是按照英国宪章运动协会的方式。在人民院里，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四分之一的席位；但是当它举行会议时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如果政府拒绝实行普选权，就考虑宣布举行总罢工。第二年686 年在哥德堡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批准了这项政策；但是没有立即采取行动。1896年，在举行下一次议会选举时，采取了同样的方法。社会党人与激进党人再一次联合起来，选出了一个非正式的人民院；但是这一次激进党人反对举行总罢工，人民院以微弱的多数否决了主张进行总罢工的建议。这是布兰丁在议会中得到一个席位那一年的事。



由于在总罢工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社会党人与激进党人为了选举法改革而进行的联合运动陷于停顿；在此后的几年内，注意力主要转移到了工会斗争。1886年以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工会代表每隔一年就在它们之中的一个国家里举行一次代表大会；在这些集会上，对于在工业中的行动和总罢工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代表大会效法第二国际的榜样，开始建议在五一节组织盛大的示威游行，特别是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在瑞典，地方总工会负责这个问题。但是在1898年以前，除了社会民主党的中央组织以外，瑞典的工会没有中央组织。那年，根据斯堪的纳维亚代表大会通过的建议，瑞典工会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中央机构——瑞典总工会，通常叫做L.O.。这个机构同丹麦的平行机构一样，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联合会，目的在于利用下属各工会的联合力量来帮助任何一个发现自己陷于劳资纠纷之中而不能单独取胜的工会。大体说来，它的目的是保证以仍在做工的工人的钱，在经济上帮助罢工工人或者因关厂而不能上工的工人；但是骨子里是想以总罢工作为使雇主就范的最后武器。1899年，L.O.卷进了一系列的劳资纠纷，这些纠纷主要是由于瑞典北部的雇主拒绝承认工人联合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而引起的，而在南部，这种权利已经相当稳固。这些劳资纠纷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接着在1901年，由于政府坚持大大增加军事开支，并为此而大大增税，选举权又突然成为重要问题。687下议院勉强同意了这些措施，但是要求实行宪法改革作为交换条件；保守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有限制的选举权法案，打算给予已经服过兵役的25岁以上缴纳赋税的男子以选举权，同时给予已婚男子和四十岁以上的男子以投第二票的权利。

这就使社会党人参加了斗争，来要求实行平等的普选权。各城市组织了大示威；社会民主党在工会支持下，决定在议会辩论政府法案的同时举行总罢工。按计划这只不过是一次示威性罢工；只

打算举行几天。到罢工时，得到了很大的响应。但是，政府并无意对社会党人的要求屈服。它自己的法案没有通过：倒是议会根据上议院的建议，决定对于整个问题进行调查。在以后两年内，政府更迭频仍，一系列新的改革建议提了出来，然而这些建议所根据的方针不但社会党人，甚至自由党人也完全不能接受。自由党人在1900年组成了一个新的自由党，成了一支相当强大的议会力量。后来有一个时期，由于关于挪威宪法权利的长期争执达到严重阶段，整个问题降到了次要地位，当时挪威和瑞典仍然是在同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联合在一起，它有自主的组织，不过关于自主组织的权限则从来没有明确的规定，两国之间对此也从来没有取得协议。

1905年使瑞典挪联邦结束，导致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挪威王国的那场决定性纠纷中的一些事件，除了对劳工运动有影响的方面之外，与本文无关。瑞典的社会党人和与社会党人有关的工会完全支持挪威人的独立要求，在工会提出总罢工的威胁以后，瑞典国王和政府最后只好接受。危机刚过，此事就在瑞典的国内政治中产生了影响。自由党政府在卡尔·斯塔夫的带领下得以上台，<sup>688</sup> 保证在单一候选人的选区中，实行成年选举权。斯塔夫的法案在下议院通过了，但是为上议院所否决，上议院表示，唯有在成年男子选举权与大选区中的比例代表制结合起来的条件下，才准备同意这种选举权。至于妇女是否也应该有投票权的问题则提交国王决定。因此自由党人提议解散下议院，以听取选民的意見；但是国王拒绝这样做，政府因而辞职。保守党人重新上台，使上下两院都通过了一一不过下议院是以微弱的多数通过的———项规定两院议员选举都采取比例代表制，下议院实行成年男子选举权，上议院则降低投票人的财产限制的议案。这一议案在1907年成为法律。

同时，在工业方面发生了纠纷。瑞典的资本家，一部分是出于对成立瑞典总工会的反应，一直忙于在工业和财政领域内组织他

们自己的力量。当时瑞典的主要资本家是克努特·阿加森·瓦伦堡，他出身于一个拥有很多企业的显赫家族。他建立了瑞典银行协会，日后该协会成了金融界的主要发言人。1902年，大工业雇主也在一个叫做瑞典雇主联合会的中央组织中联合起来，这个组织不久就转而由于练的贾尔马·冯·西多领导。西多在那时是工会主义的无情反对者，人称“老板”。此后几年，主要是由于他，才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瑞典雇主联合会是以本章前一部分所介绍过的丹麦团体为蓝本，并且具有同样的目的——如果工会坚持它们的举行地区性罢工的政策，就用总关厂的威胁来对付联合起来的工会。如我们所见，工会的组织基础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主要是通过以地方劳工会作为后盾的地方谈判来采取行动。在必要时由瑞典总工会在后面给予支持。与此相对的是，雇主希望在每一个行业或企业进行全国性的谈判，如果有任何一个工会不接受雇主认为合理的条件，就由瑞典雇主联合会在幕后以总关厂作为威胁。不过雇主需要时间以使他们的组织趋于完善，以便与瑞典总工会进行瑞典雇主联合会已断然决定的“摊牌”。此后两三年内不断发生零星冲突；接着，当挪威的危机仍然处在严重关头时，在冶金工人中间爆发了大罢工，雇主为对付罢工，在整个冶金部门从1905年5月到10月实行关厂，结果工人取得了部分胜利，他们得到了最低限度的工资。丹麦和挪威的工会纷纷捐款帮助被关在厂外的工人。有些支援来自更遥远的地方。

1905年的斗争促使瑞典雇主联合会行动起来。政府在议会中提出一项限制罢工权利的法案；但是，在瑞典总工会扬言要举行总罢工以后，这一法案遭到了否决。一项调解法案在1906年成为法律，它与在丹麦已经实行的相类似但是没有赋予强制的权力。瑞典雇主联合会则决定加强它的组织，采取进取的方针。它规定属于它的所有雇主都必须遵循它指导下的统一政策。每一个雇主

都应该遵守“工厂开放”的原则——那就是说应该拒绝只雇佣工会会员：任何雇主如果不向瑞典雇主联合会请示，并得到批准，不得达成集体协议。面对着这个强有力的雇主联合，瑞典总工会认为自己不能不在1905年与瑞典雇主联合会签订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每一方都承认对方有权利进行组织和集体谈判，同时也暗含着同意了工会所一直激烈反对的“工厂开放”的原则。这同在丹麦签订的协议相类似，只不过没有规定在有分歧时实行仲裁，或者由国家来调解。

此后几年，情况就是这样。1907年，开始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因而造成了普遍的失业，工会的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工资降低了，劳资关系迅速恶化。工会企图抵抗：雇主则准备给工会以教训。瑞典雇主联合会威胁说，除非工会取消它在一些行业中已经宣布了的罢工，它将实行总关厂，将所有同瑞典总工会有关系的工人关在厂外作为回答。工会虽然深知经济条件对他们不利，仍然决定抵抗，他们没有等待被关在厂外就宣布了总罢工。罢工的号召得到了巨大的响应。吉哈德·马格努逊主编了一份罢工特刊《答复》；工人们举行了盛大集会，严厉谴责冯·西多和瓦伦堡家族。但是瑞典雇主联合会态度坚决，而且有充足的财力作为后盾；商业情况则很萧条。

1909年的瑞典总罢工与1902年的政治性总罢工不同，这是工人阶级与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一次真正的实力较量。绝不是所有的瑞典工人都属于瑞典总工会，也绝不是所有的雇主都属于瑞典雇主联合会。在瑞典总工会外面，还有铁路工人、印刷工人和一些其他工会：瑞典雇主联合会基本上是大工业家的联盟。有一个独立的雇主的组织，它们是比较松散的联合，主要的追随者在建筑业中；此外还有一个小业主的联合组织。这些团体都没有参加大工业家将自己联合在一起的协议：瑞典雇主联合会的成员也并不

是普遍支持它的战斗性的策略的。在工人方面，有些工会不愿参加瑞典总工会为建立一个集中的运动所作的努力。但是，这两个巨大的组织包括的领域很广，所以他们的冲突成了一种非常重大的事件，对于未来的劳资关系，实际上对于瑞典劳工运动未来的整个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我们所见，罢工是在一个不利的时刻发动的。领袖举行罢工的时候便知道他们很可能被击败：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反对举行罢工，但是由于他们的成员强烈反对瑞典雇主联合会所要求的投降，他们让步了。鉴于存在这种情绪，看来最好是采取主动，而不是等待被关在厂外，主要是因为，在最后较量的时刻到来之前，已经发生的局部性罢工和关厂持续的时间越长，在这种时刻真正到来时，工会剩下的钱就越少，已经失业的工人就会越感到疲倦。无论如何，当地积极分子的斗争决心是无可怀疑的；所以发动了总罢工。

作为一次总罢工，它持续了一个月。这次罢工的经费也是来自国内和国外。丹麦人和挪威人给予了大规模的帮助；许多其他外国工人组织也送来了捐款。特别是为了在码头上工作，雇主企图从英国招来破坏罢工的工贼；由于英国工会没有能够在经济上帮助瑞典人，引起了相当大的不满。这表现在随即举行的一次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上，在这次大会上，英国工会代表很不受欢迎。一个月过去，经费告罄；瑞典总工会被迫命令那些为同情直接卷入罢工的工人而举行罢工的团体复工。罢工继续以较小的规模进行了一个时期；但是结果没有免于失败。大工业家的做法表明，他们并没有受自己方面的小人物掣肘，妨碍他们能在工会所擅长的活动中击败工会。如果劳资双方的两大组织，较量一下谁更能持久的话，资方是能够维持较长时期的，特别是在商业不景气的时候，只要罢工只不过是罢工，而没有成为一场革命。

在瑞典，在 1909 年，由于新宪法刚刚生效，罢工还绝不可能变

成革命。在工会内部有革命者，当罢工斗争结束时，他们退出了瑞典总工会，在 1910 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工团主义工会，这个工会主要在林业工人中间得到了拥护者，但是从来没有强大到能在其他地方起重要作用。罢工失败的主要影响是使成千上万的工人退出了工会，而且严重地减少了主要依靠工会会员入党的社会民主党的人数。它的党员从 1905 年的 112,000 人减少到 1910 年的 55,000 人。在 1909 年以前很久，主要由地方劳工会协调在一起的旧地方工会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已经由一种与雇主进行全国性谈判的全全国性工会体系所代替。1907 年，有四十五个这样的工会，会员有 230,000 人。其中，有二十八个工会，计会员 186,000 人，属于瑞典总工会。在罢工以后，会员总数减少到 114,000 人，瑞典总工会会员人数减少到 80,000 人。此后，工会逐渐恢复元气，1915 年，会员总数增加到 158,000 人，瑞典总工会有会员 692 110,000 人。后来，在战争年月里，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 1919 年，工会空前强大。但是，在 1909 年以后有几年时间，尽管商业情况大有起色，它们却不能有什么作为。不过，它们并没有瓦解；雇主在显示了他们的力量之后，宁愿继续举行全国性谈判，也不愿意去消灭他们，担心很可能会驱使工人转而支持对立的工团主义工会。

在罢工期间，在斯卡恩的马尔默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在那里，一小批青年工团主义者企图炸毁一艘该港口起用的工贼用来作为住所的船只。这个密谋被发现了，领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得到了缓期执行的处理。社会党人和瑞典总工会当然谴责他们；在其他各地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不过，这次事件曾被大大利用来污蔑工会和社会民主党。

1911 年，举行了根据新宪法举行的第一次大选；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尽管减少，在下议院中的议员却增加了一倍，有 64 名当

选,自由党人当选的有101名,其他右翼政党65名。自由党领袖斯塔夫重新执政,一直到1914年下台。在这些年内,自由党人制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立法议案,包括养老金在内(1913年);但是,在他们曾经保证厉行节约开支的军备问题上卷进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右派积极展开了增加海陆军开支的运动;当政府拒绝拨付这笔经费时,他们成立了各种爱国团体,以募集捐款,来扩大海军和进行宣传。在1914年2月的选举中,自由党人在右派手中遭到惨败;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不仅维持了他们的地位,而且还增加其议席到73席,自由党人获得了71席,右翼各政党获得86席。一个大雇主所控制的新内阁上了台,克努特·瓦伦堡和奥斯卡·冯·西多——不是那个瑞典雇主联合会的领袖,而是一个失业委员会的发起人<sup>①</sup>——参加了内阁;这届政府在战争爆发时,由于国内存在各自同情一方的壁垒分明的态度,瑞典保持了中立——右派大体说 693 来同情德国人,左派同情协约国,但是由于存在强烈的反俄情绪,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态度。尽管有这些分歧,总的说来却差不多是一种赞成中立的情绪。社会民主党人在战前的年月里一直反对增加军事开支,他们是坚定的中立主义者。1917年,当一个新的、主要是自由党的政府上台时,布兰丁在党的支持下参加了内阁。就在此之前,有一部份人脱了党,成立了一个左翼独立社会党;但是关于这次分裂及其后果的情况,必须留待本书下一卷再作讨论。

在1909年的挫败以后,社会民主党人积极致力于改善他们的组织。在总罢工以前,在党内一直很活跃的左派失势了;人数减少以后的党求助于教育来作为恢复实力的手段。这时很强大的瑞典工人教育协会的主要事迹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但是,基础是在1914年之前,在社会民主党、工会与合作运动的密切合作

---

<sup>①</sup> 这个管理失业救济工作的委员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被利用来作为降低工资的工具。

下奠定的。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谈到瑞典合作运动的情况,这个运动出现较晚,1900年以后,才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瑞典合作运动的基础主要是 G. H. 冯·科赫奠定的,他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运动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回国时对于罗奇德耳制度充满了热情。冯·科赫率先建立了一个整个消费合作运动的中央组织——合作协会,并在该协会于 1899 年成立时,成为该组织的第一任书记。此后,运动的领导换了能干的阿尔宾·约翰逊(生于 1888 年),他在 1903 年在一个商店里做助手时,开始了他的合作运动生涯,但是,直到 1917 年,才成为合作协会的主任。在初期,地位次于冯·科赫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是马丁·松德尔(1879—1910 年),从 1910 年起实力加强,又加入了安德斯·俄尔涅(生于 1881 年),他是《合作报》的编辑,一直到 1920 年为阿克雷尔·约尔斯所接替。另一个重要领袖是 K. 埃利克逊(生于 1878 年),他在 1911 年任合作协会主任,在合作保险事业的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在丹麦的影响下,瑞典的合作运动最早在斯卡恩壮大起来,后来扩大到瑞典中部;在那里,在约翰逊的领导下,运动开始具有了代表消费者与垄断资本家斗争的特色。它的中央组织——合作协会从一开始的时候起就兼有两种职能,而这两种职能在英国是由作为贸易和制造机构的批发合作社和负责宣传、教育和全盘统筹工作的合作联盟分担的。合作协会逐渐扩大,它对政治持超然态度,只是力图在城市里和农村里,在产业工人中间以及在农场主和中产阶级中间,逐步争取对它的支持。在斯德哥尔摩,1905 年创办了主要的消费合作社之一——瑞典之家,该组织与合作协会全然没有关系,而是一个在中产阶级主持下的妇女合作社,但是后来同与合作协会有关系的斯德哥尔摩合作社合并了。1908 年,合作保险协会开始工作,1908 年,合作协会对控制着人造黄油制造业的卡特尔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



的反垄断运动。这个卡特尔于 1911 年解体。合作协会的人数在 1913 年达到 10 万人,1917 年时,它的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

同时,瑞典的农场主一直在单独组织一个与合作协会全然没有关系的全国农场主联盟,这个联盟发展了它自己的银行,并且创办了自己的航运事业以输出农产品。但是这个机构由于扩充过份,力不从心,在战争年代陷于财政困难,结果瓦解了。约翰逊在 1916—1917 年,在斯德哥尔摩合作社的事务中崭露头角。他彻底改组了这个合作社。他后来成了合作协会的一位主任,对这个组织,他也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组。他一直在准备向 1914 年成立的面粉厂商卡特尔进行决战;但是一直到战争结束后,这一斗争才达到严重关头。与斯德哥尔摩只有一水之隔的陆上标志——著名的三王帽面粉厂,一直到 1922 年才被合作协会买下。同时,约翰逊和合作协会帮助一些农场主合作社进行了改组,并且在它们与消费合作运动之间,商定了相互购买的协定。约翰逊还与丹麦人和挪威人一起制定了成立联合批发合作社的计划,这是 1918 年 7 月在丹麦人弗雷德里克·尼尔逊的经营下开始经营。与垄断资本的进一步的大规模斗争是后来,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行的。——战争时期,工会在 1916 年创办斯德哥尔摩住宅合作社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从而在住宅方面,瑞典合作事业有了另一突出发展。此后在 1923 年,建立了住宅合作社,它的发起人是瓦朗德尔。这个住宅运动与合作协会全然无关,它独立地参加了国际合作联盟。

1918 年以后,瑞典合作运动才完全呈现出了它的特色;但是,合作协会的领袖在 1911 年与人造黄油卡特尔进行斗争时,已经在他们的合作运动上深深地打上了他们的烙印。瑞典的合作运动者的态度就是 J. T. W. 密契尔在初期,以“罗奇德耳原则”的名义,强使英国合作运动采取的那种态度。他们坚持说消费合作社应该完全坚持它们那保卫消费者不受剥削的本职工作,应该严格按照商

业路线经营，而不应该让自己转到妨碍商业成就的理想主义的做法上去。由于需要得到农场主的支持，他们准备帮助生产合作社，并且在纯商业的基础上与它们签订合同来购买他们的产品。但是，他们坚持使合作协会保持一个纯消费者的组织的本色；他们反对一切将它卷入政治或者与工会结成任何正式联盟的企图。尤其是约翰逊坚信应该自愿人会并由消费者会员实行民主管理。但是，他也认为合作协会是全体消费者而不单单是它的成员的领导者。在他与垄断资本家展开的一系列价格斗争中，他说他自己最满意的696 不在于从他们手里为合作运动抢来了生意，而在于迫使他们降低了价格。在这一事业中，他非常愿意将合作社产品除了通过合作商店出售以外，还卖给私商。有些人希望按照比利时的模式，成立社会党人、工会主义者与合作运动者的三角联盟来进行共同斗争，他与这些人发生了许多争执。他不信仰社会主义，也不赞成给合作运动以阶级基础；他坚定地使合作运动从事于他认为是它的唯一的绝对的任务。当然，合作社主要是由工会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组成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合作事务中发挥了杰出作用。但是就全国来说，合作社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工会或者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没有丝毫关系的领导；农场主运动的发展也完全和在合作协会中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运动没有关系。

在布兰丁的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在1909年以后，基本上是一个稳健的党，虽然他们也有一个直到俄国革命就要爆发时才退党的左翼。1909年以后，工会中心与社会民主党的有机连系不那么密切了。瑞典总工会宣布它与社会民主党有“道义上的团结”，可是这两个机构在组织上是各自为政的，虽然它们通过工人教育协会，在教育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合作。自由党人上台时，邀请社会党人组织联合政府，但是这项邀请被拒绝了。尽管如此，社会党人在议会中在极大程度上是支持自由党人的。除了布兰丁了以外，他

们的主要领袖包括有 F. W. 索尔逊、瓦尔纳·李登、从 1901 年以后担任党的书记一职的 C. G. T. 维克曼，还有 A. C. 林德布拉德；在工会方面，有运输工人工会的查尔斯·林德莱（生于 1865 年）、1900 年以后担任瑞典总工会主席的赫尔曼·林德奎斯特、冶金工人工会的 E. 布朗伯格（死于 1911 年）以及石匠工会的尼尔斯·佩尔逊。未来的领袖和首相、马尔默的佩尔·阿尔宾·汉森（1885—1946 年）是在 1914 年以前的年代里作为社会民主青年联盟的机关刊物《前进》的主编，日益出名的。工会主义者在议会内社会党人的队伍中人数很多，甚至在中央机构正式分开以后，他们在全国仍然控制着党的组织。除了布兰丁以外，瑞典人在 1914 年以前，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并没有发挥突出作用：由于瑞典作为中立国家的地位，他们在战争时期发现自己被强加上了新的特殊职能。斯德哥尔摩由于被指定作为 1917 年拟议举行的盛大的社会党会议的中心，在全世界享有盛名。但是即使在这时，瑞典社会主义仍然远没有取得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作为稳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倡导者所取得的地位。

### （三）挪威

在 1905 年以前，挪威在同一位国王统治之下附属于瑞典，但是它在内政方面完全是自主的。这种情况并没有防止，它同瑞典与瑞典政府不断磨擦。事实上，挪威争取民主的斗争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紧密联系的。挪威上层阶级主要由于希望国王以及他的出身贵族的大臣支持他们抵抗民主的压力，所以主张与瑞典结成联盟。左派中有一些人认为实现民主的最大希望在于完全切断与瑞典的联系，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在于将国王制定共同政策的权力限制在最狭隘的范围内。在社会结构方面，与欧洲其余地

区相比,挪威在整个十九世纪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主要是由农民、渔民和海员组成,工业一直到临近十九世纪末时,也没有多大发展。这片土地虽然有利于民主民族主义的生长,却不利于与激进主义思想有别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成长,这完全是因为它有利于一种某些社会主义思想——比如说,对社会立法的要求——在其中可以据有一席之地之地的激进主义、1848年,马卡斯·特兰(1817—1890年)在城市工人和农村工人中间建立了工人协会。他要求普选权以及制定保护工人和农民的法律。但是在1851年,他与他的主要追随者被捕下狱,在五十年代反动势力甚嚣尘上的时期,他的运动被消灭了。特兰本人在1863年移居美国。他定居在芝加哥,在第一国际中起了积极作用。

在这些人被逮捕的前一年,在下一代将支配挪威政治生活的  
698 约翰·斯维尔德洛普(1816—1892年)当选为挪威议会议员。斯维尔德洛普受过律师教育,成了他自己所建立的激进党的当然领袖。激进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来自小农场主,但是在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中间也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他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思想上很受法兰西斯·李伯尔(1800—1872年)的影响。李伯尔是一个定居在美国的德国人,是维护国家主权、反对联邦概念以及外国统治的代表人物。李伯尔——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的学说在南北战争期间影响了美国的思想;这些学说提供了正好是挪威人所需要的民族主义和人民政府的综合概念。斯维尔德洛普在争取挪威的独立和代议制政府的斗争中,得到了文学界的和广大人民的主要舆论的支持。挪威文学界已经具有支持民主思想的传统,这种传统来自具有共和思想的诗人亨里克·文格兰德。文格兰德曾经与在1869年以前担任议员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农民领袖奥尔·威兰德积极合作。而斯维尔德洛普则得到了下一代的一个杰出的文人皮扬逊(1832—1910年)的全力支持,皮扬

逊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版。斯维尔德洛普为了扩大选举权以及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责任制的政府所进行的斗争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才开始有效，到 1884 年，国王才被迫任命他为首相；但是，从 1850 年起后，他已经积极为民族独立以及小农场主的利益而进行鼓动。

在斯维尔德洛普得势的情况下，挪威对于第一国际在丹麦的活动只有微弱的反应。那里仅有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激进党内部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八十年代，这个党开始瓦解。1885 年创建的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团体在两年以后发展成为一个粗具规模的社会民主党，建党伊始时它纯粹是一个宣传机构。工会主义也在小规模地发展，1889 年，主要以与瑞典同样的方针建立的地方劳工会为基础，成立了社会党工会中央联合会。同年，斯维尔德洛普的激进党分裂成了两个团体，一个是赞成政府对工商业采取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派，另一个是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对社会立法的要求方面都是激进的激进派。挪威的经济随着木材工业和商船队的扩充，经济发展刚刚蓬勃开始；这种情况一方面趋向于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中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另一方面，趋向于促使工会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成长。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激进党的影响下通过了许多社会立法。1894 年，社会党人提出了它们第一个议员候选人，但是，由于大多数工人仍然没有选举权，所以结果很坏。不过，1898 年，挪威议会否决了将选举权扩大到妇女的修正案，而确定了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地位；1903 年，社会党人有四名议员当选。同时，在 1899 年，一直在迅速发展的工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中心，在此以前主要是地方性的工会开始联合一起来组成了以产业而不是以行业为基础的全国性的组织。这些全国性的产业工会逐渐剥夺了地方劳工会对经济行动的控制。社会党改组成为工党，仍然通过地方劳工会与各工会有密切联系。

1905年，争取挪威独立的全国性斗争发展到重要阶段。挪威议会宣布，它完全脱离瑞典和瑞典国王而独立，瑞典政府派了几支巡逻队进入挪威。不过，即使瑞典国王能在战斗中打败挪威人，他实际上没有希望保持他统治挪威人民的权力；他几乎立即停止了他们的巡逻队的行动并同意谈判。结果他放弃了挪威的王位，挪威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而不能不决定它未来的政府形式。举行公众投票的结果坚决主张推选一个新国王，而反对成立共和国。1814年以来就曾经存在的一院制政府得以保存；只赋与新国王以非常有限的权力。如我们所见，当斗争达到最激烈的阶段时，瑞典工会  
700 在与挪威工会的密切磋商下扬言，如果国王与瑞典政府拒绝让步，就要举行总罢工；但是，结果他们并没有采取这种行动的必要。在挪威获得完全独立以后举行的1906年大选中，工党获得了10席。3年以后，在1907年制定了一项有财产限制的妇女选举权的法律以后，又增加了1席。

这时，关于给予外国资本家开发挪威经济——特别是它的木材资源——特权的问题，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为一方，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为另一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右翼政党反对，而左翼政党赞成制定法律以防止将开发国家资源的特权转让给外国资本家，1909年，制定了这样的法律，不过不久当右派重新上台时，又作了修改。同时，在1907—1908年，自由党人与激进党人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分裂，成立了一个新的激进党。在1912年的大选中，左派大获全胜：工党的议席增加一倍，得到了23席。第二年，新的挪威议会规定了男女平等的选举权，取消了财产限制。

接着就发生了战争，挪威保持中立——因为虽然它的大多数人民同情协约国，但中立显然是上策。这需要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联防。在挪威，这还特别意味着必需品严重缺乏，和在不久以后，为了保证必需品的供应，国家将要相当多

地过问经济领域的事务。物价扶摇直上,引起了普遍的不满;1916年,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参加罢工的有运输工人、矿工和产业工人。因此,工党以外的各政党联合起来,通过了一项规定实行强迫仲裁的法令,尽管工党反对,这一法令一直有效,直至1923年(1927年重行颁布)。劳资斗争以及挪威议会采取的行动使工党急剧向左转。当俄国革命爆发时,这种趋势更为加强,1919年,挪威工党决定与第三国际共命运。这就导致了分裂:右翼分裂出去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快到第二年年底时,发生了铁路工人罢工,遭到了政府的严厉镇压。铁路是国有的,在政府看来,罢工是双重犯罪,701它既是破坏仲裁法案,也是反对国家。铁路工人失败了:几个月以后,工会举行了总罢工,结果也同样不利。两年以后,在1923年,工党与第三国际发生了争执,退出了第三国际。左翼有一部分人分裂出去,成立了挪威共产党。因此在1927年以前,挪威有三个对立的社会主义政党互相竞争。后来工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将共产党排斥在外面;合并后的党在挪威议会中得到了59席,组成了一个少数派政府,可是几乎立刻就倒台了。

我所以一直叙述到这里是因为欲罢不能。1914年以前,工党虽然一直在不断壮大,而且在1912年力量大为增强,却没有能够取得任何特殊成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激进党的副手起作用。不过,工会却一直在迅速发展,而且在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方面很成功,这主要是因为资本家的投资进展特别快,也是因为木材及木材产品的贸易呈现有利形势。挪威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但是它有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它的大部分工业坐落在农村地区。因此,在建立工会以及在主要城市——都是港口,而且除了克里斯琴尼亚(现名奥斯陆)以外都非常小——以外争取对于社会主义的支持方面,比大多数国家的困难少得多。城乡之间的矛盾比起大多数地方来也小得多;主要的矛盾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

盾，两种人中间都有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 1914 年以前，挪威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没有非常显著的贡献，这主要是由于它具有富于生气的民主传统，以致在战前年代资本大量流入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以前，它能够得过且过而不必发展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挪威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缔造者中间，必须给予克里斯琴·霍尔特曼·诺德森（1845—1929 年）以应得的荣誉。诺德森生于卑尔根，在克里斯琴尼亚做排字工人，1876 年，任石印工人工会主席，1883 年任中央工会组织主席。1884 年，他创办了一份刊物《我们的工作》，并且自设印刷厂来印刷这份刊物。第二年，他建立了社会民主协会，并且担任第一任主席，后来这个协会发展成为工党。他的报纸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成了党的正式机关报。诺德森在 1898 年当选为奥斯陆市政委员会委员，1906 年当选为议员。他成了工党的领袖，并且担任领导职务一直到 1918 年，在这一年，他被控制了多数的比较激进的派别赶下了领导岗位。不过，他拒绝与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一道退党，并且竭尽全力来防止分裂。在第二国际的辩论中，诺德森是挪威运动的主要代表。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与诺德森密切联合在一起的是卡尔·叶普森（1858—1930 年），他生于丹麦，做过制造雪茄烟的学徒，但是在成年后成了制刷工人。叶普森在 1878 年在克里斯琴尼亚定居，与诺德森联合创办了社会民主协会。1887 年，担任《社会民主党人》编辑，1898 年，与诺德森一道当选为市政委员会委员。1892 年，他放弃了编辑工作，开了一家烟草店；但是在 1906 年，他又回到报馆，再次主编该报直到 1912 年由于在禁酒法问题上产生了政策分歧而辞职。叶普森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曾担任工党主席五年。在 1918 年的分裂中，他支持被击败的右翼，此后他参加了退党的社会民主集团。



不久以后，诺德森就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新成员，他是激进党医生埃里亚斯·戈特里布·奥斯卡·埃吉德·尼森(1843—1911年)。尼森作为一个医生先是在丹麦同德国的战争中，后来在普法战争中服役。后来他在奥斯陆定居，当妇科医生，鼓吹完全禁酒和卫生改革。从1879年到1887年，他是完全禁酒协会主席，主编它的刊物，对于使这个问题成为主要的政治问题起了很大作用。在八十年代后期，他参加了社会党，从1894年到1898年，他主编《社会民主党人》。另一个脱离激进党而参加工党的人是阿尔弗雷德·埃利克森(1864—1934年)牧师，他在1902年创办了《北极光》刊物，<sup>703</sup>第二年当选为议员，在后来的两次选举中当选连任。但是，不久之后，埃利克森就与党发生了争执，因而1910年没有能够被重新提名。1912年，他被开除出工党，晚年，他在政治上成了保守派，虽然他仍然持有进步的文化和社会见解。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由于他作为一个传教师和作家的辩才，他是工人阶级运动方面的一个强有力的道德力量；但是，他是一个社会改革家，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还有一个领导人物是奥拉夫·克林根(1867—1951年)。克林根最初是一个农业和林业工人，1887年前往美国。他在那里受师范教育，在执教数年后，转而从事劳工新闻工作。他受到了英国社会主义的影响，为吉尔·哈迪所办的《劳工社论报》撰稿。1897年回到挪威之后有两年时间主编《社会民主党人》，在间断一个时期以后，又担任了几年主编。他积极参加第二国际，有一个时期他是社会主义国际局的委员。在挪威工党中他属于右翼，在战后发生分裂时，他参加了社会民主集团。克林根的著作很多——有小册子也有日记——并且与诺德森一样，是第二国际历届代表大会上最著名的挪威人。

在工会方面，地位次于诺德森的领导人物是奥尔·奥尔森·

李昂(1868--1925年)。李昂在少年时代是一个水手,后来成了印刷工人和社会民主党人。1907年以后,他是工会中心主席。虽然他是一位稳健的社会民主党人,可是当左翼在工党内控制了多数时,他曾奋力斗争来反对分裂,甚至在党参加了第三国际以后,他还说服工会继续与党合作。他担任工会中心主席一直到他去世。他在工会中心的主要同事是英格瓦尔德·马里乌斯·奥尔姆斯塔德(生于1874年),他在1911年担任奥斯陆疾病保险局的经理,是工党关于社会立法问题的卓越的专家。

704 1914年时,一位新领袖马丁·特兰米尔(生于1879年)出了名。特兰米尔最初在挪威做印刷工人;但是1900年时移居美国。1905年回国,成了一个积极的工党新闻记者,从1912年到1918年,主编《新时代》。特兰米尔在一开始的时候,完全站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左翼,1918年,他是使工党得以顺利进入第三国际的左翼的主要领袖。在那一年,他成为党的书记。从1921年起,他主编《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该刊物的后身《劳工报》。他除了是一个文笔犀利的能干的新闻记者之外,还是一个雄辩的演说家,他非但在他的追随者以及同事中间,在他的反对者中间也深受敬仰。

这些领袖中没有一个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中起过任何重大的作用,至少是在1914年以前是如此。挪威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极大程度上是从别处得来,只是到了俄国革命以后的年代里,才具有明确的性质。

#### (四) 芬兰

在1917年以前,芬兰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在二十世纪之前它还没有多少工业,而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虽有丰富的林业资

源,然而只不过是刚刚开发。但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它开始发展了专供出口的农业,特别是牛奶制酪业;1900年以后,它的伐木业和木材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开发。这些变化促使贸易转向西欧,并且促成了广泛的合作运动和产业工人阶级的壮大。八十年代它的农业合作社开始扩大到各地,1900年时,消费合作运动和农业合作运动都取得了巨大进展。1899年,成立了农场主合作社的中央组织,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汉尼斯·格布哈德教授为合作社的发展积极展开了运动。1903年,主要是农村的消费合作社,在政治守中立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批发合作社。主要以城市合作社为基础的对立的进步批发合作社一直到芬兰在1917年取得独立时才成立起来。

在1917年以前,芬兰人为独立进行了斗争。1808年,芬兰被 705 俄国从瑞典手里兼并,成为一个自治的公国,它有自己的组织,但以沙皇为大公。俄国从瑞典统治时代接收过来一个不给予工人选举权的四等级的国会。这个古老的工具一直存在到1905年。不过有很长时期,它没有举行会议,芬兰由一个俄国任命的元老院在一个俄国总督领导之下统治着。俄国交替采取两项政策。一项是给予芬兰广泛的自由,允许它在自己的制度下生活并使用它自己的语言,另一项是企图强制实行芬兰的俄罗斯化;关于芬兰人在芬兰以外地区免除在沙皇军队中服兵役的义务,他们一再为条件问题发生争执。

除了合作社方面,直到十九世纪快要结束时,芬兰才有工人阶级运动。1894年,尼古拉二世即位后,开始了一个新的俄罗斯化运动。大约就在同时,一群芬兰社会党人创办了一份刊物《工人报》,三年以后,在赫尔辛基,从这个刊物产生了一个地方性的工党。第二年(1899年),在阿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主要以工会团体为基础成立了一个工党。它所发表的主要取材于1891年的德

国爱尔福特纲领的宣言立刻就被没收。同年，沙皇政府在一篇所谓的“二月宣言”中实际上废除了芬兰宪法，开始了加紧俄罗斯化的过程。俄国总督波布里科夫被授予独裁权力；俄国政府开始禁止使用芬兰语，并消灭转入地下的民族运动。第二年，青年民族主义者尤金·肖曼杀死俄国总督后自杀，这一行动受到广泛赞扬。此后，俄国在远东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俄罗斯帝国各地发生了几乎推翻沙皇统治的起义。芬兰人利用沙皇政权困难重重的机会，坚决维护他们的民族独立的要求。1905年10月，他们发动了使全国陷于瘫痪的总罢工；这与其说是一次工人运动，不如说除了那些直接依靠沙皇支持的阶级以外，所有阶级都普遍拒绝与俄国政府合作。俄国政府在芬兰人反抗它的权威，成立了实际上是自己的政府与它分庭抗礼以后，退让了，因为它在俄国境内为扑灭革命运动已经疲于奔命了。甚至是四等级的国会也参加了民族起义，要求进行大刀阔斧的宪法改革。1905年11月，在俄国的动乱达到高潮时，沙皇答应芬兰人有充分自由按自己的意愿来管理自己的事务。根据旧制度选出的国会有鉴于民族情绪的激昂，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宪法规定普选权扩大到年满二十四岁的男子和妇女，并以这种普选权为基础建立一院制政府。当这部宪法是否被接受还成问题的时候，芬兰人扬言要进行新的总罢工；1906年6月，沙皇再次退让，答应让新宪法生效。在随即根据比例代表制举行的选举中，以前几乎不成其为一股政治力量的社会党在新国会的200个议席中赢得了80席——其中包括9个妇女，她们与十个属于其他政党的女议员，成为第一批当选为议员的妇女。国会立即着手制定大批非常进步的社会立法，但是几乎没有一项生效。这时，沙皇政府已经占了上风，控制住了革命力量，实行斯托雷平的镇压政策。芬兰国会除了与沙皇政府以外，还与杜马发生了新的斗争；因为后来的几届杜马，就敌视芬兰的民族主义这一点而言，比

沙皇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1909年以及1910年，沙皇颁发敕令，解散芬兰国会，芬兰由杜马不经芬兰人同意而强加的法律统治着。在革命时期已经公开的工人阶级组织遭到了镇压，他们的领袖不是被捕下狱就是被流放。但是，民族抵抗运动始终没有被消灭。1910年，杜马根据帝国立法法案，实际上废除了芬兰国会的立法权，并试图用俄罗斯法律来强行统治。作为对策，芬兰官员集体辞职，从而瓦解了行政机器。1914年战争爆发时，斗争仍在进行中；<sup>707</sup>当俄国政府企图强迫芬兰应征士兵在芬兰以外地区服兵役的时候，斗争更趋激烈。这一企图失败了；芬兰人多亏战局紧张，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包括免受俄国警察的控制，这就使得许多受到威胁的人能在芬兰领土上避难，列宁在第一次革命与第二次革命之间的1917年，就曾经在芬兰避难。克伦斯基的政府曾经企图胁迫芬兰人：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之后，立刻宣布芬兰独立，于是芬兰就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就发生了内战，接着在1918年年初，德国军队随即又占领了芬兰。社会党被取缔：将社会党排除后残留下来的国会废除了在前一年仓促制定的社会立法。后来战争以德国失败告终，德国人被赶出了芬兰。1919年选出的新国会，在总共200个议席中，社会党又得到了80席，并且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但是，在曼纳林将军领导下的右翼所控制的立宪政府统治了一个时期以后，反动的“拉波”运动与左派发生了内战，而由于社会主义者队伍里的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与以合作运动为主要后盾的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了分裂，情况更为复杂。

因此，芬兰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几乎控制着一半国会的强大的民族运动，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令人吃惊地突然出现的。当它的最杰出的领袖J. K. 卡里同意担任沙皇的大臣职务的时候，它立即出现内部危机。社会党立即开除了卡里，爱德华·瓦尔帕斯接替他为领袖，并代表党出席1907年的斯图加特国际代

表大会。不过，合作运动的领袖费诺·唐纳尔(生于 1881 年)不久就成了杰出的人物。在那个时期，工会仍然主要是在地方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只有印刷工人和炼铁工人成立了全国性的工会，而这些工会在极大程度上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影响下采取行动的。

708 1905 年以后，组成了一个仍然同党保持紧密关系的工会中心；但是，在革命失败以后开始的镇压行动使它很难采取有效行动。仍然成为主导力量的是合作运动而不是工会主义；但是，合作运动分裂为二，一方面是实力在农村地区的中立的合作社，另一方面是与社会民主党有密切联系、但并没有正式加入党的城市的进步合作社。

此外，在这样两派之间，也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分歧：一派人出于对俄国的憎恨，希望德国给予协助；另外一派人，希望同俄国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共命运，最初是反对沙皇统治，在 1917 年以后，则反对西方国家打算颠覆苏维埃革命的企图。在 1917 年以前，右派整个说来将希望寄托于德国；但是有一部分左派也是如此，他们希望依靠德国人来对抗在 1905 年革命失败后，重新强迫他们俄罗斯化的企图。芬兰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这些对立的势力一直继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日后妨碍芬兰社会党人取得他们在 1905 年眼看垂手可得的明显的胜利；但是，关于 1917 年以后时期的长期冲突的始末，必须留待本书下一卷再作讨论。

## 第十九章

709

### 意大利

在本卷所涉及的整个时期内，意大利始终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理论对峙的战场，而由于天主教社会运动深受罗马教廷与意大利新国家之间的争执的影响，情况就越加复杂。在这整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梵蒂冈始终禁止教徒参与国家事务：一直到这一时期快終了时，才开始出现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天主教党。这件事产生的影响之一是使天主教大力进行社会和经济行动，诸如这样一些领域——合作事业、工会运动以及互助和慈善事业。天主教徒常常两线作战——一方面反对社会主义，一方面反对国家；有时候，有些比较先进的天主教徒还反对教廷，比如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在多姆·罗慕洛·墨里的全国民主联盟中就是如此。意大利社会主义与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一样，具有强烈的反宗教的传统，这使它甚至在工会和合作事业方面，都排除了与天主教左派合作的可能性。

除了这种宗教方面的牵连以外，意大利南部与北部的条件也存在明显的差别，或者不如说一方面是意大利北部的比较先进的工业中心与另一方面是整个南部之间的差别，意大利的中心部分，包括罗马在内，则介乎两者之间。南部——主要是农业地区，可是在西西里的矿山中，也包括或许是全欧洲受剥削最重的工业区——的骇人听闻的贫困必然使该地区绝对没有条件存在与比较先进的国家差可比拟的稳固的工人或社会主义组织。这里有可能因饥饿而发生骚乱，甚至是叛乱；时常也可能暂时成立农民和工人的

710 广泛联盟(或者叫做 Fasci); 但是这样的运动和组织的无非是过眼烟云, 始终没有同北部城市的比较持久的组织发生组织关系。只有在工农业并存、土地条件很坏的地区, 比如艾米利亚和罗马涅, 城市工人运动才能时常和特别是大庄园中的农业工人建立密切联系; 这种联合骚动由于地主和政府当局沆瀣一气共同进行严厉镇压, 不久就被粉碎, 虽然后来还会卷土重来。

巴枯宁在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工人中间开始了他的运动, 那不勒斯与从事农业的南部有密切接触, 其本身就是人数众多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发源地, 发达的工业很少, 所以自然就成了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中心; 另一方面, 米兰、热那亚和都灵这些城市, 大规模工业的发展为工会活动和更接近于西欧类型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长提供了机会。但是, 甚至在这些城市里, 尤其是在艾米利亚的较小的工业中心, 仍然存在着许多小规模的生产, 这里与仍然存在着贫困和专制——只不过比南部稍为缓和一些——的农村有密切联系。无政府主义除了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以外, 在北部仍然有它的追随者; 但是, 在很大程度上在北部, 和在中部的大城市, 它往往变成某种形式的工团主义; 这种工团主义在工会主义中寻找基础, 并且深受法国的工团主义思想发展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思想 and 政策之所以甚至在北部工业区也有吸引力, 另一个原因是在本卷所涉及的大部分时期内, 选举权受到了限制。虽然选举法一再经过修改, 尤其是 1882 年第一批社会党人当选为议员的时候经过修改, 由于选举法规定选民不得是文盲并必须交纳最低限度的赋税, 仍使特别是南部的大部分工人和农民得不到选举权, 一直到 1912 年吉奥利蒂进行了改革, 选民人数才增加了一倍以上。但由于宪法规定了当选者的财产条件, 进一步限制了工人阶级的代表权; 在 1912 年以前, 议员是没有薪水的。因此早期的社会党议员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在 1900 年



以前没有真正的工人当选为社会党议员；由于议会党团为律师、教授和新闻记者所控制，在党内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中间经常引起怀疑，并且不断使议会党团与议会外面的党的领导机构发生争吵。

的确，意大利社会党最富于知识才能；但是，党内知识分子虽然有许多人为了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流放和监禁，却往往发现自己与他们的追随者的思想感情比较疏远。由于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在许多看法上与资产阶级左派的反教权集团有紧密联系，并且欣然拥护赞成非宗教化和议会制度的资产阶级政府——即使这些政府在农民或工人反对压迫时，或者在产业工人举行罢工或者大规模示威时，对于枪杀他们竟毫无顾忌——，思想感情的距离就更远了。社会党在议会中一再被迫支持一个左派的政府，或者甚至是中间派的政府，以防止它为一个更坏的政府所取代；可是在对于罢工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屠杀和镇压引起了社会党和工会的广大成员的极大愤慨时，又不得不一再放弃这种政策。因此社会党的政策不断发生动摇，以至在这一时期快终了时，党长时期以来不顾内部分歧而维持着的表面团结也崩溃了。

事实上，虽然意大利社会主义的许多领袖在天性上是温和派和改良主义者，它却是在暴力行为频仍、骚乱迭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在南部，地主阶级异常反动，农业工人受到的压制和剥削特别厉害；新兴的金融家和工业家阶级也几乎是同样坚决地维护它的权利，反对工人阶级要求谈判、或者发挥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政治影响的一切权利。农业和工业雇主的强大联盟与农业工人 712 和城市劳工会的联盟对抗；这两个业主集团都毫不犹豫地要求当局在发生动乱时开枪。除了农业方面的不满以外，给消费者加上沉重负担的赋税制度每当年景不好的时候，就引起饥民的骚乱；当局常常以这种盲目的骚乱作为理由来屠杀参加骚乱的人，并镇压社会主义和工会组织。地方劳工会作为城市工会活动的中心，一再

被政府当局封闭；社会党几度遭到法律取缔；农业工人的组织则更是遭到无情的摧残。的确，这些压制从来没有维持多久；历届政府总是时而进行暴力压制，时而又改头换面地承认进行组织的权利，而当政府不论在哪一个方面做得过份时，议会就推翻政府。但是，在政府政策的发生种种摇摆时，甚至在全国的比较先进的地区，也总是发生暴力行动和反暴力行动；而在南部，则压制始终没有真正地放松过。

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社会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以及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在建立一个在第二国际各项计划中举足轻重的强大的政治运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另一方面，由于大规模工业的发展不那么广泛，并由于除了在合作社方面以外，没有能够在农村居民中建立起稳固的组织，意大利工会运动的力量仍然比较薄弱。意大利工会主义一部分由于受到政治性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快终了时，远不是象它以前那样激烈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但是，结果它也不再象以前那样有力量了，因为由于它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派别决裂，战斗性大不如前了。

为了继续本书第二卷所谈内容来研究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必须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工人协会的意大利支部是 1872 年海牙会议快要举行的时候成立的，它拒绝参加海牙会议，它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决定性的影响，在八十年代初期瓦解以前它一直是如此。在北部，与它对立的是在安里科·比格那密（1847—1921 年）和奥斯伐尔多·格诺奇—维亚尼（1837—1917 年）的开明领导下的、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但是这些团体没有取得巨大进展。当巴黎公社失败后就流亡的边诺阿·马隆在米兰住了一个时期之后在大约 1874 年迁移到西西里的巴勒莫来的时候，这些团体的力量得到了加强。马隆在巴勒莫创办了一份在知识方面具有相当影响的刊物《贫民》。后来，他在回到法国以

后,成了他所谓“完整的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宣传者——所谓“完整的社会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学说,其基础是接受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为之争执的各种各样的行动形式,从追求直接的缓和措施和改革,到公开的革命,从使用市政和议会方法到举行总罢工作为无产阶级起义的第一阶段。“完整主义”开始成为意大利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了一种论据,可以据此将各派社会主义者在互相容忍并且承认所有对立的见解都不无道理的基础上,在一个共同组织中联合起来。

1879年,在此之前,还是无政府主义国际工人协会的拥护者的安德里亚·科斯塔(1851—1910年)从法国的监狱中写了一封信出来发表在比格那密的《平民》杂志上,宣布他改变了信仰,认为有必要采取政治行动了;第二年获释以后回到米兰,开始意大利社会党的建党工作。同年,在本尼凡托起义以后在1877年被法律取缔的就要瓦解的国际意大利支部,在瑞士的齐亚索召开了一次社会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意大利的其他无产阶级性质的派别进行了一场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再次取得了胜利。但是几乎就在同时,在米兰创立了一个名为“劳工之子”的、以欧米尼奥·佩斯卡托尔为首的新的运动。“劳工之子”从一般的字面上说来,既不是工会,也不是政治组织,而是兼具两者性质的混合组织。这个运动致力于将各种类型的工人组织起来,将追随者分成行业集团,从而将工业鼓动和政治鼓动结合起来。它们肯定是工人阶级的团体,并且是为更明确的政治组织铺平道路。两年以后,在伦巴迪亚出现了这样的组织,这与1882年的选举权改革有密切关系,这次改革使工人阶级第一次有可能在议会方面进行政治活动。

意大利工人党的直接基础是“劳工之子”和地方工会,并且只有工人阶级的成员才能参加;该党是1882年在米兰成立的,领袖

是排字工人康士坦丁诺·拉查礼(1857—1927年)和手套制造工人朱泽培·克罗齐(1853—1914年)。在1882年的选举中,工人党没有能够选出任何候选人;事实上大多数社会党候选人在竞选时与它毫无关系。科斯塔将活动转移到了艾米利亚的伊莫拉,只有他以一个社会党人身份当选,同时当选的还有以共和民主党人身份竞选的工人安托尼奥·马菲(1845—1912年)。但是,在新运动的推动下,除了在城市里以外,在北部农村地区,“劳工之子”也迅速扩大,1884年时,它们领导了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进行的一次规模相当大的罢工运动。那一年,又有两名社会党议员当选,但是其中之一,前国际主义者卢吉·卡斯特鲁索(1827—1890年)被取消了议员资格。

这时候,意大利政府开始在北非认真推行殖民帝国主义的政策。1879年,意大利政府从一个私人企业手里买下了红海上的阿萨布的煤矿,1882年,当局宣布这个港口及其内地为意大利殖民地。1885年,政府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前往非洲,其使命是征服和殖民;科斯塔作为社会党人的领袖,立刻接受了这个挑战,并致力于组织抵抗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工作。在进行这种鼓动的同时,发生了新的罢工以及大批农民和无地劳动者企图占有和耕种荒废的公地的运动浪潮。政府采取了狂暴的镇压措施,下令解散农村  
715 骚乱的主要中心曼图亚的农村联盟。当局大批逮捕了领袖,在第二年进行审讯时,其中大多数人被释放了。在骚乱最激烈时,工人党在曼图亚举行了代表大会,宣布它完全独立于所有其他政党之外。政府逮捕了它的一些领袖,并以煽动罢工行动和煽起阶级仇恨的罪名将他们交付审讯。结果反而给予运动巨大的推动力。温和派为了与“劳工之子”对立而成立的伦巴迪劳工联合会,参加了工人党;工人党也缓和了它对社会党知识分子的反对,并同他们携起手来反抗压制。在1886年的选举中,社会党人再度选出3名议

员。政府下令解散工人党和“劳工之子”，这些团体的许多领袖——其中有拉查礼、克罗奇和阿尔弗雷德·卡萨蒂（?—1921年）——被判处监禁。不过，“劳工之子”很快就改组了他们的组织，罢工继续蓬勃开展。工人党也重新组成。

这时，在劳工运动外面发生了两件事情，不过这两件事对运动的前途大有影响。非洲的意大利远征军在多加里遭到了惨败，首相德普勒蒂斯死了，接任的是反动得多的克利斯比。接着是一个进行疯狂压制的时期。在改组后的工人党于1887年在帕维亚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在工人与社会党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上进行了激烈辩论，拉查礼力主这两个集团联合起来，而卡萨蒂则表示反对。由于没有能够说服有“阶级觉悟”的集团，拉查礼与声望日益上升的知识分子菲力浦·屠拉梯联合起来成立了米兰社会主义联盟，屠拉梯不久便成了意大利社会主义的领袖人物。第二年，在伊莫拉，科斯塔由于激烈反对非洲战争以及意大利与奥地利和德国缔结三国联盟条约，而受到被监禁的威胁，因而不得不逃往国外。1889年，他和加里波的派的半无政府主义者阿米尔卡尔·齐普利安尼（1844—1918年）以及工人党的朱泽培·克罗齐在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上代表意大利。同年在米兰等地发生了反对战争和三国联盟的大规模示威；在根据新选举法举行的市政选举中，社会党人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在这次胜利之后，在1890年的大选 716 中社会党人又得到5个议席。根据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在五一节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特别是在艾米利亚，爆发了农民骚乱，这一年的年底，在一个叫做“FASCI”的组织的领导下，在西西里，一个新的运动方兴未艾。作为对策，西西里的地主和统治阶级企图将运动的所有著名的成员都列上黑名单。

克利斯比政府在1891年初倒台，接任的是迪·鲁迪尼；但是

麻烦仍然存在。五一节那天，各地纷纷发生骚乱，但遭到了暴力镇压。在米兰，工人党代表大会投票赞成扩大它的基础以吸收脑力劳动者，改名为工党<sup>①</sup>，并且指定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拟定一个纲领。同时，仿照法国职业介绍所的榜样在米兰成立一个地方劳工会；不久在其他北部城市也成立了类似劳工会，以作为各地方工会的联合机构，作为劳工介绍所，和作为工人阶级生活的地方中心。这是将产业组织与政治组织分开的一项措施。这项措施后来又推进了一步：1892年，工党通过了一项排除无政府主义者的纲领，1893年，它采纳社会主义作为它的纲领的基础，并且改名为意大利劳工社会党。在这些年代里，铁路工人在1890年，冶金工人在1891年，都率先在他们的各该产业部门内，企图组成地方团体的全国联合会；但是，意大利工会运动继续主要在地方基础上发展，以地方劳工会作为它的主要集结点。地方劳工会的数目迅速增多，1893年，在安吉奥洛·加布利尼(1869—1937年)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全国联合会，成为产业方面的相当于社会主义工党的组织。同时，FASCI在北部的、中部的以及西西里的农村地区也迅速发展。

717 这一年，1893年，是一个遍地骚乱的年头。在前一年，吉奥利蒂在社会党人得到十个议席的一次大选中，领导一个代表左翼政党的政府上了台，但是这个左翼政府在1893年初倒台，克利斯比卷土重来，再度实行他的镇压政策。在西西里，FASCI在加里波的·博斯科(1867—?)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在市政选举中多次获胜。农民团体曾经多次想占领荒废的公地；在城市里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反对面包和其他食品价格过份高昂。作为对策，政府在西西里宣布戒严，并在第二年初加紧行动：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并根据戒严法将运动领袖逮捕下狱。同时，反对物价高涨的鼓动

---

<sup>①</sup> 原名意大利工人党(Partito Operaio Italiano)，改名为意大利工党(Partito dei Lavoratori Italiani)。

扩大到了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在骚乱最严重的时刻，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桑托·杰罗尼摩·卡塞里奥暗杀了萨迪·卡尔诺总统。这样一来，克利斯比就有了借口效法俾斯麦，实行反社会主义法，下令解散社会党和其他许多工人组织，包括许多地方劳工会在内。许多社会党领袖被捕下狱。但是尽管实行了这种非常法，社会党仍然在 1895 年在巴马举行了代表大会：他们在会上决定在全新的基础上改组党，并且称党为社会党，不再加其他字样。旧的党一直是主要以集体参加的工会和政治团体为基础。大会决定党今后应该完全以个人成员为基础，应该成为一个在全国各地有地方支部的统一的党，并且应该有一个选举产生的有权指导议会党团活动的委员会。

这种结构上的改变旨在使各工会和地方劳工会不致于牵涉到根据反社会主义法对社会党进行的镇压措施中去；但是在部分意义上说这也等于承认：必须让工会独立发展，并且绝不容许由于将无政府主义者从党内驱逐出去，结果就建立了互相敌对的、由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分别控制的工会运动。根据新的安排，工人阶级的社会党人虽然在政治上与无政府主义者分开了，在工会和地方劳工会中却要继续与他们合作。

1895 年年底，非常法有效期届满，曾经为这些法律所取缔的 718 团体又恢复了它们的公开活动。1896 年初，意大利远征军在阿多瓦败北，结果克利斯比倒台，他的继任者迪·鲁迪尼与曼涅里克皇帝缔结了一项条约。在 1895 年的大选中，社会党人得到 12 席，由于选出了一些被放逐的西西里领袖作为大陆选区的议员，北部与南部之间的团结取得了进展。1896 年的社会党代表大会长时期地辩论了合作运动问题，决定给与合作运动支持；它还讨论了普选权问题，党内有一部分人反对普选权，理由是大部分文盲选民也许会支持反动政党。这一年，社会党创办了《前进报》作为全国性的

机关刊物,列奥尼德·比索拉蒂(1857—1919年)任主编。

在阿多瓦战败和克利斯比倒台后,有一个时期比较平静。可是由于保皇党人进行鼓动,这种平静局面遭到破坏。他们要求以德国宪法为榜样修改宪法,由宪法规定给予国王和首相以行政权,并减少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权力。这个运动没有成功,但是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各地的骚乱再次普遍爆发,第二年,骚乱更加严重。事实上,意大利人称1898年为“恐怖年”。这一年的特点是在城市和农村里,都爆发了大罢工和骚乱,并且与军警发生了多次激烈冲突,最后在米兰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对工人使用了大炮。在米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宣布了戒严。社会党以及大多数地方总工会和许多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再度被解散。许多领袖被捕,并被判处重刑——包括屠拉梯在内,他被判处十二年监禁。还有许多社会党和工会领袖逃往国外——主要是逃往瑞士。第二年,政府企图实施变本加厉的镇压性法律,特别是针对着公共集会的权利;但是由于左翼政党的阻挠,这些法律没能够通过。

719 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党被迫与资产阶级左派的政党合作,而在此以前,他们曾经宣布与这些政党完全不发生关系——这种政策在意大利被称做“不妥协政策”,因为它拒绝与非社会主义分子在选举上打任何交道。1899年,左翼集团在市政选举中获得了重大的胜利;在第二年年初,由于采取了同样的策略,结果左翼在大选中又取得了胜利,使社会党议员人数增加到三十三名。其中有两名是工人,包括比埃罗的木雕工人里纳尔多·利戈拉(死于1954年)。以前我们知道,社会党议员完全来自知识分子。右翼政府倒台后,上台的是一个由萨拉科领导的左派与中间派的联合政府。社会党人结束流亡生活回国,改组了他们的组织:地方总工会复活并恢复了他们的全国联合会。但是刚刚取得这些胜利,托斯康的无政府主义者纺织工人盖塔诺·布列齐就暗杀了洪别尔国王。新



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三世在时局非常紧张的时候即位；面对着激昂的公众情绪，他作出了进行改革和给予社会主义运动以自由的广泛诺言。在议会中，社会党人谴责这次谋杀和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经过一场斗争以后，决定同意继续执行与资产阶级左翼的协约，并且拟定了一个要求立即改革的新的最低纲领。政府宣布大赦，赦免除无政府主义者以外的一切重要政治犯。但是，工会与当局几乎立即就发生了新的冲突。大罢工爆发了。一些地方劳工会再次被解散。工人的对策是举行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政府被迫撤换应该负责的地方长官。地方劳工会恢复了，工会普遍成立联合组织的权利实现了。第二年，查纳德里与杰奥利蒂联合组织了一个新政府，明确地结束了在意大利北部实行镇压的政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还在继续奉行这种政策。作为交换条件，社会党人在议会中支持政府，政府正需要他们投票来对付右派的强有力的反对。工会主义在全国性的基础上有了迅速发展，许多行业和工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此外农业工人第一次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全国联合会。罢工频繁，大多数情况没有发生什么暴乱；但是，6月里由于军队在贝拉·费拉里斯向罢工工人的纠察队开枪，再次引起了罢工工人与军警当局的一系列冲突。这使社会党议员处境很困难。他们确信，有必要使查纳德里—杰奥利蒂政府维持下去，他们也认识到，对于罢工工人和农民采取暴力行动一事主要应该由军队和地方长官而不应该由政府负责。但是，随着这种事件一再重演，积极的工会主义者和议会外面的社会党人越来越趋于倔强；他们日益强烈地要求恢复彻底的“不妥协”政策。他们在党组织内部展开了斗争，因而在有些地方，特别是米兰，支持合作政策的人组成了独立的少数派。

这时，雇主为了对1901年的成功的罢工进行报复，多次采取了关厂的手段，这就使工会不能不考虑采取对策来更加紧密地团

结起来,以便进行协调一致的抵抗。在工会运动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派别——工联主义者和地方工会主义者,工联主义者是温和派,希望将各行各业的地方组织建成强大的全国性联合会,另一方面,地方工会主义者则希望当地的各种各样的工人在地方劳工会中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希望主要以这种团结作为运动的基础。米兰工会代表大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决定成立一个常设性的两种团体都能参加的全国抵抗书记处,由安吉奥洛·加布利尼担任书记。实际上,工会已经开始强烈反对支持吉纳德里—杰奥利蒂政府的政策,拥护工团主义的总罢工概念的人在迅速得势。同时,在社会党人于1902年举行的伊莫拉代表大会上,以伊凡诺·波诺米(1873—1951年)为首的温和派得到了绰绰有余的多数,而以恩利柯·费利(1856—1929年)为首的左翼则相形见绌。大会同意议会党团支持政府的行动,并且同意议会党团在使它的行动适应于这个政策时有自主权。在市政选举中,社会党得到了许多议席,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主张将面包业收归市政府经营,以此作为降低面包价格的手段。

但是,1903年,合作政策开始瓦解。《前进报》发起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军国主义运动。农村地区发生了严重骚乱:农业工人联盟瓦解了:由于主要是在南部,当局重又屠杀罢工工人和农民,社会党人撤销了对于政府的支持。这时候,吉纳德里死了,杰奥利蒂出任首相,并且邀请屠拉梯参加新内阁。屠拉梯尊重社会党的意见,拒绝了邀请;在4月里,在波伦亚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对立派别之间的斗争达到了高潮。以议会党团的费里以及声望日益提高的工团主义领袖阿尔图洛·拉布里奥拉(1859—1904年)<sup>①</sup>和安里科·莱昂尼为首的左翼,以微弱多数击败了温和派,

---

<sup>①</sup> 不要与死于1904年的社会党经济学家安托尼奥·拉布里奥拉混淆起来。参看本卷下册第214页。

控制了党的领导机构。支持资产阶级左派的政策肯定已经彻底改变,尽管许多成员不愿意,议会党团也不得不重又采取完全脱离激进政党的政策。社会党左翼与工会中的主要集团联合起来,为争取建立新的工农联盟进行积极宣传。1904年,罢工工人与当局在一些地区发生了激烈冲突,最后在撒丁的伯吉鲁、西西里的卡斯特鲁索以及利古里亚的塞斯特里·波南特发生了一系列的屠杀事件。作为报复,工会决定宣布总罢工,罢工同时在米兰和热那亚爆发,迅速扩大到都灵、波伦亚·曼图亚·威尼斯和其他北部城市,还扩大到罗马和佛罗伦萨。艾米利亚和罗马涅的许多农民和农业工人参加了这个运动——这是全国从未有过的最广泛的罢工运动。

总罢工只进行了几天;但是它肯定结束了杰奥利蒂企图作为他的内阁基础的左翼集团。面对这种情况,他与中间派政党以及右翼的不那么极端的派别结成联盟,作为它的新内阁的基础。<sup>722</sup> 1900年到1904年曾经在社会立法方面产生某些结果的社会改革政策突然结束。在临近年底时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人由于丧失了他们以前的盟友,议员人数从32人减少到28人,幸好没有遭到更大的损失。

虽然在这个时期,工团主义者在工会中间处于上升阶段,他们的政策并非没有受到非难。铁路工人和邮政工人拒绝参加1904年的总罢工,在第二年的工会代表大会上,革命者与改良主义者发生了尖锐的斗争。工联主义者与地方工会主义者好不容易才避免分裂: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声明如果当局再进行屠杀,他们就有权进行总罢工,不过不愿将它的分歧推向极端。这件事情刚过,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意大利的铁路虽然是公有的,在此以前却出租给了一些私营公司。政府现在打算接收铁路的管理,从而将铁路工人变成公务员,而根据现行的法律,这意味着他们被剥

夺了罢工的权利。为了抗议这种剥夺,铁路工人最初采取了“边做工边管理”的阻挠政策,后来由于政府拒绝改变它的态度,于是宣布总罢工,而且要求其他企业的工人给予支持。抵抗书记处,还记得在前一年铁路工会曾拒绝参加总罢工,因此拒绝给予支持;罢工失败了。结果,工团主义者控制了抵抗书记处,但是由于遭到在各个全国性的工业联合会中地位极为牢固的温和派的反对,并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个机构。在此期间,杰奥利蒂下台,在弗蒂斯短期执政后,以索尼诺为首的一个新的右翼政府开始执政。接着发生的是一个短时期的经济方面的激烈冲突,最后发展成为又一次总罢工,罢工范围不如1904年广泛,但是,从都灵扩大到了其他一些城市。同军警又发生了激烈冲突;社会党人由于没能使议会采取行动,辞去了他们的议员职务表示抗议,并重新竞选——大多数人都当选了。索尼诺在1906年5月辞职,杰奥利蒂重又上台。由于发生了这些事件,工会运动内部的冲突达到了严重阶段。由冶金工人联合会动议召集了一次工会团体的全体代表大会,目的是按照法国总工会的榜样,成立一个新的总工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是少数,经过激烈辩论后,他们退出了大会。于是多数派成立了一个意大利总工会,总部设在都灵,控制权主要掌握在社会党温和派手里,他们着手与全国合作联盟和互助会联合会结成同盟,以求彼此维护和互相支持。工团主义者在巴马地方劳工会的年轻的干事阿尔塞斯特·德·安布里斯(1874—1934年)的影响下,在1907年成立了一个对立的抵抗团体委员会,并且企图以一些反对意大利总工会集权政策的地方劳工会和工会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运动。铁路工人由于对意大利总工会领袖仍感不满,参加了这个运动。

在此以前,在意大利总工会成立后不久,社会党内部就发生了新的斗争。在1907年10月于罗马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存在四个

对立的派别——改良主义者、完整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不妥协派。改良主义者的主要力量在议会党团中间，他们赞成奉行一种听任议会党团与其他左翼政党自由缔结选举联盟或议会联盟的政策，并且希望利用他们在议会中的地位来取得改良的劳工和社会立法。完整主义者以恩利柯·弗利和奥迪诺·莫尔加里（1865—1929年）为首，主张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完全可以采取从议会行动到总罢工的各种各样的斗争方法；但是在极左翼的压力下，完整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反对工团主义者。以阿尔图洛·拉布里奥拉为首的工团主义集团虽然仍然留在社会党里，却反对通过议会实现改革的主张，奉行法国工团主义者的“直接行动”理论。最后，在极左翼，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派，它反对<sup>724</sup>与其他政党进行各种形式的妥协，也反对工团主义，并且主张成立一个完全不妥协的、进行中央集权控制的革命政党。辩论的结果是改良主义者和完整主义者联合起来支持完整主义者所提出的一个动议，该动议以绰绰有余的多数通过——它得到 27,000 票，工团主义者只得到 5,000 票，而不妥协派只得到 1,000 票。社会党的新方向是着手与意大利总工会缔结盟约，主要反对工团主义集团和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于 1907 年在罗马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曾经企图恢复他们的影响。

1907 年和 1908 年，由于商业危机，发生了多次经济性的冲突。米兰发生了局部的总罢工。铁路工人尽管具有公务员的地位，也参加了总罢工，他们的领袖有多人被捕。地方劳工会劝告铁路工人不要罢工，引起了很深的反感，使铁路工人工会参加了工团主义集团。1908 年年初，在工团主义者势力很强大的巴马周围地区，爆发了一次农业大罢工。改良主义者支持这次罢工；但是政府占领并且封闭了巴马地方劳工会。罢工工人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罢工失败了。意大利总工会代表大会辩论了这个问题，大会宣

布说，举行总罢工的权力应该从各地方劳工会的手里转移到意大利总工会中央委员会本身。因此，意大利总工会中央委员会试图将一些全国性的工业联合会联合起来，由它统一领导，以反对地方工会主义者的政策。同年，即1908年，在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与工团主义派发生了明显的分裂，工团主义派被驱逐出党。除去工团主义者以后，党的左翼削弱了。完整主义者的领袖弗利同以屠拉梯为首的改良主义者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集中”派，它赶走了不妥协派和其余的完整主义者。社会党肯定地向右转了，它丧失了相当多的旧日的支持者。但是，在选举中，它能够从资产阶级左翼分子得到支持，从而补偿这些损失。在左翼政党得到胜利的1910年的大选中，社会党得到42席——增加了16席。

面对着这种向右转的情况，工团主义者与意大利总工会就重新联合问题开始了谈判。但是，为统一而进行的谈判失败了。尽管如此，当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弗朗西斯科·弗雷被处决的消息传到意大利时，全国各地，包括南部的许多地区在内，爆发了自发性的总罢工。这一年，1909年，天主教徒成立了天主教工会总书记处，在此以前，尽管罗皇教皇反对，他们一直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天主教民主运动的领袖多姆·罗慕洛·墨里（生于1870年）在社会党的支持下当选为议员，因而被教皇开除教籍，但是他的运动在继续扩大。

1910年年初，社会党人的元老安德里亚·科斯塔逝世。科斯塔最初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改信马克思主义，他是社会党的主要创始者，并且在党内是左派的杰出领袖。但是，在他最后担任副议长的议会里，他逐渐向右转了。在1908年的党代表大会上，他担任主席，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右翼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他逝世后，菲力浦·屠拉梯和弗利一道成了党的杰出领袖，弗利原来是左派，可是此时正在迅速地转变为极右派。杰奥利蒂在1909年临近

年底时下台，此后是两届以索尼诺和卢萨蒂为首的短命内阁。1911年3月，杰奥利蒂重又执政，再度邀请一个社会党人加入内阁，这次邀请的是列奥尼德·比索拉蒂，这时他是党内的极右翼，但是党没有准许他接受这个职务。

不过，社会党人是支持杰奥利蒂政府的。1910年的党代表大会同意给予议会党团以充分自由来制定它自己的政策，同时授权地方支部相机缔结选举联盟。由克罗狄奥·特雷维斯（1869—1933年）主编的《前进报》肯定成了右翼的机关报；当杰奥利蒂宣布实行旨在将选民人数从不到350万人增加到将近900万人的选举改革法的时候，似乎合作的前景十分美妙。再者，由于都灵各汽车工厂的大罢工遭到失败，工团主义的影响也受到了挫折。但是，当政府宣布打算占领利比亚和对土耳其宣战时局势急转直下。社会党的大部分强烈反对利比亚战争，但是以列奥尼德·比索拉蒂、埃文诺·波诺米和安吉奥洛·加布利尼为首的一个集团却根据民族主义的理由，支持这场战争。1911年的社会党代表大会虽然授权议会党团暂时支持政府继续执政，却宣布不准保证给予政府以经常的支持。分裂暂时避免了；但是第二年，在本尼托·墨索里尼的领导下，对议会党团进行了攻击，代表大会驱逐了比索拉蒂以及其他支持意大利对非洲用兵的人。议会党团的自主权被取消了：各地党支部被禁止缔结选举联盟；整个党又回到了以前的“不妥协”立场。同时，特雷维斯被解除了《前进报》的编辑职务，派来接替他的是左派的新人本尼托·墨索里尼。被驱逐出党的社会党人在比索拉蒂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改良主义社会党。

工团主义者在利比亚战争问题上也发生了纠纷，他们中间有一派人根据民族主义的理由，表示支持战争。1912年，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央工会组织——意大利工团联盟；但是，铁路工人虽然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的领导下，却拒绝加入，因此以阿尔图

洛·拉布里奥拉为首的新工会并没有很大的实力。

杰奥利蒂的选举改革在 1912 年成为法律；在第二年根据这一法律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左翼政党取得了胜利，社会党人，尽管右翼发生的分裂曾使他们的议席减少到 25 席，这次却得到了 52 席。改良主义社会党得到 18 席；还有七八名主要来自半工团主义左翼的独立派。尽管成立了反对社会党人的强大的天主教集团，社会党人仍然取得了这些胜利。在这期间，利比亚战争结束，巴尔干战争开始了。社会党进行着他们的反军国主义运动，墨索里尼作为它的领袖，地位日趋重要。在巴尔干战争中，社会党主张奉行严格的 727 中立政策；1914 年，在听到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和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后，党仍奉行同样的方针。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那些年代里，意大利社会主义由于发生了一系列的新的内部纠纷，已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工团主义者虽然被赶出了党和被赶出了除铁路工人工会以外的各主要工会，却绝没有丧失他们的追随者。工团主义者在 1913 年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企图组成一个有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荷兰人，以及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参加的工团主义国际，可是这一行动并没有成功。利比亚战争带来了经济危机；1913 年和 1914 年，罢工工人与军队在许多地区发生了新的冲突。1913 年，工人在里米尼遭到屠杀后，举行了广泛的总罢工；1914 年，在右翼的萨朗德拉继杰奥利蒂为首相后，发生了更为严重的骚乱。为了抗议对于工人示威的镇压，在无政府主义影响很强大的安科纳宣布了总罢工，后来总罢工扩大到了马尔克和罗马涅以及许多大城市。在受到主要影响的农业地区，以埃里科·马拉特斯塔<sup>①</sup>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力量很强大，足以使运动具有一种革命性质。在城市里，工人组织据守在大街上反抗军警的攻击；经过激烈战斗之后，当局才占了上风。

<sup>①</sup> 关于马拉特斯塔，参看本书第二卷第 354 页以下。



意大利总工会不承认罢工，可是并没有防止得了。

这次血腥事件刚结束，萨拉热窝谋杀案就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积极参加罢工运动的墨索里尼不同意社会党的中立政策，主张意大利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工团主义联盟分裂了。以阿尔塞斯特·德·安布利斯为首的一派人步墨索里尼的后尘，退出了党，组成了一个新的意大利劳工联盟——这是后来的法西斯联盟的前身。但是，社会党的大部分继续赞成中立。因此墨索里尼只好离开《前进报》，创办他的新机关报《意大利人民报》来支持他的干涉政策。

本章也许过份不厌其详地叙述了意大利事件，这是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说明意大利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特征，也是因为意大利这个国家最容易受到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起作用的互相冲突的力量的影响。在1914年以前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历史中，不论是在政治领导还是理论家方面，都没有出现杰出的人物。第二流的重要理论家倒是有一些，比如安托尼奥·拉布里奥拉和弗朗西斯科·萨维里奥·墨林诺；而恩利柯·费利和菲力浦·屠拉梯则既是积极的议会政治家，也是理论家。马拉特斯塔是一个具有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领袖。一部分由于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无产阶级的教育水平非常低，在社会党的领袖之中知识分子特别多，这种情况导致了很多的学术性的争论。但是意大利的运动并没有能产生真正本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它受到外国很大影响——一方面在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方面受到法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德国所控制的第二国际的影响，政治领袖们非常关心第二国际要求团结和要求党与工会之间应该有阶级谅解的号召。

意大利社会主义所以没有能逐渐形成它自己的统一观点，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性质，因为它的北部与南部，工业地区与农村

地区，旧地区与新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内部差别。在工业方面，在象米兰和都灵这样的大城市除了有使用现代技术的大工厂以外，还同时普遍存在着小规模生产，所以许多地方劳工会所代表的与其说是工厂工人不如说是手艺人集团。这些小规模的行业在意大利统一以后的时期里是这样两种人进行斗争的主要战场：一种人是主张以共和统一为基础实现民主民族主义的马志尼主义者，另一种人是团结在第一国际周围的阶级斗争的拥护者。后来，当工会大多数脱离了马志尼的影响，斗争仍继续进行，因为小规模行业分裂成为社会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再后来更分裂成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马拉特斯塔派的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

<sup>729</sup> 这些集团尽管内部有斗争，却倾向于赞成在地方劳工会里以当地全面联合为基础来发展工会主义，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企业中存在工人希望为每个工业或者行业成立全国性的联合会的趋势。然而，全国性联合会虽然往往意味着比较温和并企图从中央来控制罢工行动，却并不是永远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在国家接管了铁路管理工作以后，被剥夺了罢工权利的铁路工人竟接受了工团主义的领导，组成了无政府主义影响最大的工会集团。

地方劳工会作为各种各样的工人都可以参加的地方性联合会与全国性工业联合会比较起来，与农村的接触要密切得多——由于许多城市都相当小，并且是周围农村地区的中心，这种接触就更为密切。因此人们常常看到地方劳工会在支持、或者甚至在鼓动农村工人中间的运动。不过，城市的运动与农村的运动并没有真正合流，因为农村运动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在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以及整个西西里和南部，许多大地主雇佣和压迫大批无地劳动者和大批对分佃农，这些对分佃农耕种小块土地，与地主分享产品，不过地主享有其中的大部分。在波河流域，无地劳动者人数很多，作为工资劳动者，他们和南部的农民比较起来，更容易与城

市无产阶级采取共同行动；但是由于遭到警察镇压，这些劳动者始终不能成立稳固的组织，在农村地区，这种镇压始终比在城市里严厉而凶恶。在南部地区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在所有地区，农业工人都是文盲，因此，在杰奥利蒂于1912年进行选举改革使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有选举权以前，他们是没有投票权的。他们看不懂宣传文字，很难找到能读或能写的领袖——由于政府严厉地对待援助他们的中产阶级社会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情况更是如此。两种饥饿最能鼓动他们一再进行叛乱——一种是渴望吃面包的饥饿，另一种是渴望获得土地的饥饿。在歉收的年头，扶摇直上的粮食价格驱使他们起而反对他们的主人。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常常与那不勒斯和罗马这样的大城市里的饥民联合在一起，在这些城市里，有大批失业的、或者勉强有工作的在饥饿线上挣扎着的流氓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渴望获得土地的饥饿则是农村问题而不是城市问题。渴望获得土地的人目标大多数在于占有属于公家的、或有时属于在外封建地主的荒废的土地——至于企图占领大牧场主和大农场主已经使用的土地的情况，却要少得多。但是，不论其目的如何，也不论当权的政府政治面貌如何，农村劳动者的这种起义，肯定会遭到极为残暴的镇压。掌握警察权力的地方当局即使在左翼政党在议会中居于多数的时候，也始终是反动的。

由于宗教问题，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活动益形混乱。在庇护十世于1903年即位为教皇之前，根据罗马教廷《不予便利》的通谕，天主教徒被正式禁止承认意大利国家或者参与它的事务。教皇声称享有世俗权力，以此为基础的这道禁令事实上并没有能够防止许多天主教徒投票；但是，它却使许多天主教徒对政治不敢问津，并且有效地阻止了一切天主教党在意大利的发展。新教皇虽然并没有放弃他对于世俗权力的要求，却不再认为这是抵制国家的理由，而且与杰奥利蒂达成谅解，建立了一种互相容忍的制度，天主

教徒虽然还是不得组织政党,却不再被禁止投票,甚至还可以作为无党无派人士参加竞选,或者参加其他政党——主要是右翼政党的事务。意大利左翼,事实上还有右翼的主要部分,都反对教皇对世俗权力的要求,并且支持在政治问题上“非宗教化”原则。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天主教徒越来越难于对政治保持超然态度。比较保守的人希望将信徒联合起来反对社会党,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出现了一个民主的天主教运动,它支持农民对地主和政府当局进行斗争。教廷断然地支持比较反动的天主教集团,并且千方百计地压制支持农民的反对社会压迫的斗争的天主教左派。教皇在1906年的通谕中严厉谴责多姆·罗慕洛·墨里的全国民主联盟;除了墨里本人以外,那些一直支持这个联盟的教士们慑于通谕的威胁退出了运动。不过,1906年的联盟代表大会决定不顾教皇的反对,坚持下去,而且墨里无视教皇的谴责,继续领导运动。1907年,教皇又发布了一道进行谴责的通谕“主的牧人”;墨里被停止了宗教职务(不许执行宗教仪式)。如我们所见,由于他继续政治活动,并且在1909年当选为议员,他最后被开除出教会。

激进天主教运动的这种发展将罗马教廷进一步拉进了政治的反动方面。1910年,墨里的追随者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奉行一个进步的社会纲领,包括废除地主制度和工资制度,并且决定从他们的组织名称上去掉“基督教”这个字样,理由是他们的运动主要是政治性质的,不应该有排外性的、表白宗教信仰的号召。天主教工会运动,尤其是在纺织工人中间,继续发展,并且在那些追随墨里与那些希望保持它的宗教信仰性质的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分歧。反对墨里的天主教集团组成了一个反社会党集团,它与非宗教性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在1913年根据新选举法举行的大选中,支持杰奥利蒂;但是,他们仍然不愿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以唐·卢吉·斯图尔佐为首的天主教人民党

直到1918年战争改变了整个局势的时候才出现。从1905年到1914年，罗马教廷成了反动政党的盟友，反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不过势必遭到了多姆·墨里的追随者们相当强烈的反对，这些人拥护这样一种民主基督教义：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主张农民拥有土地和小规模财产，反对大地主以及工业和金融巨头。斯图尔佐是一个西西里的神甫，1914年，他作为“天主教行动”派的组织者来到罗马，接管和改组了墨里所发起的运动，并且在环境改变以后，争取到了梵蒂冈对于一个左翼天主教党的相当勉强的支持。在官方看来，这个党至少有这样一个长处：它可以使一大部分信仰天主教的工人阶级不为社会主义所引诱。

社会党在它的整个事业中，则由于不得不代表全国不同地区处于差别悬殊的发展阶段的工人阶级说话，由于在它的领袖中间，知识分子过多，受到了很大危害。它始终陷于痛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希望维护“世俗”国家来反对罗马教廷和以德国为蓝本的独裁政治，另一方面又敌视资产阶级左派。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同，它所面对的不是在像俾斯麦这样的一个人的铁血统治下的强大的国家机器：相反地它不得不使自己适应由许多集团组成的一个议会的摇摆，在这个议会中，均势经常在左翼、右翼和中间派之间变来变去，因而当权政府的组成时常取决于社会党议员的投票，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通过支持不那么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和领袖，时常有可能缓和工人与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力量之间的激烈的社会冲突，不过却永远不能防止这种冲突；有时候还能有机会争取到有价值的社会立法。因此，大多数社会党议员时常赞成在议会和选举中与资产阶级激进派达成某种谅解，在议会中是为了使右翼政府上不了台或者击败执政的右翼政府，在选举中是为了不仅使自己当选，而且也是为了取得某种左翼的多数。与此不同的是，他们在农村的支持者，由于反对警察镇压和工人阶级组织本身的分裂，

经常被迫极端仇视政府,即使在人们认为政府支持左派,反对更极端的反动集团的时候也是如此。社会党还因为另一个原因而更加进退维谷。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高度发展的工业地区凤毛麟角,就其对于生产力的使用和了解来说,人口又过于稠密,而且它的大部分地区又极为贫困——在这样一个国家,对于难以容忍的生活条件的反抗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要采取自发性的反饥饿运动的形式,而这种反饥饿运动就比较容易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利用,而不那么容易被导入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轨道。

当人们看到实现全国统一并不能保证他们不受压迫的时候,马志尼派的影响趋于衰落了,随着这种衰落,意大利社会主义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首先以无政府主义的形式出现。它追随巴枯宁与其说是因为受到了巴枯宁的理論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因为它的自然的和自发的行动方式与巴枯宁的学说不谋而合。在少数北部城市,例如米兰和都灵,在大规模的工业得到充分发展以前,以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为基本队伍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不可能有任何稳固基础;即使在这种工业革命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时候,社会党的有效发展也有一个时期由于工人阶级领袖怀疑社会党知识分子有意将他们看做只不过是政治棋局中的小卒而受到阻碍。从长远观点看来,在大工业城市中,这种怀疑部分消失了,而且在北部的比较先进的工业中,工会实际上也同社会党知识分子采取了共同行动。但是甚至在米兰、热那亚和都灵这样的大城市,也始终没有能完全排除这种怀疑;而在工业仍然非常落后的全国大部分地区,在本章所涉及的整个时期内,这种怀疑一直很强烈。

因此,工团主义运动就大有发展余地,这个运动大部分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但是将这种立场与由地方劳工会团结在一起的、高度地方化的工会主义联系了起来;这个运动认为总罢工不是“社会神话”,而几乎是抗议政府当局的镇压措施时经常使用的方

法。在意大利，总罢工远不是一个乌托邦概念，需要通过不断的鼓动，来慢慢地使工人接受它，它是自发地从工人的生活和备受压迫的环境中产生的。总罢工的理论是在有这种事实之后很久才出现的。<sup>734</sup>一连串的事件固而复始，不断重复发生。一开始时不是在某个行业或工厂里举行局部罢工，就是为抗议面包价格高昂举行示威，再不然就是无地劳动者或者无地农民在某个村落或农村地区发起了一个运动。第二阶段是示威者或者罢工纠察队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或者农民被从他们占领的土地上赶走。在这一阶段，时常有开枪打死人的事情，几乎总是有人受重伤，有许多人被逮捕。第三阶段往往是群众示威，除了最初参加示威的工人以外，其他职业的工人也卷进去了，并且时常使骚乱扩大到更广泛的地区——比如说从农村蔓延到城市，或者从城市蔓延到周围地区。然后与警察发生更多的冲突，当局往往调来军队加强警察力量，逮捕和开枪打死更多的人。在这个阶段，如果地方性的总罢工还没有自发地爆发，地方劳工会一般就号召全体工人为表示集体抗议而举行罢工，有时候只罢工一天，有时时间长一些。此后又发生进一步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大街上的激烈战斗。以一个城市为中心举行的总罢工往往引起其他地方类似的罢工，这种罢工一部分是同情最初举行罢工的工人，但是往往在本地也是民怨沸腾，所以工人要走上大街。这些罢工运动很少能维持长久：罢工工人的饥饿和当局镇压的残暴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可是，如果罢工当真持续下去，便会引起群众深切的同情，而在罢工结束时，便会留下仇恨。在法国，许多工团主义者以及许多类型的社会革命者曾经十分热烈地提出总罢工学说，但是在法国却没有象意大利这样的不断发生总罢工的实际经验，总罢工是意大利这样一个社会里的激烈的阶级情绪的表现，在这个社会里，不存在象1789年革命以后法国农民那样的巨大的稳定力量。

必须经常记住,一方面在法国和德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大部分工人和农民都有选举权,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在1912年以前,投票权一直是一部分人的特权,大多数农民和劳动者以及城市里的流氓无产阶级是文盲,没政治权利。在其他国家,比如在奥地利和比利时,也存在着大体上类似的情况,并且如我们所见,这些国家都用总罢工作为手段来争取实现普选权的要求。但是,意大利的总罢工没有被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它们也不是像奥地利和比利时的政治罢工那样,是社会党与工会共同组织的。意大利的总罢工基本上是远比那些国家所曾经历过的要残酷的镇压所引起的地方性起义。此外,意大利的总罢工所以没有被利用来作为争取实现选举权改革的武器还另有特别原因。显而易见,普选权在意大利社会党人的要求中绝不占重要地位,他们认为普选权孕育着使它(特别是在南部和中部地区)被大批不识字的、没有知识的选民淹没的危险;当然,永远是幕后的一支强大力量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希望改革国家,而是希望把国家彻底消灭。在这方面,意大利的情况倒是与俄国的情况,而不是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情况更相似。如果意大利北部与全国其余地区是隔离的,那倒可能形成一个社会党与工会的联盟,即使不是按照德国的模型,至少也是按照奥地利或比利时的模型。即便是按照现有情况,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事实上也出现了这样一个联盟;不过,它的势力范围只及于国内一小部分地区,即意大利南部,或西西里,或甚至是撒丁,它不可能有多大意义。意大利社会党甚至在它的议会代表已经不再是清一色的中产阶级以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知识分子领导的党,与广大的城市工人没有密切联系,与农村地区的工人联系甚至更少。有些知识分子,比如在西西里,曾经积极努力,力图与受剥削最厉害、最落后的那些人建立这种联系,但是在极大程度上说来,在农村地区以及在南部的十分贫困的城市里,从巴勒莫到那



不勒斯，彼此之间的鸿沟还是很深的。甚至在知识分子与工人的接触要密切得多的北部城市要打破一个主要由律师、新闻记者和教授代表的党与工人运动之间的隔阂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工人运 736  
动认为自己在国家中没有份，它的成员不断地来自灾难深重的农村地区，那里普遍存在骇人听闻的贫困、无知和压迫。

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可能象德国那样，形成一个特别关心动员有选举权的工人阶级，通过选举手段来夺取政权的社会民主党。也不可能象 1905 年以前的法国那样，出现许许多多的社会主义政党，每一个党都各有相当多的普通工人支持，他们热烈辩论他们的各自对立的政策以及产生这些政策的理论。意大利社会党在 1914 年以前，差不多一直是统一的，这并不是因为它的成员们彼此之间不象法国人那样意见不一致，而是因它的基础远为狭隘，支持它的只是有知识的工人阶级。从积极拥护它的无产阶级的角度来看，它没有足够的基础使它可以分裂而不招致灾难；它之所以仍然团结一致是由于它的领袖一致认为，如果要使自己有希望取得胜利，就必须进行斗争来一方面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反对教会和反动派。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团结不可能使它避免成为对立派别的战场；因为任何一派都不可能完全征服其余的派别，以致它的理论能为整个的党所彻底接受。

所以，难怪这样一个运动所产生的是一系列单独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而不是任何自成体系的社会主义思想。意大利社会主义出版了许多知识和文学水平均臻上乘的报章杂志：从尼科洛·洛·萨维奥于 1865 年创办的《无产者》和安里科·比格那密于 1868 年创办的《平民报》，到边诺阿·马隆于 1874 年在西西里创办的《贫困报》和安德利亚·科斯塔在 1880 年创办的《社会主义国际杂志》，此外还有最重要的《心和评论》，这是菲力浦·屠拉梯与安娜·库里齐奥夫在 1891 年接办的，在以后的几年，该刊发展成为《社会

评论》。《前进报》也是 1896 年创办的，由列奥尼德·比索拉蒂主编，在社会党的发展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该报主编一职是各对立派别竞相逐鹿的重要职位，随着各派之间均势的变化，人选也随之更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爆发的关键性的年代里，墨索里尼成功地担任了这一职务。

737 这些报章杂志提出并且讨论过许多社会主义理论；但其中大多数都涉及外国输入的而不是本国的理论。意大利人极有兴趣地注视着第二国际的情况，德国的修正主义的争论和法国的米勒兰事件。除了这些报章杂志以外，他们还把相当多的外国的社会主义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以及法国工团主义者的著作翻译成意大利文。此外还翻译许多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当然还有本国的无政府主义著作，从巴枯宁产生影响的时代的作品，到埃里科·马拉特斯塔的著作，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在意大利的社会主义作家中间，在国外最负盛名的是历史哲学家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1904 年），他从 1891 年开始在罗马大学讲授唯物史观，是参加 1893 年在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的意大利代表之一。拉布里奥拉在 1895 年和 1896 年出版了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面的四卷著作的头两卷，这些著作被翻译成多种外文，成了第二流的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不过，他在意大利的影响的基础主要是他的讲学，因为他的讲学涉及的范围要比他出版的著作广泛得多。他最初是黑格尔的信徒，但后来改变了信仰，接受了大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不过他与马克思不同，他在解释历史发展时，主要强调的是人类自己的创造作用，而否认人类的历史按照预定的道路发展，也断然否认前进是必然的。拉布里奥拉对历史的解释象马克思一样，基本上是经济的；在他看来，历史是人类的劳动力的发展，也是依存于人类劳动力的并从人类劳动力中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发展。他说，劳动

是“在行动中的知识”，一切理论都是这种控制事物的实际知识的发展和系统化：历史是“人在创造自己”并发展以人对于他的实际经验的反应作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因此，人以他所做的工作为基础，创造社会，并且随着他们与生产过程的关系的变化，不断重新创造和发展社会。他们所创造的制度成为对他们起作用的力量，所以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人类所创造的环境的产物；但是，他 738 也不断对这种环境起作用，所以在一个因与果不断互相起作用的过程中，他既是创造者，也是产物。他的反应决不是预先确定的：他能后退，也能前进，也可能不能善于利用他可以利用的机会。前进的必要条件是实事求是地认识人类社会所面对的种种实际情况提供的可能性。象马克思一样，拉布里奥拉轻视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与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不相容的。我们不能对于将来看得很远，也不能依靠对于“善”的抽象概念来引导我们做有益的事情。我们必须在机会来到时抓住机会，并且将我们对于将来的展望限制在我们在过去和现在所能看到的、认为是我们所能实际利用的连续的趋势上。在这个基础上，拉布里奥拉接受了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并且认为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来对实际历史趋势进行解释是有道理的。同样，他还认为生产资料的逐步社会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明显趋势，并且认为随着社会化，将产生一个趋向于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运动，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人对人的统治将让位于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道为基础的没有阶级的社会。

有些人可能认为，关于拉布里奥拉观点的这种叙述夸大了他与马克思的分歧，因为他主要是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阐释者，而不是一个批判者。在拉布里奥拉看来，创造自己历史的“人”——也可能创造得并不好——不是个人，而是群众，他们都受着关于实际生活条件的共同经验的限制。对于“大人物”创造历史的学说，责难最苛刻的莫过于这位作家了。对于拉布里奥拉，就象对于马克思

一样,历史的创造力是阶级:首先是由于《共产党宣言》明确地阐明了这一概念,他才认为《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具有极端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他还强调指出这样一点:马克思不过是简单地说明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条件,而且必然会表现在从生活经验产生的思想中。拉布里奥拉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必然是并存的产物,只有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才可以对它们有所了解。他的理论与马克思完全一样,以阶级斗争的概念为基础,指望阶级而不是指望个人,来找到通向一个新的没有阶级的完整社会的道路。此外,他还完全同意马克思的意见,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的机构,而指望它消失。事实上,尽管他否认前进的必然性,可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往往好象认为以社会所有制和集体管理为基础的没有阶级的社会是肯定要出现的,只不过认为无法预测它究竟会采取什么形式而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看来他往往好象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总趋势是一致的。他与马克思一样相信“历史的必然性”。他写道:“今天就象过去以及今后所有的时候一样,要在理论上彻底理解社会主义,就必须了解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必须认识到它将以什么方式诞生。”但是,他继续将这种关于必然性的概念与人类创造作用的观点结合起来,这种观点即使不是和马克思的观点根本不同,其表达的方式无论如何也是两样的,它似乎认为人的行动不是对于人起作用的那些无情的力量所造成的必然后果,而是这些力量与人的创造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拉布里奥拉的著作大大地影响了索列尔,实际上也影响了整个知识分子的工团主义思想。比起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来,他对于历史的解释好象给予人的创造作用以更重要的地位,而受到那些厌恶《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马克思学说的显然是僵硬的决定论的人的欢迎。他的解释对于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的不十分僵硬的



退出了党。1897年以后，他是屠拉梯改良主义的主要反对者的领袖；但是在工团主义作为一支力量于党内兴起与他抗衡的情况下，他在1908年与屠拉梯联合起来击败了左翼，结果莫尔加里成了完整主义集团的领袖。在晚年，他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

菲力浦·屠拉梯（1857—1932年）虽然也是意大利社会党知识分子中的主要人物，却称不上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他与他的妻子、俄国虚无主义的逃亡者安娜·库里齐奥夫（1857—1925年）共同创办的《社会评论》，在一段非常长的时期内，是极其认真地讨论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屠拉梯本人是一个高明的作家。但是他的言论却没有什么是了不起。他相信革命的策略已经过时，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是通过目的在于改善社会条件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议会行动。他赞成效法西方的榜样逐步建立强大的工会和合作社，并且赞成它们与社会党结成紧密的联盟。鉴于意大利的落后状态，他的渐进主义的政治行动的概念必然使他成了鼓吹在凡属有希望在资产阶级政党帮助下制定有价值的社会法律的地方方便与它们合作的人；在社会党内，他不断进行斗争，反对要求党不与其他政党发生任何牵连的不妥协派，同时也反对对于工会主义的看法与他自己的看法完全不同的工团主义者。在第二国际内，由于他主张与资产阶级左派采取联合行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控制的大部分社会主义舆论形成了对立。他总是站在温和的方面，因此在党内往往不受欢迎；但是他是一个坚定而忠实的进化论的社会党人，而且一生始终是这样。他反对在非洲进行的战争，同支持这场战争的比索拉蒂集团有尖锐的分歧。对于巴尔干战争，他主张严守中立；当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他采取同样的态度，同时主张中立国家组成集团，进行积极的干涉，以迫使交战国媾和。当法西斯出现的时候，他表示坚决反对，他留在意大利一直到1926年，这一年他逃到科西嘉，又从那里前往巴黎，六年以

后在巴黎去世。

在无政府主义方面，主要的意大利思想家是埃里科·马拉特斯塔(本书第二卷曾经简短地讨论过他的见解)，还有索列尔所推崇的弗朗西斯科·墨林诺。墨林诺也是一个企图得到准许参加1889年在巴黎举行的盖得派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的代表资格没有得到承认，因而被驱逐出了大会。

墨林诺最著名的著作《拥护和反对社会主义》于1897年出版，<sup>742</sup>第二年出版了《集体的乌托邦》。索列尔非常推崇墨林诺，他的理论是一种极端反对议会主义而主要强调自发的直接行动的工团社会主义。马拉特斯塔也曾企图取得社会党国际代表的资格，但是同样遭到了拒绝。他确实是最不妥协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在武装暴动的成功希望极其渺茫的时候，他也在最坚决地企图煽起武装叛乱。他的社会哲学与巴枯宁的非常接近：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性质的，而不是工业主义性质的，但是非常强调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反抗行动，以作为使革命精神保持活跃的手段。

在工团主义作家中，阿尔图洛·拉布里奥拉最重要。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改革和社会革命》(1904年)，以后又出版了一部论述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的著作(1908年)。他所著的涉及从1899年到1909年这段时期的《十年的历史》(1910年)，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资料，他的《当代社会主义》(1910年)是对他的见解的最出色的综合性阐释。他还写了一本文笔犀利的《社会主义舆论和的黎波里战争》(1913年)，并且写了一些关于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叙述性的文章，刊登在拉加德勒主编的《社会主义运动》上。他与法国的拉加德勒集团有密切关系。他主张斐南·佩洛蒂埃所赞成的那种工会主义，可是并不是一个彻底反对政治行动的人，虽然他非常反对象屠拉梯这样的人所代表的那种议会社会主义。

有一个时期，伟大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贝奈戴托·克罗齐（1866- -1952年）对马克思主义深感兴趣；他与索列尔和拉加德勒以及《社会主义运动》也有密切接触。1907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索列尔的著名的文章，作为《论暴力》一书的意大利文译本的序言。克罗齐的著名的研究著作《历史唯物论和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1900年）被译成了法文和英文，法文译本有索列尔写的序。当然，克罗齐的历史思想的宗师不是马克思，而是弗朗西斯科·德·桑克蒂斯，再往前追溯则是维科。但是他在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学说时，对于这种学说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它企图形成一种科学概念，是深为同情的。他的影响与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影响一起使大部分意大利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了人道主义的色彩。

一个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却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很大影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是阿基尔·洛里亚（1857—1943年），他所著的《资本主义财产的分析》（1889年）对社会主义大有裨益。洛里亚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通过收取租金对生产者进行剥削，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不过他的补救办法是分散财产和废除租金，而不是社会化；虽然他热烈赞扬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却反对他们作出的结论。



### 西班牙

在第二国际存在的整个期间，以帕布罗·伊格勒西阿斯为首的西班牙社会党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景象：它居然是在极为无法无天和暴乱的环境中进行活动的一个极为稳健的合乎宪法的政党。与它有密切关系的是一个工会运动——全国总工会，大体上说来，这一运动与社会党同样地稳健，并且在情况容许的时候尽量采取集体谈判的和平方法。但是全国总工会的会员人数非常有限：1910年，它的会员总共只有42,000人，它的影响也只限于某些特别的地区——主要是卡斯提耳、毕尔巴鄂和阿斯土里亚斯等地。与它并肩存在的是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对立的工会运动，其中心在巴塞罗那，并且与昂达卢西亚的始终是革命性的农业运动有重要的联系。这个对立的工会运动接连更换过好几个名字：直到1911年，才正式成立为全国劳工联盟，但是在此以前，它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从来也不可能说明它究竟比全国总工会大多少，因为它的会员的统计数字毫无真正的意义。我们所能说的只不过是：它能够非常迅速地发展，也能够非常迅速地衰落，在任何时候，它的影响都远远超出那些实际缴纳会费的人。其实，它几乎没有任何经费。它不支付福利金，也不雇用领薪水的工作人员，并且依靠少到不能再少的正式组织来进行它的工作。它的领导阶层中始终是无政府主义者占优势；而形成它的政策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作为一个集团采取行动的。但是并不存在有名称的或者公开组织起来的无政府主义的中央组织：著名的伊比里亚无政府主义联

745 合会一直到 1927 年才正式成立。在此之前,无政府主义者绝大部分是在秘密的小团体中组织起来的,他们依靠遍布各地的报章杂志以及职业革命者的完全非正式的地下组织联合在一起,这些报章杂志不断地消失和重新出现,而且在许多情形下是秘密发行的,而这些革命者则用他们的毅力和决心来补偿他们有意识地不建立系统组织的缺陷。

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的后期——也就是说在 1914 年以前的十年内,以后来组成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会为中心的第二个运动,越来越受到法国的影响。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队伍的内部,出现了一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他们力图强调有必要积极参加有组织的工会运动,以便在工人中间逐步争取持续不断的群众支持,而不赞成这样一种政策:依靠人数不多的革命中坚来领导每次自发性的工人或农民骚动。两种思想流派的主要争执在于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内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参加工会的日常工作,应该准备在代表工人进行日常斗争时做出必要的妥协;另一方面,“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十分愿意投身于工人或农民的斗争,却认为在这样做时其直接目的应该永远是赋予这种斗争以革命性质。这两个集团之间没有鲜明的界线;但是毫无疑问,在法国工团主义的影响下,在本世纪初,重点越来越多地转向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此后更倾向于逐步建立一个以一切阶级为基础的比较全面的工会,并在每一个大工业企业内部和在每个居民中心的明确的职业集团之间,建立一个比较持久的组织机构。

746 当时,在西班牙,工人阶级运动的左翼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和右翼社会党人。在马德里、毕尔巴鄂、阿斯土里亚斯和少数其他地区,社会党人占支配地位,虽然并不是无争议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加泰罗尼亚,这个全国最高度工业化的地

区,以及在极大程度上在东部其余地区和南部地区,无政府主义占支配地位;而且不仅在产业工人中间,还有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在贫穷和骚乱的永久策源地昂达卢西亚——的农民和无地劳动者中间,势力都很强大。在另外一些地区,无政府主义者或社会党人却没有很大势力,例如信仰天主教的、王室正统派有势力的纳瓦拉,巴斯克地区的大部分,以及干燥的西班牙中部地区的许多地方——新归卡斯提耳和累翁;还有除了在某些特别的时刻以外,西部的厄斯特列马杜拉的大部分地区和极西北部的加利西亚。天主教会在北部地区,除了加泰罗尼亚以外,在人民中势力最大,这种势力一直扩展到阿拉贡,但是在那里,与以萨拉戈萨为中心的无政府主义的强大势力遭遇了。在全国其余地区的大多数地方,教会非常不得人心,穷人的大部分以及大批知识分子甚至讨厌教会。军队一向是反教会的,虽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正统派战争以后,情况显然有所缓和,战争结束后,王室正统派军官大多数被编入了国家军队。

农业和土地所有权的情况因地而异,出入很大。中央高原的西南部和南部(也就是说厄斯特列马杜拉、西昂达卢西亚和拉芒恰)乃是大地主所拥有的和经营的(或者任其荒废)庞大领地,大地主能够在任何时候拒绝使用这些土地,以使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倒霉的居民挨饿。南部的其余地区、东部的大部分以及中央高原的北部地区,主要是在领地面积不那么大的地主手里,他们把这些土地的大部分分成小块短期出租,因之使佃农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动力来改善土地。这些地区大部分雨量不足,时常遭到破坏性的干旱,这就使可耕作地上的农作物非常不可靠,而在年成不好的时候,使不幸的农民陷于极度贫困。但是即使在南方,尤其是在东海岸一带,也有小块的灌溉充分的肥沃土地,特别是在巴伦西亚附近;在这些地区,土地的产量较高,租期较长,佃农的生活也比其 747

他地方好得多。在北部的一大部分地方，存在类似的情况——那就是说有中等面积的田地和很长的租期；但是在西北部，在加里西亚，土地分成了很难维持佃农生活的小块，在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种植葡萄的地区，特别是由于存在使果农生活朝不保夕的陈旧的租地制度，他们心怀怨恨。农业条件和土地所有权的这些差别大大有助于解释各地区农民的极为不同的社会态度和行为。租期短的小块田地，特别是在易遭干旱地区，意味着最激烈的农业骚乱；大领地，由于居民比较孤立无援，意味着骚乱的爆发比较偶然，但也会同样的激烈。土地比较充分、雨量较多、租期较长，常常意味着农村情况比较安定，但是农民在生活真正困苦的时候，也能够建立起永久的组织。

当然，西班牙过去是——事实上今天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它的大部分土地就算是耕种了，效率也极低，因为地主对于土地不投资，而实际的耕作者又无资可投。地主不论是贵族还是城市资产阶级，大多数只不过是靠收取租金度日的人；在北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收取实物租金，算是分享产品，但是在中央平原以及更往南的地方，越来越多地以货币作为短期租地的租金。除了在少数得天独厚的地区以外，在所有的地方对土地的投资都远远不足，使用的完全是最原始的农具。大片土地听其荒废，企图开垦土地的农民一再被用暴力赶走。土地斗争为当地所特有，并且进行了好几百年：在农民看来，国家几乎完全是控制土地的地主阶级的警察。

我们知道，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是西班牙市场消费品的主要供应者。其他重要的工业中心主要从事开矿和冶金——比如北部的阿斯土里亚斯矿区 and 毕尔巴鄂，西南部的里乌·廷托以及科尔多瓦附近的矿区。外国资本对于矿山和冶金越来越感到兴趣。加泰罗尼亚是本国资本主义的中心，它将剩余资

金投到本地也投到外地——例如，银行和电气发展方面。巴斯克人也既从事工业又从事金融业，另一方面，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卡斯提耳人基本上是靠租金生活的人。马德里从来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业中心：虽然它的工人运动往往为职员无产阶级和较古老行业的手工艺人所控制。

巴塞罗那实质上是西班牙的经济首都，但是政治中心是马德里，不仅因为马德里是政府所在地，也因为它是反对全国一大部分地区的强烈地方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象征。卡斯提耳是一个起统一作用的中心，总是企图对有分裂倾向的边远省份发生影响。在本章所探讨的时期内，民族主义不仅在加泰罗尼亚得势，而且也在巴斯克地区得势。在其他地区，处于支配地位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在任何紧张时刻都可能爆发的强烈的地方主义。在昂达卢西亚、东海岸一带和阿拉贡，事实上在许多其他地区，在发生骚乱时，人们就会本能地宣布本县区或本地区完全独立。1873年，几乎在萨伏伊王室的阿马多国王退位以后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的同时，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宣布成立的确是一个联邦国家，它的第一任总统弗朗西斯科·皮·伊·马加儿是联邦党的领袖，该党维护地区自治的原则，反对卡斯提耳王国的中央集权趋势。皮·伊·马加儿本人翻译了蒲鲁东的《联邦原则》，并且在著作和演说中雄辩地反对中央集权的流弊。但是他不希望西班牙完全分裂成为一些独立的国家，或者分裂成为数更多的独立的县区。可是，在西班牙中心地区以外的几乎每一个集团，一旦发现自己已经不受外来压迫而暂时成了自己的主人时，就本能地要宣布自己完全自治，并着手来重新安排它的地方事务，而很少考虑其他地方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谈到另外一些地区，这种说法就需要附加说明：比如王室正统派地区——指纳瓦拉、巴斯克地区和阿拉贡的一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既是地区民族主义者的势力范围，也是保皇天主教

749

派的势力范围，它们都希望在一个天主教王国的统治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当联邦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些地区已经在叛乱：正是西班牙东部和南部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并由于它们回到了纯粹地方主义上去，才给军队拥戴阿尔芳索十二世复辟开辟了道路。

在本书第二卷，曾经谈到一些第一国际在伊比里亚半岛的历史。我们在第二卷中看到，巴枯宁的使者、意大利工程师朱泽培·范内里(1826—1877年)在1868年曾访问西班牙，他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播下了第一国际的种子，这时候正当伊萨贝拉女王被赶下王位，因而国家的整个未来的政府——事实上是它的整个社会结构——被投入熔炉。在那场骚乱中，城市里的工人暂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公开结社的自由，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都出现了联合组织和某些行业的俱乐部。在巴塞罗那及其周围地区，纺织工人率先组成了联合团体；在马德里，印刷工人表达的立场最明确。在这两个地区，在范内里影响下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些支部在一开始时是人数相当少的团体，与一些行业中正在开始成立的初期的工会有显著区别。但是特别是在巴塞罗那，工会迅即开始与第一国际结合到一起。在那里成立的工人协会联合中心于1869年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两年以后，纺织工人的新团体——三阶级工人制造联盟宣布声援第一国际。1870年，正式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地区联合会，总部设在巴塞罗那，巴枯宁派的核心成立了某种秘密的兄弟会或联盟，他们希望通过这些组织来指导和控制这一行动。

750 这一年，军队和自由党人拥戴反教权的萨伏伊王室的阿马多为西班牙国王，企图建立一个君主立宪政体。第二年年初，巴塞罗那爆发了总罢工，结果工人得到了相当大的胜利；但是政府力图恢复秩序，开始逮捕和控告工人领袖。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为了逃避逮捕，整个迁移到葡萄牙，在那里，他们建成了一个葡萄牙支部。

8月，他们又回到西班牙；9月，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地区联合会在巴伦西亚举行了一次正式的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把西班牙分成五个区，由一个共同的联合局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并在一般组织的内部成立特定行业的工会。

1872年1月，自由党首相萨加斯塔以非法组织为由下令解散国际工人协会，因为1868年实行的工会法仅适用于与外国没有关系的团体。国际工人协会领袖因此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国际保卫者协会；但是实际上，这次解散并没有造成多大差别，西班牙联合会仍然象以前一样进行公开活动。1872年4月，它在萨拉戈萨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巴枯宁拟定的一系列提案。

在此以前，西班牙人几乎还没有受到使第一国际陷于分裂的那种激烈争论的影响。西班牙地区支部是在巴枯宁派影响下成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使者还没有出现。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看来总算一度进行过友好合作。不过，快到1871年年底时，巴黎公社的逃亡者、马克思的黑白混血种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到了马德里，这种局面迅即改变。拉法格前来西班牙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交给他的明确任务，就是与巴枯宁的追随者进行斗争；他立即开始进行密谋来对付占优势的集团。在巴塞罗那——运动的中心所在——他没有能取得进展，可是他终于把一批马德里的国际主义者争取到了马克思方面来，并且控制了他们在1871年6月创办的由何塞·麦萨担任主编的《解放报》。在那年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会议上代表西班牙的安塞尔摩·洛伦佐（1841—1914年）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巴枯宁派；对立集团之间，很快就在马德里发生了激烈斗争。在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有五个代表自称代表西班牙，其中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拉法格，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投票，其他几个人——拉菲尔·法加·佩力塞（1844—1890年）（以前是神甫），尼利拉·阿龙索·马尔塞劳、托马斯·冈萨雷兹·莫拉戈和法国人沙

尔·阿勒里尼——都是巴枯宁派。其中二人——莫拉戈和法加·佩力塞，参加了在圣伊米埃举行的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sup>751</sup>

同时，在 1872 年 6 月，拉法格及其集团——由于他们所办的杂志而被称作“解放派”——被国际工人协会马德里支部开除，于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新马德里支部”。这个新支部事实上是西班牙社会党的直接前身。除了拉法格以外，它包括后来成为西班牙社会主义对占优势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长期斗争的那个集团的大多数领袖。其中有后来领导社会党多年的排字工人帕布罗·伊格勒西阿斯(1850—1925 年)，但是在一开始时，领袖人物是何塞·贡萨(1829—1898 年)，他后来定居在巴黎做新闻记者，并且在与茹尔·盖得发生密切关系的同时，不断向伊格勒西阿斯供给有关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材料，从而使新的西班牙社会党具有强烈的盖得派的色彩。其他领导人物包括西班牙社会党的历史学家、一度担任它的书记的弗朗西斯科·莫拉和胡安·何塞·莫拉托·卡尔迪罗(生于 1864 年)，他生前写了一本伊格勒西阿斯传记，还在 1931 年写了一部关于党的著作。

1872 年 12 月，在西班牙国际工人协会的科尔多瓦代表大会上，这一派人在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失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是洛伦佐、莫拉戈、法加·佩力塞和弗明·萨尔沃奇奥(1842—1907 年)。这样一个判断是十分明确的：马德里的“少数派”在其他地方得到的支持很少。但是科尔多瓦代表大会，虽然坚决反对议会道路，却满足于通过一个十分稳健的纲领，它的主要社会要求同皮·伊·马加尔的联邦派的要求没有什么区别。纲领的主要特点是要求八小时工作日，改善工厂卫生条件和实施普遍的、非宗教化的免费教育。所以说它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是因为它拒绝给它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以任何控制地区和地方团体的权力。象在圣伊米埃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一样，它只是同意成立一个没有



行政权力的中央联络局。由于一时的冲动而自由联合起来的采取自发性的地方行动,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马克思主义者在退出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西班牙主要组织以后,1873年1月在巴伦西亚单独举行了一次集会,并且着手建立一个独立的西班牙联合会,该联合会于5月在托莱多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很快地就消声匿迹了。在此以前,在1873年3月举行的选举中共和党获得了多数;六月宣布成立以皮·伊·马尔加为首的联邦共和国,可是面对着州县独立主义运动,该共和国几乎立即就垮台了。在全国广大地区发生了起义;在许多地区,包括巴塞罗那和卡塔黑纳在内,当地的反叛分子不但不支持联邦共和国,反而宣布他们自己的地区完全独立。皮·伊·马加尔被赶下台,政府军炮轰卡塔黑纳,在那里,曾经建立一个最有力量的革命运动。1874年1月,在帕维亚将军发动政变的前夕,西班牙国际工人协会再度被解散,它的残余力量转入地下。工人阶级活动的中心,比如工人文艺协会被查封,工人主义的许多地方中心被解散。6月,国际工人协会的残余力量在马德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但是在年底以前,军队的起义使共和国寿终正寝。阿尔芳索十二世被拥戴为国王;稳健的保守党人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罗开始了他的漫长的飞黄腾达的政治生涯。两年之后,王室正统派发动的战争结束,西班牙在君主统治下重归统一。

在萨伏伊王朝和联邦共和国时期,激进的、反教权的共和党政治家与混乱的工人阶级和农民运动(一部分表现在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上)的领袖之间是不团结的。联邦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之间的主要分歧不是纲领的分歧,而是组成和方法上的分歧。联邦主义者是政治家,主要从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获得支持:他们没有多少追随的群众,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也算是社会主义者——主要是普鲁东的信徒和准信徒。另一方面,国际主义者基本上是

工人阶级集团，虽然其中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在这时期，支持他们的主要是城市工人，虽然他们已经开始与对土地有不满情绪的地区建立联系。他们不是政治家，在极大程度上不需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敌视天主教会——事实上他们的敌视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反抗权威；他们进行反抗的理想的地盘是他们实力所在的工厂或者农村社会，而不是他们没有任何地位的政治舞台。他们甚至不希望在联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国家，而是希望消灭政治权力，这种权力总是极力践踏他们，并且一直被利用来为地主阶级和雇主阶级的利益而压迫他们。皮·伊·马加尔和他的联邦主义者想要得到一些东西，其中有许多愿望无疑是十分真诚的，比如进行根本性的土地改革，进行普遍的非宗教化教育和消灭中央官僚机构。但是，皮·伊·马加尔赞成循序渐进，在宪法范围内采取行动，而不使用暴力；他不相信武力的效果，而愿意等待。另一方面，国际主义者则认为，自己的周围都是一些经不起再受苦难的人；而暴力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可以使他们得到照顾的方法。他们也不相信，皮·伊·马加尔和他的追随者，尽管也许十分真诚，有任何可能来随意支配任何类型的国家或议会。任何时候，一次武装起义就可以象把伊萨贝拉赶下王位一样轻而易举地将联邦共和国断送掉。因此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工作是千方百计破坏和分散中央权力，并通过先将地方权力控制在自己手里，然后分配给所有的人，来消灭权威。

从1874年到1881年，国际工人协会已名存实亡。1878年，胡安·奥利维·蒙卡西(1855—1879年)谋杀国王未遂后，当局大肆逮捕无政府主义的嫌疑犯，在昂达卢西亚实行了恐怖统治。就象实行严厉镇压的其他时期一样，左翼仍采取恐怖策略作为对策。1878年和1879年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议赞成采取恐怖行动，烧毁建筑物和农庄，以对统治阶级进行报复。1880年，在加泰罗

尼亚和南部,发生了广泛的罢工和农民骚乱,于是政府在加泰罗尼亚取缔工会以示报复。但是这样取缔从未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sup>754</sup>第二年年初,萨加斯塔的自由党政府再次准许工会存在。旧的国际工人协会已经声誉扫地,不再具有任何真正的代表性,于是在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后宣告解散。不过在9月里,又以西班牙地区工人联合会的新名义在巴塞罗那成立。第二年,组织迅速发展:在那一年的塞维利亚代表大会上,加泰罗尼亚的稳健派与昂达卢西亚的恐怖分子之间发生了尖锐分歧;但是并没有造成真正的分裂。然而就在同一年,以赫雷斯为中心的南部集团,在“被剥夺继承权者”的名义下分裂了出去;然而巴塞罗那工厂工人的主要组织加泰罗尼亚制造联盟仍然固守岗位。1883年,在赫雷斯地区发生了名噪一时的黑手事件。当局说什么无政府主义者阴谋进行大规模凶杀和劫掠,并且以此作为对无政府主义嫌疑犯大批定罪的根据,直到今天,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大真实性(或者甚至究竟是否实有其事),仍然还不能肯定;但是看来,奸细活动频繁,许多罪名纯系莫须有,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无论如何,监狱里的幸存者终于在1903年被释放。1883年的巴伦西亚代表大会谴责了恐怖分子,他们因而脱党,并尽全力来继续奉行他们的极端政策。

1885年,阿尔芳索十二世去世,身后留下一个幼君,于是太后玛丽亚·克里斯蒂纳摄政。政治家们由于担心有出现王族少数派的危险,缔结了埃尔·帕多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他们实际上是同意通过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来共掌朝政。自由党萨加斯塔执政后立即采取和解的政策,包括扩大出版自由和组织工会的自由。五年以后,萨加斯塔进一步承认成年男子选举权,而在以前,工人大多数是文盲,几乎完全没有选举权。但是,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实行虽然在其他国家大大地改变了选举的形势,在西班牙,则有很长时期,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影响。实际上,政府仍继续随心所欲地操<sup>755</sup>

纵着选举,甚至在中央一级不仅为自己的党,而且代表得到承认的反对派,决定谁应该当选。为取得这种独特的结果所用的方法因地而异。在大城市里,主要是通过操纵选举人名单,而在那些这样做还达不到目的的地方,干脆就在计算选票时故意算错,并且销毁讨厌的选票。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所用的主要方法是直接进行威胁。政府利用一种叫做“卡西克”<sup>①</sup>的地方领袖作为它的选举代理人,这种人往往是地主或者其他名流。卡西克的工作是保证选民选出的候选人是政府中意的人选;他们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进行威胁:对佃农说,如果他们投票不当,就把他们从田地上驱逐出去,对雇工说,如果他们投票不当,就辞退他们。这种威胁非常有效,以致发生严重骚乱的地区居然驯服地选出正是他们所要反抗的人的怪事是屡见不鲜的。代议制政治制度变成了一场道地的滑稽戏;它失去了信誉,自然就会加强在贫困阶级中间已经很强烈的反议会情绪。当选的少数激进派正是政府看中的人,只要能肯定他们不代表国内任何强大势力,政府希望他们在议会中发表反对演说。这种奇妙的制度实际上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虽然在后来,它比较难于起作用。它所依靠的是地主在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可以说是绝对的权力,以及政府对于在城市里负责拟定选举人名单的市政委员会的控制。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尽管在名义上存在成年男子选举权,任何工人阶级代表都毫无当选的可能,甚至不可能当选为市政委员会委员。因此,在极大程度上说来,工人阶级运动所进行的活动与选举政治完全没有关系,倒是比较愿意接受无政府主义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竟能找到追随者,并且居然能在  
756 西班牙发展起一个社会党,坚决采取议会和市政行动,并在完全不

<sup>①</sup> 卡西克 (Cacique), 拉丁美洲土著部族中的酋长, 这里指地方政治实力派人物。——译注

同的条件下，尽最大力量来实行象茹尔·盖得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在法国所解释的那种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和方法——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这甚至可以说是突出的成就。西班牙劳工社会党实际上是在 1879 年，主要依靠马德里排字工人工会的会员，作为一个秘密团体成立起来的，帕布罗·伊格勒西阿斯就是该工会的领导人。它还有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拥护者，主要是医生和新闻记者；但是它的主要成员最初是在熟练的手工艺人中发展起来的。1882 年萨加斯塔内阁开始执政时，它公开出现，通过了一个正式的党章；但是该党发展很慢，在初期，主要是在卡斯提耳和少数其他地方有所发展。在加泰罗尼亚，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1886 年，在与黑手案有关的镇压时期结束以后，这个党再度公开出现，创办了《社会主义者》作为它的马德里机关报。但在同时，发生了脱党现象，它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支持者以科学家杰姆·贝拉为首退出了党。因而它沦为一个党，主要成员是属于人数不多的、孤立的行业工会的体力劳动者，在首都以外，势力非常小。

这时，根据正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学说，伊格勒西阿斯和他的集团决定成立一个虽然在名义上独立于党外，却与党有紧密的从属关系的工会组织。1888 年，他们说服了一些人数不多的工会主义者团体，成立了全国总工会。新团体的主要发起人除了伊格勒西阿斯以外，还有已经提到的弗朗西斯科·莫拉以及加西亚·克希多，他们二人晚年都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全国总工会从一开始起就是西班牙雇主阶级的不妥协态度所能容许的限度内的一个温和的团体；有很长一段时期，它实际上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工人组织不如说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社会党的一个附属机构。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当它扩大到北部的毕尔巴鄂和阿斯土里亚斯矿区以及南部矿区时，它在工人中间才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加泰罗尼亚，它始终没有很大势力。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曾努力争取加泰

757 罗尼亚的纺织工人加入；但是，纺织工人保持冷淡态度，虽然全国总工会为了争取支持，曾经在巴塞罗那举行它的成员代表大会。

同时，旧国际工人协会集团分裂了。无政府主义者于 1885 年在巴塞罗那举行了国际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但此后运动瓦解，到 1888 年，西班牙地区工人联合会不复存在了。可是加泰罗尼亚的大多数工会没有加入总部设于巴塞罗那然而在那里很少有追随者的全国总工会，它们在 1888 年通过一个联合和团结公约组织聚集在一起，这个公约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更明确的工会方针的新的联合组织；同时无政府主义者完全以个人成员为基础，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西班牙地区无政府主义团体。在后来的一个时期，事实上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双重组织始终存在，虽然接连接换了很多名字。这两个新团体不久以后就扩大到了加泰罗尼亚以外的地区：无政府主义者在巴伦西亚举行了成立大会，不久以后，联合和团结公约组织就扩大到东部和南部其余地区。

在萨加斯塔制定选举改革法的那年，即 1890 年，在工业地区加泰罗尼亚和农业地区昂达卢西亚都发生了相当大的骚乱。在巴塞罗那和其他大城市都发生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这一部分是响应 1889 年在巴黎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和工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还发生了以要求土地改革为基础的农村罢工运动。但是，萨加斯塔刚通过他的选举法，便在国王和扬言要举行武装暴动的军事领袖的胁迫下，让位给一个保守党政府。卡诺瓦斯接任政府首脑，他仍然象以往一样充份使用人们熟悉的操纵选举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地区性的联合和团结公约组织的、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工会邀请全国总工会举行一次联合代表大会来考虑号召全国范围的总罢工。少数社会党工会参加了代表大会，但是根据社会党的决定，这些工会反对在政治上使用罢工的武器。1890 年，制定新的选举法以后，社会党人决定参加议会选举；

这时他们宣布反对以总罢工作为政治武器，而且及时派代表参加了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并指示他们投票反对举行总罢工。此后两年内，他们致力于制定一个市政纲领，作为进行地方竞选的基础。另一方面，属于团结公约组织的工会，继续宣布于1891年5月在巴塞罗那、萨拉戈萨和其他大城市举行新的示威性总罢工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

这时，主要是在巴塞罗那，爆发了一系列的投掷炸弹事件，结果使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遭到严厉的镇压。这些事件是以在巴塞罗那的雇主组织的总部福门托扔了一枚炸弹开始的；以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骚乱，在这些骚乱中，对立的派别的暴徒在大街上杀害那些他们被雇用来杀害的人，还有数目多得惊人的炸弹是在想不到的地方爆炸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任何人受伤。人们普遍怀疑，这些非常不顶事的炸弹有许多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雇主或当局收买的煽动分子扔的，虽然很显然枪击事件是出于双方的主使。由于发生了这些事件，在1894年和1896年通过了更加严厉的反无政府主义的新法律，根据这些法律，特别是在巴塞罗那，处决了一些主要的无政府主义者。美西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许多新的骚乱，一部分是反军国主义性质的，一部分是针对急剧上涨的物价的。由于西班牙丧失了海外帝国领土的大部分，当权政府的威信大为降低，同时也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情绪。1898年，社会党提出了第一批议会候选人——可是落选了；1899年，《社会主义者》改为日报出版。在对立的阵营里，在1900年于马德里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拟定了一个新的联合和团结公约，这一次代表大会还决定改组西班牙地区工人联合会。

在以后几年内又爆发了一系列罢工，主要是争取提高工资来应付日益上涨的物价，在五一节举行的罢工则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1901年，巴塞罗那电车工人的一次罢工发展成了总罢工，后

759 来扩大到其他地区。第二年,巴塞罗那冶金工人举行罢工,但是失败了。在这次失败以后,他们主动成立了一个叫做劳工团结协会的新的总联合组织。1903年,在昂达卢西亚,爆发了广泛的罢工运动。在此期间,阿尔芳索十三世在1902年年满十六岁时登基为国王,随即开始表现自己,与其说是在奉行任何明确的政策方面,不如说是在对付他的大臣方面。他不久就表明,他对于权力感到兴趣是由于权力本身,他最喜欢不断地威胁说要解散他的内阁,使他的内阁如坐针毡,以此来行使他的权力。结果政府象走马灯似地不断更迭,因而不可能奉行一贯的政策。诚然,在这些年代里,有相当多的主要由1903年成立的社会改良协会拟定的社会立法;但是其中大多数实际上并没有付诸实施。随着政府行动的削弱,各工会内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死灰复燃。1904年,以西班牙地区工人联合会的名义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总罢工问题——当时这个问题正在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上讨论——并且热烈地同意了这项政策;但是第二年的干旱带来了普遍的严重歉收和农村灾难,因而使农业方面的罢工陷于停顿。在城市里,粮食问题引起了骚乱,结果带来了更严厉的镇压;1906年,借口军队受到左翼报纸侮辱,军事领袖们坚决要求政府通过司法管辖权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一切对武装部队的犯罪可以由军事法庭而不是民事法庭来审判。大约就在这时候,劳工团结协会开始扩展,最初从巴塞罗那扩大到加泰罗尼亚其他地区,后来又扩大到邻近地区,而且又发生了新的劳资冲突。此后从1907年到1909年,在巴塞罗那出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恐怖统治时代。

说到这里,有必要略微谈一谈在加泰罗尼亚存在的特殊情况。加泰罗尼亚既是西班牙的主要工业地区,又是强大的民族自治主义运动的策源地。在1876年王室正统派战争结束以前,加泰罗尼亚的农村地区主要是王室正统派的势力,整个地区的上层阶级都



支持同一个方面。在王室正统派失败后，士绅和知识分子都倾向于加泰隆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最初的形式是争取恢复加泰隆语和传统艺术的一种文学和文化运动。但是随即运动具有了一种政治形式。以受良好保护的西班牙市场为倚靠的加泰罗尼亚工业家不希望与西班牙其余地区分开；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同样希望恢复在第二次王室正统派战争以后被削减了的地方自由，特别是恢复在学校中使用卡泰隆语的充分自由。大体上说来，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传统主义和保守的，它强烈反对反宗教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拥护这种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是一些产业工人——其中有许多人是来自西班牙其余地区的移民。但是，还有一个以皮·伊·马加尔以前的一个追随者瓦伦丁·阿尔密拉尔为首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左派。阿尔密拉尔本人就是一个加泰罗尼亚人，1886年，他出版了他的名著《卡泰隆主义》，此书成了这一地区深得人心的民族主义的福音；1892年，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两翼联合起来，拟定了一个要求区域自治的纲领“玛里撒的基础”。两年以后，安里克·普拉特·德·里巴（1870—1917年）创办了他的刊物《文艺复兴》，作为文化运动的喉舌。但是，一直到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失败以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才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后来，它成立了“利加”组织，为首者是大工业家弗朗西斯科·坎博，他是一个银行家，也是加泰罗尼亚雇主的联合会“福门托”和西班牙的主要的电气事业“查德”的负责人。“利加”是一个右翼政党，它既同加泰罗尼亚的工人阶级及共和运动斗争，也与马德里的中央集权派进行斗争。此后立即出现了一个与它对立的强大的、反教权的激进党；该党以政治煽动家阿里桑德罗·勒鲁（生于1860年）为首，并且能够在不受警察干涉的情况下，进行暴力运动，希望以此作为一支反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力量，能阻止“利加”的发展，从而对中央政府有利。1903

年，勒鲁的激进党人在加泰罗尼亚的选举中击败了“利加”。但是，  
761 两年以后，在当时的保守党政府不再支持它的时候，激进党人反而  
为“利加”所击败。不过，“利加”很快就触犯了中央政府，政府在军  
队的建议下，通过了司法管辖权法律，规定凡属对武装部队的所  
谓犯罪都必须由军事法庭审判。由于军队一向是强烈的集权主义  
者，并且激烈反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这条法律就使驻扎在巴塞  
罗那的军队掌握了最可怕的武器，能够用它来压制新闻记者和演  
说家的言论自由。制定这条法律之后，结果使加泰罗尼亚各政党  
联合组成了一个以“利加”为首的卡泰隆团结联盟，并在1907年的  
选举中大获全胜。马德里的保守党首相毛拉答应给予“利加”以一  
定程度的自主权，并且宣布他有意确立一种全国性的自由选举制  
度；但是，他不能使议会通过他的法案，他的内政大臣拉·谢尔瓦  
非但没有实现领袖的诺言，反而更进一步在选举中舞弊，并且准许  
巴塞罗那的军队和特种警察部队对自治主义者实行特别恐怖的统  
治。有两年多时间，巴塞罗那的暴徒横行一时，在许多情况下，人  
们发现这些暴徒是警察收买的。右翼“利加”的领袖以及共和党人  
与无政府主义者在大街上被暗杀；不久以后，来自失业者队伍中的  
敌对的团伙就实行了报复。著名的土匪胡安·鲁尔最后在1908  
年受审判并被处决，而且结果完全证明，他的许多罪行都是他在被  
警察收买期间犯下的。在这种气氛下，暴徒行为从一个集团扩大到  
另一个集团。勒鲁的极端反教权主义的激进党人成立了一个叫做  
“野蛮小伙子”的附属组织，对神甫和教堂展开了袭击；无政府主  
义集团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虽然他们好象只起了次要作用。西  
班牙和国外的报纸将这种猖獗一时的暴力行为归之于无政府主义  
者名下，但是，事实上他们却多半是这种暴行的牺牲者。

在鲁尔被处决后，有一段时期很沉寂；但是在1909年，事情发  
展到了高潮，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遭到惨败，政府为了补充军队来

进行第三次摩洛哥战争，征集加泰罗尼亚的后备役入伍。这些人大多数是已经结婚的人，这就使工人阶级展开了斗争，因为战争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组成了一个联合抵抗委员会；劳工团结协会决定举行总罢工。大街上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野蛮小伙子”加入了大肆焚毁教堂，袭击神甫和修女的暴乱。这是巴塞罗那的“血腥周”。军警用开枪和大规模逮捕来对付罢工和骚乱，不仅对付直接有关的人，而且对付那些他们认为有进行颠覆性宣传嫌疑的人。在被捕者中间，有著名的反教权的教育改革家弗朗西斯科·弗雷·伊·瓜迪亚（1859—1909），他是西班牙现代学校运动的创始者和领袖。实际上，发生骚乱时弗雷在英国，所以与骚乱毫无关系；但是他被即席进行军法审判，在俯瞰巴塞罗那的军事据点蒙特惠奇城堡被枪决。

弗雷的处决以及当局在骚乱中的整个行为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毛拉政府被迫辞职；接替它的在卡纳雷哈斯领导下的自由党政府勒令军警停止胡作非为。卡纳雷哈斯还使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给予加泰罗尼亚团结联盟以一定程度的自主权，骚乱因而逐渐平息下去。

1909年事件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迫使西班牙社会党与共和党人结成了选举联盟，在此以前，社会党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任何联盟的。另一个后果是使勒鲁的激进党丧失了工人阶级的支持；还有一个后果是使无政府主义者尽其全力敦促工人参加投票，来支持社会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在此以前，无政府主义者置身历次竞选之外，并且要求他们的追随者不要投票。情况发生这种变化之后，社会党首次有一名代表当选为议会议员——伊格勒西亚于1910年在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选民以及共和党选民的支持下，当选为代表马德里的议员，在这次选举中，由政府操纵选举人名单以及通过“卡西克”来进行威胁的旧制度，在大城市中显然

763 可以看到瓦解的迹象，虽然在许多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仍然原封未动。支持政府的力量——虽然大多数教会的权贵或者是大地主或雇主并非如此——认识到有必要对于普遍存在的情绪，至少作某些让步。卡纳雷哈斯通过了更多的工业法（得到遵守的很少），并对于地区自治主义者的权利作出了一些让步。不过他立即发现在教育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与教会发生了斗争；由于遭到上层阶级的越来越大的阻挠，他的成就非常小。1912年，他在企图对日益强大的工团主义运动采取有力行动以后，被暗杀了。

1909年的事件对于特别是加泰罗尼亚的工人阶级运动有很大影响。在社会党与共和党左派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战争和教会的斗争的同时，工会也经历了一个内部改组和迅速扩大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全国总工会参加了共同斗争，会员人数有了急剧增加，并且发展到了在此以前很少有追随者或者根本没有追随者的地区——特别是阿斯土里和里约廷托矿区以及莱昂和毕尔巴鄂附近农村，同时还扩大到西班牙中部的一些农业地区。全国总工会并没有改变它的基本性质：它仍然是一个稳健的团体，在凡属可能的时候，便在全国的基础上，并以先进国家的中央集权的工会运动为蓝本，组织成为独立的行业或工业联合会。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它必然要附和群众情绪而比较激烈，并参加较为激烈的工团主义团体所发起的运动。

但是，巨大的变化在于：在全国总工会以外，组成了人数多得多的工会主义者团体。在加泰罗尼亚和在其他地区（只是程度上差一些），这些团体中有许多松散地组成了主要受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名为劳动团结协会的运动。1910年，作为前一年发生事件的直接后果，全国总工会以外的大多数工会联合组成  
764 了一个全国性的联合会——全国劳工联盟，在此以后，它就与全国总工会对立，而成为一个人数多得多的、以截然不同的工会组织和

行动理论为基础的团体。甚至在全国劳工联盟完全组成以前，在1911年内，就发生了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的罢工浪潮。巴塞罗那苦难深重，元气大伤，所以比较平静；但是在附近的萨拉戈萨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有力据点，发生了总罢工，后来演变成为暴动，遭到了武力镇压。更往南在巴伦西亚，工人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市。比较平静的毕尔巴鄂也首次爆发了总罢工；在那里就象在一些其他地方一样，全国总工会违背了它的领袖的意志，也卷进了总罢工。卡纳雷加斯政府被迫对罢工工人采取强硬措施，于1911年9月下令解散刚在巴塞罗那举行了它的成员代表大会的全国劳工联盟。但是这一措施的唯一影响是使运动转入地下，并使无政府主义者的秘密团体扩大了对这个运动的控制。第二年大体上说来骚乱较少；但是全国总工会在9月举行了铁路工人罢工，在11月卡纳雷加斯被暗杀以后，又爆发了新罢工。保守党人重又执政，但是已经阻挡不住罢工的浪潮。1913年，昂达卢西亚的农业工人成立了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西班牙全国农民联合会，与全国劳动联盟建立了密切关系。巴塞罗那的纺织工人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罢工。1914年初，在里约廷托矿区和巴伦西亚发生了大罢工。那时候政府已放弃了镇压全国总工会的企图，因而该工会重又公开出现，正好面对必须阐明它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这样一个新问题。

我曾经指出，全国劳工联盟和全国总工会所根据的工会主义理论具有本质的差别。全国总工会下属各工会有正式的领薪水的负责工作人员和办事处：他们支付罢工福利金，在有些情况下，还支付互助福利金。全国总工会的宗旨是在每个行业或产业中成立一个有分会和中央基金的全国性工会，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与雇主集体进行谈判，并利用政府由于希望促进社会安宁而成立的调 765  
解机构。但是，除了非常少数的行业以外，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大多数的大雇主不愿意承认常设性谈判机构——当然，大企业的

业主根本就不愿意谈判。因此,除了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以外,全国总工会发现自己很难在工业方面发挥作用;而它与社会党和马德里方面的密切关系,也是它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有很长一个时期,尽管它在加泰罗尼亚力量很弱,可是总部仍然设在加泰罗尼亚,这种软弱一部分是由于地方上存在反对中央集权的情绪,一部分也是由于把它的方法应用于这个地区的恶劣的劳资关系上行不通。加泰罗尼亚工会交替地呈现两种情况:它时而缔结往往为无政府主义者所领导的“公约”,时而分裂成为企图单独行动的独立团体。不过到1910年时,它们已经愿意在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上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共同的组织,比起它们前几次缔结的“公约”来,这个组织不是那么松散,也不是那么具有完全自主的性质。它们这种新的情绪,毫无疑问,是受到了当时盛极一时的法国总工会的榜样和理论的极大影响。但是实际上,他们以法国总工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全国劳工联盟是一个大不相同的团体,就其组织来说,要松散得多;它受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控制,其方式是比较软弱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在企图控制法国总工会时所始终没有做到的。

法国总工会是建立在双重组织基础之上的——即包括所有地方行业的联合组织的职业介绍所和特殊产业部门(在某种情况下是特殊行业)的全国联合会。这两种组织最初是独立存在的,后来合并<sup>①</sup>。在大多数情况下,各全国联合会部分是在盖德派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并与盖德派工人党配合行动,或者在某种情况下,与对立的可能派配合行动。后来,它们与这些党断绝了政治联系;但是这些联系对它们起了塑造作用。大体上说来,它们相当于西班牙工会运动中参加全国总工会的组织。另一方面,法国各职业介绍所与以它们为中心的工团主义理论一起成长,绝大部分始

<sup>①</sup> 参看本卷上册第358页。

终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性分支机构。法国工团主义至少在它的早期,是一个地方性的阶级团结运动,后来,一个以按产业分别成立全国性联合会的概念为基础的、具有不同性质的工会组织参加了这个运动。在西班牙,地区观念甚至比法国更为强烈;但是在1910年之前,它没有通过与法国的职业介绍所有丝毫相似之处的机构表现出来。事实上,它不可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因为,法国的职业介绍所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是公认的就业机构,并且往往从抱同情态度的市政当局得到津贴。在西班牙,绝不可能有任何市政当局承认或帮助真正独立的工人组织。西班牙最接近于职业介绍所的机构人民之家是1910年以后才在有意识模仿介绍所的情况下发展起来;而实际上,创办第一个人民之家的不是工会,而是与工会对立的勒鲁的激进党人。西班牙人表现团结的典型方法是一些地方工人团体所缔结的“公约”,目的是为了互相维护和开展共同运动——劳工团结协会。这种公约和以公约为基础的组织往往不可能久存,并且除了统筹委员会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机构。这一部分是由于那些领导他们的人大多数对于正式的组织 and 正规的领导疑虑重重,而且甚至比法国的工团主义者更热衷于相信完全自发行动的有效和有价值。除了在卡斯提耳和少数其他地区以外,鼓动西班牙群众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1910年以前并不希望成立任何需要拥有经费、定期收集会费并且维持一批领薪水的负责人员来管理钱财的工会。甚至在巴塞罗那——比如说在纺织工人中间——也有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会,但它们是特殊情况。在加泰罗尼亚和在一切无政府主义影响极大的地方,典型的工会是准备在一旦需要时与其他人联合的自发性的工厂或矿区团体,但是它们由自愿担任工作的委员会委员和书记不拘形式地指导工作;当会员罢工时,它从来不拿出一文钱的福利金来维持他们。因此,罢工只能进行很短的时期;为了迅速取得胜利,罢工工

人对于破坏罢工的工贼以及调来镇压他们的警察，往往被迫采取暴力行动。凌驾于自发性的工作场所团体之上的所有领导都来自致力于自己规定的社会革命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半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数不多的秘密团体。

工会主义的这种概念在法国的工团主义发展的影响下，越来越遭到非难，这种概念当然是巴枯宁派关于秘密兄弟会及其对自发的群众运动发挥作用的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有一派人赞成维持旧的方法，认为它能保证革命运动的纯洁性，另一派人则愿意放弃纯理论的严肃性，以便更彻底地投身于群众运动。“老无政府主义者”赞成作为革命的中坚分子置身事外，随时准备在群众斗争发展成为一种群众怨恨情绪的表达方式时，投入这场斗争，但是这样做的时候永远是为了直接的革命目的——利用群众，可是除非革命已经充分发展，否则永远不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希望直接投身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即使他们还远远落后于革命的要求，也为他们的事业而斗争，并通过与群众打成一片，逐步使群众具有充分的革命阶级觉悟。

由于采取第二种态度，结果成立了全国劳工联盟，当时正是多事之秋，巴塞罗那的经验使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无可奈何地给左翼政治家投票，并且认识到必须与社会党人和全国总工会共同进行斗争来反对摩洛哥战争、教会和马德里的国家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大多数人愿意竭尽所能，来加强支持他们的人以进行这场斗争，并且使他们自己得到一个运动的支持，以使他们、而不是左翼政治家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即使那些受到法国榜样的影响，并且认为有必要建立全国劳工联盟作为一种群众运动的人，也对于任何带有中央集权或职业领导气息的事物非常怀疑。因此，他们便着手建立一个可以说是没有领薪水的工作人员或者



办公室设备的全国劳工联盟，作为一个由自愿人员进行管理的地方团体的非常松散的联合机构，同时还有同样松散的，地方和地区的跨行业联合会，以及某些行业的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联合组织，其工作方法大同小异，既没有领薪水的负责工作人员，也几乎没有经费。此时仍然还没有罢工福利金——当然也没有互助福利金。此时也没有正规的集体谈判——只有对将来不承担义务的罢工解决办法；同时也没有强行规定统一的政策，只是在十分严重的危机临头时，发出举行总罢工的响亮号召。

全国劳工联盟成立以后，关于基本的工会团体应采取何种形式为好，进行了许多辩论。最后的定论是认为最好的形式应该是工团主义工会——也就是说至少在某一种企业内，成立与行业没有关系的、组合一切工人的地方工会；而在小地方，则成立一个初级工会，吸收各种职业的全体工人参加。这种主张背离了自发的自我组织这样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概念；但是这个步骤最符合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地方自然团结的信念。实际上，由于会费无足轻重，而且工会所需要的经费很少，全国劳工联盟下属各工会始终不知道它们有多少会员，对这一点他们也从来不太关心。重要的并不是缴纳会费的会员有多少，而是在关键时刻到来时能够响应团结的号召。

在加泰罗尼亚，雇主们并没有坐视这种工会运动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他们千方百计地组织被称为自由工团的对抗的工会，这些工会不仅反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而且肯定也破坏罢工，甚至组织暴徒行动。此外，在许多地方，还企图按照教皇“劳工通谕”的概念，组织天主教工会和天主教农业工人和农民团体。不过，当这些团体一旦企图认真对待他们的社会学说时，就往往引起天主教统治集团的不满。比较进步的天主教徒——因为甚至在西班牙，<sup>769</sup>也有一些这样的人——特别是在农业地区，所办的各种形式的合

作组织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在北部地区，他们所办的天主教互助会情况也是如此。1912年，多明我修会神甫热拉尔和加福所创办的新天主教工会运动主要集中在纳瓦拉和巴斯克各省以及旧卡斯提耳一些地区。

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内，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产生许多理论著作。它继承了西班牙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并且吸收法国的理论后做了一些修正。从巴枯宁的时代起，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同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有密切联系；后来，特别是在昂达卢西亚和南部，马拉特斯塔具有重大影响，而塞巴斯蒂安·福尔的“自由主义”学派则大大地影响了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中坚力量。就我所知<sup>①</sup>，西班牙本土的无政府主义著作，在理论上说来是无关紧要的。在它的作家之中，最有创见的似乎是托马斯·冈萨雷兹·莫拉戈，他在参加了第一国际以后，年纪很轻就死在格拉纳达的一所监狱里。他的著作散见于各种刊物；他的主题是工人由于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他的人格所受到的侮辱，而物质的考虑与自我表现的个人自由两相权衡时，物质考虑相对说来居于次要地位。在许多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中，贯串着这种轻视财富和物质生活水平精神。

在国际工人协会存在时期的国际主义者中间，法加·佩力塞和安塞尔摩·洛伦佐二人著作甚多——洛伦佐除了写了一些报道文学作品之外，还写了书。洛伦佐的回忆录《战斗的无产阶级》是整个时期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他死于1914年。在下一代人中

---

<sup>①</sup> “我承认，我所知甚少。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其中有一些人是为了逃避西班牙本地的迫害而在此避难的。当西班牙的压制特别严厉时，拉丁美洲往往成了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刊物和其他出版物的出版地点，这两个人陆的运动之间的关系的确往往变得非常密切。关于拉丁美洲的无政府主义，参看第二十二章。

间,无政府主义作家中最坚持不懈的是前陆军上校何塞·洛佩兹·蒙的内哥罗,他除了写书和写小册子以外,还写小说:他最有名的著作是《火球》。加利西亚的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印刷工人里查多·麦拉(1861—1925)是另一个多产的理论家。塔里达·德尔·马莫尔(1861—1915)教授所著的《西班牙的审问官》(1897年法文版)是一本揭发警察手段的经典著作。但是作为象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这样一个广泛运动的理论基础,1914年以前时期西班牙本土的著作没有多大意义。西班牙人翻译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莱克留、马拉特斯塔、马拉托的著作,还有许多其他人的著作;但是除了在他们偶尔出版的杂志上以外,他们没有写出重要的作品。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甚至更少。在本章所涉及的整个时期,据我所知,没有出过一本重要的社会主义著作。

就广义的无政府主义来说,我认为必须认为费雷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是这位现代学校的创始者几乎没有任何作品,虽然他编辑和出版了他的学校所使用的许多教材。费雷的事业开始时是担任六十年代革命期间的激进保皇党领袖,并在萨伏伊王朝阿马多国王在位期间,担任过一个短时期的公共教育大臣的曼努埃尔·吕兹·索利亚(1833—1935年)的秘书。索利亚是一个强烈的反教权者和一个理性主义者。在共和国沦亡以后,他住在巴黎进行革命的密谋;费雷与他合作,后来滞留巴黎担任教师。他在那里爱上了一个中年女子,一个非正统的天主教徒,她不久就去世了,给他留下一笔很大的遗产,并允许他随意用之于他所希望的任何事业。1901年,费雷回到他的故乡加泰罗尼亚;在巴塞罗那创办了他的第一所现代学校,以当代科学为基础进行现代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教育。他聘请了著名的理性主义者来编写教科书,由他编辑出版;他出版了许多外国理性主义著作的译本。在他创办了这所学校以后,在加泰罗尼亚以及附近地区,创办

了一些同样的学校，在西班牙其他地区也有许多模仿者，在那些地方，在本世纪初期，创办了许多理性主义的学校，来对抗天主教会对于教育制度的几乎是完全的控制。自然，他的运动引起了教会的激烈反对，当局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对这一运动进行镇压。费雷  
771 本人在 1906 年被捕，这正是在无政府主义者于那一年企图杀害阿尔芳索国王和他的新婚夫人未遂之后，当局大肆逮捕的时期。所有现代学校一律被当局封闭，而且当局还企图罗织罪名，将他与暗杀案联系起来。尽管捏造了证据，他仍被宣告无罪，并于一年以后获释；但是奉当局的命令，他的主要的现代学校仍然被查封。一些其他的学校重又开办了，费雷恢复了他的工作，但是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或者至少在 1907 年到 1909 年的骚乱时期，他不在巴塞罗那。如我们所知，在 1909 年的“悲惨的一周”时，他不在国内；但是，在骚乱结束以后他回国的时候，他仍然被立即逮捕和枪决。

现在很难追溯费雷有什么动人之处。看来他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他肯定对社会主义思想或无政府主义思想没有任何贡献，也没有打算做出任何贡献。除了通过他与许多主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友谊以外，他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他是许多国家所习见的那种正统的、反教权的理性主义者，热心于将青年人从宗教教条的灌输中拯救出来，而本着强烈的唯物主义道德教给他们科学事实。自然，他的现代学校主要招收积极反对教权者的子弟，这些学校由于他和那些反教权的人受到诽谤攻击而更加出名。他的私生活不断受到攻击：他和他的妻子分居，由于不可能离婚，他和另外一个人同居了。有人指责他通过不适当的势力，取得了他的法国遗产，并且没有根据遗产授与人的意志来使用它，并且指责他与遗产授与人有罪恶地同居。他还被莫须有地指责为在幕后操纵无政府主义者的刺客——事实上凡是他的敌人认为能够用来诽谤他的名声的一切罪状都栽到了他的身上。但是

他本人——或者说除了他后来有幸成为殉道者这一点以外——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甚至在他的教育见解中，也没有任何东西称得上是特别有创见的。 772

我在结束本章时，对于我所写的内容是颇不满意的。除非非常熟悉西班牙人民和西班牙的历史，否则很难理解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而我深知，在这两方面我的知识都有局限性。就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这两种人说来，前者显然要令人感兴趣得多。就西班牙社会党所表现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说来，是一个思想狭隘和没有创造性的运动，它始终没有深入人心，或者哪怕是企图规划出适合整个国家情况的独立的政策和行动方式。它是强烈的集权主义性质的，支配它的概念是一个集权的和有纪律的政党，领导着一个附属的工会运动，它完全没有能够为强烈的地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动力找到发展的余地，而这些动力却是从加泰罗尼亚到极南部的工人阶级政治中的支配因素；由于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中央地区以外的西班牙人看来，它常常好象是卡斯提耳中央集权的一个代理人，而不是一个解放运动。这些特点使得西班牙社会主义后来在拉戈·卡巴勒罗的领导下将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引到了同普利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的合作中去；再往后，在内战期间，一种同样的集权化的反应，又将它们引进了俄国共产主义的怀抱。它自始至终，一直是不仅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而且还反对地方分权；西班牙劳工运动的命运与西班牙本身的命运一样，由于地方主义和集权主义这两个极端而苦难深重；以致集权主义者和自由意志论者甚至不能联合起来与他们的共同敌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天主教会——作战。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者是斗争的各派中最最人道的——因为他们在野蛮行动仍然是支配力量的环境中，是“西方化派”。毫无疑问，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就象他们与之斗争的统治阶级一样，往

往是残忍的，常常草芥人命。毫无疑问，尤其在南部的农业斗争中，甚至是在巴塞罗那的工业斗争中，蔚成风尚的是原始的农民起义而不是现代阶级斗争。尽管存在这种情况，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于有勇气以外，还有许多优良品质。他们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极其简朴，并且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是严格的道德家，恪守他们的信仰，常常盼望别人抛弃他们的懒惰和自私，表现出他们善良的天性。他们所开展的运动是一切工人阶级运动中最不重视物质、最不追求个人利益的运动；可是它仍然具有非常广泛的吸引力。他们的缺陷是完全没有能力——事实上是拒绝——服从大规模组织的需要，或者计划和推行任何统一的运动。

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追随者，大多数人对于理论一无所知，至于关心那就更少了。在农村地区，无政府主义对于它的大多数支持者说来意味着分配土地，除此以外几乎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他们非常愿意响应娓娓动听的言词，而且他们之中因而存在了团结一致，反对统治阶级的根深蒂固的情绪。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领袖不是理论家，而是巡回各地进行宣传的人，他们发表令人振奋的演说，他们高声朗诵无政府主义刊物上摘录下来的文章。在这些人中间，杰出的有费明·萨尔沃奇奥和何塞·桑契兹·罗萨，他们都是全国的知名人物；但是还有无数同样类型的、地方上的“狂热分子”。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演说家基本上是传道者，他们将无政府主义当作是一种新生的宗教福音和改革运动。

## 葡 萄 牙

关于葡萄牙的社会主义，我必须承认我几乎毫无所知。十九世纪中叶，傅立叶主义在那里有一些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西班

牙；国际工人协会的西班牙支部的领导机构在 1870 年有一个时期被迫在葡萄牙避难，这时，建立了一个葡萄牙支部。这个支部不可能存在很久；因为在 1876 年，成立了一个新的葡萄牙支部，作为保尔·拉法格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德里国际的附属机构。这个支部不久以后也结束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唯一比较重要的人物似乎是阿兹多·格内科，他也建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合作事业——卢西坦尼亚，结果失败了。此后，在 1911 年革命以前，实际上一直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运动，在这次革命中，一个社会党出现了。1912 年，在里斯本创办了一家报纸《社会主义者》，约在同时，一个社会党人、排字工人曼努埃尔·何塞·达·席尔瓦在波尔图当选为议会的唯一的社会党议员。主要是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领导下，还发展了一个小规模的工会运动，但是在 1914 年以前，社会主义和工会主义都不具强大实力。就我所知，在第二国际的任何一届代表大会上，都没有葡萄牙的代表参加，虽然格内科是社会党国际局的一个成员。 774

## 第二十一章

775

### 美国：加拿大

本书第二卷讨论了到二十世纪初叶为止，也就是到 1901 年建立美国社会党为止，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在此后十二年内，美国社会党从最初的小规模发展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党员达 15 万人，在 1912 年的总统选举中，得到的票数与 100 万张票相去不远。事实上，它一直只有一名候选人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威斯康星州的维克多·伯格，但是它在各州的州议会中，却有相当数目的议员，并且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小工业城市以及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在地方政府中显示了相当大的实力。尽管（也许正是因为）它不断拒绝与其他政党缔结选举联盟，尽管始终存在一个不断指责它是一个反动的、迎合时势的团体的对立的劳工社会党，它仍然取得了这些成就。此外，尽管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党内存在尖锐的分歧，尽管在政党与工会运动应保持何种关系方为正确的问题上，内部始终在进行斗争，而且还面对着美国劳工联合会——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都属于该工会——的大多数领袖的激烈反对，它仍然具有越来越大的号召力。

从 1901 年到 1912 年的这些年代里，美国社会党的大多数领袖不论属于哪一派，无疑地都认为，形势对于美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都是非常有利的，甚至认为，只消再进行几年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胜利就不成问题了。他们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非常腐朽，并且认为，面对着反社会的垄断资本的迅速发展，不久以后，产业工人的主体、一大部分农业人口和小资产阶级

776



以及白领工人都会相信有必要向社会主义前进，以逃避他们共同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封建主”所剥削的命运。社会党领袖们总是相信他们自己眼看就要控制美国劳工联合会，或者粉碎这个组织并以社会党领导的一个新的工会运动来取代它。这些年来，在这个联合会里，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党少数派。社会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似乎丝毫没有削弱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胜利即将到来的信念。

但是，在取得这种迅速而有信心的进展之后不出几年，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便完全瓦解了：直至今日也没能够有效地恢复起来。人们将这种衰亡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即使在欧洲，在大战开始以前，衰落的过程就已经开始，并且达到了一定的程度。1913年，美国社会党已经开始从它在1912年达到的高峰上一落千丈：甚至也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组织来取而代之。劳工社会党的德·里昂派只不过是一种不起作用的残余力量；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工业社会党人”几乎与社会党同时臻于极盛，在1913年，他们已经开始与社会党一起走下坡路。

显然，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学家说来，最重要的是探究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美国社会主义在本世纪初叶似乎取得了十分迅速的进展，而为什么后来又趋于衰落。历史学家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原因究竟主要在于当代美国社会发展的性质，还是在于美国社会党人本身的态度和行为。当然可以提出理由说，美国社会党人的思想和行动方式只不过反映了美国社会发展的不断改变的状态，而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与各种试图把运动导入相互冲突的道路、甚至导向社会主义本身的相互冲突的概念的社会党派别的优缺点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那些持有这种见解的人却难以说明，为什么在1900年到1912年之间实

实际上转而信仰社会主义的有这么多人，为什么在 1912 年以后，它的广大追随者又锐减。即使我们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影响的日益衰退主要是由于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开始起作用的那些因素，由于战争，影响更为严重，我认为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美国各社会主义派别的实际行为起了相当大的次要影响。

毫无疑问，使社会党人没有能在美国工人中间取得领导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天主教会力量的日益强大，天主教会始终在工会以及政治领域与社会主义影响进行斗争。在九十年代以前的那一段时期，爱尔兰人的天主教团体居于显著地位；而爱尔兰人在建立工会方面和在操纵各级党派政治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大约 1890 年以后，在大批涌入美国的移民中，包括有来自不很发达的欧洲国家——比如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和克罗地亚——的天主教工人；对于这些移民加入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加入具有社会主义或工团主义倾向的工会——比如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天主教会成了一种强有力的障碍。这并不妨碍美国社会主义在大约 1912 年以前，主要在非天主教徒中间取得迅速进展；但是，它的确严重妨碍了夺取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各工会和建立左翼色彩比较浓厚的对立工会的工作。天主教的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至少对工会超然于任何挂有社会主义招牌，或者“沾染上”阶级斗争理论或唯物主义行动哲学的运动之外，有着重要影响。

778 当然，世界上一切社会主义运动无时无刻没有内部派系，而且派系之间也都会有斗争；而通常总是能够从改良主义的右派与革命的左派之间的斗争这一角度来叙述这些内部斗争的，当然还常常有一个中间派与上述两个极端展开斗争，或者与两派中的一方结成朝不保夕的联盟来对付另一方。肯定地说，本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主义的派系斗争也是很容易从这些角度来加以叙述的——世

界产业工人工会代表革命左派的态度，威斯康星州社会党代表渐进论的、改良主义的右派，而有一个时候控制着美国社会党——并且帮助使它团结一致——的希尔基特派则居于中间派的地位一直到它在后期几乎完全与右派合而为一。任何人只要略微看一下美国社会党的历史，就不能不注意到这三个互相斗争的集团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但是，如果只根据这种划分来解释美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那么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就只能得到一种极其肤浅的了解。象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样，右派、左派和中间派都是存在的；但是它们同工人阶级或者是有组织的工人主体的关系，与任何主要的欧洲国家都是不同的。

我们已经知道，社会主义不论是在它的初期建立团体的阶级，还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都主要是作为一种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输入的学说在美国出现的。在1871年到1895年之间，前来美国的所有外国移民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德国移民，而来自英国的移民不到16%，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不到13%——这是人数居其次的两支移民队伍。在整个时期，意大利和斯拉夫的移民队都比较少：法国移民中虽然包括许多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见解的人，在总数中却只占1.5%——只不过15万人，而德国移民则在260万人以上。这些德国移民的人数之多是可以使他们在他们的主要定居地区建立起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本土的社会主义运动保持密切关系，甚至在他们完全适应美国的条件之后，也可以在极其显著的程度保持他们的民族特色和观点。他们之间仍然讲德语；他们开会时也主要使用德语；他们主要通过德文的报章杂志和偶尔出版的小册子来进行他们有关政策的宣传和讨论。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不学习如何讲英语，更不用说写英文了；有许多人虽然学了，可是在很长时期里，仍然以它作为第二种语言。在某些地方，他们维持着自己的工会，在另外一些地方，维持

着德国的分会,虽然随着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技术行业中的得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技术工人逐渐被吸收到劳工联合会下属各工会的队伍中去,并能在其中某些工会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在大多数先进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1914年的发展期间,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力和威信的巨大影响:在美国,这种影响最大,因为在美国有大批德国移民,可以通过他们来发挥作用。但是它的实力本身也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限制性因素,因为它阻碍了德国社会主义理论与美国社会条件相适应,而且往往使德国社会主义者成为孤立的集团,具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and 思想方式,主要在他们自己中间,或者在象奥地利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这样的在习惯和态度上与他们最接近的集团中间进行宣传。虽然德国移民就人数来说,在美国社会党内,只不过是人数较多的少数派,可是从一开始起,美国社会党就很受德国人的影响;当有些与当初创办这个党的主要集团很少共同之处的新人加入该党时,党内并没有出现真正的融合,也没有共同策划出一种符合美国条件的政策,因此,无论在观点或行动方面都不一致。美国社会党几乎在一开始产生显著影响时就陷于分裂,因为它碰到严峻考验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它团结一致。

社会党内的德国移民对于怎样使自己适应美国工会运动的情况茫然不知所措。在德国本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党与工会应保持何种关系方为正确具有明确的概念。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拉萨尔派,他们都希望在社会党的实际领导下逐步建立工会运动,作为党的盟友或助手。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对于工会运动争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力量可能存在分歧;但是他们一致认为,工会不可能使经济制度发生任何根本变化,而且只有工人阶级夺取政治权力之后才能使阶级制度发生任何改变,或者解放生产力使它不受资本主义矛盾的束缚。伯

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义者虽然相信通过一连串零星的进步能够实现巨大的变革，却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一样认为社会民主党有必要夺取政治权力，并认为工会主要是党的大军的助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流以后，认识到使工会不与社会党发生正式联系是上策——因为倘若存在正式联系，显然既会使工会受到政治镇压也会妨碍他们与基督教或自由党领导之下的对立的工会运动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仍然致力于使工会运动通过共同领导与党建立非正式联系，从而与党紧紧连结在一起，而且他们在相当显著的程度确立了这种优势地位。

在美国，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这种事情的希望十分渺茫。虽然美国工会主义中的某些部分是在英国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可是大体上说来，仍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运动。它是从美国特定的条件中产生的，而美国条件本身因地而异，出人很大；除了少数地区——尤其是威斯康星州——以外，社会党人丝毫没有可能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取得优越地位的方式，建立一种控制工会的优越地位。这一部分是因为，在美国就象在英国一样，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产生任何实际影响以前，工会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这也是因为，在美国，社会党人不能不在一种与德国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起作用。在德意志帝国，尤其是普鲁士，工人阶级面对着一个强大的、专制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它尽管在帝国议会选举中采用了成年男子普选权，仍然是建立在合法的阶级特权的基础之上。统治阶级仍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与军方有密切关系的地主贵族。最高行政权力掌握在首相手里，他是国王的代理人，而不是任何主要政治舆论的代表；联邦上议院拥有的巨大权力约束了帝国议会的立法权力。再有一层，在帝国内最大的一个邦——普鲁士，投票的等级制度有效地排除了大部分人民真正分享哪怕是一部分立法权的可能性，为工人阶级

取得邦议会中的代表权设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强有力的理由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群众性政党以反对整个政府机构；而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如果能够成为反对专制制度和阶级特权斗争的象征，就能够希望得到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至少除了在它不得不与天主教会共同分享这种支持的地方之外，情况是如此。在文化斗争期间，天主教会几乎和社会党人一样为维护它的生存权利而与国家斗争。在德国，工人的经济斗争比起政治斗争来是次要的；政治领袖可以说服他们的追随者，使他们相信，即使工会能够有所作为来改善工人的生活和保护他们不受极端的压迫，走向真正解放的第一步仍然必须是取得政权，并将国家变成社会进步的工具。诸如约翰·莫斯特和后来的古斯塔夫·朗道尔这样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这种见解，他们说不应该是取得政权，而应该是消灭政权；但是他们得不到什么支持，轻而易举地便被赶出了社会民主党，并且在工会里沦落到软弱无能的境地，大体上说来，工会满足于在社会主义大乐队内做一个第二提琴手。

另一方面，在美国，政府远不是那么无所不在，国家既不是一个专制政体，也不是为一个合法的、有特权的贵族阶层所控制。总统和国会都是一批选民选出来的，他们包括除了最近入境的移民以及受到南部种族歧视非法阻挠的黑人以外的几乎是所有的男性公民。联邦各州的州议会和州政府同样是在普遍选举的基础上组成：在美国，不需要进行斗争来争取德国人为之斗争的讲求形式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已经存在。这并没有妨碍政府——特别是某些州的州政府，在发生劳资纠纷时对罢工工人采取最激烈的行动，甚至是对被指控为进行颠覆性的反资本主义宣传的组织者采取这种行动。但是，它确实意味着，美国的大多数工人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或者在某些具体的场合，才认识到国家和政府是他们的敌人——比如说，在一帮资产阶级的雇主占有或收买了国家的权力

或权力的一部分,来帮助他们奴役有组织的工人,或不让他们的雇员组织起来的时候,更具体地说,在他们发动州民兵或雇主所控制的“公民”联盟的力量来破坏罢工,或者是收买州法官来陷害他们希望镇压其活动的工会领袖的时候。美国劳工运动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工人与雇主和雇主控制的国家权力的联合力量之间的激烈的、而且常常是血腥的冲突的历史。美国劳工运动有关与上述联合力量发生激烈冲突的记录与德国劳资斗争一向比较平静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如此,在美国,主要的斗争是在工人与雇主之间进行的,除了偶然的个别情况以外,不是在工人阶级与国家之间进行的。

大体说来,在美国,国家并不象它在德国那样进行统治;它只是为了某一件特殊的事情进行干预。不论我们是只考虑联邦政府,或者将联邦与各州放在一起考虑,情况都是这样。美国社会的主要模式是一个讲求形式的民主社会的模式,在这个社会里,大多数问题——至少是大多数经济问题——是留待直接有关各方进行激烈斗争来解决的,一般情况,只有在某个压力集团已经在这场斗争中控制了局面的时候,国家权力才作为这个集团的盟友插手进来,进行干预。当然,人们也接连进行过多次努力,企图通过建立厉行社会改革的政党来改变这种形势,这些政党会争取公众舆论来支持旨在团结老百姓对付大资本和金融力量的具体纲领;与这些工作同时展开的往往还有“清除”各级政府中贪赃枉法现象的运动。美国的“民粹主义”具有许多形式,在一个仍然以农业为主,而且在其国界内有许多小农业和商业企业家以及许多小手工艺企业的国家内,它的基础经常是设法使小农场主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靠工资为生者携起手来,展开一个反对“垄断资本家”的联合运动。自然,在“民粹主义者”的纲领中,对于无利息的或者利息很低的信贷的要求,有时候还有对于银行国有化的要求,都居于重要地

位，并且将金融资本家当作主要敌人；自然，这种要求在经济衰退时期拥护的人最多，而当经济条件改善时，往往就迅速减少。这种纲领一再出现，但是，它们的发起人始终没有取得可靠的胜利，也没有能够拟定使他们打算争取的各种各样的集团都感到满意的纲领。纲领的发起人以小人物的名义不仅指责“信贷垄断”的限制性质，而且指责金融资本所控制的大工业和商业规模日益庞大，他们指责这种工商业抬高物价，制造人为的物资恐慌，而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但是，小农场主最不愿意的事情莫过于使农产品价格降低；而小工业家或者零售商则倾向于指责资本主义的大公司出售的货物价钱比他们便宜，而不是指责他们使消费品短缺而昂贵。小企业家经常指责托拉斯和大公司在他们不得不向他们购买转手货物的时候，索价过高，正如他们指责银行家在贷款给他们时，要的利钱过高一样；但是，他对于降低他卖出的货物的价格则却同样不感兴趣。他认为大企业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者，这是因为大企业的生产成本低，因而使它能够日益侵犯他的市场，而不是因为它向消费者索价过高。因此，甚至在反对大企业的小企业中间，态度也有两面；当这些集团与产业工人或资本主义林业或农业企业的雇工联合起来进行运动时，就出现了更大的困难。当然，产业工人并不希望为了降低成本，从而使消费者买到便宜货物，而降低他们的工资。他正确地认为，如果他竭力要求更多地分享他的雇主的总收入，他的生活就会改善。他愿意与别人一道来竭力反对能够被指责为实行垄断的资本主义牟利者；但是在一个假定每个人都竭力追求他所能得到的一切的社会里，产业工人的主要兴趣在于在他的自己的压力集团内组织起来，从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任何雇主或者雇主集团取得他所能取得的最高工资和最好条件。

面对着这些“矛盾”——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术语来说——民粹主义运动在它们当初成立的理由不复存在时，特别是在经济衰退



之后情况得到改善时,就往往趋向下瓦解。但是,在这种运动中联合起来的人们,当他们分裂和企图单独行动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不可能建立稳固的政治组织。小农场主以及小工商业企业家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也有着不同的经济利益。毫无疑问,他们对于金融资本家持有共同的敌对态度;但是农场主希望粮食价格高,希望工业品价格低,另一方面,城市商人和小生产者的希望则恰好与此相反;至于越来越多的薪水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则希望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都低廉,唯有他们自己的服务——比如说教书或者做医生——能够有比较高的报酬。在民粹主义运动消灭时,所有这些集团往往就支持民主党,因为在大多数州里以及就整个联邦说来,共和党是大企业和大金融资本所大力支持的。但是除了少数地方以外,这些集团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控制民主党。或者充分团结一致,足以成为一个统一的压力集团对民主党起作用。由于这些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一致的要求,所以用一些零碎的、大部分是次要的让步就可以将他们打发走,要不然就是用一些漂亮动听的言词来报答它们,而这些言词是不会使政客们承担任何义务的。 785

工人在企图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时,也遭到同样的困难,因为靠工资为生者阶级以及他们谋生的条件都缺乏统一性。人们经常指出,在初期,当边界仍在向前推进,土地垂手可得的时期,至少对熟练工人说来,工资大部分是自动送上门来的,不过有一个重大的限制条件:那就是在经济衰退既影响工业也影响农业时,情况就不再是如此了。在向前发展的经济中,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相比非常丰富,熟练工人在经济景气时很容易流动,也很容易在某地定居,或者在一个新的、迅速发展的地区,找到一个工资比较优厚的就业机会;因此,这种工人,就象小农场主和商人一样,只有在发生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停滞的时候,才被迫趋向于激进的政治态度。但是,

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还有进一步的障碍,那就是:在美国成长起来的熟练工人在美国经济发展的那个阶段,远不是象欧洲的熟练工人那样,认为自己必然毕生要靠工资为生。甚至是一个在西欧成长而且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移民,在到达美国这样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土”之后,也很容易丧失一大部分与工人同志和衷共济的阶级感情,而产生思想斗争:一方面要忠实于他的阶级,另一方面又希望提高他的社会经济地位。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工人阶级内部的裂痕非但远没有随着美国边疆的逐渐封闭以及大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而消除,大约就在这个时期,肯定地反而大为扩大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之一是前来美国的移民人数迅速增加,其性质和命运发生了变化。从1850年到1880年,移民的实际人数虽然每年有很大出入,每十年的总数几乎总是大约250万人。在1881年到1890年的十年间,移民总数猛增到430万人。在下一个十年中间,下降到大约320万人,后来,在1901年到1910年这个时期,又上升到560万人<sup>①</sup>。此外,移民的性质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1880年以前,移民中有很大大一部分到农业中去,在进入工业的人之中,有相当多的人是熟练工人,他们与当时存在的那些技术工人并肩工作。当然,即使在那个时候,也有相当多的人在工业中做不熟练的工作,赚较低的工资——比如,在芝加哥的屠宰场或者矿区。那时的情况如果与1880年以后发生的情况相比,进入工业就业的不熟练工人是比较少的。后来从工业不那么发达的欧洲国家——那里的生活水平很低——来到了人数多得多的移民,也从日本和中国来到了非欧洲移民,这种情况使形势大变,导致了这样的职业的迅速增加:它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并与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大规模生产工具一起来使用这种劳动力。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

<sup>①</sup> 这是实际数字:当然总移民人数要多得多。

题：究竟是这一时期的移民的到来刺激了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还是大规模生产技术的成长刺激了移民人数的增加。显而易见的实际情况是，这些因素是相互起作用的。

无论如何，这批多数习惯于极低生活水平的移民的出现，对于美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的已经有人定居的工业区，情况尤其是如此。当时已经存在的工会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将新来的人组织起来并且要求给予他们“美国生活水平”，或者是对他们关门，以使本地的或者已经同化的美国熟练工人得到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条件。至于移民，由于受到语言和赤贫的阻碍，完全不可能单独成立有效的工会，因此很明显，第一种政策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建立某种会使美国的熟练工人担任一个联合运动的实际领导的工会运动，其办法是改组现有的行业工会，成为产业工会，然后逐产业地既向熟练工人也向不熟练工人开放，或者甚至是组成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工会，这种工会能向移民发出总的号召，并且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支持每个产业部门。 787

要不然就是采取另一个政策：不组织新来的人或者改善他们的就业条件，而是集中力量，垄断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并且将技术和适应美国工业条件作为难得的资本，尽量索取最高的级差工资。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以行业为基础的组织，通过采取谈判的方法，就能最好地实现这个政策，这些谈判方法旨在对技术性较高的操作或者是对于那些十分容易被人超过的操作进行垄断，办法是使用关于学徒的规章制度或者其他使人们难以接近这种操作的方法。

不用说，美国工会并没有彻底执行这两个政策中的任何一个。但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新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大多数工会更接近于奉行第二种政策而不是第一种政策。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劳工协会致力于吸收各种类型的工人加入一个无所不包的工会，不论他们的技术和职业，只是为了方便的缘故，才在这个工会下再划分成小单位，而权力则集中在中央领导的手里。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这种组织形式就遭到一种不同类型的工会主义的挑战，这种工会主义的基础是每一种行业或行业集团组成独立的组织，力图迫使雇主接受劳动条例，以主要保护和改善熟练工人的劳动条件，至于下层工人可能有什么遭遇则不予重视。在英国出生的雪茄制造工人塞缪尔·龚帕尔斯（1850—1924年）的能干领导下，这种类型的工会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成功地使越来越多的大小雇主签订了集体协定或合同，规定了工资和劳动条件，有时候还规定不得雇用非有关工会的会员。这个政策在最初并没有被采用，因为这是有意识地将移民排除在外或者把美国工人阶级分成两个集团——特权集团和非特权集团。之所以采取这项政策，实际上主要是群众工会运动没有能取得预期结果的一种反应。但是它与新的形势非常适应，在这种形势下，一向生活水平很低的没有技术的移民，开始在使用大规模生产方法的大工业的劳动力中，占有迅速增长的比例；它也符合美国社会将自己组织成为越来越多的、代表一种相当狭隘的共同利益的压力集团的趋势。

这种工会运动旨在增进每一个具体的熟练工人集团的经济利益，它与依靠要求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号召，或者力图将它作为一个阶级团结在一起，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以集体取得政治权力的任何形式的政治行动都是有矛盾的。与它没有矛盾的一种政治行动是，对国家施加压力，要它在劳资纠纷中不支持雇主，或者要它制定有利于工会权利的法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行动所采取的最自然的形式是将工会的选票转移到能够保证支持特定工会当时提出的最高要求的任何政党、集团或者个人的那一方面

去，而不是向任何一个党承担持久的义务。它的目的决不是使工会支持一个社会党或者工党；因为这样一种义务会彻底破坏工会对于实际当权的政党或者可能于最近的将来当权的政党施加压力的能力。压力集团的工会主义——人们常常称之为“纯粹的”工会主义——是希望将它的支持出卖给最有可能交出现货的政客；如果要诱导致客屈服于工会的压力，工会就必须能够给予他们以某种实际的东西作为报酬。 789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鼓舞下，这种工会主义迅速得势。但是即使在工会内部，它也不是从来没有遭到过反对，至于从外部，更是不断有人对它表示同样的反对。在1914年以前，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始终存在着一个很有力量的社会主义少数派，其中包括组成联合会的大多数正式工会中的一些领袖。这个少数派在接连几届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般的社会主义提案，有时候得到多达三分之一的票数的支持。这个少数派时常威胁龚帕尔斯的领导；有一次，有一年之久，由于它同与龚帕尔斯暂时有分歧的其他分会联合起来，竟将他从主席的职位上赶了下来。它在联合会内部的斗争与关于工会组织应有何种基础方为正确的争执是密切地纠缠在一起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是使它接受入会的每一个工会都有一个章程，说明它的“管辖范围”——也就是说，它有权力吸收什么样的工人——并且保证下属各工会中没有一个会插手到另一个工会后备会员中去。并且不准许两个工会争夺同一批工人。大体说来，这此关于管辖范围的章程是从行业而不是产业的角度来明确说明入会的资格——在一个特别注意以行业为基础来建立劳工垄断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在有些工业中，在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之间，很难划出明确的界线；在这一类工业中，迅速发展的天然物生产业居于重要地位。象汽车制造和橡胶制造这样从事现代化大规模生产

的工业，后来才属于这个集团。特别是在采煤业中，除非以产业而不是以行业为基础，是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工会运动的——由于煤矿矿主往往拥有和控制他们的雇工不得不在其中生活的整个城市或村庄，并且激烈反对给予集体谈判的权利以丝毫承认，由于他们通过雇用专用的武装暴徒，通过控制地方政府和州的权力，使用极端的暴力行为来破坏工会，或者使工会根本不可能组织起来，所以情况更加是如此。

面对着这种短兵相接的情况，必须容许煤矿矿工在凡属可能的时候，以产业为基础——也就是说不分熟练和不熟练工人——组织起来，而不是只组合熟练工人；还存在其他说明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并不严格遵照按行业进行组合的实例。不过一般说来，美国劳工联合会倒的确是坚持按职业而不是按产业划分界线的；所以，比方说，一家纺织工厂的维修工属于机械工人工会而不属于纺织工人工会，而运输工人即使是为一家制造厂所雇用，仍然属于卡车司机工会。大体上说来，美国劳工联合会里的社会党人不是赞成有别于行业工会主义的产业工会主义，就是至少认为，应该留有充分余地，在情况需要时，采取按产业结合的做法，并且认为不应该阻碍行业工会在他们认为适当时，将它们的队伍向属于各种行业的工人开放。美国劳工联合会里的社会党人宣布说，他们采取“从内部钻出来”的政策——也就是说，设法争取他们的同事支持阶级行动的政策，并且促成社会党人当选担任重要的工会职务。但是总有另外一些社会党人指责美国劳工联合会基本上是一支反动力量，认为要改变该会的信仰是一件毫无希望的工作，他们主张奉行一种对立的“双重工会主义”的政策——也就是说设法建立一些新的产业工会，或者是建立一个让所有工人参加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对抗，并且作为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阶级斗争的进取性的手段。在十九世纪九十年

代,在建立美国社会党之前,这是丹尼尔·德·里昂的劳工社会党的政策,该党组织了行业和劳工联盟,作为它与美国劳工联合会针锋相对的产业组织。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继承了战斗性的产业工会主义的衣钵,该组织最初是在德·里昂派和新的社会党左翼的联合支持下成立起来的,不久之后,便在政治行动问题上分裂成为德·里昂派和反德·里昂派,在社会党内,引起了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该党成员同以尤金·维克多·德布斯和威廉·达德莱·海伍德为首的双重工会主义的提倡者之间的严重分歧。

为了了解这些争论的性质和它们对于美国社会主义的影响,<sup>791</sup>有必要稍微交待一下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成立的始末,对这个组织最初的支持主要来自远西部的矿区和伐木区。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在1905年成立时,主要以一个工会——西部矿工联合会——为基础,该联合会一部分是由于管辖范围的争执,但主要是由于它所进行的激烈的劳资斗争,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发生了严重分歧。西部矿工联合会——与煤矿工人组成的矿工联合会全然无关——主要成员是在西部各州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城市中的金属矿工和冶炼工人。在这些孤零零的地区,劳资关系十分恶劣,公司为了阻挠工人组织工会,为了通过收买“治安”力量以及地方和州政府机器来支持它们以加强实力,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些地区实际上是作为公司所有和公司控制的城市,在资本主义企业一手经营之下发展起来的。

在这种背景下,1893年成立了西部矿工联合会,最初,它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1897年时它脱离了劳联。于是西部矿工联合会率先联合一些主要是地方性的“边疆”工会组成了一个西部劳工联盟,这些“边疆”工会与控制着西部各州大矿区、伐木区和石油产区的工业和定居点的公司进行斗争。运动最初的中

心是蒙大拿州的矿区城市比尤特；但是它迅速扩大到其他各州——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不久以后又扩大到了东部。1902年，西部劳工联盟改名为美国劳工联盟；三年以后，它并入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这个工会实际上是由它所代表的西部集团与中西部和东部各州的德·里昂派及其他“双重工会主义者”集团合并而成。在这整个期间，西部矿工联合会一直是这个运动的唯一真正坚强的组成部分；因为虽然运动后来包括了其他一些名义上超出地方范围的工会，它们之中没有一个真正有力量或者能代表有关行业中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多数。另一方面，西部矿工联合会在它的地区内是一个组织坚强的团体，在它的激烈斗争中获得大部分金属矿工和有关集团的拥护；它所采取的暴力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采矿公司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谈判和这些公司力图用狂暴手段来镇压工会主义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经过几乎二十年激烈斗争以后这种态度有了改变时，西部矿工联合会很快便丧失了它对极端行动的热情。1907年，它退出了它曾经帮助组成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1911年，它回到了美国劳工联合会。

西部矿工联合会中的杰出人物是它的主席查尔斯·H·莫耶尔和它的主要组织者威廉·达德莱·海伍德(1869--1925年)。这二人是成为运动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的一次著名审判中的中心人物。他们与另外一个人乔治·佩蒂波恩一起被控告谋杀爱达荷州前州长，一个名叫斯多农伯格的人，他在使用州的权力来对付工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此事是1906年年初开始的，当时爱达荷州的州警察在科罗拉多州非法绑架这三个人，并把他们投入爱达荷州的监狱听候审讯。1907年，他们的律师克拉伦斯·达罗为他们进行了著名的辩护以后，他们被无罪开释，此案就此结束。这件轰动一时的审讯案使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事务和政策成了全美国的注



意中心,但是它也在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内部引起了严重分歧,而这个联合会在它的主要左派领袖不再碍事的时候,退出了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主要也是由于这件事。因为,虽然被告没有犯谋杀罪,审讯中透露的情况却大事渲染了双方在前几年的激烈斗争时的行为,从而引起了舆论对双方的激烈攻击。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西部劳资纠纷中的这个暴乱时期绝不是到1907年就结束了;但是就矿工而论,斗争的激烈程度从那时起大有改变,想要彻底粉碎工会的企图也大体上放弃了。 793

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从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时起,在内部就存在着尖锐的倾向性冲突。诚然,它的创始者和支持者一致认为工人阶级政策的基础应该是革命性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宗旨应该是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和由有组织的工人在社会上掌握权力。他们也一致断然谴责这样的想法,即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和诸如铁路工人兄弟会这样的独立工会内部进行工作,指望使他们的会员改变信仰,从而采取比较激烈的态度和接受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该工会的创始者和支持者也全然反对这样一些社会党人:他们指望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并且进行渐进的改革,作为走向新社会的手段,并据此着手提出温和的改革纲领来争取非社会主义的选民,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是半社会主义的选民。但是,尽管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支持者一致反对正统的工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他们在导向他们的革命目标的积极政策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在他们中间,至少存在四个界线分明的集团。第一,劳工社会党的德·里昂派以及行业与劳工联盟,他们力主通过一个革命政党采取政治行动,但是希望这个党与革命性的产业工会运动联合行动,来避免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追求任何改革,并完全利用选举和议会制度作为教育和启发工人的手段,以便争取他们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同样,希望它也完全为了同样的目的进行

日常的劳资斗争。德·里昂派相信，党和工会运动应该由革命的社会党人来领导，贯穿着革命思想，党则应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决策机构，对它的所有成员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在时机成熟时，引导产业工人采取统一的革命行动。

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内部的第二个集团——其杰出领袖是  
794 W. D. 海伍德——不象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完全摒弃政治行动，而是认为它居于十分次要的地位。海伍德本人在1913年被赶出美国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之前，是该党的一个积极的成员；他总是反驳说他反对参加政治的指责。但是，他认为，必须主要在产业领域内进行阶级斗争，而能使工人阶级革命化的唯一有效方法是使工人不断在矿区、工厂和其他劳动场所进行对资本家进行斗争以从中得到锻炼。因此他的目的首先是建立一个激烈的、革命性的产业工会运动，而认为社会党的作用是次要的。事实上，他比这更进了一步；因为他认为，参加竞选以及参加政府和地方政府机关的工作必然会使参加者腐化，除非他们受到不断地、积极地在工业领域内进行阶级斗争的工会运动的推动，并不断对这一运动负责。海伍德所采取的这种态度来源于他在不断扩展的西部矿区和伐木场得到了实际经验。他不可能完全摒弃政治行动，这不仅是因为他希望利用产业工会运动作为工具，来不断对于同大企业沆瀣一气的敌对的国家 and 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而且是因为他认为作为产业斗争战略的一部分，至少有必要夺取地方政府机构。不过，他与德·里昂派如出一辙，都激烈反对各种各样拉选票的妥协办法，以及企图利用现有的政府机构来实现渐进的改革的一切做法，在他看来，除了革命以外，工人在政治上能做的唯一有益的事情是防止政府机构被资本家利用来对付工人。此外，海伍德认为未来的无产阶级社会将以革命的工会运动而不是政党作为基础。工人本身通过他们的产业工会，将从资本家手里接收工业的管理权，并且将

以他们的有组织的工业力量的直接机构来代替议会和政治执行机构。

当然,这种见解在许多方面接近于法国工团主义者的见解;但是这种见解不是从他们那里借鉴来的,而且与他们的信仰也并不完全等同。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内部的海伍德集团的主要观念是“大一统工会”的观念,在阶级基础上将全国——不久以后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起来,并且根据一项全面的计划使全体工人接受中央集权的领导。海伍德始终坚持说,“大一统工会”必须成为新的无产阶级社会的总的策划机构,为生产力的正确使用和发展作出安排,以满足工人的需要和控制产品的分配。实际上,产业工会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地方的积极分子集团的自发的主动行动;但是,一方面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坚持以地方自治作为自由社会的必要基础,海伍德派却认为,除了依靠集中的工人阶级力量以外,不能有效地对抗资本主义的集中力量。这两个思想流派都强烈地相信革命的中坚分子——就是法国人所说的“有觉悟的少数”——的概念;但是,西部劳工联合会和西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都力图置中坚分子于中央控制之下,并且在凡属有机会时将它投入战斗。

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以及在它以前的西部劳工联盟)在为言论自由的权利进行斗争中所使用的方法特别说明了这种政策。每当在某个地方开始了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时,其他地方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会员就蜂拥而至,投入斗争,结果招致逮捕,使当地监狱人满为患。当然,这些策略之所以行得通主要是由于西部边疆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性极大。西部的劳动阶级经常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地方——往往坐火车而不出钱买车票。他们不象大多数法国工人,甚至不象美国的比较安定的地区的大部分工人那样,在当地有家有业,难以脱身。他们并不是他们碰巧在那里工作的城市

或者营地的居民，而是一支流动的劳动力里的组成部分，对于这支劳动力说来，他们在哪儿都很习惯，或者说在哪儿都不怎么习惯。<sup>796</sup>在积极分子中间，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种团结一致，反对他们的阶级敌人的强烈情绪，这充分表现在他们所唱的歌曲以及在他们日常交往中逐步形成的行话中。但是这种团结并不是地方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产业领域的行动中要比在拉选票的行动中比较容易形成团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追随者中间，第三个集团是政治行动的彻底的反对者——就是人们往往与海伍德派混为一谈的无政府主义产业工会主义者。这一派在理论方面深受欧洲的影响。它的无政府主义是来自欧洲的移民输入的，虽然，在美国经历的条件使它发生了变化。这种无政府主义可以追溯到约翰·莫斯特（1846—1909年）和以他的刊物《自由》为中心的集团以及八十年代的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sup>①</sup>，在外国移民中拥护这一派的人数最多。当西部矿工联合会的退出破坏了产业工会运动在西部各州的力量以后，这一运动开始大部分为这一派所控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部的产业工会主义是一种本土的观念，是从一个边境地区的区域性条件中产生的，没有受到多少欧洲的影响。

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既不想控制国家，并将国家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也不想成立一个接管国家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工会来取代国家，而是要消灭一切强制性的政权，由工人在地方的、社区的基础上成立“自由”的和自发的自治组织，以地方团体的“自由”联合组织作为处理广泛地区的问题的工具。此处毋需叙述他们的基本理论，因为在其他各章在谈到它们在欧洲的表现形式时，已经做了充分的讨论。此处只需要说明，在美国，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感到

<sup>①</sup> 关于莫斯特和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可参看本书第2卷。

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将从欧洲,特别是从那些欧洲的工团主义势力很强大的拉丁国家,或者是从东欧或东南欧的不发达地区涌进这个国家的大批移民组织起来。虽然在十九世纪,到美国来的德国移民比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移民都要多,在二十世纪初期,却是意大利移民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法国人比较少;他们对于美国工团主义的影响不如意大利人的影响大。移民定居在大城市,成了工厂工人、商店和饭馆的雇员或者是形形色色城市职业中的服务人员,意大利人在许多地区就成了这些移民的领袖。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大部分参加了制针行业,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工团主义对他们也是有号召力的。

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还包括第五派人,这一派人的杰出榜样是象尤金·维克托·德布斯(1855—1926年)这样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是接连几次总统选举中的社会党候选人。德布斯曾经组织铁路工人成立一个无所不包的产业工会,来反对保守的铁路工人兄弟会,他便是这一活动的领袖,并因此而出名。铁路工人兄弟会是在行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它无视铁路建筑和维修方面所雇用的不熟练工人的权利。德布斯本人是个铁路工人,担任火车司炉兄弟会的书记,但在1892年,为了按照纯产业界线组成美国铁路工会,而辞去书记职务。1894年,他领导新的工会,在对大北铁路公司进行的一次重要的罢工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在同一年,当他的工会对于许多铁路进行抵制,以支持普尔曼铁路公司工人的罢工时,公司进行了报复,使联邦法庭颁布一项禁令,并促使联邦政府调遣联邦部队到伊利诺斯州帮助破坏罢工。德布斯本人被控以阴谋罪,后来虽被宣布无罪,仍以破坏禁令罪名关在监狱里,在此期间,公司、法庭与联邦政府采取联合行动破坏了罢工,也破坏了工会。这是第一次利用法院的禁令程序来挫败工会的行动;此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联邦部队不顾开明州长约翰·P.阿尔特·杰尔

798 德的抗议，被调遣到了伊利诺斯州，关于这位州长，我们已经在关于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的叙述中提到过<sup>①</sup>。这些经验使德布斯转而信仰社会主义，他参加了美国社会党的建党工作，立即成了它的最受欢迎的领袖。他始终是党的极左翼，并且不屈不挠地提倡产业工会主义。他是党的杰出的演说家，因而得到许多人的拥护；尽管他与它的大多数领袖存在明显的分歧，他仍然在接连几次选举中，被提名为党的总统候选人。作为党的巡回演说家，他的持久力是十分惊人的；有许多年他是党内能够得到党外广泛支持的、唯一真正受欢迎的领袖。党的右翼一再想取消他的总统候选人的地位：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声望始终是无懈可击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采取了坚定的和平主义态度，因而再一次被监禁。德布斯虽然在表示他的左翼意见时是直截了当的，却不断拒绝担任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免纠缠到社会党的内部争执中去：他不喜欢受约束，拒绝接受党的干部会议的指示。他的社会主义是非教条的，具有强烈的道德倾向。理论对于他说来没有多大用途，对于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不感兴趣。他坚信有必要进行阶级斗争，相信没有阶级的社会必然会出现，他毫不妥协地提倡一种使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有共同组织的工会主义；因此，他强烈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各种形式的行业工会主义。他支持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但是他既不是海伍德类型的“大一统工会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工团主义者。在任何其他国家的劳工运动中，与他差可比拟的人物是乔治·兰斯伯雷，兰斯伯雷具有大致与他相同的道德倾向和对于下层工人的苦难的强烈同情——还具有能够激怒右翼社会党人和工会主义者的同样的能力，这些人最后不得不承认他的真诚和道德力量。在德布斯的带动下，许多社会党人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运动，不然这些人对于该运动强烈反对资本

<sup>①</sup> 参看第2卷第331页。

主义道德和将暴力当作对付资本主义压迫的正当对策，是会有反感的。

事实上，这种摒弃普遍道德准则的态度是美国社会党人中间<sup>799</sup>辩论最激烈的问题，而反对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人正是不断利用该工会的这个行为特色来使它不得人心。这种摒弃道德准则的态度最激烈地表现在远西部，在那里，产业工会主义者经常与采取措施时在道德上无所顾忌的反对派进行斗争。在西部各州的边疆地带的冲突中，开枪、非法逮捕、驱逐出境和殴打“煽动者”是司空见惯的；而公司所雇用的代理人并不是仅仅“罗织罪名，陷害”他们打算清除的工会领袖便善于罢休。工会主义者以暴力作为回答，不仅是对付“工贼”以及公司的奸细和代理人，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对付被公司收买来从事他们肮脏勾当的政客和警察；海伍德和其他领袖在为这种行为辩护时，指责整个司法治安机构只不过是歪曲真正的正义和自由，它所代表的概念只不过是工人毋需考虑的“资产阶级道德”。一切诸如此类的言论都使主要报纸感到震惊并进行申斥，并且成了对冒犯者采取镇压措施的理由。当然，在这些申斥中，有很大程度的伪善因素；但是，产业工会主义者摒弃通行的道德标准的做法也使许多社会党人感到震惊——特别是在社会党成立初期支持社会党的人数相当多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德布斯虽然为极端分子辩护，说他们所以采取暴力行动是由于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而且往往肯定是不合法的镇压，他始终没有走到摒弃道德准则的地步，而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正是由于摒弃道德准则在不加深思的公众中间名气不佳，并使它更易于受到迫害。他仍然是一个多少比较孤独的左翼知名人士；正是他的孤独大大有助于使社会党在它的对立派别之间恶感很深的情况下能够团结一致。

在西部矿工联合会退出以后，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内部的对立

派别之间不久便在政治应占的地位，或者不如说是政党应占的地位问题上摊了牌。1905年通过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会章开宗明义便说：

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只要千百万劳动人民处于饥饿和匮乏的状态，而构成雇主阶级的少数人却享有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就绝不可能有和平。

在这两个阶级之间，斗争必须继续下去，直到不仅是在产业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他们都团结起来，并且在不隶属任何政党的情况下，通过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占有他们的劳动果实。

这种令人相当迷惑的措词是折衷的产物。除非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既赞成产业领域的团结也赞成政治领域的团结，德·里昂派是不会参加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但是如果他们提出参加政党的问题，就必然要引起这样一个疑问：产业组织应该隶属两个对立的社会主义政党中间的哪一个。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内赞成政治行动的人也不一定希望工会组织隶属任何政党；因为这种隶属关系可能意味着党为不完全接受它的理论的分子所冲淡。事实上，他们中有许多人喜欢德国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工会运动并不隶属于党，可是接受它的领导，而且由党的忠实同志来担任负责工作人员。他们希望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中，就象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要取代的行业和劳动联盟中的情况那样。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这一部分是由于在那个时候，新的社会党比德·里昂派的劳工社会党发展得迅速得多；一部分是由于德·里昂派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成立初期吸收其大部分会员的西部根本没有势力。

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内部的德·里昂派非常重视会章序言中似乎同样强调政治组织和产业组织的措词。与此不同的是，不仅是



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而且还有西部产业工会主义者都认为产业行动是革命的工人阶级活动的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形式，因而对于德·里昂派以及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一些社会党的追随者始终不厌其烦再三加以重复的、关于政治方面的讨厌词句感到恼怒。因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西部集团联合起来，力图对序言进行修改，将一切提到政治的词句删去。 801

1908年，这些集团以酿酒工人工会的 W. E. 特劳特曼和西部的文森特·圣约翰为首，提出并且通过了对第二段的一项修正，内容如下：

两个阶级之间，斗争必须继续下去，直到全世界的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占有土地和进行生产的机器，并且废除工资制度。

原来的一段文字全被删掉，根本没有提到政治行动，也没有以明确的措词提到产业行动。但是，序言的其余部分表明，建立经济方面的阶级组织被认为是首要目标，并且进一步表明，这种组织不仅要成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要成为革命胜利以后管理社会的控制机构。政治行动并没有明确排除——不会有多数赞成这样做——，但是也没有加以肯定；这个问题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干脆一带而过。

德·里昂派绝不能容忍这样做，他们立即退出了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他们在单独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成立了一个对立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并且重申多数派所删掉的政治条文。事实上，他们更进了一步，拟定了一段远为更明确地体现他们的观点的新文字。这段文字如下：

两个阶级之间，斗争必须继续下去，一直到劳动者团结起来，在政治

方面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所支配的明确的革命政党的旗帜下，在工业方面，在大一统产业工会的旗帜下来夺取和占有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并且管理这些资料和手段来造福所有的财富生产者。

因此，1908年以后，有两个对立的团体都以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为名，都各自力图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群众性革命组织。以海伍德为其主要人物的多数派总部设在芝加哥；对立的德·里昂派的国际产业工人工会以底特律为中心进行活动。在这两个机构相比较，芝加哥团体的规模大得多，影响也较大；但是这两个机构人数都不多。在分裂的时候，这两个团体加起来几乎还不到15,000名交纳会费的会员，大约一年以后，芝加哥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还不到1万人，而底特律的国际产业工人工会最多只有4,000人。此后由于它们的活动使它们成了主要是纺织工厂中的移民工人的罢工运动的领袖，它们的会员人数都增加了。但是在罢工期间大批加入的新会员，一旦罢工过去，几乎总是立即消失了；甚至在极盛时期，芝加哥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在1914年以前，肯定始终没有达到2万名可靠的会员，底特律的国际产业工人工会的会员人数肯定从来没有超过1万人。拟议中的群众性工会始终没有成立：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所以具有世界声誉并且产生积极的影响是由于存在少数特别积极的革命者，他们愿意在任何时候，挺身到任何发生劳资纠纷的地方去。在这方面，它继承了它的远西部的前身——西部矿工联合会和美国劳工联盟的策略：但是它主要是将这种策略应用于东部和中西部的移民社会，而不是应用于西部各州的边疆条件。

我认为，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活动之所以引起骚动，主要是由于它的反对者所进行的宣传，而不是由于它自己的努力。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和洛维耳以及新泽西州的派特逊的纺织工人罢工无疑是重要的，因为罢工标志着移民的反抗开始了。他们作为廉价

劳动力的来源受到剥削，并且处于比“美国的”工人要低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但是，这些罢工的规模非常小，如果美国的企业权益集团没有准备千方百计地将罢工镇压下去，罢工引起的注意相对说来本来会小得多。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在受熟练的技术工人的工会运动发展影响的地区，美国资本主义对行业工会主义做了估量，而且准备与它妥协，可是偶尔也还要采取比较原始的丛林战的方法。还有许多大公司雇佣劳工奸细和私人暴徒队伍，并收买行政当局伪造证据来对付工会运动；但在很大程度上说来，只在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企图采取联合行动的地方，才使用这些方法。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矿区城市和遥远的西部，在亨利·福特的汽车工厂，在钢铁工业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和邻近各州的石油开采和伐木地区，在凡属大批工资低的移民工人使“煽动者”有机会制造骚乱的地方，还仍然使用这些方法，但是就组织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的大多数团体说来，资本家不管是多么不服气，总算是汲取了一个教训：通过向熟练技术工人妥协来分裂工人阶级，要比不分青红皂白对各种形式的劳工组合进行镇压要保险一些。在熟练工人的工会满足于作为压力集团为他们自己的会员争取最好的条件，而不去为他们队伍以外的人们的命运操心时，与他们妥协往往要比以“订合同的自由”的名义镇压他们来得稳当。此外醉心于金圆的资本家是了解渴望得到钱的技术工人的，只要他所追求的不过是改善他自己和他的同事的条件，而不提出工人阶级团结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来胡闹。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工会，它们的发言人要求“废除工资制度”，并且宣称全体工人应该实现阶级团结，而且宣称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势不两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宣扬这种理论的鼓动者和赞同这种理论的组织将被无情地看作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敌人，或者用当时的一句流行话来说，作为犯了“罪恶的工团主义”罪的人来追击。有一些州的法律规定宣

803

传工团主义理论是犯罪；在那个时候政治迫害所以不象今天这样大张旗鼓和丧失理性完全是因为当时的世界不象后来那样神经错乱和疯狂到极点。

804 在分裂以后的时期中，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活动的的高潮是1912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的纺织工人罢工<sup>①</sup>。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说明一批由于语言不通和大多数美国工会主义者对他们的情况漠不关心而受到严重掣肘的工人是如何有效地随机应变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在组织他们进行罢工时，巧妙地利用了以语言分单位的办法，以及用各种语言作书面和口头宣传。但是它应变的杰作莫过于群众纠察线，即不断移动工人的队伍来阻止破坏罢工的工贼进入卷入争端的工厂。当局诉诸法律来禁止使用这种方法；但是在公众的深切同情以及大量金钱的支持下，再加以积极分子准备被逮捕，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坚持它的战略，从而取得了显著胜利。不过取得这一成就是付出代价的，又有一些敢于将他们的阶级斗争原则付诸实施的领袖被控告了。主要的罢工领袖中间，有两个人——约瑟夫·埃托尔和阿瑟·乔凡尼蒂——由于因罢工而产生的事故，被控以谋杀罪，到后来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的时候才被释放，这时成千上万的在罢工期间参加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工人在得到了好处以后，已经几乎全部退出了这个工会。洛维耳和派特逊的罢工也同样使大批工人参加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但是当暂时的骚动结束时，两个工会都没有能够在有关的地区保持住相当多的会员。在组织移民成为更持久的团体并为他们争取到持续的让步的工作中，以悉尼·希尔曼（1887—1946年）和戴维·杜宾斯基为首的、革命性较差的成衣工人工会和妇女服装工人工会不久就取得了大得多的成就。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基本上是一个积极分子的联盟，没有能力执行工会组织的日常工作。

<sup>①</sup> 关于更详细的叙述，参看1913年出版的拙作《劳工世界》。

它有时候也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它不能减缓它的革命步伐来满足日常需要。

在工会进行积极活动的这个时期，美国社会党人不仅在工会问题上，而且在他们的基本目标方面陷于严重分裂。在工会问题上，主张“双重工会主义”的人与主张从历史较久的工会“内部钻出来”的人形成尖锐对立。大多数社会党人在原则上赞成产业工会，而反对行业工会主义，痛惜行业工会主义者对下层工人的福利漠不关心；但是问题是，致力于从内部改变行业工会的信仰是否能够争取它们，使它们更多地奉行社会主义政策，或者，它们是否大力采取压力集团的策略，以致认为它们与资本家本身具有几乎一样的资本主义观点，于是就把它们一笔勾销。此外，有许多社会党人虽然在理论上认为产业工会比行业工会主义可取，对于工会事务却很少兴趣，往往认为它们与社会主义事业几乎风马牛不相及而不予理会。尤其是威斯康星州的社会党人具有这种态度，他们是美国社会党中最强有力的、组织最紧密的部分，而且唯有他们在政治上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为他们的领袖在国会争取到一席之地。威斯康星州，尤其是它的首府密尔沃基，居住着一大批德国移民，他们是移民初期前来美国的，而且不断有新的移民从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一批一批地涌入美国。以维克多·伯格(1860—1929年)为首的德国人坚决主张建立一个有纪律的群众性政党，致力于夺取政权并利用工会主义主要作为选举中的辅助工具，认为这样的政党是可取的。但是，在德国，社会党人至少在理论上继续将希望寄托在革命上，并且对旨在加强资本主义国家力量的措施心存疑虑，而伯格及其追随者却都认为美国目前的国家基本制度已经十分民主，可以安全地加以利用，在它上面建立起一个社会化的和逐渐进行社会改革的上层建筑。他们认为美国不需要革命：美国的形势只要求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选民，和建立一个有足够实力的

806 群众性的社会党来取得对于现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控制。伯格尔忠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宣称必须采取独立的社会党的政治行动，不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或者发生瓜葛；但是为了为社会党争取选票，他愿意缓和他目前的纲领，以便尽量少得罪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选民，并且愿意维护任何看来能够增加他的直接追随者人数的主张，比如要求成立“廉洁政府”等等。不过，他是强烈的集体主义者；事实上，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与集体所有制以及经营重要企业和服务事业几乎是同义词。他基本上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愿意用这样一些要求来表达他的直接愿望，就是将必不可少的公用事业以及由声名狼藉的托拉斯和垄断公司所控制的工业改为国家的或地方的国有企业。产业行动对于他和他的集团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们认为这种行动几乎不会有任何成就，认为当前形势的关键在于用选举手段和平地取得政治权力。此外，伯格尔具有德国人所特有的对于秩序和权威的爱好的爱好，他对于左翼行动的狂暴感到厌恶。尤金·德布斯使他恼怒，他认为此人完全没有能力进行有条理的理性的思考，并且认为此人由于给予一切没有定形的叛乱以感情用事的支持而正在危及社会主义的命运。在伯格尔的领导下，威斯康星州的社会党人形成了美国社会党的几乎是一个坚定的右翼；但是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右翼。有一些其他右派集团希望社会党人与资产阶级进步团体联合起来，结成力主改良的集团，或者希望工会加入按照英国的模式建成的半社会主义的工党。维克多·伯格尔的追随者绝不愿意进行这种妥协：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别具一格的社会党人，他们坚决认为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必须投奔他们并接受社会党人的称号。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接受了爱德华·贝拉米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集体主义理论<sup>①</sup>；但是他们与贝拉米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政策建立在右翼所

<sup>①</sup> 参看第2卷第372页。

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还在于为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规定了一个逐渐建立新社会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他们追随爱德华·伯恩斯坦，而不是贝拉米或者英国的费边主义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修正主义者的称号。

与伯格爾渐进的集体主义相对的另一极端是对于丹尼尔·德·里昂的领导感到不满的革命的社会党人。参加1901年成立的新社会党的主要集团之一当初脱离劳工社会党主要是由于它不同意德·里昂的“宗派主义”政策，并且认为他的行业和劳工联盟的失败使他们有了强有力的理由，可以不相信根据一个既无视争取直接让步的斗争，又将获得实际经济利益的希望推迟到革命以后的纲领，有可能将美国工人组织起来。这些分裂分子中有许多希望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日常斗争，从而将联合会的会员转变成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另外一些对于工会兴趣较少的人拒绝了德·里昂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且希望建立一个更近似于德国和奥地利社会党人的群众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这些群众性政党将当前的改革纲领同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结合在一起。这两个集团以及在成立新党以后新参加进来的人构成了新党的中心，但是它们的性质并不相同，除了它们都不同意右翼和左翼的极端派这一点之外，见解也不是一致的。它们一方面包括进步的工会主义者，比如联合矿工工会的马克斯·海耶斯和马萨诸塞州哈佛里尔的詹姆斯·F·凯雷，另一方面包括中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些理论家的领袖人物是纽约律师摩里斯·希尔基特（1869—1933年）以及作家约翰·斯巴戈（生于1876年）和A. M. 西蒙斯（生于1870年）。这两个集团开始时都是党的中间派，由于反对工团主义者和左翼的极端产业工会主义者的倾向而逐步地被推向右边。到世界工人工会开始活跃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维克多·伯格爾和反对革命分子的右翼的同盟者了。

在 1914 年以前的那些年里,参加组成美国社会党的不仅仅是这些人。在这一期间,还有相当多的作家和新闻记者、牧师和从事其他自由职业的男男女女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堕落以及赤裸裸的对比感到震惊,于是开始支持争取廉洁政府的运动,或者反对具体的暴力或法律上不公正的行为,或者反对大企业的反社会措施,最后他们相信整个制度已经腐烂,需要彻底清除。还有人数相当多的所谓“百万富翁的社会党人”——这就是团结在社会党周围的一些有钱人,就象在他们以前,团结在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建议周围的另外一些人一样。并不是所有这些类型的信徒实际上都参加了党;但是有不少人参加了,还有一些人在为党出谋划策时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在党的队伍中杰出的工人阶级领袖比较少,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杰克·伦敦(1876—1916年)以及厄普敦·辛克莱(生于 1878 年)的著作在争取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辛克莱的《丛林》揭露了芝加哥屠宰场的情况,于 1906 年问世;杰克·伦敦的《铁蹄》在第二年问世;在几年以前,弗兰克·诺里斯的《章鱼》(1901 年)和《矿坑》(1903 年)揭露了美国商业中投机分子的丑恶形象。艾达·塔贝尔的《美孚油公司史》(1905 年)和其他反托拉斯的著作也有助于使许多人信仰社会主义;象美国费边社创始人 W. D. P. 布利斯(1856—1926 年)以及乔治·D·赫伦(1862—1925 年)这样的作家在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是很活跃的。在转变信仰的新闻记者中有查尔斯·爱德华·鲁塞尔和罗伯特·亨特尔,这两个人都成了积极的党员。亨特尔以前以社会工作者闻名,1906 年参加社会党,他的写作大有助于将欧洲社会主义的知识传播到美国。第二国际当时似乎在迅速发展;1905 年的俄国革命以及英国工党在 1906 年顺利地初次上台都对美国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1907 年的财政恐慌又给予美国舆论进一步的影响。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西奥



多·罗斯福执行“反托拉斯”政策期间；当塔夫脱在 1909 年继罗斯 809  
福为总统，共和党迅速向右转的时候，有更多感到希望被灭的进步  
党人加入了社会党的行列。在 1900 年的总统选举中，尤金·德布  
斯得到了不到 10 万票，而劳工社会党的候选人只得到大约 33,000  
票。1904 年，德布斯的选票增加到 40 万张以上；1908 年，只不过  
421,000 票；但是到 1912 年，达到了 90 万张票，在此期间社会党  
的党员人数也迅速增加，从 1908 年的大约 3 万人增加到 1912 年  
的最高峰 15 万人。

当然，这些新党员中有许多是体力劳动者；但是这个没有大规模  
工会给与支持的政党在中央和在许多地区都受到中产阶级分子  
相当多的控制。也许有人说，在大多数欧洲的社会党中，情况也是  
如此，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杰出领袖确实也是来自自由职业者阶级  
——比如饶勒斯、维克托·阿德勒、王德威尔得、海德门和威廉·李  
卜克内西，还有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吉尔·哈迪和奥古斯特·倍  
倍尔是突出的例外。但是在大多数国家中，领袖们不管出身于什  
么阶级，都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主体，或者至少是与其中相当大  
的一部分，密切合作展开活动的，并且必须考虑到工人阶级的反应  
来制定他们的政策。可是，美国的社会党人却是和美国工人的主  
要代表组织进行斗争，只有那些对于工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派系进  
行反抗的工人阶级领袖支持他们。此外，党内的工会主义者陷于  
严重分裂，有的主张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内部“钻出来”，有的支持  
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这种情况使许多中产阶级的社会党人论证  
说，社会党应该避免在任何方面卷进工会的斗争中去；只有几乎完  
全置身于日常的劳资斗争之外才能做到这一点。维克托·伯格  
尔和他的绝对政治行动主义的追随者，确实主要采取了这种态度；  
但是那些由于看到周围的剥削和非正义行为而成为信徒的“感情用 810  
事的”中产阶级社会党人则内心十分矛盾，他们一方面同情下层工

人，另一方面对于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所特有的那种狂暴的演说和行动产生反感。有的人走这条路，有的人走那条路；但是到头来他们中大多数人总是和维克托·伯格爾，或者至少是和摩里斯·希爾基特站在一边，反对“毕尔大哥”海伍德，同时支持尤金·德布斯，认为他是一个置身于日常斗争之外的社会主义战士。

毫无疑问，在加强社会主义右翼来反对左翼方面，著名的麦克纳马拉兄弟案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个案件与社会党或者世界产业工人工会都没有直接关系。与该案有主要关系的工会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这一事件是从1910年桥梁和结构钢铁工人工会的会员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罢工开始的。洛杉矶市政委员会试图通过发布命令禁止设立纠察线来破坏罢工，当时发生了骚乱，结果逮捕了大批罢工工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当混乱达到极点的时候，《洛杉矶时报》的建筑被炸毁，炸死了21人。该报在反对罢工方面一直起主要作用，它立即控告工会要为这次爆炸负责。臭名远扬的伯恩斯侦探局被雇佣来调查这一案件；第二年年初，工会秘书约翰·麦克纳马拉的兄弟詹姆斯·B·麦克纳马拉以及另一个名叫麦克曼尼加尔的人在底特律没有使用逮捕证就被捕了，并被解到了洛杉矶。约翰·麦克纳马拉同样在工会总部所在地印第安纳波利斯被捕，这三个人都被控以谋杀罪。麦克曼尼加尔由于希望保全自己，在威逼利诱之下承认工会教唆了一些爆炸事件；但是他否认与《时报》馆的爆炸案有任何牵连。劳联请克拉伦斯·达罗（1857—1938年）进行辩护；但是达罗开始相信詹姆斯·麦克纳马拉是有罪的，因此与原告进行协商，希望拯救约翰·麦克纳马拉，当时约翰不在加利福尼亚，显然与《时报》爆炸案没有牵连。詹姆斯同意承认有罪，条件是无罪开释他的哥哥；但是原告坚持不仅要判处詹姆斯无期徒刑，而且要判处约翰十年监禁；而达罗由于担心正式审讯会对工会产生影响，勉强同意了。这些协商是瞒着社会党人

在其中很活跃的辩护委员会进行的；德布斯等人一直在进行广泛的运动，相信被捕的人完全无辜，是受到了雇主的“陷害”。因此，达罗的行动公开时，人们感到惊愕万分；事情更糟的是在审讯的时候，尽管詹姆斯极力辩护，法官仍坚持判处约翰十五年徒刑，詹姆斯则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证据表明，詹姆斯·麦克纳马拉实际上与《时报》爆炸案以前的一些爆炸案有关，虽然没有一件造成了生命损失。另一方面，证据表明约翰·麦克纳马拉和工会与《时报》事件全然无关。事实上，约翰之所以承认强加于他的他在爆炸案中的罪责，完全是由于当局告诉他这是唯一能挽救他兄弟性命的解决办法。

麦克纳马拉案件确实对于左翼工会主义有很大损害，尽管世界产业工人工会除了支持辩护以外，与此案毫无瓜葛。这个案件被利用来掀起公众反对一般工会主义的情绪，特别是战斗的工会主义；许多比较稳健的社会党人由于感到害怕而对党的左翼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右翼之所以能在1913年年初的一次复决投票中，终于将W. D. 海伍德赶出全国执行委员会，与此事大有关系，虽然海伍德和麦克纳马拉案件毫不相干。

到了1913年，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将海伍德逐出执行委员会一举使许多左翼党员退党，右翼党员也有退党的。此后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加速了它的衰落，其实在这以前已经出了毛病。1912年以前，社会党人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是得势的；但是到了1913年，他们在那里也遭到了严重的挫败，因为劳联在全体公众反对左翼的意见的压力下开始向右转了。事后回顾，很容易看出，社会党人使劳联转面信仰任何种类的社会主义的希望总是渺茫的，但是在1913年以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没有这种看法。相反地，主张“从内部钻出来”的人相信，由于公众舆论趋向于社会主义，劳联中的大多数会迅速受到他们的影响。

1912年，劳联代表大会上将近三分之一的票数赞成某些社会主义的提案，但是这样的高潮此后永远没有再现。

现在我们不得不再问一下，美国社会主义为什么在1900年至1912年之间取得了相当重大的进展以后，会突然衰落下来，而且为什么没有得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支持。只要首先考虑一下社会党人在某些欧洲国家的工人中间，在建立领导地位方面取得非常重大成就的真正原因，就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德国和奥地利这种社会党人在工人中间占最大优势的国家，社会党不仅与雇主阶级，而且也与强大的、专制的和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进行斗争。他们象与资本主义斗争一样地与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作斗争，而且实际上斗争的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领袖和选民的思想里，反对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政治斗争所占的地位实际上比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更重要；而资本家、军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终于联合起来反对工人这一事实，也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不仅成了一个坚固的经济集团，也成了一个坚固的政治集团。在法国，形势不那么明朗，社会党人从来没有对工会建立起同样的优势；在英国，封建主义、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并不占优势，只是通过一直到1918年才献身于社会主义而且其最高权力为社会党人所掌握的工党，工会才与社会党人结成了联盟。但是，即使在英国，工会也逐渐倾向于接受某种社会主义，而且的确接受了社会党人作为他们在共同斗争中的盟友。

在美国，军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比较次要的因素，国家机器完全没有它在德国和奥地利所具有的那种专制和贵族的性质。政府的确常常偏袒资方来反对有组织的工人，并且无情地使用国家的力量来镇压他们。但是，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联邦政府、州政府或者地方政府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作为雇主们收买的帮手来行动。工人的主要斗争是反对雇主阶级而不是反对政府；它特

别反对的是雇主阶级的一部分——大托拉斯、垄断资本和金融集团而不是反对较小的雇主，或者整个雇主阶级。极端残酷无情的斗争大部分限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某些有限地区——主要限于新开辟的采矿业、伐木业和石油工业，限于煤矿和大规模生产企业的中心，如芝加哥、贝思利赫姆和底特律等处。在这些有限的地区，阶级斗争比西欧要激烈得多，虽然法国的劳资斗争也很激烈。但是，在全国范围说来，美国从来不存在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或者说从未残酷无情到使整个工会运动受到影响，更没有使整个工人阶级受到影响。此外，由于至少在形式上说来政府的基础是民主的，并由于政府对工人的干涉是时断时续的而绝不是普遍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工人阶级的政治情绪普遍激昂起来反对国家。革命分子于是很少见的，而在德国和奥地利，则大部分工人都认为政治革命有朝一日必然到来，认为这几乎是一件肯定无疑的事情。美国的劳资关系就象美国生活中的其他因素一样，有一种边疆上无法无天和擅处私刑的味道；但是无法无天与革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而且是从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产生的。美国的革命者虽然并非完全是一些从欧洲带来革命原理的移民，却大部分是如此；隐藏在西部各州的激烈的劳资斗争后边的实际上是一种无法无天的心理，而不是革命主义。

因此，作为一种从《共产党宣言》得到鼓舞的革命理论，美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有多大发展。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包括大多数工会主义者在内，没有必要进行政治革命：充其量也不过是需要安 814  
置一些新人来控制国家机器，然后利用这些机器为工人服务。不过，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工会特别不愿意接受社会党的领导。在美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或者可以统一的工人阶级。即使将黑人问题除外，这里也存在着两个美国工人阶级，一方面是比较有特权的工人贵族，由当地的美籍熟练工人以及大多数

来自经济比较进步的欧洲地区并掌握同样技术的移民所组成。另一方面是人数越来越多的不熟练工人，他们一部分来自比较先进国家的农业地区，但是也日益增多地来自生活水平大大低于美国本地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国家。当然，不可能在这两个集团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有许多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差别已经非常具体，足以深深影响美国的阶级结构和阻碍统一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形成差别的一个因素是语言，这个因素使得讲英语的工人对大多数其余的工人具有极大的优势，虽然对德国移民并不是这样，德国移民在威斯康星州和其他地方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水平很高的社会。随着非常贫困和大部分没有工业生产技术的讲外语的移民入境人数的增加，鸿沟越来越深。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时本来对于会员和对于欧洲思想都是比较开放的工会，开始关门而变成了主要是熟练技术工人的工会，这些工人希望建立和维持他们的特权和优越地位，无意冒险去替陌生人战斗。此外，美国社会的风尚和发展速度助长了工会发展成为压力集团的倾向。在美国与其说政府是一个应该反对的敌人，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应该被挤压的桔子。大企业已经指明了这条道路，最便当的作法是学它的榜样。政客作为一个阶级既不招人憎恨，也不受人尊重：他们可以说是具有进取心的能干人，有时候可以贿赂他，有时候可以威吓他，有时候可以哄骗他。此外美国是一个充满经济机会的国度，这样说与说它是一个热衷于追逐名利的野心勃勃的人的国度并没有多大区别。企业家醉心于赚钱被认为理所当然；由于工人也要赚钱，所以正确的作法似乎是尽力挤压雇主，使他认识到，他的利益在于向那些挤压最凶的人让步。显然，工会要企图代表整个工人阶级这样作，要比代表特权部分这样作困难一些；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业工会主义是收效最大的组织形式。也许有人反驳说，没有必要到美国去就可以找到行业利己主义和对于

不熟练工人漠不关心的例子。说得对，但是美国的引诱力比其他地方更大一些，奉行这种政策更容易一些，这是由于美国工人与移民之间存在着鸿沟。在美国也不存在促成政治团结的因素，这些因素在西欧帮助统一了工人阶级对产业问题和对政治问题的态度。

如我们所见，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主要在远西部有了一个开端之后，实际上主要发展成了对于人数较多、然而既没有知识而且挣钱又少的移民产生影响的几批人数不多的革命领袖的组织。但是，它从来也没有能够将这些人组成一支能够在直接斗争之后继续存在的有组织的力量。只是在对移民的限制已经减少了不熟练工人的流入，并有时间来大规模同化已经来到的那些人的时候，在美国才有了建立群众性工会的机会。此后，产业工人联合会才击败了反对在大规模生产企业中建立自由工会组织仍然强有力的力量，从而确立了与劳联并驾齐驱的地位。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过去的旧帐仍然使两个团体不能合并成为一个运动。产联下属的各工会也并没有在接受产业工会主义的同时一道接受社会主义。

为避免离题太远，此处就不对此后发展作进一步的讨论了。这里我要谈的问题到1914年欧战爆发为止。我一直试图说明，为什么即使在“自由土地”时代已经结束，“边疆”已经实际封闭以后，<sup>818</sup>在本世纪初叶，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没有真正成长壮大的余地。我认为，突出的原因有二——一是不存在使欧洲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专制的军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动机，其次是工人阶级分裂成为特权集团和没有特权的集团，在这两个集团之间，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上都相差悬殊，包括语言障碍在内。第二个因素使得在美国不可能采用折衷办法，即社会党人与工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准备维护整个工人阶级权利的工党。正象第一个因素使美国完

全不可能以德国为蓝本建立社会民主党一样。

在本章所研究的时期内，美国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动的弱点反映在它的思想的贫乏上。亨利·乔治所著《进步与贫困》一书是一个美国人对于社会主义思潮所作出的唯一真正卓越的贡献，可是这本书却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杰克·伦敦所著《铁蹄》，不仅作为一本小说，而且作为对法西斯主义的卓越的预见而受到了赞扬，它也的确是这样。厄普敦·辛克莱的小说，从《丛林》到《石油》，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许多有力的谴责。爱德华·贝拉米在他所著的《回顾》中，写出了一个是受欢迎的、但并不是非常吸引人的乌托邦。有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非常出色的阐述，并企图应用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美国的社会。但是关于整个社会主义，或者特别是关于美国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人写过任何有份量的或有创见的作品，除非把索恩斯坦·维布伦（1857—1929年）算在内，他的理应受到赞扬的《有闲阶级的理论》（1899年）是一套社会学著作中的第一部，在这套著作中，他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进行了最尖锐的批判和评价。不过，维布伦的著作是反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具有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他预言资本主义即将消失，以及在现代社会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价格制度”即将消失，但是他没有提出明确的补救办法，除非凭借他最新的著作，把他算作是技术主义福音的先驱人物。正如在他以前的圣西门一样，他开始肯定地相信，人类的未来在于作为生产力的计划者和控制者的“工程师”，并且相信，某种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必然要取代目前的你争我夺的个人主义的混乱局面。他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夸大了社会进化中的纯经济因素，而牺牲了心理因素。他的哲学基础是康德，而不是黑格尔；他主要是从科学作为一种实用知识的发展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发展的。除了一些热心崇拜他的人以外，在



他的时代很少有人阅读他的著作，可是近年来他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主要并不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虽然有少数人，比如约翰·阿特金森·霍布逊，颇受他的思想的影响。

除了维布伦和亨利·乔治以外，与社会主义有关的美国思想在1914年以前的时期主要表现在偶尔出现的关于社会主义政策的著作的演说中。在杂志方面，美国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倒的确不少，其中有一些刊物读者非常广泛。在这方面很突出的是朱利乌斯·A·威兰德(1854—1912年)，他的刊物《诉诸理智》1895年开始在堪萨斯城出版，在1910年左右，发行额即达25万份以上。另一种很受欢迎的刊物是盖洛德·维尔夏尔(1861—1927年)在加拿大主编的《维尔夏尔杂志》，但是该杂志主要在美国发行，月销售量号称10万份。另一种虽然销售量少得多可是很有名的刊物是赫尔曼·F·泰特斯主编的《社会主义者》，该刊最初于1900年在西雅图发行，后来迁移到托莱多，在那里泰特斯有一个时期与一度担任过社会党书记的威廉·梅利(1871—1912年)合编这家刊物。泰特斯原来是西雅图的一个医生，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积极参加了社会党左翼，他攻击机会主义者争取选票的作法，坚持有必要建立健全的理论基础。后来，《社会主义者》迁移到爱达荷，然后又移回西雅图，继续代表社会党左翼，一直到泰特斯于1909年退出社会党。

另一个极端是威斯康星州机关报《社会民主先驱报》，该报在先盾许多位编辑的主持下，主张奉行维克托·伯格曼集团的纯政 818  
治政策。最大的社会党出版公司——芝加哥的C.H. 克尔出版公司所发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提供了更公开的左倾的论坛。《评论》初创办时是一种知识水平相当高的进行学术探讨的刊物，主编是A.M. 西蒙斯；但是在1908年，克尔决定进行改组，使之比较通俗化，将编辑职务移交给了玛丽和莱斯利·马尔西。玛丽·马

尔西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一个猪肉包装商的速记员的信》——她实际上担任过这项工作——的作者，此书于辛克莱的《丛林》问世以后不久出版。马尔西夫妇将《评论》改编成了一种有插图的通俗杂志，使月销售量骤然提高到将近5万份。

但是，所有这些活动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都很小。正如美国社会主义领域很少有什么有创见的著作一样，美国的产业工会主义领域也没有出现任何著作可以与法国工团主义的大量著作相比拟。对贝拉米以后的美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情况，必须根据维克托·伯格和他的威斯康星州的追随者的文章和演说来研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丹尼尔·德·里昂<sup>①</sup>，他的著作受到了列宁的推崇；但是除了德·里昂以外，其他人几乎只限于对欧洲理论作第二手的阐述。对于大批偶尔出现的著作进行研究以后，人们所得的印象是，这里不乏善意的人，他们准备用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和独立工党在英国所用的大致同样的方式为社会主义提出道德上的论据。但是这里没有象费边社那样真正善于思考的集团来为美国社会条件设计出渐进主义的政策：也没有任何坚强的推进力量将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并且使他们深入下层。许多右翼社会党的著作极为幼稚；左翼往往太激动，为生存而进行十分艰苦的斗争，以致没有闲暇来思考问题。少数作家，比如威廉·英格利希·瓦林在他所著的《当前的社会主义》（1912年）一书中对于欧洲社会主义及其基本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性的研究。年轻的华尔特·李普曼所著的《政治序论》（1913年）一书是在几乎全新的社会心理学领域进行的一次开拓，是出色的批判性的探讨，主要就是受了格雷厄姆·华莱士的启发。但是，所有这一切与使得社会主义在美国实现这样伟大的任务相比，还是微不足道，远远不够的。进行尖锐的批评和有利的攻击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也做到了；但

<sup>①</sup> 关于德·里昂，参看第二卷第373页以下。

是缺乏建设所需要的材料,没有出现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加 拿 大

由于社会主义在 1914 年之前在加拿大并无重大发展,本卷没有列入对加拿大社会主义的研究。加拿大劳工运动在八十年代以后主要是在来自美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最初主要是通过劳工协会,该会在 1881 年在安大略省的汉密尔顿建立了第一个加拿大分会,到八十年代后期,在加拿大有了不下于二百五十个分会。劳工协会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很强大,后来就迅速衰落,虽然在魁北克有一些分会一直存在到 1910 年。在此期间,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些“国际性”工会<sup>①</sup>从八十年代开始就逐渐侵入加拿大,不是成立新的分会,就是接管以前是加拿大的独立团体。早在 1873 年,就成立了一个企图将各种类型的工会联合起来的加拿大劳工联盟,但是由于遭到严重的商业萧条,只存在了几年。1886 年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央机构——加拿大职工大会,最初只是在安大略有追随者,但是基础相当广泛,既包括隶属劳工协会的团体,又包括隶属力量日益强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国际”工会。这些“国际性”工会逐渐得势,1902 年,职工大会排除了属于劳工协会的团体,也排除了与劳联没有关系的独立工会,这些独立工会于是就开始成立一个对立的,纯加拿大的中央机构,最初叫作全国职工大会,后来叫作加拿大劳工联合会,主要力量在魁北克。在新斯科舍,1879 年在矿工中间成立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叫做地方工人联合会,后来扩大到了其他行业。劳工协会以及此后不久的联合矿工工会开始成立分会来与它竞争;于是地方工人联合会迅速

820

<sup>①</sup> 时至今日,美国有许多带“国际”字头的工会及其他组织,实际上其活动范围只及于美国及加拿大,所以此处“国际”带引号。——译注

失势。不过它一直存在到 1917 年成立地方性的联合矿工工会，但是到第二年就与“国际”联合矿工工会合并了。特别是在魁北克，也有一些天主教的行业工会，可是这些团体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联合起来，正式成立了一个天主教工人联合会。

因此，在加拿大就有了好几个对立的工会运动，它们的主要的根据地在全国的各个不同地区。其中力量最最大的是与美国劳工联合会有密切关系的加拿大职工大会。职工大会与产业行动没有什么关系，这个行动主要是由劳联的各“国际”工会控制的。它主要致力于在整个自治领以及在各省争取劳工立法；它还企图取得限制移民的法律，特别是进入城市地区的移民。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它赞成采取政治行动；但是它将这项工作完全交给省联合会或者单独组成的劳工选举机构去进行。在一些省里选出了少数劳工候选人，但是一直到 1918 年以后，才成立全国性的工党，虽然特别是在 1906 年成立英国工党以后，曾经作过几次建党尝试。九十年代曾经存在一个小小的加拿大社会党，有好几年时间，它的地方支部加入了职工大会，但是这种关系到 1902 年结束了，社会党根本从未产生过广泛影响。

1902—1903 年，当美国劳工联盟——这是美国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一个分支，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先驱——开始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建立分会的时候，出现了新的挑战。就是这个团体派遣了本·W·贝克尔作为代表去参加 1904 年的阿姆斯特丹社会党代表大会。紧接着这个运动到来的是大约从 1906 年起扩大到加拿大西部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运动。德·里昂派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国际产业工人工会——在分裂后也扩大到了加拿大；这两个工会都取得了一些进展，一直到 1915 年，由于他们的反战活动而被解散。1918 年以后，它们恢复了一个时期；但是在战后的年代里，主要的左翼挑战来自 1919 年成立的“大一统工会”，那一年，温

尼伯的总罢工就是这个工会发动的。

在 1914 年以前，加拿大劳工运动没有出现杰出的领袖。渥太华排字工人 D. J. 奥敦纳宁(死于 1905 年)后来被称作加拿大劳工运动之“父”，他是 1879 年加拿大劳工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排字工人的多伦多的乔治·道威尔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P. M. 德雷佩尔和汤姆·穆尔在 1900 年以后，都是 1914 年以前的职工大会中的杰出人物。此外还有从 1906 年起，代表蒙特利尔任议员的阿尔芳索·韦尔维伊以及职工大会的律师和议会法案起草人 J. G. 奥敦纳宁。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对社会主义或者劳工运动的思想作出任何独立贡献。加拿大的工会主义大部分追随美国的榜样，而在魁北克以外地区的政治活动则是附和英国争取社会立法的要求；不过根据自治领宪法，大多数形式的劳工立法属于各省职权范围，所以必须主要以省为单位来进行活动。在自治领一级，主要是工会权力和限制移民问题。除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受到了美国劳工联盟和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产业方面的影响以外，几乎一直到 1918 年以后才产生社会主义问题。

## 第二十二章

### 拉丁美洲：墨西哥革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拉丁美洲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一直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有两个国家——阿根廷和乌拉圭——有代表参加第二国际，虽然还有两个国家——智利和巴西——时常派观察员出席它的历次代表大会。整个地区，从墨西哥到巴塔哥尼亚，主要是农业地区，有少数采矿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少数其他城市，比如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还有一些工业。此外，除了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以外，居民主要是印第安人和混血种，有些国家混杂着大批黑人。阿根廷到 1914 年为止，接纳了大约 250 万意大利的和 150 万西班牙的移民，还有人数少得多的移民来自欧洲其他地区：乌拉圭的居民大部分也是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比例大致相等。这是拉丁美洲唯一其居民主要是纯种欧洲人的两个国家。巴西的人口主要是黑人或混血种人，并同化了大约 3 百万白种移民。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仍然主要受着当地出生的白人地主贵族的统治，其中有一些人拥有的产业比西班牙的贵族的产业要大得多。印第安人和混血种往往仍然在接近于农奴制度的租佃制度下劳动：黑人从法定的奴隶身份得到解放后，大部分处于同样情况，或者往往处境还要坏。外国公司拥有的矿山和大果园在技术上比当地业主所管理的大多数企业开发得好，整个说来，工资也不那么低得可怕。但是它们非常坏，在政府的帮助下，它们用高压手段镇压叛乱或者罢工行动。在阿根廷和乌拉圭，劳动条件好得多，但是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条件仍然是非常坏的。在各地，宗教对

人民的影响非常强烈，特别是在黑人中间，天主教信仰掺杂着较原始的宗教信仰。教会是一个大地主；仍然大部分来自欧洲的教会统治集团与普通的乡村神甫之间有着很深的鸿沟。文盲非常普遍——在许多地方，印第安人和黑种居民几乎全是文盲。慢性营养不良的情况也是这样，随之俱来的是疾病和夭折。

整个说来，拉丁美洲虽然包括大片荒芜不毛之地以及连绵不断的蛮荒丛林，如果生产资源哪怕得到差强人意的利用，它也很可能在比较高的生活水平上养活多得多的口。然而事实上它的可耕地只有一小部分面积被利用，甚至还包括大片听凭牛羊放牧而不加照管的地方。农村居民拥挤在仅足勉强让他们维持生计的小片土地上，而周围是完全无人居住的、属于大地主或者教会的辽阔地带。在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想办法改进利用土地的方法。阿根廷和乌拉圭实际上是畜牧业很发达的国家，受着欧洲和美国的肉类进口公司的控制；在北部，在美国的管理下发展着果树种植。智利也有它的资本主义采矿业：在许多地区开采了黄金和白银，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又开始对玻利维亚的锡进行开发。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锡兰和马来亚开始形成威胁以前，还在巴西内地探索橡胶。

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在 1914 年以前，与西欧国家有丝毫相似之处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多大发展余地。但是，几乎可以说直到 1914 年为止，那里所有的运动大体上都是模仿欧洲社会主义，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形式的社会主义，虽然法国的影响和在较小的程度上德国的影响也起了它们的作用。从这些国家来的移民所起的作用很重要。美国的社会主义则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但是 824 亨利·乔治的思想在那些企图面对实际上是根本性的至关紧要的土地问题的拉丁美洲人中间是很有影响的。不幸，在大多数有关的国家中，这样的人太少了：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

城市运动在产业工人中发展起来的，一直到 1914 年以后才在农村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在墨西哥，虽然在临近第一次大战的那些年代里，在波菲里奥·狄亚斯垮台以后，大革命经历了它的初期阶段，农业领袖和城市工人阶级之间也一直过了很久以后才有实际的结合。

在当时普遍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必然主要是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给它以支援的是少数的熟练工人，如印刷工人、木匠、面包工、机械工人以及公共和公用事业的雇员。大多数在边远地区劳动并且受到残酷压迫的矿工只是到后来才加入了运动。社会主义者有的作为中产阶级主张改革的政党的左翼出现，与有土地的贵族和教会的统治进行斗争，也有的作为反对这些政党的宗派出现，在一个异邦，将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派之间的争论，将议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将社会民主党人与工团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进行到水落石出，由于这些争论者都没有任何有效的群众支持，争论也就更加激烈。对于激进派的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有深刻影响的孔德派的实证主义，一部分与社会主义理论有争论，一部分则与社会主义理论合流。天主教派中没有产生左翼，甚至也没有产生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哥斯达黎加，在本杰明·努涅斯神甫的领导下才有了一个小小的开端。事实上在墨西哥有许多乡村神甫支持土地革命；但是教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却是反对人民的贵族的道道地地的盟友。

实际上，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社会主义的历史是随着 1848 年以后欧洲移民的来到开始的。在 1871 年巴黎公社以后，随着更多的信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避难者的到达而进入第二阶段。象在世界上很多地区一样，现在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影响是傅立叶和卡贝的影响。罗伯特·欧文 1827 年时关于在得克萨斯和以后在



墨西哥土地上建立新的合作国家的偶发的奇想,以及后来他与圣·安纳将军的谈话并没有为人们留下永恒的回忆。1848年以前,唯一的社会主义表现形式是1838年巴斯克的空想诗人何塞·伊斯特班·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1805—1851年)在阿根廷建立的一个“五月协会”,他根据圣西门和皮埃尔·勒鲁的思想为这个协会写了一篇宣言。埃切维里亚是一个流亡者,他定居在蒙得维的亚,在那里发表了他的最著名的著作《社会主义学说》(1846年),阐述了他的宣言中的理论。他还写了关于经济计划和社会哲学的著作,这些书在1915年和他的《社会主义学说》一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再版。在埃切维里亚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时候,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他被认为是阿根廷社会科学的创始者和阿根廷的第一个社会历史学家。地位次于他的是一个法国人陶登内,他于1845年在里约热内卢出版了昙花一现的《社会主义评论》。1849年,在哥伦比亚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俱乐部。比较重要的是弗朗西斯科·比尔宝(1823—1864年)于1850年在智利建立的平等协会。四十年代时,比尔宝是一个智利流亡者,在巴黎曾参加1848年革命。他回国以后对于合作运动和互助运动极为热情;他和他的后来在政治上与激进派合流的追随者在促进合作协会和互助协会的建立方面是非常活跃的。他们为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合作和互助运动奠定了基础,因此使智利直到今天还是拉丁美洲最强大的合作中心。墨西哥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也有一个合作运动。

此后出现了希腊裁缝普洛提诺·罗多卡纳蒂,他于1861年在墨西哥创办了一种傅立叶派的刊物《公共之家》。后来在古巴,在1868年到1878年之间当地出生的白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一系列起义开始时,出现了西班牙人领导的第一个无政府主义集团;并且象整个起义一样,反映了西班牙当代的混乱。它们的领袖萨土尼诺·马丁内兹在烟草工业工人中间组织了一个工会——这是整个

826 地区第一个范围广泛的工会。

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事态发展变得比较活跃。在墨西哥建立了很多的合作协会和互助协会，有许多互助协会开始发挥雏型工会的作用。在1872年，成立了“墨西哥工人俱乐部”——这是第一次企图建立一个普遍的组织——并且开始发行一种刊物《社会主义者》。1876年举行了一次墨西哥劳工代表大会；1878年，阿尔伯特·圣菲建立了一个巴枯宁派联盟。在狄亚斯的独裁统治下，工会和无政府主义团体不得不主要进行地下活动；但是它们发展得很快。有一些工会团体与美国的劳工协会有了松散的隶属关系，另有一些工会则模仿它的方法。但是这些运动主要存在于手工艺人和非常有限的工厂工人中间。它们并没有触及矿工，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几乎没有接触。它们是移民的运动，而不是主要是印第安工人阶级的土生土长的运动。

同时在奴隶制度一直继续到1888年的巴西，进步分子主要注意的是路易斯·阿尔维斯和约昆·纳布科领导的解放运动。在阿根廷，欧洲的移民在建立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团体方面非常活跃——法国的、意大利的、德国的和西班牙的团体大部分是单独组成的。法国人埃米尔·杜马——他后来回到法国，成了一个议员——在1872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办了《劳动者》，并且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支部，后来领导这个支部的是查尔斯·毛里。不久以后，S.波列伊创办了《革命者》，德国人也出版了自己的《前进报》。1878年，阿根廷印刷工人建立了一个正式的印刷工会，这个工会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团体并为其他行业树立了榜样。第二年，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一个国际社会主义协会，这个协会在八十年代期间由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埃里科·马拉特斯塔的访问而得到了加强。无政府主义者在秘鲁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于1884年在秘鲁成立了一个各行各业的工人都能参加的总工会。

1887年,在智利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那里,1874年就实行了成年男子选举权,不过要受识字测验,因而大大地限制了它的范围。新政党的名字是民主党,不过有一个大致是社会主义的纲领,并且得到合作协会和互助协会的有力支持。它的领袖是拉菲尔·阿伦德,它的当地的理论家是马拉基亚斯·孔查,他使这个政党有了明确的社会主义方针,但是后来这个方针又被放弃了。从这个党的活动中产生了1870年硝石矿工以及社会运动以前没有接触到的其他团体的罢工。党为路易斯·雷卡瓦伦(死于1924年)的活动指出了道路,他后来成了新世纪里智利工会主义和左翼社会主义的杰出领袖。

在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发生激烈争执的同时,阿根廷的社会主义运动日益具体化。阿根廷各团体响应1889年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号召,发动了一个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成立了一个阿根廷地区工人联合会,创办了一个由阿夫·拉尔芒主编的《工人报》。团结在A.乌勒所编辑的刊物《前进报》周围的德国人,首先在1890年组织了规模巨大的五一节示威游行,参加这次游行的有许多工会和合作组织。法国人的团体也有他们的刊物《社会前途》,编辑是阿希尔·刚比耶。主要由于这次运动,有别于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各社会主义集团在1894年联合组成了阿根廷社会党,参加了第二国际,并派代表出席了它的历次代表大会。两个中产阶级人士立即担任了新党的领导人物,他们后来成了阿根廷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杰出人物——这两个人是帕拉西奥和胡斯托。

阿尔弗雷多·L·帕拉西奥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演说家——讲台上的伟大人物,非常受欢迎的浪漫主义者。他也是一位顽强的斗士。他在晚年,曾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校长和上院议员;但是在九十年代,他朝气蓬勃而热情,在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有着

巨大的影响。他的合作者胡安·B·胡斯托（1865—1925年）是一个技术高明的青年外科大夫，此时已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且是一位作家而不是一位演说家。他将《资本论》译成西班牙文，并且使他出版的刊物《先锋报》成为德国类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喉舌。帕拉西奥在1904年当选为议员——他是社会党人当选为议员的第一人。胡斯托在数年之后就继他而当选。在初期，领袖中还包括阿希尔·刚比耶和乌勒；不久以后，又加入了A.S.洛伦佐，他担任党的书记，并向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移民问题的报告；此外还有青年诗人曼努埃尔·乌加特（1878—1932年），他有一个时期住在巴黎，在国际社会党联络局中代表阿根廷。

社会党的建立促使无政府主义者又作了新的努力。社会党人希望利用工会作为议会斗争的辅助工具：无政府主义者决心争取工会，使它们不受议会政治的危害和引诱。但无政府主义者本身又分为两派：一派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对于群众组织不感兴趣，而信任一群革命弟兄的使命；一派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们希望建立以总罢工作为主要武器的革命工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当1890年成立阿根廷地区工人联合会的时候，“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合作，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不是全心全意，因为该联合会是社会党团体倡导的，特别是德国人倡导的。1892年联合会瓦解了：在社会党的领导下，联合会又重建起来继续拖延了四年，然后真正瓦解了。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主要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影响下进行大规模的罢工活动。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会在一系列的单独运动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让步——事实上，争取到的不是八小时工作日，而是在一些主要行业中的每星期五十四小时的劳动。比起以前的工作小时来，这已经减少了很多；在工资方面也有了很大提高。

1898年，意大利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皮埃特罗·戈里在阿根廷停留了一个时期，企图说服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者转而支持日益强大的工会运动，以便挫败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党人，将工会运动团结在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之下。这样作的效果很显著。1901年，大多数工会联合组成一个新团体——阿根廷地区工人联合会。<sup>829</sup> 1902年以后，阿根廷地区工人联合会发动了一系列越来越普遍的罢工运动。贸易很萧条，失业现象十分严重，遭到警察严厉镇压的这些运动，却战斗性越来越强。同时，在1902年，拒绝了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的工会成立了一个对立的联合会——全国总工会，这个机构逐渐与社会党发生了密切关系。政府企图诉诸特别法律来对付罢工工人，但是面对着大规模的示威，政府撤回了它的法案。这种混乱情况在1909年五一节的大示威中达到了最高潮，这次示威被警察驱散，造成很大伤亡，接着举行了总罢工，通过总罢工，取得了进一步的巨大让步。但是在同年11月，波兰无政府主义者西蒙·拉多维茨基用炸弹炸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警察首脑法尔孔上校。政府接着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其中包括行使一项反无政府主义法律，使非无政府主义的工会和社会党也受到了影响。在1906年以前，许多工团主义者都是社会党党员，但是到1906年的时候，社会党将他们开除出党。许多人留在全国总工会内，总工会成了改良主义者与革命者斗争的战场——前者坚持说工会应该集中力量提出立刻可以实行的改善条件的要求，而后者则大体上同情阿根廷地区工会联合会鼓动总罢工以作为社会革命的准备的政策。总工会中的稳健派也非常赞成合作事业，积极促进合作社和居住区以及合作生产，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在1909年的混乱后，左右两翼都受到了迫害。许多工人组织被勒令解散或者赶入地下，许多领袖被逮捕或者从首都放逐出去，或者不得不逃到国外：印刷胡斯托主编的《先锋报》的社

会党人的印刷所被破坏了。1910年，社会党不得不在警察势力所达不到的地方——在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举行代表大会。在此后  
830 几年内，工资情况和劳动条件大大恶化，同时工会又慢慢地重建它们的队伍，恢复它们的实力。整个说来，直接的影响对于稳健派是有利的，受到的迫害不如其对手严重的全国总工会恢复得比较快，社会党力量加强了，而无政府主义者却被削弱了。在这个国家北部地区的农业工人中间也开始建立了组织，社会党人的土地政策取得了一些进展。

1909年，意大利社会党领袖、犯罪学家恩利柯·费利到阿根廷进行了一次长期访问，与阿根廷社会党领袖发生了激烈争执，他指责社会党实际上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激进集团。费利说，在阿根廷这样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一个真正的社会党是没有发展余地的，因为真正的社会党只能够建立在一个受到资产阶级剥削的、充分发展的工业无产阶级上面。胡斯托回答说，费利不了解情况。他论证说，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地主统治阶级一直在加快制造一个城市无产阶级，不是通过建立足以以为无产阶级提供就业机会的工业，而是通过使它不能接触土地，从而使它溃烂在城市里。他争论说，无产阶级的的发展不一定象费利所说的那样，决定于资本主义工业的技术进步，而可能是随着劳动者被暴力夺去生存于土地上的手段开始的——实际上在欧洲就是这样开始的：工厂制度和蒸气动力的发展是在这个过程之后，而不是这个过程之前。他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起原的叙述，和关于提供可以剥削的劳动力从而使工业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叙述，并且说，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信息必须同样地直接传达给不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城市过剩人口。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是什么样的信息呢？在这些过剩工人和他们在乡下的贫困同胞中间很可能引起反应的是什麼真理呢？阿

根廷的社会党人——还有乌拉圭的社会党人，以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有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党人——是从土地政策中找到了部分答案，而这种土地政策的理论根据更多地是来自亨利·乔治，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或巴枯宁。他们要求制定一种田赋制度，把作为地租被地主征收去的钱交还给整个社会，同时按照土地如果使用得当所能生产出来的价值来向没有开发和耕种的土地征税。实际上，这是“单一税”的理论；阿根廷的社会党人希望以此作为手段，来强迫将土地开放给小规模的生产者安家立业。借助国家提供的资金和装备以及合作信贷和合作销售，而由农民来耕种，成了社会主义土地纲领的主要特色；但是，在1914年以前，这个纲领在真正的农民和农业工人中间并没有为党争取到很大的支持：它主要只是对于人口众多的城市中的没有土地和往往是没有工作的无产阶级有吸引力。

社会党内部有些人指责这种土地政策危险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派的领袖是唯一的社会党议员恩里克·德尔·巴列·伊巴鲁西亚(1877—1921年)，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党的内部也存在着更直接的严重分歧，面对着外国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侵入，这一问题越来越趋于尖锐。对于同时带来外国资本主义控制危险的工业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方针，社会党人是犹豫不决的。一方面，他们大多数人希望工业化，作为加强工业无产阶级和提供就业机会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们不满意英美资本主义集团在英美政府支持下所行使的权力，并且指责外国公司实行垄断和残酷剥削当地居民。对于从外国来的工人的工资和薪水比本地雇工要高得多，他们也感到非常不满；他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强制的工资平等和针对外国公司的劳资立法。到这时候为止，阿根廷的社会主义运动，当然还有无政府主义，从第二国际和没有严密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国际的各项声明中得到指点，一直具有强烈

的国际主义倾向。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里，一种民主的民族主义得了势；它必然要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得到迅速发展。暂时它只是使以曼努埃尔·乌加特为首的一少部分人脱党，但是结果并没有出现能站稳脚跟的对立组织。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才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当时在 1917 年，社会党的左翼与党分裂，建立了一个后来成为阿根廷共产党的国际社会党。后来的这个争执并不是刚才所指的那种“民族主义”引起的，而是起因于党对于战争和俄国革命的态度问题。党的领袖大部分赞成阿根廷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另一方面，大部分普通党员则主张恪守中立。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超出了本卷的范围：它与 1914 年以后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一样，属于 1917 年俄国革命揭开序幕的那个时代。

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乌拉圭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自从乌拉圭获得独立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是对立政党——红党和白党——的党徒们几乎连绵不断进行内战的场所，而且总统一个接着一个进行独裁统治。社会党没有存在的余地，工会运动存在的机会也不多：这两个党——其中红党经常执政——与其说是任何明确的政治观念的代表，不如说是家族集团的结合；每个政党都有相对的左翼和右翼。以后，在 1897 年，在红党的总统伊迪阿特·布尔达被暗杀以后，参议院议长朱利安·奎斯塔斯执政，并且企图使全国局势安定下来。内战时断时续，一直到 1903 年，激进派的报纸主人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1856—1929 年）当选为总统。巴特列早在 1880 年就创办了《每日新闻》，并且将该报办成了一个激进舆论的强有力的喉舌。他的政策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因素。他首先扑灭了一次白党的暴动，然后着手制定了一个根本改革的方案。他的继任者继续执行了这一方案，而 1919 年的新宪法也主要体现了这一方案。这部宪法并没有能够防止后来的巨



大混乱——实际上它还部分促成了混乱；但是在巴特列当权的时期，乌拉圭从南美政治最黑暗、最混乱的国家之一迅速地变成了社会最进步、具有最先进的劳工法（包括八小时工作日）和一个非常有实效的公共教育制度的国家。这些改革是经过与教会的一番激烈斗争实现的：巴特列的追随者都强烈地反对教权，但是他本人是一个调和的力量，并且设法将两个传统党派的优秀分子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情况的改变使一个社会党有可能在诗人和大学教师埃米利奥·弗鲁戈尼（生于1880年）的领导下得到发展，他在1910年创建了这个社会党，在第二年成了它的第一个议会代表。在此以前只有人数不多的属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移民团体。但是，巴特列的追随者中间包括有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情者，所以在他的影响下通过的法律都有相当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

1914年以前，巴西实际上没有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巴西曾经发生过黑人暴动事件，并且在1910年发生了一次蔓延到大部分舰队的海军叛变。叛变的海军所提出的要求完全是关于薪饷和待遇的条件，他们炮击里约热内卢，迫使国会接受了他们的大部分要求。后来海军陆战队也发生了叛变，但是被镇压下去了。不过这些骚乱没有政治内容，实际上并不存在全国性的左翼政治运动，虽然在某些城市，尤其是圣保罗和里约，有一些主要由移民组成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集团。共和国北部几个州的居民主要是黑人和混血种，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物色不到领袖，除了偶然出现一个只有局部影响的宗教狂热分子。白种移民主要集中在南部，特别是在圣保罗附近，而他们的活动也主要限于地方政治。德国人在圣保罗有一个社会主义团体，从1912年起，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前进》；在巴西中部的巴伊亚，意大利人大约在同时也创办了《前进报》。在里约热内卢，无政府主义者具有主要影响，在1914年以前的年代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了一个社会政治联盟，

在那里出版了一个刊物《自由主义者》。一直到1916年才成立巴西社会党；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效的运动才开始形成。当时所有的工会都是地方性的，只是通过无政府主义集团彼此有非常松散的联系。在农业地区，在新成立的农学家联盟的影响下，到1914年时方才有一个运动出现。

我们知道，在智利，社会主义的出现要早得多，但那里的地形很不便，不适于建立任何遍及全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或者农民运动。的确，大多数居民集中在中心地区，特别是在圣地亚哥和瓦尔帕来索附近；但是主要的矿区则是在北部，再不然就是在没有水的沙漠地区，或者，如果是煤矿的话，就是在更南方的康塞普西翁地区。北部是硝酸盐和其他矿物的主要蕴藏地，在它们于太平洋战争（1876—1883年）期间被从玻利维亚和秘鲁手中夺过来以前，并不属于智利；但是在智利的监督下，依靠外国资本的帮助，在极恶劣和有损健康的条件下，对它们进行开发则早就开始了，这有助于使那些矿工不仅在智利，而且在整个拉丁美洲，都成为最坚持战斗的劳工集团。

尽管从1874年开始普遍存在以识字为条件的成年男子选举权，智利仍然继续受到外国资本权益集团所支持的少数寡头政治的统治，一直到1886年何塞·巴耳马塞达（1840—1891年）当选总统为止。巴耳马塞达是一个激进的贵族，社会观点相当进步，并且是天主教会仍然在全国具有的强大势力的一个敌人。在他与教会和有土地的贵族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他被迫使用独裁权力：因此引起了叛乱，1891年他被推翻而自杀。接替他的所谓“民主”政权一  
835 直执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一时期，许多以各种各样的右翼和中间政党的联合为基础政府更迭频繁，在经济上，采矿业有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硝酸盐的产量有了迅速发展，为智利提供了大部分的出口和国家岁收。但是，这种情况却使劳工运动得到

了相当大的发展。我们已经注意到,在 1886 年建立了一个具有大体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纲领的民主党;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在互助协会和一个重要的合作运动掩护之下的工会的发展。历史最悠久的工会——印刷工会,从 1853 年起就一直存在。到 1900 年为止,工会的力量主要是依靠非体力劳动者和运输业;但是从那时以后,矿工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整个运动开始具有更大的战斗性。除了矿工以外,1902 年和第二年,在圣地亚哥和瓦尔帕来索,电车工人和码头工人还举行了多次罢工;1905 年在经济危机时期,圣地亚哥爆发了一次总罢工,后来扩大到了其余地区,包括矿区在内。政府严加镇压,有几百名罢工工人被击毙,罢工于是瓦解。四年以后,运动恢复了元气,组成了一个中央工会联合会,这个工会包括所有工业区,并且包括历史比较古老的互助协会,和比较新的、更富于战斗性的产业工会,这些产业工会逐渐取得了控制权,与一个人数较少的、在一些与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有关系的北美人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积极分子团体并肩工作。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在尤其是港口工人中间成为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中央工会联合会中的杰出人物是路易斯·雷卡瓦伦,他在民主党里也很活跃,并且主持它的刊物《改革》。1906 年,民主党决定参加社会党国际,但是没有保持住这一联系。1912 年,左翼脱离了向右转的民主 836 党,雷卡瓦伦成了新的劳工社会党的领袖,在 1918 年以后年代的人民阵线运动中,这个党起了重要作用。1912 年,雷卡瓦伦当选为议员,但是由于他拒绝宣誓效忠宪法而失去议席。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央工会联合会在参加赤色工会国际以后,由于分裂而瓦解,在此之前,它始终是主要的工会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它的力量严重削弱。许多矿山被迫歇业,失业现象严重。但是工会和社会党都继续存在并在战争结束以后表现出新的活力,虽然在合成硝酸盐的竞争之下,硝

酸盐工业的衰落继续对于国家的经济情况以及工会力争社会改革的力量有不利影响。但是，铜矿的不断发展为工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战斗中心。

在二十世纪初叶，在少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开始了社会主义活动。在玻利维亚，1906年在拉巴斯建立了一个工人社会中心，举行了大规模的五一节示威游行，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这一运动在1912年发展成了国际工人联合会，后来又改名工人劳动联合会，到了1918年以后它才变得重要，其会员的主要来源是锡矿工人。在某些中美国家也有一些小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在这些国家里也是到1918年以后才有重要发展。1912年，阿根廷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了第一次拉丁美洲劳工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巴西、智利和秘鲁的代表；但是这次大会结果没有成立持久性的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努力以及这个机构与中美和南美的主要工会之间的争执是1914年以后时期的事。

在古巴，民族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在1868年到1878年的十年斗争中声势减弱；新的反抗力量在大约1890年以后，才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在1878年至1890年之间的年代里，古巴革命运动的主要人物是何塞·马蒂(1853—1895年)，在1870年他十七岁的时候，由于在报纸上写革命文章而被捕下狱，第二年被递解到西班牙。在西班牙，他在萨拉戈萨和马德里学习，1874年在那里得到学位。他还发表小册子，揭发古巴的监狱制度，并且攻击西班牙共和国不准许古巴独立。1875年他前往墨西哥，在那里担任新闻记者；后来又到危地马拉执教。1878年他回到古巴，第二年又被递解到西班牙；但是在1880年，他到了纽约，开始在流亡人士中间逐步建立一个古巴民族主义运动。他写诗，也写了一本小说，为拉丁美洲的独立事业，他作了许多新闻工作。1890年，他在纽约的

古巴流亡人士中间组成了一个联盟；1892年，这个联盟发展成为古巴革命党，以他创办的《祖国》作为机关刊物。这个新政党与波多黎各的民族主义者建立了密切联系。此后的三年内，马蒂与在以前的斗争中曾担任领袖的马克西莫·戈麦斯将军共同积极策划起义；1895年，他和戈麦斯发表宣言，号召古巴人民起来战斗，他们率领了一支小部队，4月里在古巴登陆。第二个月，马蒂在一次小冲突中牺牲，此后戈麦斯和安东尼奥·马可继续进行革命运动。

在此期间，在古巴，诗人迪亚哥·文森特·特赫拉（1845—1905年）在1890年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宣传家俱乐部，并且恢复了马丁内兹在七十年代开始的工会组织工作。1893年美国经济的萧条以后，糖价的惨跌对起义者发出了信号。起义在最初是成功的；但是1896年，西班牙军队司令魏勒将军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政策，为了扫荡起义波及的地区，将千万名古巴人赶进了集中营。这引起了美国的抗议；1898年初，西班牙在劝说之下同意成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政府。但是在这时候，由于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口爆炸，美国进行了武装干涉，美国军队在古巴登陆。美西战争结束以后，古巴成了美国的属地。正是在1899年到1902年，美国军政府进行统治时期，一个新的古巴宪法生效，使古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是美国保留进行干涉的权利，后来美国曾经数次进行这种干涉。在以后的年代里，种植园工人不断举行大罢工，1911年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起义。1912年发生黑人起义时，美国军队在古巴登陆平息叛乱。1902年开始的罢工运动主要是为了抗议以跌价的纸币付给工资；罢工被镇压下去，在以后的几年中，工会虽然进行坚决抵抗，但终不免于渐趋衰落。美国劳工联合会插手，企图按照美国的模式来改组这些工会；但是效果甚微，始终没有强大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议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长期宗派斗争中，在新政权下失了势。

在 1895 年到 1914 年整个时期中，这个国家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美国曾一再进行干涉，通常都是站在反动方面。1917 年，自由党起义反对建立了腐败独裁政体的保守党总统曼诺科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古巴登陆以保护财产；自由党人失败了。内部斗争和美国的干涉一直继续到二十年代；不过本文不能再作进一步的阐述。

古巴的革命者很难称作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主要理论家何塞·马蒂也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社会主义理论。他是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是非常激进的，是以种族平等概念为基础的，因此，人们将他与后来的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认识到他的革命运动必须主要以工人阶级、尤其是种植园工人为基础；他始终拒绝古巴自治论者的方案，他们希望把古巴交给美国保护，以脱离西班牙的压迫。他是“殖民主义”的最强烈的反对者，在纽约居住期间，曾经著文极力谴责美国资本主义，特别是它的帝国主义方面。但是，他的政策是使他所主要依靠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合作，这些民族主义者必须肯于和工人阶级携手，在没有民族歧视的基础上来反对贵族种植园主。他也是进步的社会立法的拥护者，有鉴于此，他应该在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把墨西哥这个拉丁美洲国家留到最后讨论，在这个国家里，  
83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爆发的那些年里，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最重要的发展。在 1900 年以前，墨西哥在社会主义活动，或者甚至在工会活动中，几乎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虽然，如我们所见，在早期，合作组织和互助组织曾经有过一些发展。在波菲里奥·狄亚斯的独裁统治之下，直到这个政权开始崩溃，这里没有政治活动的余地，工会主义存在的余地也不多。工会，特别是铁路工人和纺织工人的工会都是地下组织，偶尔也举行罢工；但是七十年代的那

种广泛的运动几乎已经销声匿迹。被孤立在北部的石油工人受到严重迫害,无法组成稳定的组织。农民暴动是地方性的,但是它没有力量超出纯粹局部抵抗的范围,它的策略只不过是抗议大部分人民在大庄园主的封建统治下所过的骇人听闻的生活,这些大庄园主大部分是欧洲来的外国人,或者是不在他们的荒芜的大片土地上生活的在外地主。狄亚斯的政策是靠外国资本帮助来发展经济:甚至在数目很多的纺织工厂中,本国资本也很少,在英美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石油开采业中几乎就没有本国资本。

除了独裁统治以外,对于有效劳工运动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是产业工人与农村居民之间的一道深深的鸿沟。主要是印第安人的农村居民的大部分生活水准之低达到惊人地步。白种移民除非是能够用印第安人的劳力来进行耕种的资本家,否则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安家立业,他们住在城市里,并且组成一个熟练工人的工人贵族阶层,企图为他们自己争取较好的生活条件,在赚钱的能力方面和在文化方面,他们与不熟练工人都有很大距离。由于教会在大部分居民中有势力,两个集团的分裂加深了;因为流行的宗教形式中包括有很大成分的纯粹的迷信和对于巫术的信仰,这和受教育阶级的天主教义很少共同之处,同时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也使虔诚的宗教信徒感到震惊和离心离德。墨西哥的迫切的基本要求是土地改革;但是本身也有很多苦恨的城市工人和矿工不能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也不容易和这种运动联合起来。胡斯托博士在阿根廷进行的那种土地宣传对于墨西哥的城市居民是没有吸引力的:他们最不愿意作为印第安人农民的竞争者在土地上定居下来,虽然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与较先进的国家比较起来还很低,他们仍然不能适应印第安农民的生活水平。

墨西哥社会主义宣传是在1900年恢复起来的,当时安里克(1877—?年),杰塞斯(1871—1930年)和里查多·弗洛雷斯·马冈

(1873—1922年)三兄弟创办了他们的刊物《再生》，但是这家刊物立即遭到了取缔。后来他们在边界那边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印行这种刊物，然后偷运进墨西哥。弗洛雷斯·马冈兄弟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们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者，而不属于“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类型。他们并不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行动——只是反对改良主义类型的议会主义。1906年，他们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发表了一个宣言，组成了一个“自由党”，这个党实际上与其说是一个议会政党，不如说是一个目的在于团结左翼集团来支持一项共同纲领的宣传中心。这个纲领号召革命和推翻独裁政体和教会的权力来建立一个开明的政权，这个政权将把教会的巨大资产和属于大地主的荒地社会化，将废除强迫劳动，并且将为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规定最低工资。圣路易斯纲领进一步要求八小时工作日、普遍的非宗教教育、外国工人与本地工人工资的平等、市政自治和用民兵来代替常备军。

弗洛雷斯·马冈的宣言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油田和一直  
841 直到尤卡坦的墨西哥东部地区。1906年组成的自由兄弟联盟从靠近美国边界的、美国人拥有的卡纳内阿矿区迅速向外扩大，1906年，在那里爆发了一次要求墨西哥工人与外国工人工资平等的罢工。公司征调来的美国军队非法越过边界镇压工人运动，这就激起了墨西哥人的民族情绪。在这一年和第二年，在纺织工厂中爆发了多次罢工；狄亚斯的对策是宣布罢工为非法，并且实行一种不参加罢工的工人领取品德良好证书的制度——这是一种间接形式的黑名单。1907年年初，里乌—布朗库的一次纺织工人大罢工由于资方答应接受罢工工人要求而结束；但是当工人根据这种保证恢复工作的时候却遭到了野蛮镇压，而且没有得到任何让步。在工业地区，激烈的冲突一直在继续着；许多开明的领袖逃到山区企图组织农民反抗。同时，在埃米利亚诺·萨帕塔(1869—1919年)



的领导下，在墨西哥南部的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次强大的农民起义，弗洛雷斯·马冈兄弟竭尽全力与之建立了关系。独裁政权还受到以地主弗朗西斯科·因达莱西奥·马德洛(1873—1913年)为首的比较开明政客的日益严重的威胁。

马德洛是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大地主和矿山主人。1889年到1895年他居住在法国，主要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受过教育。1900年以后，他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为了建立一个进步的政党来反抗狄亚斯的独裁统治和实现土地改革，他组织了贝尼托·胡亚雷斯民主俱乐部<sup>①</sup>，该俱乐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支组织，他在各州召开了民主代表大会，然后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目的是在1910年总统任期届满时，阻止狄亚斯重新当842  
选。作为他的运动的一部分，他在1908年出版了一本《1910年的总统继任人选》，在这本书里他反对独裁统治，并提出了一个宪法和社会改革纲领。狄亚斯取缔了这本书，但是这本书的私下销路很广。当选举的日期来到时，马德洛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并积极进行竞选来反对狄亚斯。在竞选达到高潮时，他由于诽谤独裁者而被捕入狱。当狄亚斯得到胜利，选举结束时，马德洛被释放了。马德洛的拥护者说，选举的结果是伪造的。后来马德洛越过了美墨边界，在得克萨斯州发表了他的“圣路易波托西计划”，号召起义。这个计划除了包括立宪政府以及规定任何总统都没有当选连任的权利以外，还包括庞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计划——不受教会控制的普及教育，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废除从西班牙借鉴来的为政府和有土地的贵族利益而控制农民的村长制度，以及恢复农村居民对于森林和水源的集体权利。马德洛的宣言宣布选举无效，因为选举是用舞弊手段取得胜利的——的确是这样，因为它是通过

<sup>①</sup> 这个俱乐部是以贝尼托·巴勃罗·胡亚雷斯(1806—1872年)之名命名的，他是墨西哥的激进派总统和民族英雄，他促成了1857年的开明的联邦宪法。

村长取得胜利的；他宣布自己是临时总统，并且重新越过边界，与已经在北部诸州结集起来的叛乱部队会合，这支部队的领头人物是以前的骠夫帕斯库亚尔·奥罗斯科（1888—1916）和化名为潘乔·比亚（1877—1923年）的土匪弗朗西斯科·比亚，他曾经有一段时期匿居山区里逃避狄亚斯的追捕。在这些人的辅佐下，马德洛在胡亚雷斯城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萨帕塔在南部起义；在其他诸州也有多处起义。狄亚斯面对着压倒优势的反对力量，要求讲和；马德洛与他达成协议，协议规定他辞职，让位给根据宪法选出的总统，解散革命部队，以便进行自由选举。但是萨帕塔拒绝在土地改革确实完成之前，解散他的农民军队；大多数叛军依然存在。尽管如此，仍然举行了总统选举，1911年，马德洛以极大多数票当选为总统；但是仍然让狄亚斯时代选出的旧国会继续存在，独裁者的

843 的大多数官员和将领没有撤换。国会立即阻挠通过“圣路易波拉西计划”所要求进行的改革，马德洛发现自己两面受敌——维护旧秩序的人指责他的破坏计划，革命者指责他是堕落分子，与反对改革的人妥协，从而招来了悲惨的后果。萨帕塔于1911年在南方发表了他的“阿亚拉计划”要求马德洛辞职，立即将所有荒地分配给农民，并没收狄亚斯支持者的产业。奥罗斯科在北部领导了一次新的起义，他的纲领大致与此相似；里查多·弗洛雷斯·马冈自立为南加利福尼亚边缘诸州的主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马德洛派陆军领袖乌埃尔塔将军去镇压奥罗斯科，结果奥罗斯科被击败。但是乌埃尔塔串通了反对革命的反动分子准备反抗马德洛。1913年2月，墨西哥城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乌埃尔塔统率着大部分旧军队参加了这次行动。他俘虏了马德洛，并且在将他和副总统J. M. P. 苏亚雷斯解往监狱途中，命令他的卫兵将他们杀害了，并宣布出任总统。美国大使亨利·兰恩·威尔逊立即设宴为他作贺；但是杀害马德洛一举做得太过火，伍德罗·威尔

逊总统无法忍受，因此美国拒绝承认乌埃尔塔政府。反正这个政府本来也没有控制这个国家：萨帕塔在南部仍然没有被击败，乌埃尔塔的法令仍然在许多州无法贯彻，特别是，北方的科阿韦拉的州长、马德洛的旧日的支持者维努斯提阿诺·卡兰萨（1859—1930年）拒绝接受乌埃尔塔的领导，并且在其他州长和象潘乔·比亚这样的游击队的支持下准备进行内战。卡兰萨试图与萨帕塔达成协议；但是萨帕塔对他心存疑虑，谈判破裂了。同时，乌埃尔塔在墨西哥城进行真正的恐怖统治，处决了许多有开明观点或者激进观点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而对待外国权益集团的态度又引起了美国的积极干涉。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威尔逊总统派遣一支舰队到那里去，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墨西哥城的港口维拉克鲁斯。同时，潘乔·比亚再一次在北部起义；马德洛的老同事阿尔瓦罗·奥夫雷贡（1880—1928年）在为了马德洛的利益对奥罗斯科及其他人进行的战斗中已经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现在他站在卡兰萨方面抗击反革命军队，首先击败了老独裁者的侄子费利克斯·狄亚斯，然后击败了乌埃尔塔本人，在1914年8月占领了墨西哥城。乌埃尔塔逃往国外，但是消灭了他绝不等于结束混乱状态。萨帕塔和比亚都进入了墨西哥中部，坚决要求立即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另一方面卡兰萨则希望先进行宪法改革，在建立了新的立宪政权以后再处理土地问题。卡兰萨被赶出了墨西哥城，萨帕塔和比亚的军队先后占领了这个城市。但是农民领袖没有能够与城里的工人阶级领袖取得协议，后者在1912年成立了一个名为“世界工人之家”的组织。城市工会主义者虽然赞成进行土地改革，却害怕农民军队，他们喜欢卡兰萨，而不喜欢萨帕塔或者比亚。在更大的程度上他们喜欢奥夫雷贡，他是马德洛社会纲领的真诚的支持者；当奥夫雷贡决定支持卡兰萨的时候，他的决定对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左翼政治团体的态度有很大影响。1915

年初，奥夫雷贡的军队击败了萨帕塔，于是萨帕塔撤退到了南部他的根据地，然后奥夫雷贡又挥戈指向比亚，将他的军队赶回到他在北部山区的老巢。卡兰萨重又进入了墨西哥城，在奥夫雷贡的支持下担任总统。在奥夫雷贡的压力下，他在1915年颁布了关于土地改革的影响深远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法令规定赔偿在狄亚斯的独裁统治时期被破坏的农村公社的村民的损失；规定没收土地，用以建立新的农村公社，并且规定恢复农村公社对于森林和水源的传统权利。同时，卡兰萨与“世界工人之家”签订了一个“维拉克罗斯公约”，根据这个公约，该组织同意建立赤卫营来保卫革命，并且将这些队伍交由卡兰萨指挥来镇压他的反对者。

845 卡兰萨像这样恢复了他的权力以后，巩固了他的地位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承认。但是此后还有新的麻烦。比亚仍然在北部逍遥自在；1916年1月，一批支持他的人，在圣伊萨贝尔袭击了一列火车，杀死了火车上的18个美国人，此后就发生了混战，在3月里，比亚攻进了美国领土，袭击了新墨西哥州哥伦布市，又杀死了17个美国人。于是美国政府派遣了一支军队在潘兴将军的统率下追赶比亚；进入墨西哥境内；奉命消灭比亚的军队和他本人；这支军队深入到墨西哥领土以内，最后与卡兰萨的军队发生了一次小冲突，几乎引起了两国之间的战争。一些美国兵被俘，经过严重抗议以后才被释放，同时墨西哥也对美国军队占领墨西哥领土提出了抗议。这时传来了比亚死亡的讹讯，1917年年初，美国军队终于撤退了。

在这个时期，萨帕塔保持了他对于南部的控制，在某些州里，曾经企图在实行土地改革方面，做得比卡兰萨所保证的更进一步。特别在尤卡坦，在萨尔瓦多·阿尔瓦拉多(1888—1924年)的领导下，州政府宣布没收该地区的一切作为私有产业的土地，并且制定了一项非常进步的劳工法，这些都是卡兰萨所拒绝采取的措施。尤

卡坦在菲利浦·卡里略·普埃尔托(生于 1872 年)领导之下,直到他于 1924 年战死,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叛乱的中心。

1917 年初,卡兰萨和奥夫雷贡已经充分控制了墨西哥,使它可以成立一个新国会,着手于根据马德洛的纲领制定一部宪法。结果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文件,它至少在书面上确立了一个完全民主的政府制度,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宪法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条款。它宣布墨西哥所有的土地和矿场都是公共财产,因此就引起了与石油公司和支持公司权利的外国政府以及与当地的地主权益集团的激烈冲突。在同一条款中还包括有出租土地给小业主的保证,并且限制了个人在国家的压倒一切的支配下所能占有的土地数量。宪法宣布进行普及的、免费的和非宗教化的教育,并且废除宗教对于学校的控制,从而引起了与教会及其支持者的激烈争执。宪法规定工作日最多不得超过八小时,并且规定定期修订最低工资来适应生活费用的变化;它还为劳动保护和保健法奠定了基础,规定外国工人与本地工人的工资、男工与女工的工资一律平等,它保证结社的充分自由和罢工权利;最后它保证言论和著作自由。<sup>846</sup>

因此,根据 1917 年的宪法,土地改革派和工会在书面上得到了他们所要求的一切,而且使卡兰萨的许多支持者——或者卡兰萨本人感到十分满意。但是,新宪法的经济和社会部分,与政治条文不同,不过是表白一番而已:在极大程度上说来,在能够将它们变成正式法律以前,并没有实际的作用。卡兰萨正企图与他的不十分坚决的右翼反对者以及他希望争取其承认和支持的外国政府进行和解,因此不急于将这些条文付诸实施。他立即被卷进了与外国石油公司的激烈争执,它们拒绝承认没收它们的财产为合法,并且吁请它们本国政府为之撑腰。当宪法主要在奥夫雷贡和工人之家的压力下通过时,卡兰萨越来越右倾,在拥戴他上台的力量中

间逐渐失势。尤其是他与继续竭力要求采取行动的奥夫雷贡发生了争执。在他当选担任总统的四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他设法保持住了他的地位。但是他企图制止社会立法，并且干涉州政府的行动，因此日益不得人心。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保持中立政策，被人认为同情德国——这是发生内部分裂的另一个原因。后来，在1920年初，他在石油公司的压力下让步了，甚至于停止了  
847 某些法令的贯彻，这些法令原来规定石油公司必须接受油田国有化、交付矿区使用费以及墨西哥政府有权规定劳动条件。卡兰萨并没有放弃这些要求；但是，他停止了法令的贯彻，并且允许石油公司在旧有条件下继续开采油田，因此就得罪了工人阶级中大部分支持他的人。最后，奥夫雷贡与他决裂，退隐到故乡索诺拉州，与其他心怀不满的将军们商妥要推翻卡兰萨，在即将于1920年举行的总统举选中阻止卡兰萨使自己的提名人当选。奥夫雷贡于是向墨西哥城进军，占领了墨西哥城；卡兰萨在逃往维拉克鲁斯途中被暗杀。在临时政府执政一个时期以后，奥夫雷贡在1920年12月当选为总统。

早在这件事之前，在1919年4月，萨帕塔对于当局的长期敌对就已经结束——不是由于他被击败，而是由于他被暗杀了。他中了圈套，与一个假装要投诚过来的军官瓜哈尔多见面，在这时候被瓜哈尔多的士兵击毙。在他死后，他所号召和领导的运动就瓦解了。他所控制的领土又回到了联邦的控制之下。比亚维持到1923年，他也是被暗杀的；不过他在1916年被潘兴击败以后就已经算不上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了。

奥夫雷贡在1920年执政以后曾经打算认真执行革命纲领，特别是这个纲领的土地政策方面。他着手使农民可以占有土地，恢复农村公社，并且恢复农村公社对于森林和水源的权利，同时支持工会为了执行劳工法的规定所作的努力。但是，他遇到了巨大障

碍,他的土地改革只是在全国的一小部分地区实行了;在他下台以后,在他的此后几位继任者统治下没有取得什么进一步的发展。直到三十年代卡德纳斯总统才继续接过革命事业,通过恢复土地分配,和将农村公社制度扩大到更多的地区,而使革命事业向前迈进了一步。 848

墨西哥革命此后几个阶段的事情不属于本卷范围,而是属于下一卷范围。但是不可能过早中止这个话题,因为除了在卡兰萨执政初期所提出的冠冕堂皇的诺言落空之后引起的失望以外,没有便于停止的地方。在本书第四卷,我将继续从1917年的宪法谈起,这部宪法在形式上体现了——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并没有完全体现——革命初期的成就。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在1920年以前,在奥夫雷贡执政时,墨西哥革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胜利,在什么地方它失败了,为什么它只发展到这种程度就不再前进了。毫无疑问,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和坚持,而不是由于其他任何原因。首先多亏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他虽然不是思想家,但头脑却十分清楚,知道为了改善农民的命运,他要做些什么事情。什么样的政府当政问题只是在对于农村人民的生活有影响时,才为他所注意。萨帕塔在开始他的事业时是在狄亚斯统治下捍卫农民的利益,由于他的革命活动,他在墨西哥军队中强制服役了十年。1910年他被释放以后,企图通过合法手续,使属于他自己村庄——他在自己的村庄里也是一个佃农——的土地重新为该村庄集体所有。当这一企图失败后,他组织了一次起义,领导村民进攻大庄园,并用武力占领土地。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支持马德洛;但是在土地改革没有实现的时候,他在更广大的地区重又采取了直接行动,使自己成为莫勒洛斯州和面积相当大的临近地区的主人。在他的阿亚拉计划中他要求分割大庄园,将土地交还给农村公社。萨帕塔是一个

极其能干的农民领袖，从安东尼奥·狄亚斯·索托—加马（生于1874年）的著作中得到思想的启迪。如果萨帕塔没有将他的农民军队年复一年地留在战场上反抗要镇压他的一切企图，如果没有进行实际的土地分配，并在他所控制的地区消灭大庄园，墨西哥城的政客就永远不会制定1917年的宪法，至少不会制定宪法中有关土地的部分；如果不是卡兰萨迫切需要工人帮助他来对付萨帕塔，工人大概将会十分软弱，没有力量取得宪法所规定的进步的劳工保护法。但是城市工人却没有作什么事情来支持萨帕塔和其他农民领袖：实际上他们曾与卡兰萨的军队一道与农民领袖作战。这就是了解革命的第一阶段的关键，尽管城市工人阶级运动——或者这个运动的大部分——与农民之间有很深的鸿沟，革命仍然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在弗洛雷斯·马冈兄弟的“开明的”半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农民之间是不存在这种鸿沟的；但是，城市里的有组织的工会主义者——主要是欧洲的或者大部分是欧洲血统的工厂工人、手工艺人和职员——与组成农民军队的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之间，这道鸿沟却是很深的。墨西哥城和一些古老城市的比较文明的、识字的工人害怕不识字的受到神甫影响的和半野蛮的农民，不仅是在农民的队伍布满全国，尤其是他们占领城市的时候，害怕他们伤害身体，而且在经济上也害怕他们作为潜在的竞争者，可能被利用来使他们自己本来已经很低和朝不保夕的生活水平。诚然，在萨帕塔军队占领墨西哥城时，他制止了一切抢劫行为，并且单靠他的人格感召力量，军纪就很严明，但是萨帕塔有出色的顾问和政策，所以他就不仅仅是一个偶然得势的农民起义的领袖。潘乔·比亚和一些其他人就更象是土匪，他们的队伍是远远不能使人信赖的。弗洛雷斯·马冈兄弟的追随者当然属于不同类型——他们是有阶级觉悟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所领导的不是庞大的农民军队，而只是人数不多的集团，着手于在某些地区建



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且没有远离他们的根据地。但是,首都的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治家甚至对他们也是颇有疑虑的。

萨帕塔比所有其他领袖都更能在墨西哥农民中间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在他所控制的地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全国。在墨西哥南部,他成了一位传奇的英雄;他的坟墓被看成是神圣的纪念物。对外界说来,他今天以一部非常成功的影片中的主人公蜚声世界,这部片子几年以前曾在许多国家放映。在他的时代,他在反动人士中间以“南部的阿提拉”<sup>①</sup>闻名,人们纷纷议论农民军队的无法无天,恣意杀戮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毫无疑问,墨西哥农民战争的双方都是非常残酷的,生命、财产都遭到很大破坏。但是这是谁的过错呢?几乎不可能将罪责推在不幸的农民,或者萨帕塔的身上,他为了保持手下军队的效忠,不能不根据他们的见解以及他自己的见解来统率他们。

在第一阶段,墨西哥革命运动中没有一个领袖能将革命的力量统一起来。萨帕塔在南部农民中间是一位出色的领袖,但是他在北部没有很大势力;而且没有能力与城市工人阶级达成协议。弗洛雷斯·马冈兄弟的追随者太少,过分局限于狭隘的少数地区,离首都太远,所以不能取得全国领导权。马德洛力量太弱,没有多大组织能力;除了建立立宪政府以外,他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卡兰萨在奥夫雷贡的支持下成了领袖,通过了新宪法和土地法,这倒不是由于他具备任何制定政策的个人条件,而是由于他有能力估量形势和愿意让新国会放手制定法律,虽然并不是愿意执行它所制定的法律。奥夫雷贡在1920年执政时,的确曾为土地改革进行过真正的努力;但是他半途而废,没有多大进展。

---

<sup>①</sup> 阿提拉(Attila,约公元406—453年),匈奴国王,他曾蹂躏拜占庭的大部分和西罗马帝国,公元451年,他远征到高卢的奥尔良,公元452年,到达意大利的明齐奥河。他死后,他的帝国瓦解。——译注

因此,在二十年代以前,墨西哥革命的成就是破坏旧秩序,而不是建立任何代替旧秩序的新秩序。与弗洛雷斯·马冈兄弟的半无政府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确是力量薄弱。1910年以前,没有社会党——只有一批社会党人在马德洛于1907年建立的自由党内活动。这一个以J.萨拉比亚(1882—1920年)为首的集团在1910年脱离自由党组成墨西哥社会党,继续与马德洛合作,后来又与卡兰萨合作,但是它在农村或者油田中毫无势力。社会主义是激进政治家的一种倾向,是少数人数非常少的移民集团的信仰,而不是一个运动。社会党人没有明确的土地政策:革命社会主义因素的力量与其说是来自社会主义情绪或者对于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信念,不如说是来自反对矿山和工厂中的外国剥削,反对狄亚斯给予外国人特权,以及反对给予外国工人的优惠工资的民族情绪。

当然,在这方面,油井问题是极为重要的。1884年,狄亚斯发布一道命令,给予地主以地下矿藏的所有权。这是违反规定地下蕴藏为公有财产的西班牙法律传统的。这样作是为了鼓励外国资本,并且从那些得到开采权的外国人身上捞到油水,同时也是为了取得国内富有阶级的支持;结果是外国公司——英国公司和美国公司,得到了许多产石油的土地,并且使得那些能够取得采矿权的墨西哥地主生财有道。1917年的宪法废除了狄亚斯所给予的开采权,宪法规定地下蕴藏是国家财产,并且规定石油公司必须服从关于管理开采矿藏的国家法律。新宪法还规定,作为根据任何条件延长开采权的一个条件,公司不得请求本国政府帮助它们违反墨西哥政府可能决定执行的任何法令。英国和美国公司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拒绝承认1917年宪法的有关条款为有效。他们争论说,狄亚斯在旧宪法下给予它们的开采权是不能废除的。它们还拒绝实行有关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法律,并且企图依靠蔑视国家权

方面由私人征集的武装卫队来保持他们的财产。它们阻挠工会的建立——除非组成地下工会——并且强硬对待违抗禁令的鼓动者。当1920年，卡兰萨在外国的压力下屈服，同意在不危害未来的情况下停止执行1917年法律的时候，各石油公司的最大希望就是趁机赶紧捞一把。由于各石油公司要在它们的开采权问题发生新的纠纷之前赶紧尽量开采石油，石油开采量达到了最高纪录。它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开采权，知道现有的资源快要开采完，可是并不愿意投入新的资本来开辟新的油源。在二十年代，墨西哥的石油生产急剧下降；这一争执一直继续到卡德纳斯最后在三十年代对它作了断然处理。 852

因此，墨西哥的革命在第一阶段结束以后就半途而废了，而广大农民与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仍然没有消除。城市工人从革命得到的好处最多：他们得到了结社自由和罢工权利，同时还有许多劳工立法，工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都得到了真正的改善。他们形成了劳工贵族，与欧洲水平相比，当然还很差，但是比起广大人民——农业地区的印第安人和混血种——的生活水平来，却提高了许多。他们之中的那些政治激进派或者社会主义者——当然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也由于教会权力遭到重大削弱而得到好处。不仅是理性论者和无神论者痛恨墨西哥的教会：农民对于教会也是极为痛恨的，因为他们知道教会是有土地的贵族的暴虐的盟友，它本身就是使穷人丧失土地、而自己拥有庞大土地的压迫者。分别在于：农民虽痛恨教会，但是不恨宗教，一般说来也不恨教区神甫，这些神甫常常几乎与他们一样贫困，也常常站在他们的一边。农民大部分是非常迷信的，很容易反对城市里的无神论的知识分子。狄亚斯的罪状之一就是说他被邪恶的、信仰无神论的顾问包围了：狄亚斯下台以后，教会曾千方百计使农民对他的继任者也产生同样的不信任。但是教会统治集团太不得人心，以致永

远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1917年以后教会权力的削弱，是使卡德纳斯在将近二十年以后能够接过奥夫雷贡的继任者的未竟事业，继续建立新墨西哥的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 澳大利亚的工党和社会主义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地理位置很偏僻，社会结构与欧洲的任何国家都大不相同，它们在第二国际的事务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这两个国家都存在活跃的劳工运动，主要以工会为基础，特别是在1890年以后，澳大利亚工会对于政治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在不同的州以不同的名义建立了工党；但是这些党在任何正式意义上说来都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大部分都很少受到外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方面，昆士兰是一个例外，主要由于威廉·兰恩在宣传方面的努力，社会主义在这里的影响超过了别的地方。在澳大利亚的其他各州，工党在开始时是第三党，拥护或者反对比较老的政党组成的政府，但是在他们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自己组织政府以前，始终是在野党。同时在新西兰，由约翰·巴兰斯以及后来由理查德·赛登领导的自由党人得到了工会的拥护，在1904年以前，没有单独成立工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大洋洲不存在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组织都是存在的；而且曾经不止一次企图组成一个社会党。工党本身也常常宣布要追求社会主义的目的，比如生产资料国有化。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看来，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外国的学说：它始终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支持。澳大利亚工党甚至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议的时候，一般总是宁可避免用这个字。他们的政治活动是围绕着直接目标进行的；就连他们的领袖也大部分对于新社会秩序的理论不大感兴趣。这并不说明他们一定是

854 稳健派：雇主与工人之间斗争激烈而频繁，工会——特别是在剪羊毛工人以及采矿业和码头业中间——往往能够接触到非常激烈的学说，并且很容易响应阶级斗争的口号和理论。在这些集团中间，左派理论常常采取宣扬阶级团结和阶级敌对的措词激烈的宣言形式，同时公开宣布目标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即使如此，在实践中，产业工人中有战斗性的部分所要做的仍然是控制他们的资本主义雇主，而不是取消这些雇主；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在土地定居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目的是反对大牧场主和建立家庭农场，而不是追求社会主义目标。除了在产业工人积极分子集团中间以外，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建议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得到的响应要大得多；工党关心得多的是向富人征收赋税，而不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在一个主要是间接税的制度下，对他们征收的赋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是非常不够的。

关于澳大利亚，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大批爱尔兰移民和他们的后裔，而且通过他们还有罗马天主教会——永远是社会主义的坚决的反对者——自始至终对于劳工运动产生的有力影响。在澳大利亚的地方和中央的劳工领袖中间，始终有相当多的人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这些领袖们的思想里既要忠实于天主教又要忠实于倾向于社会主义信仰的工党，因而从这两种忠诚的冲突之中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矛盾。这些斗争常常表现为个人或者集体争夺重要位置的逐鹿；许多非天主教领袖由于担心失去信仰天主教的工人阶级的支持，或者由于甚至担心遭到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集团强烈诅咒，而强自克制，避不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爱尔兰人尽管其社会观点是激进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对于社会主义大体上却很冷淡；这就使工党甚至在他们的政策事实上是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时候，也不愿接受社会主义的称号，或者通过直接的接触或者参加社会党国际而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生联系。

在澳大利亚，1850年和1890年各有一条鲜明的分界线——头一条分界线是黄金的发现，第二条分界线是海运工人和剪羊毛工人大罢工的失败。1850年以前，只有少数孤立的工会。早在1833年，为了维持伦敦的价目表和同时提供互助福利，家具工人就已经组织起来。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铜匠和排字工人在悉尼已经建立了工会。1837年发生了一次海员罢工，两年以后，他们建立了正式的工会。1839年失业现象严重的时候，悉尼工人联合会筹集了赈济款项打算建立一家面包厂。1840年又成立了车辆制造工人和机械工人工会。1840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排字工人工会于成立当年在悉尼举了一次罢工。成衣工人和建筑工人在四十年代已经组织起来。在1850年以前的时期，由于利用假释的犯人作为廉价劳工而引起了争执。金矿的发现使得熟练工人的劳动力市场荡然无存，因为大批熟练工人都去开金矿了。同时，这件事使物价急剧上涨：所以留下的工人不得不要求大量增加工资，并且他们还处于使他们的要求非常容易得到接受的有利地位。工资迅速地提高了；工会非常活跃；有一些工会依靠罢工、或者不依靠罢工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日。在金矿中，采金工人进行斗争反对执照制度的弊端，最后在1854年发生了尤里卡围场的激烈斗争；同年，矿工在巴拉腊特成立了一个改革联盟。但是这一激烈斗争与社会主义或者任何正常的工会主义都毫无关系；在执照费降低和执照的管理章程经过修改以后，运动逐渐平息下去。

第二年——1855年，在墨尔本和悉尼都开始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前威尔士宪章派詹姆斯·斯提芬斯的影响下在建筑工人，特别是石匠中间开始的，1850年，他们在墨尔本成立了工会，三年以后又在悉尼成立了工会。1855年，石匠领袖休·兰德勒思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提案，号召工人在劳动八小时后停止工作；当雇主拒绝接受这项要求时，墨尔本的石匠，然后是其

856 他行业,在 1856 年举行了罢工,并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那一年,T. W. 范在墨尔本组织了木匠和细木工进步协会;各工会组成了一个八小时同盟,其他一些行业很快也获得了同样的让步。在悉尼,在一个同样有希望的开端之后,运动有一个时期中断了。过了将近二十年时间才完全实现了八小时工作日。但是在墨尔本,工会的力量一直很强大,足以保持住他们的胜利果实。由于他们的成功,八小时工作日制度逐渐在熟练工人中间稳固地确立起来,并且开始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工会主义的第一个伟大成就。不过,到 1872 年,才最先在悉尼,不久以后在其他大城市,开始每年一度举行一次庆祝的做法。

维多利亚还率先派出劳工代表参加殖民地议会。在尤里卡围场失去一条手臂的彼德·罗尔(1827—1889)在 1856 年当选为代表巴拉腊特的议员;一个著名的工会主义者查尔斯·贾丁·唐(1820—1867 年)在 1859 年得到一个议席。1858 年,墨尔本工会组成了一个行业工人委员会,两年以后发展成为行业工会委员会,这是不久以后在所有州的首府建立起来的行业和劳工委员会中的第一个。同时,矿工也一直在进行组织工作。纽卡斯尔的煤矿工人在 1854 年组成了一个工会;六十年代初期,煤矿工人和其他矿工都进入了一个进行积极的劳资斗争的时期。纽卡斯尔煤矿工人工会的苏格兰籍的领袖詹姆斯·弗勒彻尔(死于 1891 年)在 1863 年说服他们在他的管理下开办一个合作矿井;但是几年以后,这个矿井就卖给了一家公司,他则仍然代表这家公司管理这个矿井。后来他成了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员,继续为工人的利益发挥积极作用。矿工工会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迭有浮沉,兴衰互见。煤矿工人于 1870 年在新南威尔士举行的一次大罢工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一直到八十年代,各团体才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包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各矿区的混合矿工工会。



可以大体上这样说，澳大利亚工会的“黄金时代”一直继续到 1896 年。当然，也是有盛有衰，所进行的斗争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雇主曾经企图用中国或本地的廉价劳工来代替白种工人；对于在政府协助下白种工人的移民工作也是怨声载道。但是，整个说来，至少是对于熟练工人说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是有利的；工会渐渐懂得了如何利用他们的力量尽量争取从一般说来攫取高额利润的雇主那里取得让步。特别是技术工人工会知道如何实行限制学徒制并协同一致，拒绝与非工会会员一道工作，以保持他们对于技术的垄断。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雇主并没有坚强地组织起来拒绝工会的要求；工会虽然没有力量遍及整个大陆的有效组织，却通过他们在大城市的行业工会委员会或者工会理事会，在每一个州里进行了相当密切的合作，而且有时在越过州的边界的运动中进行合作。

悉尼劳工理事会书记安古斯·卡麦隆似乎是在工会的财政支持下，第一个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的工会主义者。1875 年，他当选为代表西悉尼的议员。1879 年举行的第一届全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大会和 1884 年举行的第二届代表大会要求支付给议员薪水，以便工人有可能在殖民地议会中有能起作用的代表。这个代表大会还在各州成立了议会委员会，来为工人的利益对议员进行院外游说活动，主要要求修改有关劳资关系的法律，进行工厂监督，保护地方工业和废除双重投票制。1885 年，维多利亚行业工会委员会宣布赞成工人代表参加议会，第二年，第四届全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大会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并重申支付给议员薪水的要求。在此期间，许多工会的章程规定它们不得干涉政治——也就是说，不得干预选举。这并不妨碍工会在直接牵涉到工人利益的时候，对政界人士施加压力；但是它们认为只要它们能够做到以下几点来实现它们的大多数直接要求，就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工党。在工业内部

采取行动,再加以派遣少数工人代表参加各州议会,与比较激进的政治家——这些人支持“小人物”反对富有的牧场主和更富有的雇主——采取联合行动。

此后在 1890 年,形势急转直下。主要依靠输入资本支持的经济迅速扩张时期告一段落,资本家和债台高筑的政府焦头烂额,急于还债。雇主到处削减工资。政府放弃了它们的公共工程,在公用事业中,厉行节约。此外,较大的资本家和牧场主认为劳动力市场情况改变后有机可乘,于是沆瀣一气对付“工会的专制”。具体地说,他们达成协议对于工会拒绝与非工会会员合作的政策进行联合反抗,并且宣布劳资双方之间缔结“自由合同”的原则——那就是说,雇主有权利不受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的集体章程的约束,并且有权利与雇工个人缔结他认为合适的合同。在航运业和码头业中,以及在牧场主与组织强大的剪羊毛工人工会之间,同时产生了这个问题,剪羊毛工人工会在拒绝让它们的会员在雇佣非工会会员的地方工作这一方面,是最成功的一个组织。

威廉·戈思里·斯宾士在 1878 年开始改组矿工,在 1882 年他成为维多利亚矿工联合会书记以后,迅速将这个组织扩大成为全澳大利亚的混合组织,他在这个时期的工会运动发展中是一位杰出人物。他在 1886 年,继续建立混合剪羊毛工人工会,这个工会迅速从维多利亚扩大到其它各州,并且与昆士兰已经建立起来的类似工会密切合作。在此后几年内,这两个剪羊毛工人工会订立了剪羊毛工人愿意以它作为准则进行工作的唯一协定。协定中包括“只能雇佣工会会员”一项,对于这一点,大牧场主激烈反对。因此,牧场主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来抵抗工会的要求;1890 年,这些组织组成了一个牧场主联合理事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自由合同”  
859 的共同纲领——即协同一致,拒绝与工会打交道或者承认它们的条件。在剪羊毛季节,成群地辗转移动的剪羊毛工人住在他们自

己的营地，建立了反对牧场主的强有力的阵线。斯宾士的 1890 年宣言坚持全面维持“工会合同”，正是这个宣言引起了那年的大罢工，这次罢工从一开始就往往被称之为“海运罢工”。

海运大罢工实际上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开始的：轮船职员工会是否有权利参加墨尔本行业工会，从而与海员工会、厨司和侍者工会以及码头工人工会联合在一起。这场开始时范围很小的争执，从一个州扩大到另一个州，从一个行业扩大到另一个行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采取支援行动，并由于企图应用这样一个原则：任何工会会员不得运送“不干净的货物”，或者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任何雇佣破坏罢工工人的公司。最初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后来在昆士兰，海运罢工开始与剪羊毛工人罢工汇集成了一体，因为他们拒绝装运从羊毛工人举行罢工来反对雇佣非工会会员的牧羊场发送来的羊毛。在这种争执中，剪羊毛工人的习惯做法是在受波及的工作地点附近建立“罢工营地”，并且设法阻止破坏罢工的工贼进入，并阻止已经在当地的非工会会员的工作。这些战术常常引起激烈冲突，牧场主往往借助军警来镇压剪羊毛工人。船主和码头主人也请求类似的帮助来对付干涉破坏罢工的工贼工作的企图；在港口发生了激烈冲突。许多工会领袖被捕，被判徒刑，关进监狱。

由于商业萧条和失业普遍，雇主即使没有州政府给与帮助他们，也处于很有利的地位。1890 年，由于羊毛工人工会的经费随着时光的流逝消耗殆尽，最后他们不得不停止罢工而让他们的会员尽量争取最好的条件，使尽可能多的牧场主遵守工会合同的条件，但是不再拒绝与非工会会员合作，不再阻挠破坏罢工的工贼工 860 作。这一斗争甫告结束，1891 年年初，与兰恩的澳大利亚工会联合会有关系的、独立的昆士兰剪羊毛工人工会卷进了完全类似的斗争。这场斗争变成了比前一年的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斗争

要激烈得多的纠纷。昆士兰政府是牧场权益集团所控制的，因此非常反动：昆士兰牧场主协会是一个最嚣张的组织；也许正是由于这些事实，昆士兰的劳工运动也最有进取心。牧场主立刻就从各城市组织一批破坏罢工的工贼；州政府动员了骑警和警察来镇压剪羊毛工人。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号召其他工会拒绝运送破坏罢工的工贼生产的羊毛以支持剪羊毛工人；政府进行报复，逮捕了工会的一些领袖，并且根据 1825 年的不列颠反结社法，控告他们阴谋反叛，该法在英国早已废除，但是根据裁决，在澳大利亚各移民区仍然有效。<sup>①</sup> 法官概括罪行的措词怀有极大的敌意：陪审团最初不同意，但是最后，在把他们关起来并停止供给食物以后，他们同意判决其中的十个人，可是坚决主张予以从宽处理。法官接着作了严厉的判决，大多数人被判处几年监禁。在整个争端中，法庭处理得非常严厉而且显然对罢工工人有偏见；最后，罢工瓦解了。

尽管如此，剪羊毛工人继续斗争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以尽可能地维护工会合同。但是，1894 年时，各州的牧场主已经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来实行更坚决的“自由合同”制，并拒绝与工会打任何交道。这时，工会的力量已经十分薄弱，无力再进行进一步的抵抗，虽然昆士兰工人在那年又举行了一次罢工，最后才承认失败。就在这个时候，斯宾士将剪羊毛工人工会改组成为澳大利亚工人工会，并着手在一个更广泛团结的基础之上重建他的力量。

861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各州，以各种不同名义，迅速地成立了工党。工会由于认识到，面对着商业不景气和雇主串通起来依靠政府帮助来击败它们的决心，它们在产业中的力量不足以保障它们的利益，它们进一步参加了政治。

---

<sup>①</sup> 不列颠反结社法 (British Combination Laws) 是英国议会于 1799 年和 1800 年分别通过的法案，内容规定工人结社反抗雇主为非法。这两个法案于 1824 年废除。——译注

1890年大罢工时，澳大利亚工人阶级运动的两个杰出人物是威廉·戈思里·斯宾士（1846—1926年）和威廉·兰恩。斯宾士生于奥克尼群岛，但是在童年时就随家庭移居澳大利亚。他曾经做过牧羊人和矿工，如我们所见，他在1882年，成为维多利亚混合矿工联合会的书记。然后他着手组织剪羊毛工人，他们在1886年成立的工会立刻取得了成就，并在1890年的斗争中起了主导作用。但是，斯宾士不满足于在工会组织方面所取得的这些相当大的成就。他坚决主张采取协同一致的产业行动，他的雄心是建立一个包括各种类型的工人——产业工人或者农业工人在内的有效的组织，并以整体的力量来帮助可能需要帮助的每个部分。他的这种雄心始终没有实现；但是他在剪羊毛工人工会失败时，他利用它作为核心来组织澳大利亚最最大的工会——澳大利亚工人工会。根据章程，这个工会是所有工资劳动者都能参加的；但是有很长时期，实际上它只限于畜牧业，在这一行业内，有着从事种类繁多的职业的各种各样的工人。后来，它从畜牧业扩大到其他许多行业，吸收了诸如昆士兰混合工人工会这样的工会。实际上，斯宾士早在英国型的工会出现以前，就是在阶级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总工会”类型的工会的先驱。他所领导的澳大利亚工人联合会介于1889年在英国成立的煤气工人和码头工人工会所代表的类型与美国产业工会主义者所赞成的“大一统工会”之间。到后期，它就更近似于以上的第一个类型；但是在它的初期，早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成立以前，许多积极分子就希望它成为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一个庞大的战斗组织。

斯宾士在1898年当选为新南威尔士议会议员，在1901年联邦议会成立时，当选为联邦议会议员；但他仍然主要注意的是工会问题，到1914年才担任内阁部长。1916年，他在征兵问题上支持休斯，反对工党，因而丧失了他的议席。不久以后他退出了政界。

斯宾士并不是伟大的理论家；他的巨大的声誉来自他的组织能力。他坚决相信工人阶级的团结，并且相信最全面的工会主义类型是实现这种团结的手段。

另一位领袖威廉·兰恩（1861—1917年）与斯宾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他是与澳大利亚劳工运动有关系、而有资格被看作是理论家的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兰恩生于英国，十四岁到加拿大，他成了一个新闻记者，1885年移居澳大利亚，创办了一家刊物《飞去来器》，在工人阶级中间，主要是在矿工和农业工人中间有相当大的销路。1889年，为了支持伦敦码头工人而筹集3万英镑以上款项的运动，主要就是由他负责的。同年，他带头建立了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目的是使之成为整个大陆劳工运动的政治中心和产业中心。事实上，这个联合会只是在昆士兰活动，始终没有大规模地在其他地方确立自己的地位，虽然它得到了斯宾士和他的工会团体的支持。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有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在兰恩的影响下，从这个联合会产生了一个鲜明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成了昆士兰工党，着手通过议会行动来恢复在1890—1894年的产业斗争中失去的东西。1890年，在昆士兰支部的赞助下，兰恩创办了《昆士兰工人》，该刊所宣传的社会主义理论比澳大利亚的任何其他重要刊物都要先进得多。在此以前，兰恩写了一些文章，赞成社会主义和亨利·乔治的单一税主张。在海运和剪羊毛工人罢工失败以后，他相信，面对着资本主义的现有实力以及普遍存在的工业家赚钱谋利的思想，在澳大利亚建立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他转而信仰空想主义，产生了领导一批信徒，在一个新的国家，按照共产主义的方针建立一个移民区的设想。他选中了巴拉圭，在那里，成年的男子已经为独裁者济佩斯进行的战争消灭殆尽。他在得到巴拉圭政府拨给他的大片土地以后，在澳大利亚筹集了3万英镑的款项，并在1893年弄到了一条船，带着240

名其他社会主义者，出发到巴拉圭去，定居在他称作新澳大利亚的移民区。第二批又用船运去 260 人。这个移民区不久就发生了麻烦，一方面是因为内部有分歧，另一方面是因为气候恶劣使得许多移民丧生。兰恩迁移到了一个新的中心科斯美，进行了第二次尝试，但是这一次也遭到了困难，1899 年，他放弃了这个计划。许多残存的移民在昆士兰政府的帮助下回到澳大利亚；但是有些人仍然留在那里，分裂成为较小的集团，放弃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兰恩本人重操旧业，从事他的新闻工作，定居在新西兰，从 1913 年开始，编辑《新西兰先驱报》。

兰恩在投身于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的八年期间，给他的同时代人留下了强有力的印象；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也是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的整个历史上唯一有浪漫色彩的人物。他是一个文笔犀利的优秀作家；在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他曾极力促使它沿着产业工会主义和政治行动这两个方向前进——他认为这两者同样有必要，并且强调必须有一个联合运动在统一的控制下利用这两种武器。他的乌托邦阶段是后来的事情，并没有很大的创见。看来，他受到了奥地利的乌托邦主义者西奥多·赫尔茨卡<sup>①</sup>的一些影响，赫尔茨卡在 1890 年出版的小说《自由的土地》描写了在赤道非洲建立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在赫尔茨卡的乌托邦中，生产主要是由选举出来的经理所领导的合作协会来进行的，资本来自国家，为竞争性的市场进行生产。这种概念与路易·布朗和拉萨尔的概念有些共同之处。兰恩曾经试图粗略地将这些想法应用在巴拉圭；但是他的新澳大利亚只是勉强能够维持生活，因此不可能对于这种概念的价值进行任何实际的考验。

正当工会开始从事政治，希望弥补它们在产业领域的失败中 864  
所遭到的损失时，兰恩的巴拉圭冒险使澳大利亚失掉了它的一些

<sup>①</sup> 参看本卷下册第 40 页。

最活跃的社会主义者。工会在采取新方针的时候，并没有将目前的行业 and 劳工理事会变成政治机构。它们认识到为了政治目的，有必要争取许多不是工会会员的人，不仅包括那些在工会失败后退出工会的人，而且包括许多没有组织起来的比较不熟练的工人，并且尽可能多争取在工资阶级以外可能同情它们的人——职员，就是那些即使组织起来也是力量很弱的人，还有小农和商人等。因此，它们在微乎其微的个人捐款的基础上组织政治团体，在每个选举区设立支部。开始时，在某些州里避免使用“工党”这个名字，而用“进步”这个名称作为代替。在任何重要集团里，都没有考虑使用“社会主义者”这个名字：各种纲领主要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包括生产资料国有化这个一般性要求——后来这个要求又经过了修改。这些纲领中大多数都包括废除双重投票，征受地产税，为改良他们的土地的地主提供可靠保障；累进直接税；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法定的最低工资）；防止殖民性质的移民；并且停止各种形式的由国家帮助的移民；改革有关主仆关系的法律，并且给予组织工会的充分权利；改进劳资立法，还有其他一些因各州情况而异的改革。其中大多数纲领还赞成保护主义的财政立法，来保障工人对付可能对工资有不利影响的廉价舶来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在新南威尔士存在强烈的意见分歧，这个州历来是一个“自由贸易州”——因此这个州的纲领是闪烁其词的。关于任何种类的社会化的唯一普遍的具体要求是建议成立州银行，来打破私人对于信贷的垄断。在大多数情况下，纲领还要求实行普及的免费教育——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并且要求增加技术训练的设备。

865 虽然建立了新的政治团体，作为有别于工会的机构，实际上在开始的时候，它们大部分都处于大城市的工会理事会控制之下。工会和工会的分会，以及地方政治集团，都派遣代表参加这些政治团



体的会议,而且大部分参加它们的决策。但是,不久就在这些新的政治组织与在它们的支持下在州议会中得到议席的某些成员之间发生了纠纷。从一开始起,新的政党就取得了重大的选举胜利,由于资格比较老的政党所得票数相当均衡,不久以后,新政党就掌握了均势——昆士兰是例外,那里的阶级斗争最尖锐,其他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以工党成了反对党。在别的地方,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了支持政府的多数党的一部分,并且能够通过反戈一击,使另一个派系当权。各州的现有政党一般说来并不是按照任何明确的原则划分阵营的。它们往往是追随某几个领袖的集团;还有许多无党派人士,他们常常改变他们的拥护对象。在新南威尔士这个人口最稠密的州,自由贸易论者和保护主义论者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党派斗争;但是在其他问题上,党派之间没有尖锐的分歧。州的政治主要是政客讨好某些压力集团的问题;已经发生许多较小的贪污事件,特别是在拨给土地和订立公共合同方面。在九十年代以前,工党大部分满足于作为一个议会外的压力集团来行动,而在立法议会中只有少数自己的议员,有时作为无党派人士,有时与某个比较老的政党联合起来。当工党决定建立自己的政党时,就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它应该希望这个老政党而不是希望那个老政党上台;因此,它可以自由地反复改变支持的对象,使政府上台或者下台。这就使它有可能从各州政府取得相当大的让步;并使用这种权力以种种形式取得保护性的劳工立法,包括废除陈旧的工会法,以及改变赋税制度,使它有利于比较贫苦的阶级。关于工资,在罢工失败以后的这一时期,工会大部分赞成在劳资纠纷中采取强迫仲裁办法,或者作为代替,赞成某种形式的法定工资制度;工资委员会和仲裁法庭的各种制度一部分就是在劳工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些制度绝不是劳工的发明。它们是各种色彩的政府所提出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包括一些工

会即使在原则上不反对，但也不能同意的规定。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叙述人们常常谈到的那些工资制度在各州的发展经过。新南威尔士率先在 1892 年通过了一项仲裁法，但是一直到 1898 年才实行强制仲裁；后来通过从维多利亚借用来的办法，第一次在 1901 年，第二次在 1908 年对这个制度作了修改。维多利亚工资委员会法是 1896 年通过的，其他各州则群起效法。限于解决州与州之间问题的联邦仲裁法庭在 1906 年开始工作，但是最初由于法律的解释不同，使它的许多裁决被宣布无效，而受到很大的妨碍。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规规定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这些州进行的那种干涉毫无疑问对工人是有利的，他们利用这种干涉重又取得了许多他们在 1890 年以后失去的东西。这种干涉也有利于工会会员的发展和将工会运动扩大到以前这种运动力量薄弱或者根本不存在的职业中去。只有在工会完全取得了仲裁法庭或者工资委员会所愿意给的东西的时候，州的规定才遭到了工会左翼的严厉抨击，他们指责这种规定起了稳定资本主义的作用，使工会丧失战斗性，并且助长了似乎劳资双方利益乃是一致的虚假概念。

事实上，当取得最初的让步时，人们就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在仲裁者和工资委员会愿意给的工资和目的在于阻止进口的保护性关税以及澳大利亚人民生活费用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867 在 1900 年建立了统一的联邦以后，保护澳大利亚的工业，免受尤其是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舶来品危害，成了联邦工党政策的一部分；曾经在新南威尔士很有力量的主张自由贸易的反对派消失了。官方的政策名曰“新保护主义”；它所根据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即仲裁者可望同意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实际上决定于保护性关税率的高低，同样也决定于影响消费品价格的其他因素。新的联邦仲裁法庭面对着各法庭以“国家权利”的名义限制它的管辖权的明显愿望，经过了相当时间才确定了稳定的地位；但是，在法官 H.

G. 希金斯先生的主持下，这个仲裁法庭地位逐渐稳固了，并开始在广泛的范围内应用它的生活工资政策。各州的这种确定工资的机构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各州的工党继续维护这种机构，尽管遭到工会积极分子的日益猛烈的攻击。九十年代的失败使许多工人集团非常不愿意只是信任罢工行动；关于要求恢复旧日工会战斗方式的产业工会主义者，工党政治家愿意说恭维话的是微乎其微的。

“白澳”政策也在联邦工党政治中起了重要作用。1901年，第一届联邦内阁在工党的强有力的支持下，通过了移民法，不准有色人种移民入境，以维持“澳大利亚的生活水平”和澳大利亚的“种族纯洁”。有一些州里的工党一向是赞成“白澳”的要求的。事实上，整个运动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只有非常少的社会党人，主要是移民，以国际工人阶级团结为理由，反对不准有色人种移民入境<sup>①</sup>。

因此，从1890年以后，澳大利亚工党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政策<sup>868</sup>和纲领，侧重在国家的帮助下，维持——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工会现在企图利用政治武器，首先在各州，然后在联邦，重新取得和保持当初通过产业行动曾经力图得到、而且有一个时期已经大部分得到的东西。

当工会象这样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政党，而且企图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以外，找到政治斗争的盟友时，一些少数派集团，特别是在南威尔士和昆士兰，都在试图为既作为社会学说又作为工人阶级行动基础的社会主义取得支持。但是有一个时期，这些集团虽然争取到了信仰者，对于各州的工党或者工会的当前政策，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的确，当以在伦敦码头工人罢工中取得胜利——澳

---

① 关于这个问题在社会党国际中的情况参看本卷上册第44页和第85页。

大利亚工人曾经对于这次罢工的成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sup>①</sup>——而闻名的本·提勒特在 1898 年访问澳大利亚时，由于他宣传社会主义时的辩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但是他更多地被当作是一个新工会主义的代表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宣传旅行的影响更多的是增加了工会会员，和使工会于失败以后重归统一，而不是建立任何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样，亨利·海德·香皮翁曾经于 1894 年愤然离开了英国，到澳大利亚定居；虽然他对重建劳工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力量，却没有做什么事情。汤姆·曼恩在新西兰住了一年以后，后来在 1903 年到澳大利亚，他用了六年多时间在澳大利亚从事劳工运动，他的贡献是比较大的；他曾经企图使澳大利亚工人信仰社会主义，但是他的更大的影响是鼓动起产业工人的战斗精神而不是将他们争取到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上来。

四十年代，一些英国宪章派——有些是被流放的犯人，另外有些是志愿的移民——到达以后，对于赋予澳大利亚工人以激进传统起了一些作用；但是，并没有象美国那样，有大批的社会主义流亡者来自欧洲大陆。1848 年以后，从英国来的工人阶级移民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混合工会的“新型”工会主义。几乎与在英国一样早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建立了英国机械工人和木工工会分会，并且在不断发展的澳大利亚经济中为工会主义的发展树立了楷模。实际上，一直到 1880 年以后，澳大利亚才听说有社会主义；但是即使到这个时候，社会主义思想也是由欧洲大陆的移民，而不是由英国移民带来的。在八十年代初期，一批法国和意大利移民曾经想建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当时在欧洲这个组织已经瓦解——为时已晚的澳大利亚支部，但是没有成功；大约在 1886 年时，有两批德国人在阿得雷德和墨尔本建立了社会民主联盟。然后在

<sup>①</sup> 参看本卷下册第 338 页。

1887年，一批英国移民在悉尼建立了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联盟，他们只有6个人；但是，他们创办了一家刊物《澳大利亚激进派》。接着他们发生了争执。《澳大利亚激进派》的业主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开除了他，另外创办了一家新刊物《社会主义者》。这家刊物寿命都不长。

后来发生了1890年和以后几年的大罢工，此后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普遍起来了。一些工会分会参加了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联盟。社会主义者参加了争取在新南威尔士成立一个工党的运动，但是后来又退出了，企图建立一个劳工社会党。1892年，他们在悉尼召开了一次全澳大利亚社会党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昆士兰的代表，包括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集团在内。这次代表大会虽然与会者甚少，仍决定成立一个澳大利亚社会党总支部，派遣一个代表F. 斯森萨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但是，不久便发生了争执。以德国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脱党组成社会民主党总支部；无政府主义者单独成立了一个团体，创办了一个刊物《正义》。社会民主党总支部到1896年就宣告结束；这时，社会主义联盟似乎已经奄奄一息。但是，在那一年以后，联盟在查尔斯·M. 巴尔洛(死于1900年)的领导下又复兴起来：它在新南威尔士的矿业中心纽卡斯尔出版了《集体主义者》，后来又出版了《人民》，与工会发生了激烈争执。纽卡斯尔成了社会主义联盟的坚强据点，联盟与工会领袖进行了激烈斗争，指责他们在1896年的惨败后所奉行的小心翼翼的政策将工人出卖给了煤矿主人。1898年，一群意大利移民在悉尼成立了一个国际社会党俱乐部，参加这个俱乐部的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移民。这个团体与社会主义联盟发生了争执，因为社会主义联盟在纲领中列进一项条款，反对可能降低澳大利亚工人生活水平的移民。俱乐部反对这一条款，举出国际社会党所持的立场

来支持它的赞成门户开放的政策；联盟同意删去这一条款。同时，联盟发展到了维多利亚，1897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支部；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在昆士兰成立了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先锋队的社会主义团体，威廉·兰恩早先曾在那里做了许多工作来推广社会主义思想。1900年，社会主义联盟将它的总部迁回悉尼，在悉尼继续出版《人民》。1902年，在维多利亚发生了分裂，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民主党。

1901年，在澳大利亚各移民区统一之后举行的第一次联邦选举中，社会主义联盟有6名候选人竞选参议员，结果全部落选。它与新的联邦工党和悉尼的行业劳工理事会发生了激烈争执，因而不准它的会员参加这些理事会的工作。联盟一直存在到1904年派遣克劳德·汤普逊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时；但是，它的影响减退了。然后，主要是在汤姆·曼恩的影响下，又重整旗鼓，曼恩于1906年任墨尔本出版的《社会主义者》编辑后，在1907年建立了一个大洋洲社会党总支部，计划包括新西兰在内，并以当时的悉尼国际社会党俱乐部的H. E. 霍兰德<sup>①</sup>为书记。这个新团体派遣维克多·E. 克罗耶梅尔参加了1907年举行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最初它得到了以J. P. 琼斯(1872—?)和弗兰克·安斯提(1865—1940年)为首的一些工党议员的支持；但是，当大洋洲社会党总支部在左翼挟持下，决定禁止其成员与工党联合以后，他们中大多数人被迫辞职。在汤姆·曼恩于1909年离开澳大利亚以后，它很快就变成了无足轻重的组织，虽然有些曾经与曼恩密切合作的人，比如H. E. 霍兰德、继曼恩为《社会主义者》编辑的罗伯特·S. 罗斯和维多利亚社会党书记兼铁路工人工会书记弗兰克·海叶特等仍保持社会主义传统。

社会主义联盟的查尔斯·埃尔在向190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

<sup>①</sup> 参看本卷下册第374页。

社会党代表大会报告澳大利亚社会主义的情况时，谈到它的农村地区仍然主要是畜牧业和农业性质，而且它的主要工业城市彼此之间距离遥远，从这两点来解释它的落后状态。他认为，近年来，资本主义剥削的刻薄程度大大增加了，他说，“不比在英国的情况好多少”。他详细谈到在 1890 年的海运罢工以后，社会主义思想突然迅速发展情况，并且在主要谈到新南威尔士的时候，认为社会党人在建立政治劳工联盟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 1891 年的竞选中，这些联盟取得了巨大的、在绝大多数上也是非逆料所及的胜利。

他叙述了在取得这一胜利之后，如何在新南威尔士在保护主义问题上，工党又迅速发生了分裂，他还叙述了在一方面是当选的议员，另一方面是行业劳工理事会和政治劳工联盟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如何发生了分裂。他说，由于吸收了只对于当前的目标感到兴趣的会员，当地联盟的初步的社会主义被冲淡了，又说，这种压力变得十分强大，以致社会党人被迫退出工党，并根据阶级斗争的概念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党，在它的纲领中包括废除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私人所有制。

1907 年，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澳大利亚报告，是澳大利亚社会党维多利亚支部主席 J. P. 琼斯和书记汤姆·曼恩签署的。报告的语气很乐观，报告的倾向与 1904 年查尔斯·埃尔的报告大不相同。琼斯和曼恩认为联邦和各州的工党，872 主要是由社会党人组成的，许多议员也是社会党各组织的实际成员。他们一致认为，在普通的工会主义者和工人选民中间，对社会主义还没有普遍了解，但是他们说，正在进行有力的宣传，看来很快就可以将工党改变成为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这份报告是在大洋洲社会党总支部成立以前不久写成的，当然也是在迫使琼斯和其他工党议员辞职的分裂发生以前写成的。

这两个文件之所以互相冲突，真正的原因是：在九十年代初

期,社会党人虽然人数甚少,在他们帮助建立起来的政治劳工联盟中,却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并且利用工会失败所引起的强烈的阶级斗争情绪将社会主义目标写进了联盟的纲领。在新南威尔士,情况尤其是如此,在那里,联盟毫不含糊地宣布主张把生产资料以及分配和交换手段国有化。在1900年成立联邦工党时,又重复了这些宣言,这并不意味着,各工党实际上要在国有化方面采取什么行动,或者将它列为竞选纲领中的直接要求。他们的社会主义,就其意味着国有化来说,只不过是希望在不知何年何月他们当权时实现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越是接近于掌握政权,就越是不顾他们的队伍中积极的社会党人的抗议,倾向于要把社会主义排除于他们的纲领之外,因为他们担心把有些选民吓跑了,这些选民可以被争取过来,投票支持工党的直接要求,但是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认为这是一个暗示革命和没收财产的主义。工党的反对者不断在工党奉行社会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希望影响动向未定的选民。

873 在社会党人比较强大的新南威尔士,差不多工党刚一成立,这个问题就达到了严重地步;以后社会党人就不断在党内进进出出——或者不如说是有些人在党内,有些人在党外反对它。新南威尔土工党未来的领袖 W. A. 霍尔曼原来属于党内的社会党人派,但是没有跟随它的极端分子退党,他在看到党内纲领中社会主义条文可能危害他获得多数的前景时,立刻就反对这一条文。1905年,几经斗争,他说服工党会议从纲领中删除了社会主义条文,而作为代替,纲领阐述党的宗旨为“通过将垄断企业改为集体所有制,以及扩大州和市政当局的产业和经济职能,将它们生产的全部成果交给所有生产者”。这并没有妨碍他在1905年与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敌人乔治·里德爵士的著名辩论中,有力地为国营和市营企业的优点辩护;也没有在他成为新南威尔士政府的主要人物时,阻碍他与阿瑟·格里菲斯(1864—1946年)合作,来建立一些以1901



年创办的州营砖厂为开端的州营企业。在他于 1911 年成为州总理以后,在创办砖厂之后又创办了州营采石场,州营输油管 and 水泥工厂、州营锯木厂和一个州营拖网渔船队。这些企业中有一些是在霍尔曼于 1917 年因征兵问题被开除出工党以后开办的。他过去是,这时候仍然是相信州营和市营企业的经济优点的,他提倡这种企业是因为这是有益的事业,而不是以此作为取消资本主义的手段,并且丝毫无意将它扩大到有限范围以外。他的国有化的概念,说老实话,是反垄断性质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当州向资本主义公司购买供应品,或者与私人企业家签订有关承办公共工程的合同,而不是直接雇用劳动力来完成时,这也是为了防止普遍存在的贪污现象。

威廉·阿瑟·霍尔曼(1871—1934年),一位英国旅行剧团演员的儿子,十七岁到澳大利亚,在悉尼定居。他具有极为强烈的求知欲望和了不起的演说天赋,后来成为澳大利亚劳工运动中最优秀的演说家。最初他是左派,是悉尼一个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团体的坚强的支持者。他在 1898 年当选为新南威尔士议会议员,在休斯转向联邦议会进行活动以后,他随即成为州议会中的杰出人物。1910 年,他在詹姆斯·麦克戈温(1855—1922 年)领导的第一届新南威尔土工党政府中担任检察总长,不久以后,麦克戈温就让他成为实际的领袖。他于 1917 年与工党分裂以后,担任总理一直到 1920 年他被击败而退出政界,重操律师旧业。他在晚年再次担任联邦议会议员,但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他是澳大利亚政界的一位伟大人物,除了在他自己的州里以外,在各次联邦会议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874

一位有真知灼见的法国人阿尔贝·梅丹在本世纪初写了一本关于大洋洲劳工运动的书,将他的著作称作《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他承认当时存在的各工党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但是指出,道

道地地的社会主义者是很少的并且对于控制各工党的各工会没有什么影响。他说,他发现在澳大利亚,一般是在轻蔑的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在工党人士中间,社会主义者甚至被说成是“极端分子”,他指出工党纲领的狭隘性,以及将许多工党党员与其他政党党员分开的狭隘的界线;他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在大洋洲影响很小,是由于工党领袖除了英语以外几乎不说任何别的语言。他在书中记载了甚至在1900年以前,工党在从当权政府手中争取到它们所要求的法律方面所获得的极其巨大的成就。在1911年出版的、他的书的再版中,他几乎没有修改这些判断,虽然这时社会主义宣传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新的动力,产业工人的战斗性已经大为增长,工党也已经大大增加了他们在议会中的实力。1904年,以约翰·克里斯蒂安·华特森(1867—1941年)为首的第一届联邦工党政府执政了几个月,十年以后,在联邦中以及在组成联邦的六个州里的五个州里,又有几届工党政府执政。在战争年代,由于在义务兵役制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在这场争执中,875 休斯起了主要作用)而运动陷于分裂,结果在政治上遭到挫折。但是在此之前,在苏格兰煤矿工人和机械工人安德鲁·费舍(1862—1928年)的领导下,它一直在不断扩大它的影响。费舍于1885年移居昆士兰,在他于1901年当选联邦议会议员以前,作为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他在那里就有很大影响。1907年费舍成为党的领袖,第二年出任总理。除了有短时期的中断外,他一直担任总理到1915年,这一年他辞职,以联邦代表身分前往伦敦。费舍是一位精明的领袖,他坚决主张奉行一种追求明确制定的有限目标和避免理论和承担长远义务的政策。实行累进土地税和建立联邦银行主要是他的成就,虽然准许银行成立的条件与工党的传统要求很少相似之处,工党一贯要求建立一个公立银行机构,从而将资本主义的银行赶出金融界,并且为小人物和各劳工组织的利益控

制信贷。费舍也没有能够将“新保护”政策的重要部分付诸实施，根据这项政策，不仅要利用进口关税来保护澳大利亚的生活水平，而且为此要对那些没有支付公平工资和不同意改善劳动条件的雇主实行差别待遇。最高法院认为这种差别待遇是违反宪法的。

费舍到伦敦去之后，曾在他手下担任检察总长的威廉·摩里斯·休斯(1864—1952年)接任总理。休斯生于伦敦，1884年移居新南威尔士，成了悉尼旅馆、俱乐部、饭店工人工会的创始人和书记。1894年他当选为新南威尔士州议会议员，在议会中他起了杰出作用。1900年，他转而为悉尼码头工人联合会服务，1902年，担任联合会书记。1901年，他当选为联邦议会议员，他在费舍手下任职以前，曾在1904年华特森的为期短暂的工党内阁中担任外交部长。休斯是一个容易激动的、善于哗众取宠的政客。他在1916年 876 由于支持征兵法而被开除出工党，而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反工党联盟的领袖。他一直任职到1923年，在战争的后期以及在和会中同劳合·乔治一道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此后他失去了他的影响，虽然在1934年莱昂斯执政时期又担任了部长，一直到1941年工党重新执政。

从联邦成立起，各州的工党经常定期举行联合会议来制定它们的统一政策；1905年，会议确定党的目标如下：

(甲) 以保持种族纯洁和在澳大利亚发展一个开明和自给自足的社会为基础，培养一种澳大利亚精神。

(乙) 通过将垄断企业改为集体所有制，以及扩大州和市政当局产业和经济职能，将他们生产的全部成果交给所有生产者。

除了这些目标以外，会议又增加了一个包括九点的“战斗纲领”，这九点是：(一) 维持一个白澳；(二) 实行垄断企业国有化；(三) 实行老年退休金制度；(四) 举行关于关税的公民投票；(五)

实行地价累进税；(六) 限制公家借款；(七) 实行航海法；(八) 成立民防队；(九) 颁布仲裁法修正案。其中第(四)点是那些希望党承担义务力主实行保护主义的人，与那些反对这种政策的人彼此僵持的结果。他们同意这样一个妥协办法，就是由全体公民投票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 1905 年的同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如果工党再次奉召执政，“工党内阁应由党的干部会议提出组阁人选”。这样就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不仅是总理，而且是他的内阁同僚都应该由整个党来选择。但是，会议没有建立任何执行委员会负责休会期间的日常工作。一再有人提出组织这样一个机构；但是一直到 1915 年才在澳大利亚政治执行委员会的名义下，真正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这是在工会经过多次努力均告失败之后，终于建立起一个类似的统筹机构以后两年的事情。事实上，州的组织，不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产业方面的，都很不愿意建立任何共同的执行机构。工会早就习惯于举行代表所有各州的全体代表大会；并且如我们所见，工党也效法了它们的榜样。不过虽然人们承认有必要举行这样的大会，却非常反对建立赋有执行权力的任何统一机构。

关于议员的地位与提名他们为候选人的工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有很大的麻烦。我们知道，这种麻烦首先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新南威尔士产生的。在那里，党企图在议会外面控制它的议员，结果，在工党赞助下当选的议员有半数以上脱了党，并且加入了其他历史较老的政党。面对着这种脱党的情况，工党硬性要求它们的候选人提出各种形式的“保证”，限制他们必须按照党作出的关于政策的决定投票，并且必须接受议会党团的多数就在具体问题上应该如何投票作出的决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议会党团奉命单独举行会议来事先决定应该采取的方针。保证的内容因组织而异，出入很大，有时在不构成党的既定政策的一部分的问题上

容许有伸缩余地,有时却要求无条件服从大多数的决定。

1900年以后,在联邦和各州工党发展的同时,由于仲裁法庭和工资委员会作出越来越不利于工人的决定,劳工的骚乱也在日益增加。人们普遍认为,强迫仲裁和国家规定工资的制度充其量只不过是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在物价日益上涨时保持不变,还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工会强制实行符合要求的劳动条件的权力比1890年以前的黄金时代要小得多了。除了工资最低的那些人——他们从运用“最低生活工资”这一概念中得到了好处——的情况以外,这大概是正确的;因为,在1890年以前,工会处在非常有力的地位,它们不仅能提高工资,而且能在规定学徒制、八小时工作日、“不雇佣非工会会员”和“工会合同”这样一些问题上贯彻它们的规定。毫无疑问,主要是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象矿工和剪羊毛工人这样组织良好的团体才能得到这些利益;大多数不熟练的男工或女工所得到的利益要小得多。但是熟练工人,尤其是矿工和剪羊毛工人,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在1890年以后的失败和不景气的年代中所受损失是多么巨大,并且认为仲裁法庭或者工资委员会不可能再给他们权力使他们能迫使雇主服从他们的片面规定。 878,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仲裁制度的情绪日益强烈,虽然许多经过九十年代失败的资格比较老的工会领袖,以及历届议会中的工党议员仍然为这种制度辩护。稳健派就象英国的稳健派一样,指出了从比较公平的赋税、得到改善的社会福利事业以及免于被庞大的资本主义联合企业压垮的自由中得到的好处;他们说在澳大利亚,为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有必要限制对于生活费用会有不利影响的工资增加。工党必须从工会会员以外的人中间争取选票;它们要想得到大多数,就必须注意农村的选民和城市里的“小人物”;他们肯定非常害怕,如果工会恢复战斗性,可能引起与1890年一模一样的可怕的反应。因此,政治领袖坚持以强迫仲裁作为维持劳

资和平的一种手段。

这种妥协政策在费舍新保护主义失败以后，越来越对雇主阶级有好处，与这种政策形成对照的是，战斗性的产业工会主义又开始抬了头，这一次不是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理论，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从 1905 年美国成立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时候起，产业工会主义的宣传就开始在澳大利亚，特别是在矿工和码头工人中间，取得了进展。

当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分裂时，它的大多数澳大利亚的追随者支持德·里昂派——也就是说，拒绝完全抛弃政治行动，要求建立一个革命的社会党并在产业联合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础上改组工会运动。运动的主要力量在新南威尔士；它的领袖一再努力企图采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章程序言作为州工会运动的基础。这些企图都失败了，但是产业工会主义者终于使赞成合并的提案得到采纳，并且在使一些行业工会并入产业型工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他们还竭尽全力来煽动非法罢工以破坏仲裁法案。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影响只是在 1914 年以后，在战争的条件下，在澳大利亚才达到了最高峰；但是从大约 1908 年开始，它就非常积极地反对工党主张通过仲裁和国家规定工资来实现劳资和平的政策。

人们认为 1908—1909 年在布罗肯希尔发生的激烈争执主要是由产业工会主义的思想的影响引起的。当两个要求削减工资的采矿公司用关厂来对付矿工的反抗时，纠纷开始了。工会认为根据仲裁法，关厂是不合法的，但是联邦仲裁法庭决定：禁止罢工和封闭工厂的法律并不能阻止雇主的矿山整个歇业，象这些公司所做的那样。于是将工资问题提交仲裁，法庭满足了矿工的大多数要求；但是公司拒绝重新雇佣一些积极的左翼分子，而工人则拒绝在没有这些左翼分子的情况下复工。斗争再起时发生了骚乱，警察逮捕了一些矿工领袖，包括托姆·曼恩在内，他是在争执期间应

矿工工会之邀担任组织者的。在后来进行的审讯中，曼恩无罪开释，但是一些其他人被关进了监狱。矿工领袖彼得·波林因煽动罢工罪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对某些被控告参加骚乱和企图威胁非工会会员的工人纠察队员，甚至判处了更重的徒刑。为抗议这 880 次判决，矿工工会号召新南威尔士行业和劳工理事会举行总罢工，但是工党代表大会虽然对当局的行为表示抗议，却不愿意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结果没有任何作为。

引起左右两派的激烈争执的下一个大规模的劳资纠纷是 1912 年的布里斯班的罢工。布里斯班纠纷是由于电车公司雇工要求准许在值班时间佩带工会徽章遭到公司拒绝而引起的——这个要求的目的是要对非工会会员施加压力，以促使专门雇用工会会员的制度得以实现。电车工人举行了罢工，并且将他们的题目提交给昆士兰劳工联合会，该会乃号召举行总罢工以示支援。罢工最初限于布里斯班，后来扩大到了整个州。当时曾经企图进一步扩大罢工到新南威尔士；但是新南威尔士工会除了给予财政支持外，不愿意采取其他行动。昆士兰政府要求当时以安德鲁·费舍为首的联邦政府派军队镇压布里斯班的骚乱，但是费舍拒绝干涉。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了昆士兰政府对罢工工人采取激烈行动，法庭再次从严处理被逮捕的领袖。昆士兰劳工联合会过了几天就下令停止了农村地区的罢工，在布里斯班，由破坏罢工的工贼恢复了电车交通和其他公用事业，于是罢工遭到了破坏。罢工失败以后，人们纷纷互相攻讦，因而扩大了工会运动左右两翼之间的分歧。

在 1914 年以前的几年，以及在此之后一直到他们在征兵问题上进行斗争后遭到压制，澳大利亚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领袖们不断对支持仲裁的工会和工党进行激烈斗争。他们的主要发言人是托姆·巴克尔，他主编该会刊物《直接行动》。他最后在 1918 年放逐到智利，又从智利到苏联，与他以前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中的

881 盟友约翰·本杰明·金一起在苏联定居下来，并且取得了正式的地位。在战争期间，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彼得·拉金，他是都柏林的詹姆斯·拉金的兄弟。根据战时法律，他们都被判处重刑。在1914年以前，世界产业工人工会作为一个组织规模始终很小；它主要通过它对于某些工会的影响进行工作，并且作为左翼政策的极端代表采取行动，这种政策在不完全同意它的见解的社会党人和产业工会会员中间，博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即使是依靠这些盟友，除了在矿工和码头工人中间以外，它在工会主义者中间也始终没有获得接近于多数的支持。铁路工人和大多数行业工人工会对世界产业工人工会采取冷淡态度，并且继续支持受到该会严厉谴责的工党政治家。

在此期间，在1907年的著名的“收获人判决”中，联邦仲裁法庭第二任庭长、法官希金斯先生宣布了最低生活工资的原则。此后，法庭在希金斯的指导下，通过对提交给法庭的各种申诉的处理，开始拟定一套判例，用以在它所管辖的各行业中规定相对的工资。如果工人的雄心只限于保持技术工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同时使工资最低的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得到适当改善的话，那么他们对于法官希金斯先生的一套办法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他在他所著的关于这些程序的著作中，自豪地称之为建立了“一个新的法治领域”。但是联邦仲裁法庭的传票只能在涉及到一个州以上的争议中有效；而对于各州的法庭所作出的判决是颇有怨言的。再有一层，仅仅是稳定实际工资根本不是左翼的争取目标。左翼知道，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只不过回到了1890年的水平，工会比起在九十年代遭到可耻的挫败之前来，贯彻自己意志的力量要弱得多了。他们痛恨工党实际上宣称代表他们与大资本家达成的休战协议，而且他们不满意自从老板们组织起来对付他们以后，他们所受到的更加严厉的纪律约束。他们是革命者，而不是改良主义者；如

882



果他们的革命主义缺少非常明确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话，这种欠缺并不丝毫减少革命的激烈程度。

我们现在可以问，尽管发展了非常强大的劳工运动，运动往往显示相当强的战斗性，而且也经历过许多激烈的劳资斗争，为什么澳大利亚没有产生具有任何持久的力量的社会主义运动？我想，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找到答案，即澳大利亚社会是通过不同的道路走向民主的。在殖民地自治的大部分时期，支配澳大利亚政治的是争取“更稠密的”移民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在占有土地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斗争。当时深得议会关注的是接连颁布的几个土地法，根据这些法律，将集中在大牧场主手里的大地产划归小农庄所有；而在早期，需要由自由党或者激进党，而不是工党或者社会党来为“小人物”的利益进行斗争。同时，城市工人有一个时期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可以通过产业行动来实现他们的大多数要求，而并不十分需要借助政治行动——或者至少不需要组成他们自己的政党。他们——或者至少是他们中间的比较熟练的工人——建立起了大概是十九世纪中工人阶级所能达到的最高生活水平，并且贯彻了一种在经济迅速发展情况下，雇主们不得不接受的工会的规章制度。当1890年工商业严重不景气时，资方利用这个机会来破坏工会权利，这时工人迅速采取了政治行动，但是，是以它作为恢复他们所失去的地位的手段，而不是作为改变社会基础的手段。他们的斗争对象是富人，但是实际上，这里并没有资格依靠世袭权力来控制一个州的贵族阶级，当地也没有反对他们的民主思想的君主，也没有压倒他们的军人阶层或者军备的负担。甚至在州当局对罢工工人采取强硬行动时，他们也不可能象马克思那样，或者哪怕是象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声明的那样，来看待一个州。当他们投身政治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大多数州里，特别是在新南威 883  
尔士和南澳大利亚，大多数资格较老的政党都非常愿意与他们妥

协，并且竞相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们几乎立刻就发现自己能够左右政治权力，并且能够随意使政府上台或者下台，即使说还不能够组织政府。甚至在他们自己组织政府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劳资立法和社会立法方面取得了巨大让步；并且不久以后，在著名的1907年“收获人判决”中，他们争取到了联邦仲裁法庭承认以最低生活工资原则作为根据，来作出一切裁决。工党早期纲领中所包括的几乎每一项都得到了实现；虽然战斗性的工会仍然遭到失败，在最初取得的一些成就之后从仲裁得到的利益越来越小，整个说来，许多澳大利亚工人仍然认为极端分子所指责的温和的宪法政策是颇为使人满意的。当联邦和各州中的工党接近于取得多数，使它能够组织自己的政府，而不是靠着有时支持这一个老政党，有时支持另一个老政党来取得让步的时候，局势发生了变化。工党这种威胁所产生的影响是迫使其他政党为了希望将它击退而联合起来反对它；这种政策在一开始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这种政策并没能能够长时期地阻止工党在大多数的州和联邦里得到绝对的多数。不过，取得这种多数的代价是：为了吸引态度动摇的选民，而将它的纲领大为冲淡了。工党不再谈论社会主义，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限制在立即可以实现的要求方面。在联邦中，联邦工党面临着一种特殊的困难，因为联邦宪法在经济事务上赋予的权力非常有限，这种权力主要掌握在各州的手里。

安德鲁·费舍在1910年发现，如果不凌驾于宪法之上而给予联邦以更广泛的权力，新的工党“纲领”有一大部分就无法实现，他于1911年提出了一系列提案，交付全民进行公民投票。费舍要求  
884 得到全权来控制商业（不仅仅是对外贸易，或者各州之间的贸易），控制营利公司的权力，在各州内部及各州之间的商业中规定工资和就业条件的全权以及对于各种各样的垄断资本和联合企业进行控制的权力，包括接管它们，并且作为国营企业来经营的权力。这

些提案遭到了断然拒绝,除了西澳大利亚以外,在每个州都遭到了多数票的反对。安德鲁·费舍认为,公民投票的这个决定明确说明,人民并没有委托工党采取有别于在目前经济制度内部实行劳工保护政策的、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政策。他的这种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尽管特别是在矿区和港口存在活跃而有力的左翼,大部分澳大利亚人和澳大利亚工人并无意赋予他们的政府以采取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权力: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将政府作为一种工具来帮助他们实现直接而有限的改革,他们相信这种改革是与他们的高度个人主义的传统的延续一致的。

## 第二十四章

### 新 西 兰

新西兰的工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充满了似非而是的现象。这个国家甚至在拥有一个社会党之前，就以一种经验论的社会主义的发源地著称。它在劳资纠纷中实行一种强迫仲裁的制度，这是自由党内阁中的一个社会党部长提出的；但是它也是资本家与劳工之间曾经发生过最激烈的劳资冲突的国度。有一个时期，它是战斗性的产业工会主义的非常坚强的据点；但是在这一阶段领导极左翼的那些人大部分后来又都变成了新西兰工党的领袖，这个党由于采取一种与他们以前的愿望大相径庭的——或者至少是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实现的——社会保险立法制度而闻名。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劳工运动，特别是在初期，是有密切联系的。在新西兰劳工运动中很多知名人物是澳大利亚人，或者曾经在澳大利亚工作过；除了工人以外，宣传人员在两国之间也是来往频繁的。到澳大利亚来的外国旅客往往也访问新西兰。从1902年到1903年，以及后来在1908年，汤姆·曼恩都到过新西兰；在此以前，本·提勒特曾经在此地做过两次宣传旅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新闻记者罗伯特·S·斯罗和H. E. 霍兰德都从澳大利亚来此编辑《毛利工人》；霍兰德生于新西兰，后来成了新西兰工党的领袖。从英国和苏格兰来的移民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过从美国来的影响是不小的，这种影响主要是由曾经在美国工作过、主要受到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及其前身西部矿工联合会鼓舞的澳大利亚人或者新西兰人带来的。

代表美国稳健派影响的是 W. T. 米尔斯，在 1914 年以前，他曾经在新西兰做过几年宣传工作。

在考虑劳工运动的背景时，必须记住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新西兰经济领域发生的，以及在此后持续久远的非常巨大的变化。在八十年代以前，新西兰主要是一个拥有大牧羊场的，出产羊毛的国家，小农在那里很少发展余地。那里的矿工人口日益增加，并且也有了一些工业方面的发展，既供应出口，也供应国内市场。但是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它的畜牧活动，在经济上，支配新西兰的则是富有的牧场主，他们大多数人是用十分低廉、迹近荒唐的代价取得他们的巨大产业的。牧场主根本不急于与别人分享他们的特权地位，或者鼓励在土地上定居的机会，因为那将提高劳动力的价格，或者使劳动阶级得以独立自主。在社会意义上说来，从一开始的时候起，澳大利亚就基本上是民主的。新西兰则绝不是。新西兰是有意作为英吉利人的天堂来发展的，并且打算在这里复制“祖国”的阶级结构，而不作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由于这一点——也就是说，由于对土地的垄断以及在广阔的畜牧场上就业机会较少，新西兰的工人阶级在十九世纪的中间几十年没有得到象澳大利亚工人有幸得到的那种利益。新西兰的金矿是后来发现的，其规模也不能与澳大利亚相比拟，而且大部分是用资本主义方法开采的。移民人数往往超过就业的机会，在不景气的岁月里，失业人数达到高峰，以致民不聊生，而且事实上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民于水火的措施。统治阶级的社会态度是最反对工人提出的种种要求的；而且虽然熟练工人在六十年代开始组织福利团体，在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组织工会，一直到八十年代，甚至在技术工人中间，组织仍然是没有力量的，至于在农业工人和城市中的大批只是偶而有工作的无产阶级中间，则几乎就没有组织。在八十年代，各城市纷纷成立行业和劳工理事会，把手工艺人的小规

887 校地方性工会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各地区距离遥远，交通异常困难，所以不存在把全国同一行业的工会合并起来或者组织成为联合会的倾向。谈判和罢工行动仍然是局部性的；行业和劳工理事会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处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环境里，是作为区域性的压力集团，而不是作为具有任何明确政策的统一运动的代表来进行活动的。他们的主要要求是定居在土地上、征收所得税、保护工业、进行技术教育和实行八小时工作日。

以后，在八十年代期间，主要由于冷藏的方法使它有可能向全世界输出肉类和奶类产品，新西兰的经济开始发生变化。羊肉代替羊毛成为出口的大宗；接着黄油和干酪的输出量也越来越多。大地产仍然存在，但是通过法律或者是通过经济力量的作用，许多大地产分散了。小农有了发展的机会，整个国家欣欣向荣，发展迅速。如我们在下文将看到的，广大人民并不是没有经过艰苦斗争就取得了这种进展；不过，新西兰已经不再是一个分为绅士和劳动者，只有人数很少的中间阶级的国家，而成了一个有大大小小的农场主的国家，特别是在矿山和港口，有人数相当多的产业工人阶级，而且它的工人阶级运动中有着一一条鲜明的界线，分成从来就与自由派结成联盟来反对贵族的一代，以及迫切希望试验一下社会主义和产业工会主义的最富于战斗性的战略的年青的一代。

在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劳工协会组织扩大到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怀希的 J. J. 斯坎隆在九十年代当选为议员，后来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担任矿工联合会主席，他就是属于劳工协会的。新西兰劳工协会有一个广泛的纲领，协会的目标是成立一个不论职业，所有人都能参加的、规模巨大的世界工人联合会，借以“保证工人充分享有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协会要求土地和公用事业国有化，  
888 实行公营银行制度，成立生产合作组织，实行老年退休金制度，同工同酬，给予妇女选举权和缩短劳动时间。他们将亨利·乔治的著

作,后来又將爱德华·贝拉米的著作传播到国外;而在新西兰,它们吸引了許多反对寡头统治的激进派,包括自由党领袖约翰·巴兰斯在内。在九十年代,它们逐渐消声匿迹;但是,它们同新西兰劳工运动的良好开端有很大关系。

这时,约翰·巴兰斯(1839—189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生于爱尔兰,是一个小佃农的儿子,青年时代到达新西兰开了一家商店,后来又办了一家报纸,1875年,作为“小人物”的维护者进入政界。1878年他使一项征收地价税的法律获得通过;但是颁布这项法律的政府执政时期很短,保守党在第二年就把它废除了。再度上台以后,他在1884年到1887年之间,又使一些在小农庄土地上定居的法案得到通过,然后,作为1891年到1893年之间的总理,他前进的步伐更是大得多,他提出了庞大的土地定居计划,实行土地分级税,但对小块土地所有者豁免,对在外地主加重,同时对改进土地者豁免,并把永租的皇家土地让渡给租户。在他的影响下进行的改革——其中有一些在他死后才作为法律颁布——还包括妇女投票权,废除双重投票制、实行分级所得税,和改善毛利人的待遇。他的劳工部长威廉·潘伯尔·里夫斯一部分在他执政时期,一部分在他的继任者赛登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劳动条件的劳工法,和一项强制仲裁法,这一法律目的在于造福工人,后来成了新西兰劳工运动左右两翼争执的主要问题。

约翰·巴兰斯无疑是一个极其杰出的人物。他是自由党和工党联盟的缔造者,在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开始以后很久,这个联盟一直支配着新西兰的政治。第一批选人议会的工党议员是他的支持者,他还得到了大多数工会领袖以及产业劳工理事会的坚决支持。也许他很幸运,在他开始执政时,新西兰工会和澳大利亚工会一样,刚遭到严重失败。那时,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联系,在某些方面,比联邦成立以后要密切;1890年在澳大利亚开

始的海运大罢工扩大到新西兰，发展成了一场工会与雇主之间的类似的冲突，工会企图规定劳动条件而雇主则声称他们有随心所欲缔结个人合同的“自由”。

1889年，在约翰·A·密勒(1869—1940年)的领导下，一些工会在达尼丁组成了一个海运委员会，除海员和港口工人之外，还包括有铁路工人、矿工和其他集团。密勒是海员工会书记，后来出任自由党内阁的部长。海运委员会旨在成为新西兰各地各种工人的一个战斗性的联合组织。它所属的任何团体如果与任何雇主发生争议，它就把所有团体联合起来对那一雇主施加压力以贯彻它的意志。根据这项政策，它在1890年对一家印刷公司——惠特孔与汤布斯公司——进行抵制，因为这家公司以低于标准的工资雇用排字工人。委员会号召铁路工人拒绝运送发给或者发自这家公司的“不干净的货物”，并且与铁路局长接洽来取得他们的默认。铁路局长拒绝了，并且命令大批根据委员会的命令行事的人员暂时停职。委员会于是号召铁路工人罢工；但是工人由于担心政府采取行动，拒绝罢工，一直威胁要举行总罢工的委员会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且承认失败。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澳大利亚的海员大罢工已经开始；一家主要的新西兰航运公司——联合轮船公司——是属于澳大利亚船主协会的，这个协会决心要粉碎码头工人工会和海员工会。新西兰航运委员会与澳大利亚航运工会存在类似联系；新西兰的雇主与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同事采取共同行动，在整个农村地区设立招募处招募临时工人，并且在农场主的支持下，招募了大批破坏罢工的工贼从事港口工作。自由党人曾设法制止这种招募工作，但是没有什么成就。铁路局长下令铁路工人担当起罢工工人通常所做的工作；那些接到这个命令的人举行了罢工，结果被解雇了。政府然后进行干涉，并且设法使雇主和铁路局长与工会协



商。但是,除非工会事先同意他们雇佣非工会工人的权利,铁路局长和大多数雇主的代表拒绝参加会议。举行谈判的企图失败了;由于招募了破坏罢工的工贼,由于铁路工人一味拒绝接替罢工工人,罢工终被击败。结果工会运动的力量遭到粉碎,就象它在澳大利亚同时被粉碎一样,并且使工人领袖转而设法通过政治行动来恢复他们在劳资纠纷中失去的东西。

由于以约翰·巴兰斯和理查德·赛登为首的自由党人支持工人,甚至要设法制止招募破坏罢工的工贼,所以新西兰的政治局面与澳大利亚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在1890年的选举中,所提出来的工党候选人是作为巴兰斯的支持者,而不是象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那样,作为独立政党候选人提出来的。自由党和工党候选人的这种联合取得了巨大的选举胜利,结果在多数派队伍中有六人是工党代表。约翰·巴兰斯将保守党人赶下台,在1891年组成了一个政府,让威廉·潘伯尔·里夫斯担任教育和司法部长。第二年,里夫斯部长新设立了劳工部,1894年,他引导议会通过了强制仲裁法,这一法案一开始时使工会避免了它们在1890年所遭到的失败,实际上,在它建立了一种新的工会主义以后,导致了1906年开始的左翼的新的反抗。

威廉·潘伯尔·里夫斯(1857—1932年)生于新西兰。他受过律师教育,从事新闻工作,然后又进入政界。他在1887年曾为议员,1890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献》,在这本书里,他评述了社会主义先驱的一些著作。他在新西兰的政治生涯是很短暂的。1896年,他接受了殖民地驻伦敦总代表的职务,一直任职到1908年。在此期间,他是一位向英国公众介绍新西兰的人,在1898年,出版了泛泛介绍新西兰的《白云之乡》,在此以后,又在1902年出版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州的实验工作》,研究了大洋洲的州的管理政策的发展。他还与费边社

有关系，在费边社里，他的妻子也很活跃。他们二人都撰写费边社的论文。1908年他应韦伯夫妇<sup>①</sup>的请求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直至1919年。在此期间，在1917年，他曾经兼任伦敦新西兰国家银行董事长，一直到去世，在1919年以后则专任此职。里夫斯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热诚的信仰者，这种社会主义主张由国家规定劳动条件、放弃罢工的武装和在看来有必要的时候，将主要企业国有化，以保证它们的经营符合公众利益。

里夫斯在新西兰是在巴兰斯手下开始工作的。当巴兰斯在1893年去世时，理查德·约翰·赛登(1845—1906年)继任总理一直到去世。赛登生于兰开夏；早年徙居维多利亚，1866年淘金热潮时到达新西兰。他以一个商店老板起家，在当地政界很活跃，在金矿矿工以及农场主中间有很多追随者。1881年起他担任代表韦斯特兰金矿选区的议员。在下议院，他是巴兰斯的主要助手，主张实行一个同样的一般性纲领，但是特别强调通过公共工程提供就业机会，而这些工程是要以法国和意大利早就采用的方式为蓝本，通过与劳工合作社签订集体合同来施工的。他还极力主张实行老年退休金，改善医院和卫生事业以及发展地方政府；他也非常赞成土地上的“稠密定居”政策，和通过公家购买大地产然后加以分割及重新配备，再分给小农场主来实现这一政策。他在巴兰斯892 去世后继续奉行1891年开始执行的政策，并且全力支持里夫斯的劳工立法。在某些方面，他远不如巴兰斯激进——比方说，他在执行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法律时顾虑重重——但是除非他肯定那是有害的，否则他确信应该给他的支持者以他认为他们是所要求的

<sup>①</sup> 韦伯夫妇指悉尼·詹姆斯·韦伯(Sidney James Webb, 1859—1947)和他的夫人比娅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 1858—1943)。悉尼·詹姆斯·韦伯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和费边社会主义者。他们夫妇于1895年帮助建立了伦敦经济学院。著作有：《工会主义史》(1894年)，《济贫法委员会报告》(1909年)，《英国地方政府》(1906—29年)和《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1935年)。——译注

东西。他在察觉选民的情绪方面是非常能干的。在他生前领导自由党期间，党的优势几乎一直没有受到过威胁。他在还记得 1890 年斗争的那些资格较老的工会领袖中间有很多的追随者；甚至在年纪较轻的人严厉抨击仲裁制度的作用，认为根据这种制度裁定的工资不能适应日益上涨的物价时，他仍然能得到这些领袖中间大多数人的拥护。1898 年，面对着组成一个独立工党或者社会党的运动，他组成了一个自由党和工党联合会来维持自由党与地方性的产业劳工理事会之间的联盟。

潘伯尔·里夫斯的仲裁法目的肯定在于帮助工会主义——事实上，该法案有一个副标题明确地肯定了这个宗旨。该法案的运用要借助由工会和雇主选出的调解委员会的制度，如果工会和雇主的意见不能达成协议，最后再由一个高级法庭法官实行仲裁。但是，雇主拒绝任命代表，调解计划无法执行；所以纠纷不是通过达成协议来解决——有时通过劳工部的友好斡旋来实现——就是提交仲裁。里夫斯并没有打算让仲裁法庭在刻板的法律条文下工作；但是事实上法庭的确是这样工作的，法官们制定了繁复的判例，而这些人对于工会的申诉往往是抱敌意的。工会为了利用这一仲裁法，必须按制度进行登记，而鉴于新西兰工业的分散性和地方性，这个制度鼓舞了一些规模非常小的、地方行业工会的成立；这些工会的负责人员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仲裁法庭事务上，而实际上他们也是以此为生，因为法律程序使每一个工会几乎必须有一个拿工资的负责人来担任它的辩护人。因此，工会负责人员与不断倾向于复杂化的仲裁制度就有了切身的利害关系。这些地方的仲裁 893 工会的负责人员控制着各大城市的行业劳工理事会，并且大部分是自由党和工党联盟的强有力的支持者。根据仲裁法，违犯法庭判决而停工的罢工工人，或者凡根据这一法案登记而又批准罢工的工会都将受到惩处。实际上，虽然仲裁制度的执行越来越不顺

利，在大约 1906 年以前是没有罢工的。在最初几年，里夫斯和他的继任者曾经设法与行业劳工理事会密切合作，与它们的年会经常协商有关劳工立法和行政革新的提案。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特别是在理事会在澳大利亚工党在政治上取得胜利的影响之下在 1904 年成立了新西兰政治劳工联盟以后，磋商越来越少，自由党和工党联盟也开始解体了。

在 1901 年以前，因雇主违犯仲裁判决而对之进行控告的工作是交给工会进行的，工会保存罚款或者将罚款分发给它们的会员。1901 年的修正法案，将这项工作交给工厂视察员，从而使工会失去了一个财源。这件事影响了工会支持这一法案的态度；另一个使工会抱反对态度的原因是法庭不象以前那样愿意在它的判决中采用“工会会员优先”——也就是说，当工会能够提供适当的工人的时候，它有优先填补空缺的权利——的原则，或者即使在承认这种优先权时，也用越来越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一优先权，从而使雇主容易逃避。享受这种“优先权”的工会必须履行一个条件，即必须遵守“敞开招收会员”的原则——也就是说，准许任何够条件的工人参加工会。但是，关于谁是“够条件的”工人，以及当工会不能提供“够条件的”工人时，谁是“适合的”人这样一些问题是有争论的；关于工会会员拒绝与非工会会员合作问题，困难也越来越多。雇主总是阻挠“不雇佣非工会会员”的做法；大体说来，仲裁法庭是支持他们的。行业劳工理事会力促制定法律，规定给予工会会员“优先权”是强制性的而不是有选择余地的；为此，工党议员于 1903 年在议会中提出了一项法案。赛登投了赞成票，但是提案被否决了。这与仲裁制度日益不得人心不无关系，因为在 1901 年以后，仲裁制度无疑地就没有增加实际工资或者有助于工会的发展。1906 年，D. 麦金拉伦(1872—1939 年)攻击仲裁制度，在行业劳工理事会的会议上得到了支持。但是还不存在完全与仲裁制度脱离

关系的普遍愿望，而大多数小工会仍然给它以全力支持，因为它们的领袖知道，这个制度是它们本身的存亡所系。独立劳工政治联盟在 1904 年成立时，行业劳工理事会并没有保证给与它支持，虽然它的下属各工会中凡属愿意参加的可以自由参加。行业劳工理事会本身采取冷淡态度，它们的许多会员则仍然支持与自由党结盟。

尽管如此，在大约 1906 年以前，工会几乎无不接受仲裁制度；不满只是限于希望修改这个制度并且使它执行得更顺利。1908 年，这项制度得到了修正，但是完全不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当时实行了一项新的调停计划，每一行业成立一个谘询委员会；同时由于 1907 年和 1908 年罢工迭起，对罢工的惩罚规定得严厉得多了。

因此，主要是由于巴兰斯和赛登二人，新西兰的工人阶级运动在投身政治的时候一直附属于自由党，而不是成立一个独立的党。独立的行动首先不是来自新西兰工会，而是来自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移民，来自一些在美国工作以后回国的新西兰人。

这些集团，或者其中的某些集团，于 1900 年在惠灵顿建立了一个社会党，在其他城市也纷纷建立类似组织。从英国和美国输入了大量的社会主义书籍和小册子。社会党人没有任何强大的选举力量：他们直接关心的是宣传，而不是竞选。但是，他们的确曾 895 曾经在 1905 年提出 F. E. 库克(1866—1930 年)作为社会党候选人，不过没有成功。由于赛登在南非战争期间的强烈的帝国主义观点，他们的宣传得到了很大助力，因为在他们的口号中，反对帝国主义居于重要地位。赛登的帝国主义倾向与 1904 年在行业劳工理事会会议上投票赞成建立一个独立政治劳工联盟也可能不无关系。这一建议的主要提出者是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奥塔哥地方的新闻记者 J. T. 保罗(1874—? 年)，他于 1899 年到新西兰，在《奥塔哥时报》上经常发表文章，对劳工问题提出了最出色的当场的连

续评述。同他一道的是一个格拉斯哥出生的制鞋工人 D. 麦克拉伦,他在 1908 年担任惠灵顿市长,同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社会党人对于联盟的态度是很冷淡的,过了几年,在 1909 年,联盟逐渐瓦解,在此之前,它在 1908 年曾经提出 11 个候选人参加竞选,但当选的只有 1 人。社会党提出了 5 个候选人,结果都落选了,而自由党和工党联盟提出的 11 个候选人倒有 7 个当选。1904 年,自由党人修改了选举法,规定进行第二次投票,希望在工党或者社会党候选人在第一次投票中失败以后,他们能够得到工党的选票——这一项革新在 1913 年为保守党所废除。有一段时间,这项革新起了作用。尽管成立了劳工联盟,自由党和工党联盟仍然存在。

当 P. H. 希凯伊(卒于 1926 年)在 1906 年——也即赛登去世那一年——回到新西兰的时候,自由党和工党联盟受到了真正的威胁。希凯伊曾经去过美国,在美国社会党和西部矿工联合会<sup>①</sup>中都很活跃,他回到新西兰之后参加了新西兰社会党,并着手主要按照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形式组织一个战斗性的产业工会主义运动。希凯伊立刻成了主要由矿工组成的、而且主要关心的是反对仲裁法的一个团体的中心人物。他们说,该法案不但远没有促进工人的利益,而且被利用来压低工资,使工人在不断上涨的高昂物价和不断增加的高额利润面前,受到条件不利于他们的合同的约束。斗争于 1907 年在珀托尼具体化,那里的屠宰工人不顾仲裁法举行了罢工,结果工资提高了 15%。接着发生了其他罢工,得到了同样的胜利;1908 年,布拉克包尔的矿工举行罢工,这次罢工的起因是在午饭时间是否应该从十五分钟延长到三十分钟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仲裁法庭以矿工举行罢工违反了规定午饭时间较短的裁决为理由,对矿工处以罚款,当矿工拒绝缴纳罚款时,就扣押他们的货物来抵罚款。矿工组织了被没收货物的拍卖,用几先令就

<sup>①</sup> 参看本卷下册第 267 页。

将全部货物买了下来，以此来应付这一挑战。其他矿区继而声援布拉克包尔的矿工，8月，希凯伊和他的朋友组成了新西兰矿工联合会，由P. C. 韦伯(1886—1950年)担任主席。由怀希的提摩西·阿姆斯特朗(1875—1942年)担任副主席，由来自新南威尔士的一个澳大利亚人罗伯特·森普尔(1878—1955年)担任组织部长。

这些人和一些与新左翼运动有联系的其他人不仅在以后几年的斗争中，而且在新西兰工党的以后历史中都注定要起主要作用。1910年新西兰劳工联合会成立时担任主席的P. C. 韦伯在1914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战争期间，他在反战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因而入狱。战争结束以后，他恢复了在党内的地位，任1935年工党内阁矿冶部部长。阿姆斯特朗也成了下议院的著名议员；罗伯特·森普尔后来也成了1935年内阁的成员。

新西兰矿工联合会的组织和工作方法主要以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主要创始者美国西部矿工联合会为根据。它坚持由它的执行委员会高度集中地掌握控制权，并且极力避免在局部性罢工中分散精力，以便保存实力，用于关键性的重要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它号召工人根据“伤害一个人就是伤害全体”的原则采取行动，并且毫不犹豫地最充分地采用声援罢工的方式。它的领袖的目标绝不限于单一的产业部门；希凯伊和他的朋友们在一旦将矿工组织起来以后，立即着手将矿工联合会改变成新西兰劳工联合会，并号召所有工会都加入这个组织。1910年初，新组织开始行动，以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章程序言作为它的原则宣言，以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作为它所规定的一项基本目标。劳工联合会宣称，组织的应以产业工会主义而不是行业工会主义为基础，并且号召一切工会取消它们根据仲裁法所进行的登记，并且采取阶级团结的战斗方针。它对政治行动的态度是暧昧的。希凯伊和森普尔一直忙于与矿工工会以及他们吸收进劳工联合会的其他工

会一道,在凡属可能的地方组织社会党分支机构;劳工联合会在它的1910年的大会上通过的政治纲领实际上与社会党的政治纲领如出一辙。但是联合会包括一切敌视议会行动的产业工会主义者;所以大会决定对于该会本身是否应该从事政治活动的问题暂不作出决定。希凯伊和他的朋友是丹尼尔·德里昂的追随者而不是芝加哥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追随者。只要政治行动的宗旨是革命性的而不是改良主义的,他们赞成政治行动;但是他们认为战斗性的产业行动要重要得多。

当希凯伊、韦伯以及森普尔建立劳工联合会和社会党的时候,稳健派也在设法改组。1907年,行业劳工理事会大会决定建立一个权力非常有限的,组织松散的劳工联合会,在它的一年一度的大会休会期间作为协调机构;当时选出了一个自治领执行委员会来代表它进行工作,但是成就很小。1909年,在政治劳工联盟实际上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大会还通过重新设法建立一个工党;麦克拉伦作为大会代表到全国旅行,为新的联合会和计划建立的工党争取支持。1910年,几乎就在希凯伊的对立的联合会成立的同时,行业劳工理事会的联合会也正式组成;它也宣布赞成生产资料“公有制”,故意采用“公有制”这个字样,而不用“社会化”字样,并表明它的目的是逐渐扩大特别是垄断企业的公有制以及社会管理,而不是用革命方式夺取权力。它还成立了一个工党,与它密切配合,并且“通过纯粹的政治手段”而不是希凯伊的联合会所主张的“直接行动”来进行工作。在1911年的选举中,该党提出候选人20名,其中只有3名当选,此外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工党候选人。社会党提出候选人8名,全部落选;落选的还有其他一些非正式的候选人。劳工联合会本身提出韦伯和希凯伊为候选人;未来的总理M. J. 萨维奇是社会党候选人。这时,在1911年,行业劳工理事会联合会和工党邀请美国社会党人、威斯康星州的W. T. 米尔斯担任



宣传工作,他是维克多·伯格爾的追隨者,到新西兰以后,为伯格爾在美国所写的一本关于劳工组织的巨著《为生存而斗争》大事宣传。1911年6月,米爾斯开始了他的所谓“统一运动”。他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组织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他打算把所有工会和劳工政治组织合并成单一的团体,按产业分成一些部门,按政治再分成一些地区机构,并特别设有自由职业者阶级以及小雇主和小农场主的代表名额。这个计划立刻遭到了希凱伊的联合会的拥护者的猛烈攻击,并且受到工党以及行业劳工理事会的一些领导人物的嘲笑。但是米爾斯既有说服力,精力也很充沛,他设法争取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人物。此人就是彼得·弗雷塞(1884—1950年),他是苏格兰的移民,在1901年到新西兰以前,他是独立工党党员。他在奥克兰定居以后,成了一个码头工人,不久便当选为奥克兰总工会书记。1911年,这个工会组织了一次罢工,反对在码头上实行的那种形式的工作合同,罢工很快就取得了胜利。这个工会后来参加了希凱伊的联合会。紧接着奥克兰电车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在希凱伊保证劳工联合会给与罢工支持之后,取得了又一次胜利。弗雷塞后来在联合会事务中起了积极作用。1913年,他成为新建立的社会民主党书记,1918年,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以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西兰的工党领袖和总理。

1911年,希凱伊的联合会有了自己的报纸《毛利工人报》,这家报纸最初是M.拉腊西的剪羊毛工人工会创办的,聘请了著名的澳大利亚左翼新闻记者罗伯特·S·罗斯担任编辑。第二年,联合会遭到第一次严重的挫败。为了要求提高工资,奥克兰又发生了新的劳资纠纷,这时工会已经取消了根据仲裁法进行的登记。雇主为了对付罢工,使一个新的对立的工会根据仲裁法进行了登

记，并使法庭作出裁决，决定援用仲裁法，从而使罢工成为非法。劳工联合会扬言要举行声援罢工，甚至说要举行总罢工；但是其他工会不愿意罢工，因此只好承认失败。这是第一次利用这种办法击败了仲裁法的反对者：不久以后，在其他罢工中也使用了这种办法，在破坏战斗性的运动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联合会虽然在乌克兰遭到了失败，在惠灵顿的电车工人罢工中却得到了胜利，这次罢工得到了行业劳工理事会的支持。

1912年，米尔斯的宣传运动为行业劳工理事会联合会和工党联合主持的、拟议中的统一会议铺平了道路。尽管劳工联合会坚决反对，这次会议与会者甚众，而且米尔斯说服这次会议通过了他的计划，把两个团体合并成为既有产业职能又有政治职能的统一工党。统一工党采取了工党的渐进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特别强调公用事业的公共管理，并决定建立一些拟议中的产业部门，把政治行动主要交给行业劳工理事会来负责。保罗当选为党的主席，米尔斯为组织部长；麦克拉伦和特列吉尔任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以后，劳工联合会举行了一次对立的会议，并在一系列的产业部门中，根据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方针进行了改组。它号召所属工会取消它们在仲裁法下进行的登记，拒绝代表统一工党呼吁团结的保罗所提出的合并的号召，并批准哈迪和瓦扬在1910年哥本哈根社会党国际大会上所提出的为反对战争而举行总罢工的提案。在社会党请求援助时，劳工联合会对政治行动的态度问题再度出现：联合会决定自己不卷入政治，但是却允许它的地方组织随意采取行动。H. E. 霍兰德（1868—1933年）被从澳大利亚请来继罗斯担任《毛利工人报》的编辑，因此，被普遍称为“红色”联合会的组织对新西兰劳工运动又贡献了一位著名人物。霍兰德曾经在悉尼做过印刷工人，在加入社会主义运动左翼以前，在救世军中开始了他的社会活动。他曾经因为自己的言论而数次入狱，后来成了一

个相当重要的新闻记者,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在新西兰,在“红色”联合会瓦解以后,他在工党作为反对党的长时期内担任领袖,他早死了两年,没有看到工党在 1935 年取得的胜利。

根据仲裁法,拥有会员 15 人或 15 人以上的任何工会可以申请在仲裁法庭登记,然后它就能向法庭提出申诉,法庭则有权作出判决,这种判决不仅对于该工会会员和他们的雇主有拘束力,对于有关行业和地区的所有工人和雇主也是有拘束力的。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个工会接受新西兰劳工联合会的建议拒绝登记或者取消它的登记,即使人数很少的持不同意见者也能组成一个对立的工会,申请登记,取代原来的工会。法庭不一定必须接受这种申请,但是它完全有权力这样做。从 1912 年开始,法庭一再使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新西兰劳工联合会反对法庭的运动。雇主象他们在 1890 年曾经做过的那样,决心粉碎新的战斗性的运动,他们更密切地联合在一起,建立了一笔共同的防御基金来对付“红色”联合会。1912 901 年在怀希金矿的著名的罢工和关厂中,这一斗争达到了高潮。怀希矿工工会就是那些取消了它们在仲裁法庭进行的登记而加入新西兰劳工联合会的一个工会。它的主席 W. E. 帕里(1878—1952 年)在“红色”联合会中很活跃,后来是代表奥克兰的议员,1935 年担任内政部长。1911 年,怀希金矿在联合会的支持下曾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第二年雇主组成了一个机工的“工贼”工会,根据仲裁法进行了登记。于是矿工拒绝与这个工会的会员在一起工作,雇主则违反了前一年达成的协议,把他们关在矿场之外,并且宣布说,他们不同任何不接受仲裁制度的工会发生关系。然后他们又着手于组织另一个真正矿工的“工贼工会”,并且在雇主联合会的帮助下开始大批输入破坏罢工的工贼,并且取得了一支特别的武装警察部队——包括骑警在内——的帮助来保护工贼的工作权利。后来出现了暴动场面,在暴动中矿工的财产横遭破坏,矿工大

楼被占领并遭到抢劫,多人受伤,有一个罢工工人被警察杀死,几百名领袖和罢工工人被捕;很多人仅以组织罢工行动的罪名便被判处重刑。最后,在一场激战中,警察和工贼将罢工工人赶出了城,罢工于是失败。

在怀希纠纷的初期,曾经有人建议举行总罢工来支持它。但是新西兰劳工联合会拒绝了该项建议,因为该会深知大多数工会会拒绝罢工,并且认为让其他行业的工人继续开工,从他们那里筹款来维持罢工工人比较得策。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筹集了大批款项;但是政府使法庭作出裁决说,在仲裁法下登记的工会如果捐款支持罢工便是非法,从而阻止了捐款的到来。

902 政府所以对怀希罢工工人采取强硬措施主要是由于自由党内阁倒台,自称为改革党的保守党重又执政。新政府要用全力粉碎的不仅是怀希矿工的反抗,而且还有“红色”联合会的力量,因为政客们严厉谴责“红色”联合会是无政府主义和革命的宣传者。毫无疑问,在理论上说来情况是这样;但是在实际上,除了在被激怒的时候,它所用的手段并不激烈,在怀希,在调来更多的部队并成立一个反对工会的公民自卫团以前,并没有发生骚乱;此后,采取暴力行动的似乎也更多的是在警察和工贼方面而不是在罢工工人方面。但是报纸并没有刊载罢工工人的真实情况:大多数报纸严厉谴责“赤色分子”,因而公众舆论受到很大影响,接受了官方对于这件事情的说法。

劳工运动也没有团结起来支持罢工工人。有许多没有参加新西兰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纷纷支持怀希罢工工人;但是统一工党以及大多数行业劳工理事会反对这个运动,并且设法劝阻工会不要支持罢工。不过,在事过境迁之后,人们的情感发生了突变,变得非常同情怀希罢工工人而反对政府和警察的行动,尤其反对利用仲裁法来挫败罢工。人们普遍认识到,由于法庭有权准许实际上

是工贼的工会进行登记以及应这些工会的申请作出约束整个行业的判决，工会遭到了严重威胁，而由于现时是一个强烈反对劳工运动的保守党政府执政，这种威胁就尤其严重。因此，在1913年1月，当失败的新西兰劳工联合会召开统一会议，并邀请各种工会前来参加时，反应很好。统一工党本身接受了参加会议的邀请；这就为社会党也参加会议敞开了门户。有一些在仲裁法下登记的工会和某些行业劳工理事会仍抱冷淡态度；在极左翼，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人数不多的新西兰分会以坚决反对议会行动为理由，拒绝参加会议。

1月里举行的会议结果使左翼取得了惊人的直接的胜利。会议同意组成一个包括所有派系的统一劳工联合会；新西兰劳工联合会成功地引导会议采纳了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战斗性的章程序言作为它的临时基础。 903

会议通过决议，要求修改仲裁法，以防止“少数派”工会在主要工会取消登记的情况下进行登记。会议还决定设立两个团体，而不是按照米尔斯的计划设立单一的团体，这两者分别负责政治事务和产业事务；会议摒弃了米尔斯提出的、主张自由职业阶级以及小农场主和雇主阶级都有特别代表的建议。会议决定让每个工会自行决定是否根据仲裁法进行登记；同时还修改了“红色”联合会曾经坚持过的对于罢工政策进行集中控制的做法，而采取一种只要各该工会不要求联合会给予帮助，便给与它们更多的自主权的制度。在各对立派系在会上彼此大肆攻讦之后，这次会议居然表现了团结，这主要是由于对政府的行为感到愤慨，也是由于认识到团结对于运动的生死存亡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米尔斯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以统一工党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对于劳工联合会的计划表示支持。统一会议决定在新的统一联合会之外再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这个党由社会

党和工党合并而成,以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作为它的建党宗旨。

1月举行的统一代表大会只有建议权。必须在有关团体接受它的决议以后,它的新计划才能生效。在1913年7月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月计划”的要点;但是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以175票对161票删去了其中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章程序言。作为代替,会议承担义务“在产业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组织,以帮助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从而实现一个以产业民主为基础的合作联邦”——从所代表的许多团体过去的态度来看,这是非常战斗性的。会议进一步建议所有工会支持新的社会民主党,并且选出森普尔为新的劳工联合会的组织部长,希凯伊为书记兼司库,海员联合会的W. T. 杨当选为主席。

前劳工部部长、老资格的爱德华·特列吉尔(1846—1931年)当选为社会民主党主席。特列吉尔在建立仲裁制度方面曾经是潘伯尔·里夫斯的左右手,他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一制度的维护者,始终力图将它作为加强工会的手段,因此雇主对于他在劳工部的有党派色彩的领导提出了强烈抗议。这时他已经从行政机构退休,对于仲裁法背离了原来鼓励工会的目的,而成为反对罢工和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要求的武器,越来越感到不满;所以在退休之后,作为社会党人仍然直率陈词。由于他受到劳工运动左右两翼的普遍尊敬,而成为新党主席的理想人选。同他在一起的是担任书记的彼得·弗雷塞;米尔斯则当选为组织部长。

但是,劳工运动右翼有许多人非常不喜欢统一会议的决定,前一年组成的统一工党拒绝解散或者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并在保罗的领导下决定维持自己的独立存在。麦克拉伦也拒绝参加。不久以后,就干脆退出了劳工运动。

统一会议还交给社会主义党下列各项任务:促成一项工作权

利法案、实现最多每天六小时的工作日和建立以民主方式组成的国民军，付给标准工资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使用这支军队来对付罢工运动。

难怪统一工党的右翼拒绝接受会议决议并决定继续存在下去。铁路工人工会也退出了；但是大多数工会接受了新的组织章程，因为章程注意到不排除继续在仲裁法下工作的工会。

几乎立刻就产生了严重的骚乱。惠灵顿的造船工人举行罢工<sup>905</sup>，反对一种他们认为会减少收入的新的支付工资办法，码头工人在工作时间举行会议来考虑是否支持造船工人。于是船主取消了他们与码头工人的协议，并且将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关在厂外。其余的工人立即罢工；船主雇佣了工贼并用路障封锁了港口。工会会员冲击了路障，赶走了工贼。新的联合会渴望防止骚乱扩大，试图达成协议；但是雇主要求码头工人工会必须付出一千英镑的保证金，以防协定再次遭到破坏。政府又站在雇主方面进行了有力的干涉。它动用了大批特种警察部队，从农村地区招来了更多的工贼，训令警察局长保证他们的工作权利得到保障。于是码头工人拒绝了雇主的条件，并将这项劳资纠纷交由新的统一劳工联合会处理。联合会与政府交涉，要求各方举行会议；但是在会议上，雇主不仅要求保证将来不再举行罢工，并且拒绝与任何没有根据仲裁法进行登记的工会打交道。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政府采取了新的步骤来动员军队对付罢工工人。

这时，纠纷开始扩大，在其他港口和矿工中间都发生了声援性质的罢工。作为临时警察招募来的几百名农场主开到了闹事地区，与城市居民发生了激烈冲突。惠灵顿的街道上筑起了街垒，大部分战斗是用石块和棍棒进行的，但是也有用手枪射击的。为了威吓罢工工人，海军舰艇驶进了港口，在惠灵顿的码头上架设了一门大炮。临时警察增加到了数千人，荷枪并上了刺刀的水兵登陆

并开过工人阶级居住区。警察和临时警察占领了奥克兰码头，作为对策工人举行总罢工，使全城陷于瘫痪，甚至根据仲裁法登记的<sup>906</sup>工会也参加了罢工。联合会号召在惠灵顿、克赖斯特彻奇和达尼丁举行总罢工表示声援。统一工党发表了一个反对总罢工的宣言。不久以后，罢工就开始崩溃。当时组织了许多工贼的工会，并且进行了登记；最高法院发布它的裁定说，凡属登记过的工会不能捐助罢工基金给没有登记过的工会。复工的浪潮开始了，许多雇主拒绝重新雇佣不属于登记过的工会的会员。这些登记过的工会开列了许多工会积极分子的黑名单，因此甚至在联合会承认失败，号召停止罢工以后，他们也被剥夺了工作。政府迅速制定了一项禁止设立纠察线的新法令，同时制定了一项劳资纠纷调查法，规定突然罢工为非法。统一劳工联合会遭到了惨败，社会民主党也因此一蹶不振，虽然这两者还继续存在。

这是 1914 年的形势。在 1913 年的会议上，左派战胜了右派，不过这一年还没有过去，左派就遭到了彻底失败。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敌意很深的政府，一个很嚣张的雇主联合会，以及得到农场主和雇主强有力支持的强大而得意非凡的公民防御组织。大多数已经建立的工会失去了它们的谈判权，这种权利大部分转移到了在雇主的帮助和仲裁法庭的维护下组成的新“工会”手里。

在 1914 年的普选中，社会民主党和统一工党都参加了竞选，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一个议席而提出了对立的候选人。两党分别有 9 个和 8 个人竞选，但是，各自当选的只有 2 人；此外，独立工党也有一个候选人当选。

接着就发生了战争，随即政治方面就迅速活跃起来。1916 年，社会民主党、统一工党和一些地方性的劳工代表委员会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新西兰工党，不久以后这个党在新西兰就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它的领导主要来自旧日的左翼。他们保留了社会化的



目标。但是到 1918 年时,该党宣布说,它的直接纲领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前进”,又宣布说,“工党是实验性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旧日的积极分子,或者说其中的许多人,放弃了革命主义,而赞成追求福利国家,而把社会主义只不过作为一个长远目标。工会运动在没有有效的领导或组织的情况下维持的时间比较长。1915 年,矿工退出了残余的劳工联合会,作为一个有隶属关系的工会参加了澳大利亚矿工联合会。许多老的产业领袖反对战争,投身于反对征兵和劳工运动中的拥护战争分子;战争问题上的分歧推迟了工会组织的重新发展。但是,充分就业逐渐恢复了工会的力量,1919 年,成立了一个新的劳工联盟取代了劳工联合会。<sup>907</sup>

为什么在 1890 年,在 1907—1908 年,后来又在 1913 年,到了真正决一胜负的时候,新西兰劳工运动的斗士们会遭到失败呢?直接的原因很明显:雇主在与他们斗争时能够依靠大部分农场主的支持,这些农场主通过提供工贼和足够的临时警察部队,能够在警察的帮助下最后击败任何大罢工。此外,仲裁法的条款,虽然最初的宗旨是帮助 1890 年失败以后的工人,由于法庭利用它的权力来为工贼的工会进行登记,能够被用来并且实际上也被用来作为反对工人的有力手段。法律禁止罢工,这道禁令本身倒无关紧要。能够对罢工工人判处的罚款通常总是数目很小的,而由于法律并没有认为罢工是一种“连续犯罪”,在缴纳罚款之后继续罢工便是完全合法的了。事关紧要的是,法庭在工贼工会的动议下有权力作出对整个行业有约束力的裁决,从而迫使那些不十分坚决的工人不敢不从。这种权力的使用使某些仲裁制度的坚决拥护者变成了积极的反对者——比方说爱德华·特列吉尔就是这样一个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新西兰是一个农场主的国度,在这个国家中,工业只占次要地位,而且它越来越成为一个小农场主的国家,对他们说来,使港口工作不致停顿,以便将他们的产品运到世

界市场上去,是至关紧要的。早先,新西兰曾经是一个为大牧场主和在外地主所控制的国家;象巴兰斯和赛登在九十年代的自由党和工党联盟中所做的那样,有可能团结小人物,反对这些牧场主和在外地主。但是当巴兰斯和赛登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以后,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发家致富的小农场主就改变了立场,成了工党左翼的强烈的反对者。

至于左翼,由于它自己的极端主义而促成了本身的毁灭——这一部分是由于它的领袖年纪太轻。由于它热衷于反对仲裁制度,它走上了使工人分裂的道路,虽然工人的唯一希望在于团结。左翼的坚强据点在矿工和码头工人中间,因此它没有做什么事情来争取其他一些组织较差、比较不容易接受外界影响和对于仲裁制度并不十分不满的工人集团。那些也很擅长激烈行动的雇主对劳工运动的左派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除了在巴兰斯—赛登的时期以外,雇主通常能够依靠政府撑腰,尤其在保守党于1912年重新执政以后。

在赛登生前,自由党和工党联盟仍然能得到相当一部分工会的支持,虽然,从布尔战争的时候起——也就是说,从赛登表现为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的时候起,它就逐渐失势了。在赛登逝世以前几年,建立一个独立工党的运动一直在发展;但是关于新党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却存在着严重分歧。社会党的杰出领袖 H. E. 霍兰德是极左翼,他与希凯伊和新西兰劳工联合会是密切合作的。后来在1918年以后,他成了新的工党中的一位杰出人物,和他在一起的是战前左派的大多数领袖,他们所奉行的政策虽然确实不是稳健的,但肯定是议会主义的,而不是产业工会主义的。不肯妥协的产业工会主义者大部分都转入了共产党。其余的人则得到了教训,深知在新西兰,产业劳工运动除非也成为大部分农业人口的旗手,否则是不能指望取得胜利的。

## 第二十五章

909

### 南 非

在二十世纪开始之前，几乎不能说南非存在劳工运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主要在维特瓦特兰德的矿工中间劳工运动有了迅速发展，终于在1913年和1914年发生了广泛的骚乱，这些骚乱后来被南非政府的高压行动镇压下去，而破坏罢工的首脑则是史末资将军。运动在最初阶段几乎完全掌握在从联合王国到南非来的熟练工人手中。开始的时候组织了一些英国工会——例如混合机械工人工会——的分会，接着建立了南非司机工会和排字工人工会。在十九世纪末之前，南非的白种熟练工人队伍大体上是由主要来自英国，还有一些来自爱尔兰、德国、意大利、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组成。在矿区中，还有些人以前曾经在美国工作过；在八十年代，还组成了一些美国劳工协会分会，但是并没有扎下根基。一直到1900年以后，在工业部门中，生于南非的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才多起来，这时候，他们在采矿工业中的出现带来了民族主义情绪和种族情绪的强烈因素，从而大大影响了工会运动的性质。

在90年代，主要通过建立英国社会主义团体的分会，社会主义象工会主义一样有了一些小规模的发展。社会民主联合会在开普敦和德班建立了分会，独立工党在德兰士瓦建立了一个组织，总部设在约翰内斯堡。费边社也有少数追随者，主要是在格雷姆斯敦；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了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团体。早在1904年，南非社会党人就派遣了一位代表爱德华·B·罗斯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7年在斯图加

特,马克·卢加斯代表一个新成立的,以约翰内斯堡为中心的南非社会主义联合会,参加了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那个时候,开普敦的社会党人出版了一种英文刊物《开普社会党人》,附有南非荷兰语的副刊;并有3名社会民主党人新近被选为纳塔尔州议会议员。在其他议会中,如在德兰士瓦和开普的议会中,也有少数工党议员,但是他们还没有组成一个有组织的政党。

主要是由于兰德的矿工举行了罢工,在1907年和1908年才真正组成了南非工党。它的主要提倡者是机械工人W. H. 安德鲁斯,他在以后几年内,作为左翼思想的代表人物起了突出的作用,并曾经企图使白种工人、印度工人和本地工人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最初,安德鲁斯的主要合作者是南非印刷工会的H. W. 桑普逊和火车司机和司炉工会的彼得·怀特赛德。几乎立即就有一个新的重要人物F. H. P. 克列斯威尔上校(1866—1948年)参加了他们的队伍,他与矿业厅发生了争执,成了白人矿工权利的维护者,反对公司雇佣较大比例的本地工人和印度工人的企图。白种工人的工资比非白种工人的工资高许多倍,非白种工人完全没有保护他们的组织,也不能参加白种工人工会。采矿公司认为,除非它们能够减少白种工人人数,就不能减少开矿——特别是金矿——的成本;主要由于他们打算这样做,加以同时又有大批非洲出生的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进入采矿业,1913年和1914年才发生了大骚乱。

克列斯威尔当选为新成立的工党领袖,该党在1910年在联邦议会中得到4席,第二年,在30名工党候选人中,有13名当选为约翰内斯堡市政委员会委员。当时该党所属工会的会员人数约有75,000人。

911 : 1907年的罢工直接导致了工党的建立,这次罢工是停止雇佣  
011 华工造成的后果。采矿公司被迫将华工遣返以后,就一部分在非洲出生的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中间,一部分在本地人中间另行物

色廉价劳动力。非洲白人和本地人一样都没有任何工会组织，他们有许多人愿意接受比英国工人工资低得多的工作。各采矿公司要求将现行的白人雇工的工资水平减少 15%，当英国人控制的工会拒绝时，公司就招来非洲出生的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工贼来代替他们工作。这场激烈的斗争以工会失败告终。于是工会就着手组织非洲出生的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以便形成一个联合阵线。同时，采矿公司也同葡萄牙政府谈判，希望取得从莫桑比克输入当地劳工的权利，1909 年签订的莫桑比克协定，使南非又得到了大批本地工人，从而使他们能够把减少白种人与本地人的比率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

一直到 1913 年才有了进一步的重要发展，当时，在克莱因方丹发生了一次反对延长星期六值班时间的罢工运动，运动自发地扩大，终于使兰德的整个采矿业完全陷于停顿。在此以前，工会一直是随波逐流，听任事态发展而没有控制事态发展；但是这时，德兰士瓦行业联合会开始考虑为支持矿工而举行总罢工的可能性。它首先决定在约翰内斯堡组织一次群众性的示威；但是史末资将军借口罢工造成了严重骚乱而禁止举行示威，并且要求总督准许他借助英国军队来镇压矿工。他的禁令发出太晚，已经来不及阻止工人集会；1913 年 7 月 4 日发生了大屠杀。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有 21 个大部分与罢工毫不相干的人被击毙，有 83 人受伤。政府应付局势的这种办法在南非各地引起了愤怒的浪潮。罢工根据有利于矿工的条件告终；但是，公司拒绝履行这些条件，并且用公款来偿付它们被迫辞退的工贼。此外，它们还拒绝重新雇佣许多 912 罢工领袖，并且几乎立即又企图用较低的工资雇用非洲出生的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从而削减既定工资。

几乎立即发生了新的骚乱。铁路减少了它们所雇佣的白种工人；1914 年 1 月，纳塔尔的煤矿工人举行罢工，一部分是要求改善

劳动条件，但是也是为了抗议迫害他们的一些领袖。铁路工人在政府拒绝与他们会见来讨论他们的疾苦时，也举行了罢工，罢工迅速扩大到了全国。政府在史末资将军的领导下用最残暴的手段来对付罢工。这一次史末资没有向英国军队求援：他用一支主要从布尔农场主中间招募来的武装卫队和罢工破坏者组成的民间力量装备了自己。他动用这支力量来帮助警察部队，在铁路工人罢工发生以后的几天内宣布了戒严。铁路工会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后来还有德兰士瓦行业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遭逮捕。几乎所有的著名劳工领袖，包括工党领袖克列斯威尔上校在内，都被投入监狱。当局用非常强暴的手段取缔集会；并在骚乱地区进行恐怖统治。史末资的疯狂行动甚至还不止于此。他将9名被捕的领袖押出监狱，连夜火速解往德班，用一艘名叫“乌姆吉尔”的船，在武装监视下将他们押送英国。此举毫无法律根据：史末资甚至没有装模作样要依法行动。后来，南非议会颁布了一项特别法对他的行为免于惩处。

史末资在1913年和1914年的行动的直接后果是工党在德兰士瓦州委员会中得到了明显的多数，并一直保持到1917年。但是，史末资在粉碎左翼工会运动方面却暂时取得了胜利。这一年的晚些时候爆发了战争，造成了党内分裂。仍然主要是英国人的工党大多数支持战争；但是以W. H. 安德鲁斯和S. P. 本丁为首的一批人脱了党并立即组成一个反对主张战争的大多数的国际社会主义联盟。被押解出境的那些人里面的杰出人物，机械工人阿奇·克劳福德改变了他的观点，作为采取稳健态度的新的中央工会组织——南非产业联合会的书记回到了南非。战争时期对劳动力的需要以及物价的不断上涨形成了1914年以后工资迅速增加的局面，雇主为了劳资间相安无事也乐于承认工会并与它进行谈判。只是到1918年以后才重又发生劳资纠纷，最初是1919年在约翰内

斯堡和德班，以后几年又在兰德发生了激烈斗争。1922年，史末资再次企图用暴力手段粉碎总罢工运动，因而在兰德发生了内战，双方都有多人伤亡。约翰内斯堡近郊的主要工人阶级居住区福德斯堡遭到炮轰；除了那些在战斗中死亡的人以外，一些工人阶级领袖被处决，还有多人被投入狱。当局动用了一支6万人的军队，用大炮、坦克和飞机强迫工人复工。不过所有这些都属于本卷所叙述的这一阶段以后的时期。之所以提到这些事情完全是因为1919—1922年的纠纷是1913年和1914年的纠纷造成的直接后果。

战前这些年代的事件使南非劳工运动的性质大变。在1914年之前，对于组织本地工人实际上没有作过任何尝试，而人数迅速增长的非洲出生的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也没有受到工会主义什么影响。但是在战争期间，以前主要是欧洲白种工人的工会着手按产业并从政治上对它们的白种工人同事进行了有效的组织，于是工会运动就逐渐失去了它的英国人占优势的性质而开始成为白种工人的联合运动，其宗旨在于维持白种人的生活水平和条件，并防止雇主减少白种工人与本地工人之间的人数比率。在本地工人中间，在1919年建立了产业和商业工人工会，第二年，发生了码头工人和本地矿工的罢工，这就是他们建立与白人无关的独立组织之<sup>914</sup>始。但是，白种工人和本地工人并没有采取共同行动；实际上随着非洲出生的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在白人工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白人工会变得更加反动。在二十年代，国民党占了上风，工党失势，并且没有能够保持住它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在政治上获得的重大成果。同时社会主义几乎消失了。以组成国际社会主义联盟的W. H. 安德鲁斯为中心的集团在1920年加入了共产党；南非产业联合会在1922年的纠纷中瓦解；整个运动一蹶不振。

## 第二十六章

### 中国：孙逸仙

今天，每当泛泛地叙述作为一种世界力量的社会主义时，中国的社会主义都会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本卷所涉及的这一时期却很难说当时中国存在什么社会主义。在1914年以前，中国不存在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参加第二国际的事务。1911年—1912年的中国革命从任何意义说来都不能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在发生革命时，被认为基本上是一种西方理论的社会主义，几乎还没有开始被人按照适用于中国或者除日本以外的亚洲任何地区的思想方法重新加以解释。左派的主要人物孙逸仙有时被说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毫无疑问，他是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更多的是受到亨利·乔治思想的影响。但是即使在他的晚年，他也更多地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反帝的革命激进派，而不是一个在任何普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尽管如此，仍然主要是在他的著作中才可以找到1917年以前中国存在的社会主义思想。

孙逸仙（1866—1925年）是一个广东农民的儿子。他在幼年就反抗他周围的传统礼教，他被送到在夏威夷定居的他的哥哥那里去，他的哥哥是一位富有的农场主和店主。在那里他被送进教会学校，信仰了基督教，这使他的家族十分反感。回到中国以后，他又违反了村里的规矩，获准前往广州和香港求学。他同英美传教士很投和，他接受了外科大夫的教育，有一个时期曾在澳门的一家医院里行医，直到遭到葡萄牙法律取缔，因为这项法律规定唯有葡萄



牙公民方能做医生。此后他就投身于革命宣传，主要在外国居住<sup>916</sup>和旅行，并在世界各地中国移民中间建立革命团体。1895年，他参加第一次革命活动——企图占领广州，再从广州发动对满洲人的反抗。结果计划被发现了，他幸以身免，在当局悬赏捉拿下逃往外国。他转道美国，前往伦敦，第二年他在伦敦被诱骗到中国公使馆，被囚禁起来，企图将他秘密解回中国处决。他的英国朋友发现了这一情况，几经周折，英国政府坚决要求将他释放。此后，除了遍访国外华侨界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日本，一直到革命爆发。在满清统治的最后时期，很多中国学生到日本受现代教育，他在这些留学生中间影响很大。

这一时期，在中国，维护传统制度的人与维新派之间发生了激烈斗争。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不甘受民族屈辱的情绪由此而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成了“亲西方派”，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要想保护自己不被列强毁灭和瓜分，唯有采用西方技术和思想。但是，还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另外一些人，他们持有相反的见解，认为中国应该摒弃一切西方观念，而致力于竭尽所能，驱逐洋人。1898年，一位学识渊博的儒家维新派康有为说服了青年皇帝，这位皇帝在康有为的影响下，颁布了一系列的敕令，宣布进行广泛的现代化改革，包括废除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使军事训练现代化、在北京建立一所现代化大学堂、改庙宇为学校、把外国书籍译成中文和撤销许多挂名差使等等。慈禧太后的对策是把皇帝软禁起来，由自己垂帘听政。她处决了许多维新派，还有一些人逃往国外。这种反动措施导致了1900年狂热排外的义和团起义，德国公使和另外一些外国人在北京被杀害，使馆区被包围。在华北还有<sup>917</sup>许多传教士被杀害。在中国有权益的国家出兵组成了一支国际联军占领了北京，平定了义和团，索取了大量赔款并提出了其他丧权辱国条件；中国受到互相争夺的列强越来越大的压力，逼迫它割让

领上和给予它们贸易和投资权利，这些国家只有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认为中国政权的衰微是它们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大好机会。面对着这种压力，甚至慈禧太后和他的反动亲信也开始领悟有必要进行某种革新；1904—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许多中国人这才破天荒第一遭相信，中国其实毫无理由不充实自己以维护独立。这就是为什么派遣许多留学生到日本留学的主要原因，而结果这些学生都受到了孙逸仙博士的革命影响。

1908年，慈禧太后和被囚禁的皇帝突然死去，似乎也没有人能够肯定他们是否善终。新皇帝年幼，敌对的领袖密谋争权，局面极为混乱。在拥戴慈禧太后夺取和掌握政权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袁世凯是这一政权的“铁腕人物”；但是他很不得人心，后来在敌对者的逼迫下引退。地方军阀割据四方，已经由于义和团起义而摇摇欲坠的中央政府开始解体。1911年“双十节”（10月10日）汉口附近的武昌爆发了地方起义，指挥军队的将军由于不能相信他的部队的忠诚而临阵脱逃。他的部队参加了起义军，起义军实际上兵不血刃便赢得了胜利。此后各地纷纷起义，终于华南和华中大部分落入起义者手中，但这时他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仍然控制着华北的满清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袁世凯，袁则应召勤王。这时起义军邀请孙逸仙回中国领导革命；革命在事前殊少计划，所以在革命爆发时，孙逸仙正在美国旅行。但是孙逸仙并没有立即返回中国，而是匆匆赶到伦敦，当时袁世凯和满清的使者正在伦敦与一个银行财团商借一笔国际贷款，以使用以镇压起义。孙逸仙劝阻了银行家们——大约由于使他们相信满清王朝已经无可救药。这项工作完成之后，他及时赶回中国，1912年初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以南京为首都，他当选为总统。

孙逸仙发现中国的局面非常混乱。主要由于义和团起义之后备受屈辱，人们对于满清的恶感很深；同时也存在一种反对帝国主

义列强的强烈的排外情绪。但是孙逸仙所倡导的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北方没有势力，看来似乎只有打一场结果难以逆料的内战，不然中国就要形成分裂的局面，而这又是与民族主义情绪不相容的。孙逸仙采取了第三条道路，即如果袁世凯同意使满清王朝退位并且与中华民国联合便与他谈判。如果袁世凯愿意这样做，孙逸仙情愿将总统职位让给他，自己则负责领导一个经济组织从事国家的开发工作。袁世凯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孙逸仙辞去总统职务由袁世凯出任总统，他则改任新设置的全国铁路总办，具有改善中国经济，特别是通过修筑铁路和公路促成全国统一的广泛权限。这种开发计划曾经长时期在孙逸仙的宣传中居于重要地位；他希望那笔国际贷款能够主要用来实现这一目的，作为与袁世凯达成协议的一部分，他已经撤消了当初对于借款的反对。根据双方协议的条件，袁世凯担任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共和国总统，与一个由革命议会批准并受议会控制的总理共同执政。共和国政府的首脑机关从南京迁到北京，清帝被迫退位，袁世凯的一些亲信与革命领袖一起被任命担任显要职务。

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孙逸仙在 1911 年之前，主要是在居住国 919 外和在国外留学的中国人中间逐步争取追随者，虽然他也在香港和上海公共租界开展了一些实力强大的运动。自他亡命国外以来，曾经数次秘密回国，但是当他不去周游世界物色志同道合之士的时候，他主要居住在日本。他有很高的声望，但是那些实际进行革命工作的各色各样的领袖与他本人并不十分熟悉；虽然他能使他的基本思想为南京的共和国国会所接受，但是这些思想究竟被人理解到什么程度却是很成问题的。他在 1894 年创立的革命团体最初称为兴中会，以后从 1905 年起称为同盟会，它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国外华侨。1911 年以后，改组为国民党，在中国本土吸收了很多党员；不过它的组织很松散，成员形形色色，他们只是由于

反对满清和反对外国干涉中国事务才联合在一起。国民党对于随着袁世凯参加共和国政府的新人物也没有任何支配力量。孙逸仙本人和追随他的人主张实行“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孙逸仙多年来一直声称这是革命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对于袁世凯以及投向胜利方面的许多其他人说来，这些主义中只有头一个主义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他们勉强算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不相信民权主义，也无意实现孙逸仙所提出的保证所有人都过一种小康生活的要求——这就是他提出第三个主义的用意。

因此，发生分歧就是必然的了。孙逸仙在担任全国铁路总办的时候，发现自己被降到了从属地位，而且没有资金。袁世凯将孙的许多朋友撤职，而代之以袁世凯能够信赖的保守分子或者反动人物。得到列强和国际银行家支持的是袁世凯，而不是孙逸  
920 仙或者国民党，他们认为袁世凯是最有可能恢复法治和最能服从它们的需要的人。也正是与袁世凯，银行家们恢复了借款谈判，各国驻北京代表也情愿与袁世凯打交道。而袁世凯则虽然接受了共和国，使清帝退位，却根本不相信国民党领袖设法强迫他接受的议会控制和民主政府的机器，于是他开始逐渐破坏这个机器，并扩大自己的权势。不久以后，在袁世凯与外国银行家谈判借款的附加条件上发生了严重争执。作为借款的担保品，银行家要求扣押盐税收入，将来由海关征收。海关负责人是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爵士，他的身分是中国政府的雇员，以前倒是曾经利用过海关来取得外国借款，但是这一次实际上是建议将海关的控制权从中国政府手里——尚未得到外国承认——转到银行家手里，并且坚持应将它所征收的全部款项交给中央，中国地方政府不得保留分文。

国民党领袖、总理和国会十分强烈地反对这些条件。威尔逊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也同样反对，理由是这样做就势必要非法干

涉中国管理自己事务的自由。美国银行家被迫退出了银行财团，但是其余的人却继续推行这个计划。袁世凯也继续推行这一计划，由于他的总理国民党提名的宋教仁指责借款的做法，袁世凯派人把他暗杀了。这件事发生后，长时间避免攻击袁世凯的孙逸仙严厉地谴责了这次暗杀和袁世凯接受借款的条件。孙逸仙和他的追随者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分庭抗礼的共和政府，拒绝接受袁世凯的权力；但是孙逸仙没有强大的武装部队作为后援，袁世凯因此得以将他从南京赶到了南方去。然后袁世凯解散了残余的国会，并着手重建帝制，自立为皇帝。孙逸仙再度流亡国外。但是袁世凯打算做皇帝的企图使得群情激愤，以致他的外国顾问也惴惴不安，只得劝告他观望。登基仪式延期了，袁世凯在反动领袖的支持下继续进行独裁统治。

此刻的局势由于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发生了突变。银行财团由于德国人被驱逐出去而瓦解；日本乘机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并且得寸进尺，要求在该省得到更多的权利。翌年，日本又随即向袁世凯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二十一条，这项最后通牒的要求极为广泛，显而易见其用心是要在其他列强忙于自己的事务，无暇进行有效干涉的时候，使中国沦为日本的附庸。袁世凯试图使这些条件得到修改，但是他深知他没有能力进行武装抵抗，于是在徒劳无益的讨论之后，他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他的这种投降行径结束了他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他被认为是日本进行侵略的一个工具，中国人的强烈的反帝情绪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他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不复存在，因为各省的军阀或者督军都拒绝服从他的命令。于是他为了争取支持，答应恢复议会政府和恢复国民党领袖的职位。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保证。以孙逸仙为首的共和派在华南设立了一个新的革命政府。

这时，1916年6月，袁世凯突然死了，他死后，他的政府和残

余力量也随着消失。中国分裂成了一些各自为政的地区，每个地区都由一个不理睬任何中央权力的军阀统治着，他们有的独霸一方，不问外事，有的就近联合其他军阀，扩大地盘。这种一团混乱的局面持续了十年，一直到第二次国民革命在 1926 年取得胜利。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孙逸仙一直领导着广州的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地区时大时小，曾经不止一次甚至失去了对广州本地的控制。在此期间，统治华北的军阀集团不时更迭，其中最重要的是 922 奉系的张作霖和基督将军冯玉祥。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列强拒绝承认孙逸仙的政府，于是国民党立即求助于俄国人，他们在苏维埃革命以后，率先放弃了一切特权，如治外法权和在中国领土上的租界等。在以鲍罗廷为首的俄国顾问的帮助下，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纪律严明的全国性政党，并且采取步骤训练和装备了一支有现代化武装和战略思想的国民党军队，由当时被认为是属于共和民族主义运动左翼的蒋介石担任领导。同时，在华北，政府象走马灯似的更迭频仍，令人眼花缭乱。1922 年，吴佩孚击败了张作霖，重新召集 1913 年的国会，恢复了黎元洪的总统职位，但是不出数月，黎元洪就逃出了北京，军阀混战又起。1922 年，冯玉祥倒戈，帮助张作霖打败了吴佩孚。另一个军阀段祺瑞被拥戴为临时政府执政，他向争执各方发出通电，要求他们派代表到北京来举行善后会议，解决中国的未来政府问题。1925 月，孙逸仙北上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到北京之后就生病，进医院几个星期之后死于癌症，结果一事无成。他留下了一份“遗嘱”，成了翌年国民党进行新的革命的根据。

当然，这些事情应当说不属于本书本卷的范围，向应该留待下一卷再作讨论。其所以必须在这里扼要作一交待，是因为不如此就不可能恰当地叙述孙逸仙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或者说明他的社会思想的背景。不过我在本卷中没有必要谈到俄国共产党对于

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这个争执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完全属于 1917 年以后的时期。孙逸仙早在俄国革命以前就已经大部分形成了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他丝毫没有受到俄国的启发，不论在他晚年将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这一点上，他可能受到了俄国的榜样多么大的影响。孙逸仙的社会哲学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毫无共同之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完全摒弃阶级斗争的概念，并且拒绝将不同于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看作为中国人民必须着手反对的敌人。他竭诚相信人民民主主义，除了在革命斗争的实际过程中以外，他反对中央集权。他所盼望的革命的直接后果并不是一个阶级或者一个政党的统治，而是将政府权力按职能分配，从而为黎民百姓的利益建立一种互相制约的制度。虽然他的基本学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在他的著作中，并且常常很不严谨，但是其主要内容却十分清楚，并且在他的勇于开拓的事业的各个阶段表现了明显的一贯性。

孙逸仙的最著名著作是《三民主义》。就其英译本来看，这一著作包括他死前一年，即 1924 年，发表的一系列演说，这些演说都是即兴之作，由一个速记员记录了下来。孙逸仙在出版这些演说稿时，并没有作实质性的修改。演说的内容主要是重复他多年来的著作和言论：关于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阐述可以追溯到 1905 年他在布鲁塞尔发表的一次演说。他不止一次地着手于写一篇阐述三民主义的综合论文；1922 年，他已经写了一部分，不料他的手稿连同所有的笔记在这一年他的总部遭到攻击的时候全部付之一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演说有许多失实之处，表达方式也常常很不严谨，但其主要概念很清楚，与他在其他地方所发表的著作也是一致的。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最重要的是 1918 年分三卷出版的《建国大纲》以及《建国方略》（1924 年）。他在遗嘱中推荐这些著作，还有《三民主义》和 1924 年国民

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说这是他给中国人民的遗产,建设新秩序<sup>924</sup>的根据。

孙逸仙虽然是一个反抗他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的僵化传统的叛逆,却深深相信中国人民有伟大的文化,相信他们有能力创造一种与任何其他文明相比至少并无逊色的文明。他相信,要作到这一点,必须驱除歪曲了古老文化的满清人,完全恢复民族独立,摆脱外国的控制以恢复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的团结,而且象日本人那样,既从西方发展中汲取经验教训,又不是盲目地模仿。他深深相信,以潜力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拥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并专心致志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西方工农业技术来予以开发。他深知不依靠外国资本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会遭到困难,他的计划包括争取较富有的国家提供大量借款。他认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碍这种借款,只要接受借款的国家组织良好,并采取完全独立的态度,反对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不能体面地接受的任何条件。孙逸仙看不出为什么经济发达的国家——那些其货物需要市场,其剩余资本需要投资场所的国家,在中国人民推翻了他们腐败的统治者并且建立了真正的民族国家,从而表现他们不再甘心被当作劣等国家对待,或者被外国资本家剥削的时候,不愿意根据可以接受的条件,贷款给中国。他的民族独立概念中包括建立一支对外来的暴力侵略进行抵抗的力量,因此他希望建立一支有效而装备精良的国民军作为革命的工具。但是他也深深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国家对于外国的剥削和侵略进行抵抗的力量不仅在于它所控制的一支武装部队,也在于国民精神——中国国民党人能够有效地利用抵制运动作为对付日本人和英国人的武器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sup>925</sup>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成立国际联盟时,孙逸仙吁请组成联盟的各国政府,作为国际联盟一项最重要的事业,在比较先进的



国家所提供的资本的帮助下，发展经济落后的国家。他是在世界范围内对“匮乏作斗争”这项主张的一个最早的宣传者；他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进军所作的呼吁没有引起多大反应，这一点使他很不理解。在他看来，整个问题十分简单；他确信，国际联盟除非首先着手解决在非常富有、潜力很大的世界上人类灾难深重这个问题，否则它对世界和平就会毫无贡献。

孙逸仙在他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毫不担心采用西方技术会破坏中国文明的特性。相反地，他认为只有采用西方技术才能拯救中国文明，使之不致有为征服者消灭之虑，才能有希望将文明普及到全体人民。他也毫不担心，中国资本家参加建设会在中国重演西方的阶级斗争。事实上他坚决认为必须强迫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在一个强大的民主政治控制的范围内工作，国家必须负责保护普通人民不受剥削，并且保证良好的劳动条件。在农业方面，他追随亨利·乔治之后，主张征收一种相当于未改善的土地价值的地价税，因此他建议重新分配土地，以利于无地农民以及土地太少或者太贫瘠，不足以合理维持全家生计的人。他要开展一个伟大的运动来改进农业技术，并且采用合作方法来利用农业工具以及销售和购买必需品。在工业方面，他完全愿意让资本家发挥他的才能，只要他们接受国家为了保护工人利益所制定的管理法规。他设想雇主和工人都是接受“三民主义”的，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彼此互助合作的仆人，愿意为国家服务，并且在共同服务中团结在一起。在这个基础上，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拒绝接受阶 926  
级斗争的整个概念，认为这个概念必然否定民族的共同目标。

诚然，孙逸仙有时候谈到，他的思想归根结蒂是与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一致的。他在关于三民主义的著作中说，他的第三个主义，即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他又解释说，他为了使自己的态度有别于着重阶级差别

的西方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所以故意采用了“民生”这个字眼，而不采用他称作是西方字眼的“社会主义”。他可能设想，到了适当的时候，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他肯定预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大部分投资必须在公众直接监督之下进行。但是他坚决相信，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离开资本家是不行的。他与苏联顾问越飞在接受苏联援助的时候共同发表的宣言就明确地陈述了他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

孙逸仙博士认为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或者是苏维埃制度，因为这里不存在顺利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者苏维埃主义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他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实现全国统一和取得充分的民族独立。

关于社会主义，孙逸仙显然也会有同样的说法。他的宗旨是，除了积习难改的军阀和外国走狗以外，将所有中国人都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而不是将他们分成对立的阶级。

在孙逸仙的社会学说中，在三民主义之后，紧接着就是以“五权宪法”的主张代替习见的政府的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和司法。他增加了两种权力，提出了五权的计划。这两种权力分别为“考试权”和“监察权”。考试机关的权限主要是甄选公职人员，也就是说它继承满清政府旧吏部的职权，但是改革了旧吏部的甄选方法，充分考虑到了现代知识的一切有用形式，包括西方的技术知识在内。监察机构负责弹劾贪污或不称职的官员，并审查整个国家事务的处理情况。

根据孙逸仙的计划，政府机构的这五个部分分别交给各个单独选出来的院来掌握，各院在指定的职权范围内具有同等权力。因此孙逸仙关于政府的概念基本上是多元的；不过在五个院的后面是全体人民的直接权力，这种权力体现在创制权、复决权，和罢

免任何他们认为不满意的代表方面。他认为唯有这种人民直接权力与政府职权的结合能令人满意地体现专家与民主的协调。

不过，孙逸仙并没有建议立即建立他的新的政府制度。他说，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需要有三个连续的时期——军政、训政、宪政。在第一个时期，必须在军事管制下进行工作，在这个时期里，革命将击败它的敌人并且建立共和国。在建立共和国的斗争结束以后，军政就必须为训政所代替，在这一时期，胜利的党的领袖将建立起新的根本制度，从事大规模的运动来教育人民，使他们具有新的社会态度和新的技术。然后从第二个时期很快地进入第三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在五权宪法的制度下，人民将享有充分的民主的自治。在下文可以看出，第二个时期与共产党的“专政”概念有某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在这一时期持续期间赋予党的任务上。但是孙逸仙所说的“专政”肯定不是一个阶级的专政；他所设想的这种专政只需要继续几年，在这一时期，在中华民国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五权宪法的体制。

928

在孙逸仙关于产生五权宪法的三个时期的最新阐述中，似乎对他早先的学说作了一些修改。他过去曾设想这三个时期在整个中国可以分别同时向前发展和结束。可是在1924年出版的他的《建国方略》的修订本中，他认为这个过渡时期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于不同的地区开始，并且提出另外一个新概念取代由中央控制过渡的概念，这个新概念特别重视自下而上的建设，通过地方和省一级的体制的发展和民主化，为改组中央作好准备。

孙逸仙这种三个时期的概念并不是从俄国人那里借鉴而来，虽然毫无疑问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争论是熟悉的。这个概念更不是1917年以后俄国建议的结果。在孙逸仙所著的1918年出版的《建国大纲》中已经充分表达了这个概念，而且在此以前很久，他已经发展了这一概念。事实上，这

个概念于 1912 年曾经引起他与他的一些革命同志之间的争执,当时他曾指责他们不先使人民习惯于他们全然不熟悉的民主议会政府的概念,或者不事先巩固共和政权的基础,就操之过急地要建立这样的政府组织。他曾经要求他们同意在斗争停止以后必须先有一个在党任命的人物领导之下的训政时期,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不经过一个事先教导人民使用民主制度的时期,就将这个制度贸然强加给人民,这个制度就有瓦解之虑。据他自己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意见遭到否决,是使他在 1912 年情愿放弃总统职务而致全力于经济复兴工作的原因之一。

尽管我不认为孙逸仙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仍然用了这么多篇幅来介绍他的思想,这是因为他的影响无疑主要是在社会主义方面,也是因为他的许多追随者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日后变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此外,如我们将在本书下一卷所见,在 929 经济落后的国家,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只是在 1917 年俄国革命以后,才主要作为它的后果,明显地体现在实际的运动和思潮中。但是孙逸仙早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这是由于他对于列强的互相冲突的帝国主义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有切身体验,也是由于他相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只有建立起坚强的政府,率先采用现代技术,使用民族主义会给予人民的一切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抵抗武器以及经济组织和武装反抗的武器,来对抗帝国主义者——只有这样,才能拯救自己,免于被人征服和受人剥削。孙逸仙比任何其他社会思想家都更注意于设想出民主的民族主义概念,作为解放被压迫人民的工具,并且企图在孔子“天下为公”的口号下将除了无可救药的反动派以外的一切阶级都团结起来。他不仅直捷了当地反对阶级斗争,而且反对马克思提出的整个唯物史观,坚持认为在确定发展道路方面,民族的和文化的因素和经济因素同样地有力量,而对于社会力量的

了解必须建立在把人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看他的经济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他低估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不过他并不把这些因素看作是把人推向一个预先决定的目标的力量，而是把它们看作是表现在传统和民族国家的创造意志上的人类精神所控制和指导的力量。

## 第二十七章

### 日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没有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仅有的运动在 1911 年几乎完全瓦解了，因为当时政府逮捕了大多数社会党领袖，并且经过秘密审讯后以违宪罪处决了其中的许多人。被处决的人被控告为无政府主义者并从事恐怖活动：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似乎是受到美国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影响的直接行动派。牺牲者中间最有名的人物幸德秋水曾经在美国工作过几年，回国以后宣传直接行动并反对议会活动；但是 1911 年的迫害绝不限于他的集团，虽然他们是主要的遭难者。当局利用这个机会来粉碎全部社会党组织和大多数工会组织，封闭社会主义刊物，并将许多幸免于处决的人监禁起来；直到 1914 年以后很久，开始爆发反对物价高涨的罢工时，运动才有了重整旗鼓的可能。只是到 1918 年以后，社会主义运动才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

日本的社会主义显然是在两种人——知识分子和没有投票权的工人中间开始的。在此以前，曾经有一个以争取建立向议会负责制政府的斗争为中心的自由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表现形式主要来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从欧洲或者美国学到这种思想的。还有些人是亨利·乔治的追随者，为首的是《东京经济学家》的业主和编辑，经济学家田口宪。老资格的自由党的政治家矢野龙溪在 1902 年成了社会党人。写有一部畅销书《新社会》。另一个自由党领袖坂垣退之助伯爵在 1900 年创立了以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的东海俱乐部。前一年著名小说家德富芦花写了他

的宣传社会主义的小说《黑潮》，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另一个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小说家是木下尚江，他所著的《火柱》在1903年问世，他是两年以前成立的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

在1890年以前就开始了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运动在本世纪最初十年达到高潮。但是从日俄战争（大多数社会党人都强烈反对这次战争）时起，除了在学生中以外，运动迅速衰落；许多曾经对社会主义表示同情并且强调它符合于日本精神的日本知识分子，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际主义理论出现的时候，就对它表示强烈反对。当社会主义看来是强调为国家服务的观点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就向往社会主义思想，甚至有时说，日本在精神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只是需要民主来使之成为事实。当大部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主张与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这两个交战国家的独裁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时候，这些人就断然与社会主义决裂，有一些人甚至变成了迫害者。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与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会主义一道成长起来。日本曾经长时期是一个拥有组织严密的行业公会的国家，行业公会的宗旨是进行行业保护和友好互助；到了九十年代，这些公会中有一些在诸如泥水匠太田酒信和造船木工斋藤这样的人领导下，按照西方的形式组成了工会。东京的印刷工人在1890年组成了一个工会。不过一直到中日战争的时候才有巨大的发展，战争爆发之后发生了多次罢工，争取提高工资以应付日益上涨的生活费用。接着，此后一个时期的杰出人物之一，片山潜（1858—1933年）从美国回到了日本，并以工会为基础着手建立社会主义运动。片山潜出身农民家庭，曾经在东京做过印刷工人，后来在大学里看过门。1884年，他前往加利福尼亚受高等教育，他一方面做工来维持生计，一方面先后在美国一些学院和大学里进修一系列的课程。1892年毕业以后，他

932

继续深造了三年，然后大约在 1895 年回到东京，开始选定他自己的工作。到 1897 年时，他已担任新成立的钢铁工人工会的书记，已经创办了一个刊物《劳工世界》，并且成立了一个叫作“劳动组合期成会”的团体。第二年，日本铁路公司爆发了大罢工，他组织了一个铁路工人工会，并且将建筑业和木工业中的一些行业公会改成了工会。在政府经营的造船厂、兵工厂以及码头工人中间也成立了工会。除了“劳动组合期成会”以外，片山潜与同他合作的主要知识分子安部矶雄教授在 1897 年在东京成立了社会主义协会，他们还着手建立一些与工会有密切联系的消费合作社，其中有一些在工会被封闭以后仍然继续存在。

到这时为止，运动的进行还很少受到当局的干涉，虽然片山潜的《劳工世界》有时候与检查机关发生一些纠纷。1899 年，一些教授由于对激烈的工人运动的壮大感到不安，成立了一个社会改革联盟，部分是为了将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引导到危险性较少的活动中去，这个团体在第二年帮助争取制定了一条使合作社合法化的法律。不过在同年，当局感到不安起来，于是实行了一条公共治安警察法，这一法律禁止煽动罢工，并且严格限制政治结社、示威和公共集会以及组成工会的权利。从此以后，警察就有了非常广泛的权力来镇压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使用这些权力时并不是同样严厉的，政府却可以随心所欲，动辄乞灵于这项权力。政府特别禁止妇女儿童加入政治团体或者参加政治集会；警察有权参加任何政治集会和工会集会，并且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制止会议进行；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报章杂志检查极严，如果它们刊载了“颠覆性的”文章，就很可能被没收，如果一犯再犯就可能完全被封闭，印刷厂则被充公。这些规定使“鼓动者”和左翼新闻记者的生活朝不保夕。几乎每一位领袖都一再下狱，刊物也一再被取缔和改头换面重新出版。在 1904—1905 年日俄战



争期间，压制特别严厉。在桂内阁倒台以后放松了一个时期，当时新的西园寺内阁有一个时期允许有较大的宣传和组织自由。不过这种比较自由的时期只不过昙花一现。1908年故态复萌，又开始了镇压，在1910—1911年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大审讯时，迫害达到了顶峰，有一个时期几乎消灭了社会主义运动。

1900年的新警察法并没有立即把社会主义者的活动镇压下去。1899年的新宪法——人们认为这部宪法将引进一种议会政府的形式，不过选举权仍有限制，大臣仍然由天皇任命并且向天皇负责，而不是向议会负责——颁布以后，1900年成立了成人选举联盟；翌年社会主义团体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成立社会民主党，打算参加竞选，虽然在扩大选举权以前很少有赢得议席的希望。新党主要以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据发表了一个宣言。政府立即采取了对策，它控告了胆敢刊载宣言的四家报纸的主编并且取缔了这个政党，于是为了逃避这项禁令，该党改组成了社会主义宣传家协会。这一阶段的主要领袖是片山潜、安部教授、新闻记者河上肇、幸德秋水<sup>①</sup>和酒井以及与片山集团密切合作的西川光次郎和小说家木下尚江。一家很受欢迎的报纸《苦难》表示支持，发表了安部所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连载文章，并且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公开示威，在会上通过决议赞成制订工厂法和实施普选权。警察最初禁止举行示威，但是后来以与会者不得超过5千人为条件同意举行示威。其实与会人数十倍于此而警察也无可奈何。当社会党被取缔的时候，另一家颇受欢迎的报纸《万朝报》组织了一个新团体进步联盟，其纲领体现了社会党人的大多数要求。幸德秋水和酒井是该报的主要作家，此后二年，该报带头宣传进步政策，在工人和学生中间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不过在1903年，当日本和俄

<sup>①</sup> 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是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列主义思想的书籍，该书在日本出版后三个月，即1903年9月就已被译成中文传入中国。——译者

国之间因为朝鲜和满洲的纠纷而战云密布时，《万朝报》的业主们反对他们的主要撰稿人的反战态度，幸德秋水和酒井因此被迫辞职。1902年内有一个时期，片山潜把他的《劳工世界》作为日报出版；但是，他没有能维持下去，于是又恢复为双周刊。当与《万朝报》发生分裂时，社会党各团体在加藤辰郎博士——他后来是日本参加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的日本代表——帮助下联合起来创办了一家新报纸《平民新闻》，由幸德秋水和酒井担任编辑；这家报纸不仅在东京，而且在整个工业中心，立即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号召力量。同年，社会党人在大阪举行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一项新的宣言，警察好象没有加以干涉。事实上在这一年，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但是也遭到了它的第一次严重危机，这是眼看要与俄国发生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1903年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大会派片山潜出席第二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03年11月他离开日本到美国各地进行旅行宣传，然后前往欧洲。在他离国期间，社会主义者协会和《平民新闻》进行了激烈的宣传运动。《平民新闻》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译本，可是立即被警察没收了，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其他的社会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协会为不准参加男子的集会的妇女组织了单独的集会；学生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当战争爆发时，社会党人给俄国人写了一封表示致意和团结的信，这封信发表在《火星报》上，该报同时刊载了一封大概是列宁写的友好的回信。在阿姆斯特丹，片山潜与普列汉诺夫公开握手表示俄国工人与日本工人之间的团结。

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在日本，警察加紧进行迫害。许多社会党领袖被捕下狱——西川被判处七个月徒刑，幸德秋水被判处五个月徒刑，《平民新闻》一再被没收，终于完全被封闭。立刻又有一家

新的刊物《直言报》取而代之，可是还没有到 1905 年年底又被警察封闭了。第二次封闭的原因是由于 1905 年 9 月在东京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骚乱，后来又很快地扩大到了其他城镇。这些并不一定是社会党人造成或领导的运动，而是自发性的运动。这些运动的产生是由于对战争状况的普遍不满和对政府战争政策的厌恶。政府召来了军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又有许多人被逮捕，社会主义者协会也被解散。但是因此导致了战时桂内阁的倒台和西园寺内阁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

社会党人利用政府更迭的机会创办了一些新的刊物，并于 1906 年 2 月成立了一个由加藤博士领导的新的社会党，开始在各大城市建立支部。3 月，东京电车工人罢工，使交通全部中断，结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年终之前，《平民新闻》(日报)复刊，幸德秋水和酒井重新担任主编。接着在 1907 年 2 月爆发了以长冈为首的足尾铜矿工人大罢工，长冈通过他所办的刊物《矿工之友》确立了他的有影响的地位，而且他还是一个以活页形式广泛流传的工人阶级歌曲的创作者。矿工的罢工引起严重骚乱使公司的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政府召来军队，与工人发生了短兵相接的战斗，最后工人退却了。有 200 名罢工工人被捕，1903 年成立的矿工工 936 会遭到取缔。公司拒绝重新雇佣罢工工人，并且用破坏罢工的工贼接替了他们。在罢工进行的时候，社会党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以修订前一年制定的政策，在会上左右两翼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幸德秋水在 1905 年访问了美国，回国之后成了一个直接行动和产业工会主义的彻底的支持者和政治行动的反对者。在他离国期间，1906 年的社会党代表大会在它的纲领中列入了一项保证“只在法律范围以内”采取行动的条文。在 1907 年的代表大会上，幸德秋水和他的集团乘片山潜不在的时候把这一条文删掉了，虽然没有通过他们自己的积极的建议。会上通过的折衷纲领保证社会

党“对当前的社会进行彻底和根本的改革，进行反军国主义和反宗教的宣传并开展争取成年人选举权的运动”。幸德秋水提出的删掉有关成年人选举权的建议以及田添提出的肯定议会行动的必要性的建议都被否决了。

这些决议已经足以引起政府对社会党的镇压，以及议会派与直接行动派之间的激烈斗争。片山潜在代表大会刚一结束就从美国回到了日本，领导议会派，创立了一个叫作同志会的新团体（不是一个政党），幸德秋水和酒井建立了一个对立的团体叫作金曜会，这两个团体各自都创办了一个新刊物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片山潜集团在主张有必要采取议会行动的同时并不反对采取直接行动——片山潜本人在阿姆斯特丹就曾投票赞成总罢工。另一方面，幸德秋水的集团却是激烈反对议会行动的。

此时，即1907年6月，另一批铜矿矿工——别子矿山所雇佣的矿工举行了罢工，因而又重演了几个月以前在足尾发生的事件。结果又发生了骚乱，财产受到了重大损失，政府又召来军队进行镇压，许多工人被投入监狱。这次别子罢工和上次足尾罢工一样是自发性的，罢工原因是劳动条件过于恶劣和抗议监工的专横行为。

937 面对着这些骚乱，许多稳健的社会党人胆怯了，而幸德秋水的社会党集团所采取的极端态度更增加了这种恐惧。当宗派之争达到顶峰的时候，片山潜和他在同志会的主要同事西川光次郎发生了争执，西川曾经说服片山潜同意让他的朋友赤布为他们的刊物《社会主义新闻》的编辑之一，但是不久以后，片山潜就指责赤布是无政府主义者，于是在东京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报纸，都叫作《社会主义新闻》，同时幸德秋水集团则在大阪出版了一个新的《平民》，由当地领袖森近任主编。后来政府逮捕了西川，西川在狱中呆了三年，在此期间他对他的社会党活动表示了忏悔。1911年，当运动遭到彻底镇压时他出狱了，在一本叫作《忏悔录》的书中他叙述了

他改变信仰的经过。片山潜在西川离开以后设法与藤田一道改组社会党，藤田是一个奇怪的人物，后来成为东京报贩的居于绝对地位的领袖，他有一种突然组织示威并且与当局捣乱的卓越能力。这时候已经不能公开宣传社会主义；但是片山潜和藤田遍游全国各地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演说，但避免使用“社会主义”这个字眼。1908年6月，对立的两派联合起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欢迎社会党人新闻记者山口出狱。示威者手拿红旗，在激烈争斗中红旗被警察夺走了。这一次又逮捕了許多人，此后大多数领袖被判处十二个月到三十个月的徒刑，酒井也在被判处两年徒刑的领袖之列。所谓红旗骚乱案成了进行大规模新闻宣传来反对社会党人的信号，成了特别是对东京的社会党人集会加紧警察镇压的信号。此后，片山潜和那些幸免于被捕的人主要是在东京以外的地区继续他们的宣传工作。但是镇压变本加厉。1910年5月，最后发展到对社会党的鼓动者进行大搜捕，并且在警察进行长时期的讯问以便取得构成犯罪的供词以后，将其中一些人当作无政府主义者以叛国罪进行了审讯。

938

审讯是秘密进行的，案子提到了最高法院，一直进行到这一年年底。1911年1月，大多数被告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绞决，在判决和执行之间，并没有照例的间隔时间。逃出法网的或者被释放的社会党人企图组织抗议，但是遭到了镇压。所有社会党的刊物都遭到取缔，所有社会党的集会都遭到禁止。

这些事件几乎扼杀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左翼领袖幸德秋水是被处决者之一。在逮捕和讯问以后被释放的片山潜由于支持东京电车工人的一次成功的罢工而在1912年1月被捕下狱；与社会党稍有联系的工会多数被封闭，经费被充公，只有它们所建立的合作社仍然被允许继续存在。不过当局认识到镇压本身是不够的，认识到要防止激烈的工人运动再次爆发，就必须为工人阶级行

动找到某种出路。因此，某些雇主便帮助工会的右翼以及残存的行业公会和互助团体组织了一个采用温和的社会和产业改革纲领的中央机构。这个新机构——工人协会由遭到其余社会党人谴责的铃木担任领导，他后来成为当局容许存在的、宣布以劳资和平作为它的目标的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1912年以后，这是唯一被允许存在的工人组织。在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年代里，尽管这一组织具有和平的意图，面对着物价的急剧上涨，罢工仍一再发生，规模也越来越大。工人协会受到了这些发展的影响，改名为劳工联合会，开始更多地按照工会的方针进行工作。于是雇主撤销了对它的承认，建立了一个叫做劳资人道协会的对立的组织。在战后国际劳工组织成立的时候，工人协会声称它有权根据它的代表三方的性质任命劳工的代表，但是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坚持自行任命人选来代表工人。不过关于此后的斗争情况就属于本书下一卷的范围了。

1914年以前日本社会主义的历史以一种极端的形式突出了社会党和工会的宣传家在某些国家里所面临的问题，在这些国家里，在较贫困的阶级中间，既没有任何民主自由的传统，也没有任何革命的传统。日本的革命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而且在把国家从经济的落后状态和社会的保守主义转变到采用高度发展的生产技术方面，是极其成功的。它也在广大人民中消灭了文盲，从而为广泛使用文字作为宣传工具开辟了道路。但是它并没有因此使政府制度趋于开明，或者使广大人民容易接受民主理论。使社会主义运动停步不前的首要原因是在日本于战争胜利中确立了自己的大国地位时，运动的知识分子领袖的国际主义使他们和主要的民族情绪的潮流发生了尖锐的对立。社会党领袖的反军国主义的态度使他们在除了少数特别受压迫的集团——比如矿工——以外的主要舆论中间极其不得人心，并且使他们失去了在1904年

以前他们曾经在知识阶级中间得到的大部分理论上的支持。他们曾经力图排除这些障碍以取得进展，但是政府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实在太强大了，特别是由于他们自己内部发生了分歧，他们就更难以取胜。毫不奇怪，使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主义陷于分裂的社会民主党人与直接行动派之间的争执在日本居然也有反应；但是在当时存在的情况下，如片山潜所见，社会党人公开宣扬极端主义理论是一个致命伤，因为它使政府有机会在广泛的舆论的支持下在温和派和极端派一律进行镇压，从而消灭了有几年看来是日本社会中的一种日益上升的力量。

日本社会主义没有产生重要的思想家，不过日本确实有一些有才华的人，他们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不仅未为外界而且也未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注意。片山潜从来不自以为是的理论家，事实上由于他迫切希望人们把他当作是无产阶级而不是知识分子，他倒是倾向于贬低自己的知识能力。他深知，如果日本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左翼知识分子玩弄从欧美借鉴来的概念，就永远不会有力量；他一开始就致力于说服产业工人组织工会并且为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认为这是任何有效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必要基础。他是一个“议会行动派”，倒不是因为他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可能建立一个能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任何重要作用的社会党，而是因为他认识到，为争取机会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就必须表示遵守宪法，并且认为，幸德秋水的革命主张必然使他的敌人求之不得，得到一个把它完全镇压下去的大好机会。毫无疑问，他也具有一种主要来自德国人的见解，即要使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就必须在合乎宪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是他认为，在日本只有从建立工会开始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日本工人既没有投票权，而且除了使自己在产业方面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以外也没有希望得到投票权。日本没有可能象在其他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

——一样，逐步建立社会主义，以作为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最好表现，因为日本已经取得了独立的大国地位，而日本的民族主义正是社会主义必须与之斗争的那些集团的本钱。在日本，社会主义必须是国际主义性质和反军国主义性质的，必须反对越来越具有帝国主义形式的、极端强大的侵略性的爱国主义。这就使它的任务非常艰巨；事实上只是到了 1945 年当日本人民至少是暂时发现扩张主义希望已经破灭的时候，才真正有了建立强大的社会党的可能。



### 结束语。改良和革命

在本卷所涉及的整个时期内，不论在国际间还是在我不能不谈到的大多数国家内，都在不断地辩论着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争执双方对于这些字眼都没有给与始终一致的解释：任何将所有社会主义者一股脑归于这一类或者那一类的企图都没有什么意义。尽管如此，争论显然是极为重要的，而且曾经一再接触到问题的中心。在企图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显然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虽然这方面还有革命者和改良主义都可能采取的一些中间态度。

一个极端是有些人认为不依靠革命不仅得不到社会主义，而且也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改良。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在它著名的章程序言中说，“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毫无共同之处”；还有的社会主义者从字面意义上接受“日益贫困化”的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各地，工人的处境越来越恶劣，而且必然如此，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中间阶级正在被抛进他们的队伍。如果从字面的意义上来看，这显然是胡说八道和对于事实的歪曲，但是，这当然并不妨碍一些人相信它。不过，要想引导许多人根据这种自诩为正确的假定来采取行动，却有相当大的困难：所以以接受这种学说为基础的、极端激烈的运动始终是为数甚少的少数人的运动，虽然有时候在一个短时期内，这些运动也能吸引一大部分心怀不满的人追随它们。

大多数主张革命的人并没有这种极端的见解。他们认为，没 942

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并不否认，工人，或者至少是大多数工人的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在改善。他们中有些人认为，还能够进一步改善，只不过范围有限。另外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达到、或者正在达到它提供改善的能力的极限，因为它的扩张能力已经达到、或者正在达到它的顶点，并且正在沦为或者将迅速沦为它自身的“矛盾”的牺牲者，并且在它为自身的生存而挣扎的过程中，将被迫使工人阶级的条件趋于恶化。如果极限还没有达到，那就还有通过日常斗争取得胜利以得到让步的余地；这种斗争和让步都会加强工人的力量，使他们在时机到来时进行革命。根据这种见解，革命并不是一件倚马可待的事情：今后仍然还有一个准备时期，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无产阶级也会为担负未来的任务锻炼得更为坚强。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只谈相信革命的人——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仍然要通过革命，而且也一定要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单纯依靠日积月累的点点滴滴的改良，是不能将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办法使它自己趋于稳定，或者解决使之不断发展的难题以逃脱它必然灭亡的命运。这大体上是德国人的正统见解——这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考茨基的见解，并且得到了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响应。

如果在另一方面说来，资本主义已经达到，或者几乎已经达到它的发展的极限，因此也就是达到了它的让步能力的极限，如果它已经面对着越来越大的“矛盾”，或者眼看就要面对这些“矛盾”，那么就必须认为革命是一件近在眼前的事情，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居然还值得进行斗争来争取进一步的让步，价值也毋宁说在于斗争，而不在于让步本身，因为在资本主义的衰亡即将到来的情况下，这种让步是保不住的。根据这种见解，“日益贫困化”不是

已经开始,就是眼看就要开始,并且会成为使工人接受革命政策的一个手段;而社会主义者的至高无上的重要任务就是教育工人使他们于时机到来——它不久就会到来——时,出色而勇敢地进行革命。大体说来,这是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形式上的多数的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见解——这是帕维斯和罗莎·卢森堡的见解,也是法国和受到法国影响的其他国家的相当一部分工团主义者和产业主义者左翼的见解。

在那些相信资本主义由于它的矛盾会迅速崩溃的人中间,关于会实际促成这一世界性事件的力量问题并没有一致意见。有些人主要强调导致大批人失业和贫困化的即将到来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并重申马克思关于这方面的预言。另外一些人,比如罗莎·卢森堡,强调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迅速发展着的帝国主义竞争,并且预料战争会发出革命的信号,大国将在这些战争中同归于尽,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垮台。当然,这些解释不一定有矛盾,在适当的时候,这些解释常常结合起来或者不加区别地应用。随着在1914年以前的大约十年期间国际危机的加深,越来越重视从帝国主义竞争的角度所作的解释,而另一个常常强调消费不足,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危机最终来源的论点,则降到了次要地位,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中它仍然保持着习见的地位。

无论如何,公认的正统说法的部分内容是,资本主义迟早要崩溃,社会主义注定要取而代之,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

到现在为止我所谈到的各种人都相信,建立社会主义必须革命,但是当他们使用这个字眼的时候究竟何所指呢?他们可能各有所指;而且往往其他人或者连他们自己都不十分明确倒底他们是何用意。他们的意思可能——而且有一些人也的确——只不过

是说建立社会主义将是一场革命，不管它是用什么手段赢得的。正如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资本主义曾经是一场革命一样——虽然没有人能够指明那场革命的具体日期，或者指出它完全就是某一事件——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也将是一场革命，不管它可能以何种方式发生。就这个基本意义而言，即使是一个严格的改良主义者，也可能同时是一个革命论者；因为如果社会主义就是革命的话，每个社会主义者就都有资格被称作革命论者。但是并没有很多称自己是革命论者的人甘心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来考虑问题。其中大多数人在说社会主义必须革命的时候，心目中指的是，如果不在某个时候与已经建成的秩序决裂，并且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重建新社会，包括一套新的价值感和对阶级制度的彻底改革，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他们大多数人相信，到某个时候必须与旧制度决裂，从而必须有政权基础的变换；这种决裂和变换就是他们所设想的革命的内容。这是否就是说，他们设想的革命就是战斗和杀人，旧秩序进行武装抵抗，武装部队，或者他们中足够多的人，反戈一击或者拒绝开枪，于是工人阶级的敌人被打死或者解除武装和受到惩罚，大街上血流成河等等呢？那倒不一定，虽然除了托尔斯泰主义者以外，几乎所有革命者都设想革命必然包括某种暴力因素。暴力的多寡和程度可能有大有小，这要看情况而定。还有一层，虽然有一些革命者喜欢想到暴力和“流血革命”，或者甚至以此为荣，但是另外也有一些人或多或少地非常不喜欢它，认为暴力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必要手段，只要革命得以成功，应该把它压到最低限度。

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气质上的差别，当然大多数革命者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极端。许多除非在群情激愤的刺激下，否则不肯采  
945 取个人暴力行为的人，却不惮使用意在煽起暴乱情绪的言词，或者在他们脾气发作时听从暴乱思想或语言的摆布。特别是在不太动

感情的国家以及警察并非人民的天然敌人的地方，革命论者的言词往往要比他们的行动激烈得多。在落后的国家或者边疆地区，比如美国的西部矿区，或者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智利的矿区，或者除存在经济差别之外还存在种族差别的地方，往往动辄诉诸暴力行动。

首先是在那些倾向于从革命会造成灾难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人与没有这种倾向的人之间存在气质上的差别。革命主义往往比改良主义更富于戏剧性；可是有些人喜欢戏剧，另外有些人却讨厌戏剧，至少是在它威胁他们自己的生命时是这样。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革命论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常常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在落后国家他就可能不是这样——他可能是一个被暴政或者压迫所激怒的人，或者是一个希望报复因而冷静地理智地从事于他自己选定的工作的人。

当然，正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对于拥护革命的人说来，革命才十分经常地意味着“流血革命”；因为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完成任何种类的革命的可能性要比在先进国家小得多。在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以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除非联系着开枪、处决敌人以及普遍使人民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以此来胁迫他们，否则就几乎不可能设想“革命”。实际流的血倒不一定很多，但是旧秩序肯定要竭尽所能对新秩序进行有力的抵抗，革命论者要想有成功机会，就必须准备使用武力。甘地之所以在印度认为实行非暴力革命能够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的革命矛头指向的是宁可让步也不愿开枪的外国统治，而不是为了使他自己人民的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在由本国的统治阶级进行统治而且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压在人民背上的统治阶级如果不推它，如果不用力推它，它是不肯自动下来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社会主义者很难不同时也是一个激烈的革命论者。在沙皇制度之下，舍革命之外，就没有其他道

路。诚然，俄国有彼得·司徒卢威类型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左翼和右翼的社会革命党人对于必须革命这个问题并无分歧，有分歧的只不过是什么是革命的最佳手段问题。

另一方面，在比较先进的国家，特别是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和立宪政府经验和传统的国家，“革命”并不一定意味着流血。我们有可能设想革命大致以下列几种方式，以不流血或者几乎不流血的方式实现：(1)逐步争取大批人支持一个议会党；(2)由这个政党在议会争取多数议席；(3)在下议院通过一项议案，颁布一部新宪法或者召开制宪议会来制定一部新宪法；(4)上议院以及国王或行政当局否决这个议案；(5)下议院对这些反抗力量提出最后通牒，也许扬言举行总罢工或者甚至是起义作为后盾；(6)统治阶级由于认识到群众运动力量太强大，他们无法抵抗，向这道最后通牒投降；(7)召开制宪议会，通过一套新的根本大法，从而消灭旧制度，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

大多数主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也是西欧大陆上自称是革命论者的大多数第二国际领袖，在比较乐观的时刻对革命的确是这么看的。他们并不排斥在他们发出最后通牒时，统治阶级会略作抵抗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希望，不至于达到开枪或者至少不至于达到大规模开枪的地步。他们非常希望一大部分武装部队会拒绝开枪打死他们的工人同胞。无论如何，他们认为上述阶段中的头五个阶段是为革命作准备的必要阶段，并且希望第六个和第七个阶段会随之到来。这就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考茨基的想法，并且成为他们在废除了反社会主义法以后的行动基础。这也是茹尔·盖德和他的追随者在法国的想法。实际上这是西欧大陆的所有社会民主党中大多数自封的革命社会党人所要想的，并且成了他们开始奉行的政策的基础。他们既是社会主义者，也是

民主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权利不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同意，就进行革命。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是人民的大多数，或者正在成为人民的大多数，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大批地信仰社会主义事业是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至少他们所设想的在没有国际战争的复杂因素的情况下发生的革命就是这样；他们反对战争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识到，如果大战果真发生，就不容易看到革命以上述那种有条不紊的方式发生，由社会党在每个国家里取得议会的多数议席，从而为革命铺平道路。第二国际关于在战争即将发生或者实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社会党人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所进行的辩论，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尤其是德国人对于任何不经由议会道路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作法害怕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很不喜欢社会党在别人动用武力来阻碍他们的道路之前便使用任何种类的武力的想法；他们讨厌用总罢工来反对战争，不仅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认为至少是在德国，罢工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因为他们认为不把罢工变成正式的起义，罢工绝不可能取得胜利。他们宁愿把这些麻烦的问题搁置一边，而继续依靠他们自知擅长的作法——组织群众性的政党，扩大选民的支持，而不象极左派那样不断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当他们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如果统治阶级进行反扑而不是投降，用武力解散他们的议会，没收他们的房屋和经费，解散他们的组织，监禁或者杀害他们的领袖，一般说来就象过去统治阶级受挫折时通常所干的那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的群众性政党和千百万选民是否会真正起来战斗。

由于希望使统治阶级不大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他们热烈主张成立一支国民军来代替常备军，虽然在革命胜利之前没有实现这件事情的丝毫可能。出于同样的希望，他们接过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全部方案——普遍仲裁、一致协议的裁军等等。革命必

须用民主的议会方法来实现，或者至少在第五个阶段之前必须使用这些方法，考虑任何其他方法都是失策的。

任何俄国人都几乎不可能这样想。对俄国人说来，革命并不是以一系列的合乎宪法的阶段开始的那个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而是促使整个过程开始所必不可少的第一个阶段。俄国人不得不——或者自认为不得不以争取到一部宪法作为万事的开端，而他们知道除了用革命手段之外就不可能争取到这部宪法。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知道或者自认为他们知道，他们还不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他们便求助于这样一个概念，即未来的俄国革命不该是社会主义革命而该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在一个还没有工业化到足以直接跃入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发生的一次姗姗来迟的法国革命式的革命。这种态度还可以分成几种类别。站在极右翼的人主张社会党人与自由党人密切合作来进行革命，然后或者在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府中屈居次要地位，或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从外部支持这样一个政府，以便使工业化进行到社会党人能够经由德国人心目中所设想的那种民主过程取得政权所要求的程度。站在中间的是孟什维克的主体，他们认为社会党人应该帮助自由党人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但是绝不应该由于与自由党人联合而同流合污。在孟什维克中间，对于资产阶级立宪政体这一阶段大概要有多长时间，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因为有些人相信社会党人能够在政府外面采取行动来加速工业化，并且改造它以期迅速加强无产阶级力量；另一方面有些人像右翼一样，设想资产阶级将进行长时期的统治。最后站在左翼的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使他们相信，能够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紧接着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社会党人不应该害怕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以防止自由党人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以前就“背弃”资产阶级革命，而应该在他们觉得自己足够强大的时候，从



背后给他们的资产阶级盟友一刀——如果必要的话，也给孟什维克一刀——从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必等待国家工业化，或者等待无产阶级真是成为人民中的大多数。

列宁关于这两种革命的概念必然要引起农民在两种革命中所占地位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当然所有革命论者都希望在革命的每个阶段争取到农民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争论。问题是究竟是把农民看作城市无产阶级在建设新秩序时的可能的伙伴，还是仅仅是一种工具，可以利用他们的贫困和不满来加强革命——两种革命中的任何一种革命，或者还是把他们看作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力量。无论如何，在1905年以后可以明显看出，农民起义必须在第一次革命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社会党人在进行准备时也经不起对他们忽视。同时也分明可以看出，至少在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以后，农民不会坚决支持超出资产阶级革命范围以外的任何革命，许多富裕的农民——富农——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刻到来时肯定会采取敌对态度。因此，列宁不得不非常认真地不仅是考虑整个农民问题，而且考虑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别问题，不得不将半无产阶级的农民与半资产阶级的农民区别开，并且即使不是在第一次革命中，至少也是远在第二次革命开始以前很久，便从农村本身互相对立的角度来制定计划。事实上，甚至在第一次革命之前就必须开始这个过程，因为在农村中发动作为推翻沙皇制度必须使用的手段的一部分的起义的该是贫苦农民。<sup>950</sup>

再有一层，农民之所以极其重要，是因为他们构成了军队的主要部分，有必要诱导他们之中的尽量多的人拒绝服从要他们射杀革命者的命令。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党人必须给农民一些东西，使他们能够明显地理解到，除了最富有的农民以外，都有希望得到一种实际的直接的利益。显然应该给与他们的东西是土地。困难

在于农民所希望得到的是他们能够自耕自种的并且感到确能保持住的小块土地；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却不仅主张土地国有化，而且主张大规模耕种和农村工业化。列宁说：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革命，如果为了争取农民参加革命，必须按照他们的愿望让他们占有土地的话，我们就必须给他们，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我们必须答应给他们，并且告诉他们不要等待别人给他们，自己去占有就是了。农业国有化和工业化是能够等待的，当务之急是在农民的帮助下赢得第一次革命。

批评列宁的人说，好倒是很好。不过，如果农民一旦得到了土地，他们还会放弃土地吗？他们在得到土地以后难道不会成为第二次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坚决的敌人吗？列宁说，我们必须冒这个危险，我们的任务是进行第一次革命，为此我们必须尽量争取同盟者，当我们赢得了第一回合以后，我们将应付新的问题。批评他的人说，但是，建立一个落后的反动的农民政权是违背我们的原则的。看看法国在1789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吧，农民是大多数：如果农民反对我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民主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呢？列宁说不定是故意忽视了这一点。

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无疑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产业工人手里，即使他们能够使农民的主体成为他们的盟友。他们不相信农民在革命的任何阶段能够领导或者指导革命。在第一次革命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对于布尔什维克说来，特别重要的是尽量团结农民，以防止他们在富农领导之下成为资产阶级集团的一部分。由于富农必然要与资产阶级政党站在一边，这就意味着要把农村领导权从富农手里夺过来，做法是在无产阶级影响下组织广大贫农，发动他们重新分配土地，而不必等待国家的专

员或者任何其他人前来依靠法定权限这样做。这个建议使许多孟什维克感到震惊,他们希望一切事情都按部就班地进行,认为应该告诉农民等待制宪议会通过一项新土地法之后再说。但是在列宁政策的道路上有一个大得多的障碍,那就是社会革命党人比社会民主党人拥有的农民追随者多得多;问题是正确的政策究竟应该是与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还是立即着手来试图消灭他们的影响。眼前的答案是明确的。至少在第一次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人有必要与社会革命党人合作,因此,尽他们的最大力量来巩固他们在农村中的地位的同时,有必要就鼓励农民立即夺取土地问题与他们达成协议。

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希望农民拥有土地,而不是象布尔什维克那样,完全是无可奈何地而且是为了策略的原因才敦促他们去占有土地。社会革命党的右翼希望与开明的地主和进步的地方自治局合作,反对鼓动农村的穷人来反对比较富有的农民。这批人的大部分赞成农民合作运动——供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农具合作社等等——而农业合作运动则主要对于比较富有的农民是有吸引力。但是社会革命党的主体是由农民革命的鼓吹者构成,他们相信能够改变一种形式使古老的农村社会复苏,俄国能够改变成一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这种类型的社会革命党人极力赞成农民夺取土地。他们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分别在于他们不象后者那样希望首先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然后才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说来只有一次革命,他们希望立即进行这次革命,并且指望农民在全国各地自发起义,来完成大部分的革命工作。

社会革命党人在俄罗斯帝国的少数民族中间——在乌克兰和高加索,在亚洲的穆斯林中间,以及一般说来在边远地区,都很强大,因此与他们妥协是必要的;但是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

革命党人必须进行合作来进行两次不同的革命，而不是进行同一次革命。正因为如此，在1905年和1917年，真正的合作都十分困难。革命不论其性质如何，除了必须占领城市以外还必须占领农村。如果革命成功，结果必然要在农村地区建立一些地方政府，其中一些将代表反抗俄罗斯帝国统治的民族集团，大多数一定会受到主要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激励，而且对于地方事务会比对于整个俄罗斯事务关心得多。另一方面在中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将进行合作来使开明的资产阶级当权，并且需要社会革命党人在这方面给与他们支持。但是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憎恨开明的资产阶级，根本不愿意让他们当权。不过，他们与列宁的分歧不如与孟什维克的分歧，因为列宁认为第二次革命会在第一次革命之后接踵而至，与他们一样憎恨资产阶级，而且毫不隐讳他有意在资产阶级做了在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方面需要他们做的事情之后，就在背后捅他们一刀。因此，在革命初期，比起孟什维克来，事实上也是比起他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同志来，列宁较易于与社会革命党人合作。

这是因为，列宁确信农民能够在革命中发挥至关紧要的作用。可是另一方面，除了托洛茨基以外，还有些人担心，如果听任农民为所欲为，他们会使革命成功的机会毁于一旦，而只能把俄罗斯帝国分裂成为一些落后的农业国家，成为东方野蛮主义的堡垒。

我完全从俄国的角度讨论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当然这绝对不单纯是一个俄国的问题，甚至也不单纯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问题。每一个社会党都必须考虑这一个问题，而各国所采取的形式也是因国而异，大不相同的。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与俄国的问题很相象，只是在匈牙利存在大批的无地劳动者；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的某些其他地区，情况有本质的不同，因为那里根本不存在人数众多的大地主阶级能引起农民的憎恨。在奥地利一

如在俄国，这个问题是与少数民族的自治运动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在德国，南部与东部的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比方说在巴伐利亚、巴登和莱茵兰有大批相当富有的农民，而在东部的大庄园却有大批的贫困的无地工人。在法国，例如在种葡萄的地区和可耕种地区之间，地区差别也很大，不过整个说来，法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人数众多的，比较富裕的有地农民阶级，他们的土地来自大革命，因而他们希望保持革命的果实，而不是把革命进行下去。西班牙是一个地区之间存在鲜明对比的国度，一方面比较富有的农民耕种着少数肥沃的土地，另外有些地区，非常贫苦的农民拥挤不堪地居住在小块土地上，还有一些地区大庄园大部分无人耕种，而大批无地农民却听凭地主摆布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意大利的南部大庄园地区与北部地区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鲜明对比；但是在北部和中部，比如艾米利亚，也有一些有着大庄园和大批没有土地的靠工资为生的人口的地区。每个国家都需要面对它特有的农民问题，在每个国家里，社会党人都必须设法制定一项土地政策——而且他们发现这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

农民问题绝不是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决定他们打算进行何种革命时所碰到的唯一困难问题。如我们所指出，孟什维克认为要进行两次革命，在这两次革命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在这个时期内将在资产阶级政府下进行工业化，一直到社会党人夺取政权的时机成熟。只有到这个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会到来。但是第二次革命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呢？我认为，大多数孟什维克对这场革命的看法与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这场革命的看法非常相像——也就是说，是从本书第 420 页所述各阶段的角度，而不是从他们不得不承认在第一次革命中有必要采取暴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孟什维克是一些主张西方化的人，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极端崇拜者：他们指望第一次革命能够使俄国与西方

同化,从而使第二次革命按照西方的方式来完成。另一方面,列宁虽然也赞扬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至少在1914年以前,他完全误解了他们——在考虑第二次革命时甚至比考虑第一次革命时更多地从少数派用暴力夺取政权这个角度出发。列宁根本不准备无限期地等待俄国在资产阶级控制下工业化了之后再开始第二次革命。最初,我们根本不明确他根据什么标准来估计在俄国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但是他很快便得出了一个基本上是新颖的概念,那就是:俄国虽然必须先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然后才时机成熟,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因而必须经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却绝没有必要在资本主义政府下经历这个阶段。列宁设想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也就是说由一个共产党政府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技术,这个政府将实行工人阶级专政,但是在国家资本主义政权下,为实行共产主义准备好条件之前,并不实行实际的共产主义。

这样一来,进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的日期就有可能提前到来,以致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就可以迅速进行这场革命。因为,根据这种看法,资产阶级革命在经济方面的作用是完全消极的。它只需清除沙皇制度和专制政府就行了,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就可以听任共产党人来推翻它,并立即取得政权。因此,列宁设想的两次革命都是迅速完成的,继革命之后是一个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的漫长的工业化过程。这个漫长的过渡阶段有时被说成是“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在适当的时候继它而来的“共产主义”——这种区别的根据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某些段落,这些段落谈到废除不劳面获的收入,可是并不废除在过渡时期的劳动收入的差别。

行文至此,我们不免就要谈起列甫·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关于革命性质的别树一帜的观点,他既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也不是一

个孟什维克,也不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人物,而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托洛茨基的观点一部分是在1905年革命之前系统提出的,但是根据1905年他的经历又重新作了明确而详尽得多的叙述。他的观点有国内和国际两个主要方面。在国内方面,他不象列宁那样把两种革命截然分开,事实上他是把两种革命合而为一。他坚持说,俄国的开明的资产阶级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进行任何真正的革命,无产阶级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帮助他们取得政权,而是自己独立发挥最主要的作用,并且依靠自己的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对于作为同盟者的农民观感不佳,所以他不得不把几乎是整个侧重点放在产业工人身上,虽然他们人数很少;他不得不强调俄国所仅有的大规模工业的极其现代化的性质,并且非常重视城市工人苏维埃,认为这是革命的创造力量。托洛茨基指望苏维埃接管城市和周围地区的行政权,并且联合起来构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他与其余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认为迅速工业化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他的见解言下之意是说,这个过程必须在社会主义控制下,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控制下贯彻进行。事实上,他对于农民的敌对态度使他比列宁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使得他坚持革命胜利后不仅必须在社会主义控制下高速度地实行工业化,而且还必须赶紧使农业象工业一样地社会化,并且用工业方法耕种土地,以便把反动的农民尽快地改变成为一个现代的人。

这就是托洛茨基理论的国内方面。他的理论的国际方面甚至更为重要。人们把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称作是“不断革命论”,这是相当使人误解的。常常有人说他的这种见解来自俄国血统的德国社会党人A. L. 赫尔普汉德(1869—1924年),他以笔名帕维斯著称。帕维斯定居在德国,后来成了德国左翼的著名作家,经常为《新时代》和其他德国社会党刊物撰稿,还投稿给《火

星报》和其他俄国刊物。帕维斯始终置身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争执以外,并且象托洛茨基一样,曾设法起调解人的作用。但是他的见解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与孟什维克主义的共同之处。1904年,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闹翻以后,到慕尼黑与帕维斯汇合,有一个时期与他住在一起,并且与他密切合作。这是在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帕维斯1904年在《火星报》上发表的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连载文章写的就是这一事件。帕维斯认为日俄战争是强大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的首战。马克思在1848年曾经宣称民族国家即将崩溃,并且宣称工人革命具有国际主义的本质。但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民族国家非但没有消失,反而稳步加强了实力,并且在凡属足够强大的时候,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体系的中心。不仅于此,原来苦难深重的民族也日益强烈地要维护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权利;社会主义虽然反对作为一种信条的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维护被奴役的或被征服的民族的权利的时候,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它的盟友。奥匈帝国的社会党人,尤其是俄罗斯帝国的社会党人,一直在煞费脑筋地认真考虑民族问题,他们左右为难,既同情民族自决的主张,又不愿意看到工人阶级的斗争循民族界线而分裂;这一问题迄未得到圆满解决。<sup>①</sup>

957 这时帕维斯参加了争论,他说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发展已经使世界成了商业竞争和帝国主义角逐的大舞台,所以不仅在国与国之间,而且在各大洲之间,都存在很深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因而民族国家,即使是它的扩张了的帝国主义形式,也变成完全陈旧的了。不过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并没有导致文化或经济的统一,而是导致了对立国家之间的日益激烈的冲突,结果是必然一再发生同归于尽的战争。帕维斯说,日俄战争与其说是一场争夺朝

<sup>①</sup> 参看第十二章。



鲜或者满洲的战争，倒不如说是争夺东亚霸权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之后，世界其余地区也会发生类似的斗争。俄国在亚洲的遭遇会影响俄国在欧洲的命运。俄国的经济落后已经使它处于法国财政控制之下。俄国不顾经济和社会结构力量薄弱，企图发挥帝国主义大国的作用，因而使国内民穷财尽，这就会导致国内革命，“俄国革命将震撼资本主义世界……俄国无产阶级应该起社会革命先锋队的作用。”必须记住，这一段话是帕维斯在1904年说的。

可见，帕维斯已经从世界革命的角度、而不是从单独的国家革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他暗示说俄国人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这倒不是说不顾俄国的落后硬要这样做，而是恰恰因为它落后而要这样做。

毫无疑问，托洛茨基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1904年快到年底，当俄国革命看来已经到了—触即发的时候，他正在写一本小册子，企图说明俄国革命应该采择的道路。1905年1月，在圣彼得堡对加朋神甫领导的示威群众进行大屠杀以后不久他就完成了这部小册子的写作，他把这本小册子题为《1月9日以前的时期》，1月9日正是大屠杀的日子，一般人把这次大屠杀看作是革命的真正开始。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主要内容是猛烈抨击自由党人，指责他们动摇和缺乏明确的目标，并坚持说，除非工业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否则就绝对不会有革命。他设想革命是以总罢工开始，总罢工会使工人阶级上街，占领城市，攻占主要的建筑物并组成他们自己的革命政府。他说城市将是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但是单靠城市不能进行革命。作为“革命力量的来源”，必须争取农民参加，必须立即将鼓动工作扩大到农村地区。必须到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中去进行宣传，以便使本身也不乏疾苦牢骚的士兵拒绝向示威者开枪。“我们必须在士兵中间进行最激烈的鼓动，以便使每个在罢工的时候被派去镇压“叛乱分子”的士兵知道面对他们的是要

求召开制宪议会的人民。”

帕维斯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写了一篇序，在这篇序里他比托洛茨基更为明确地说明了一次革命的问题。他写道，“俄国的革命临时政府将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民主政府……由于社会民主党是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政府。”它将是一个“具有社会民主党多数的团结一致政府”——而不是一个由资产阶级组成或者受资产阶级支配的政府。这个结论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碍难接受的。孟什维克坚持说，由于革命必须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应该让资产阶级去控制政府，而社会党人则是反对党。列宁坚持说，帕维斯的概念是不可能论者的概念，因为这样一种工人的革命专政，除非以大多数人民为基础，否则就绝对不可能是稳定的，而俄国的无产阶级却只不过是少数。因此，革命政府必须由一个联合政体来建立，在这个政体中，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都必须参加，或者甚至占支配地位。列宁说，“在这个问题上抱有任何幻想都是十分有害的。”

托洛茨基或者帕维斯在这个阶段大概都不清楚这些理论会有多大号召力。他们都没有明确地反对这样一种见解，即认为革命——列宁称之为第一次革命的革命——的作用将主要是破坏性的，社会主义有待革命成功之后再建设。但是托洛茨基坚决认为，革命斗争的首要责任必然落在工业无产阶级身上，这就会迫使它不论是否愿意都要夺取政权。他继续说，不能想象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之后会自动放弃政权——他的话等于是说，无产阶级会保持政权并利用它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1905年革命逐步进行，托洛茨基担任彼得堡苏维埃领导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但是革命失败了，托洛茨基被捕了。他在监狱中有时间思索这个问题，并重新系统整理有关未来革命如何方能成功的想法。他思索的结果一部分发表在他所编辑的《圣彼得

堡苏维埃史》上。他在文章中说，下一次全国各城镇都将有苏维埃，将政府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农村地区也将有农民苏维埃来进行农村革命。他写道，“制定这样一个计划比实行容易。但是如果革命必定要胜利，无产阶级就不能不担当起这个任务。”

托洛茨基理论的主要部分体现在一篇叫做《平衡与前景》的论文中，这是他所著的《我们的革命》的最后部分。这部书写于1906年，但是销行不广，这篇论文一直到1917年以后才出名。托洛茨基在这篇文章中说，工业无产阶级既然担负了革命的担子，就不得不将革命进行到社会主义，即使在西欧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他坚决认为，俄国资产阶级存在弱点，不适合担任革命领导，这是因为在俄国，国家使一切从属于自己，所以资本主义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而是作为国家的奴仆发展的，俄国的城市不是生产中心，而是消费中心。工业各行业主要不是在城市里发展，而是分散在农村。因此在城市里，既没有人数众多从事生产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大批熟练的手工业者。它们仅有的一点现代工业主要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因此它所造成的是无产阶级而不是本国的中产阶级。但是它所造成的无产阶级是高度集中的，而且绰有余力建立起强大的组织。这些事实决定了俄国革命的模式。 960

托洛茨基接着继续从国际观点来考虑革命。他提到了三个著名的革命年代——1789年、1848年和1905年。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出色地开了路，但是并不存在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运动。1848年，在主要中心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勇气和自信，而无产阶级虽然力量十分强大，足以吓倒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担当起领导的责任。1905年，在俄国，面对着还很软弱的资产阶级，工人起了领导作用，虽然他们被击退了，不久以后他们一定会把革命进行到胜利。

托洛茨基反对那些说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

的人说：“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间可能早于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希望尽管居于少数的产业工人夺取政府权力，争取农民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革命，并且建立一个给与农民从属地位的专政政体。他说，“无产阶级将作为农民的解放者在农民面前出现”；农民在无产阶级的鼓励 and 帮助下夺取了地主的产业之后，会接受无产阶级作为他们的领袖。可见，无产阶级少数的专政会得到多数的支持。可见，托洛茨基在 1906 年，甚至在列宁之前就主张农民夺取土地。在那个时候，在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中间，唯有斯大林有着同样的主张。正如列宁在不久以后也看到的那样，两人都认为，这是使革命能够在农村取胜、从而使革命能够在城市里取得持久胜利的唯一途径。但是托洛茨基对这一点的坚持并没有使他相信农民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成为真正的创造性的力量。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这种力量。他预料在革命成功之后，将与农民发生尖锐的矛盾；他相信，到那个阶段，除非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否则农民会使社会主义革命失败。<sup>961</sup>“没有欧洲无产阶级政府的直接支持，俄国的工人阶级将无法维持自己的政权，并将它的暂时的统治变成稳定而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

这当然是托洛茨基理论的核心。他提出理由说，俄国革命必须是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除非发出世界革命的信号，并且用他的原话来说，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的引爆药”，否则就不能持续下去。托洛茨基然后接着说，由于害怕无产阶级，欧洲的资产阶级会拼命避免自相残杀战争，因为“欧洲战争必然意味着欧洲的革命”，但是他们必然要失败，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消除大国之间的相互敌对，或者防止这种敌对导致武装冲突。

然后托洛茨基同意罗莎·卢森堡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更有可能由于自相残杀战争、而不是由于内在的经济矛盾使它的扩

张能力陷于枯竭而崩溃。但是他的论点的本质部分不是直接环绕着这一点，而是环绕着他对于一次新的、取得初步胜利的俄国革命会走什么道路的预测。他相信，这种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但是他也相信，一旦无产阶级试图使这场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农民就会反对，而在俄国国外的反动力量的帮助下，农民就能够破坏革命，除非较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前来保卫这场革命。“如果孤立无援，在农民背叛无产阶级时，俄国工人阶级势必将为反革命势力所粉碎。工人别无其他选择，唯有将他们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命运、因而也就是将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与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系起来”。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不仅欧洲的工人会拯救俄国的革命，而且俄国的工人会把他们的巨大的力量和能量“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的天平上去”。这样一来，俄国革命就会变成一场世界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俄国和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将并肩作战。<sup>962</sup>

当时，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没有多大吸引力。在后来有一个阶段，托洛茨基认为没有西方革命的帮助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希望维持下去的观点，开始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几乎都同意的信条；但是在1906年时，除了托洛茨基以外，几乎还没有任何人谈论这个问题；当然，关于战争有可能触发世界革命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而象罗莎·卢森堡这样的左派已经一直在坚持有必要使革命运动具有国际性质，并从超越国界的、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世界革命的角度，而不是从一系列的国家革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世界革命已经是一个人们所熟悉的概念；人们通常总是把它设想为实际的战斗，并且认为世界革命大概将在国际战争之后到来。不过，这个概念大体上是极左派的想法。大多数西方领袖只是解释说，尽管战争有可能帮助触发世界革命，他们也不希望战争爆发，除此以外，关于这个问题他们几乎没有说什么。

迄今为止，在本章中我们一直讨论的是那些自认是革命论者的社会主义者的意见，他们之所以自认为革命者是因为他们认为要使社会主义社会诞生，就必须进行某种革命。现在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反对这种见解，并且自称是“改良主义者”或者在别人硬要这样称呼他们时并不拒绝的那些人的主张。在这些人中间有以伯恩施坦和沃尔马尔为首的德国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英国费边社社员和英国独立工党和工党的大多数党员、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美国社会党的主要部分（当然，并不包括劳工社会党或者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瑞士人、一部分意大利人、澳大利亚各工党的大部分党员和新西兰的党的一部分、法国米勒兰派（但是并不是饶勒斯或者法国社会党人的主体），也许还有俄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稳健派，除了米勒兰和他那一派人以外，不能归于这一类，因为“革命”一词对他们说来特别是指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是完成“社会革命”来维护和补充法国大革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从蒲鲁东那里承袭而来的关于“不断”或内在革命的理论，但是在许多方面，他们与其他国家接受改良主义者称号的那些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改良主义者的理论，有如悉尼·韦伯在《费边社论文》中所述，是以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另外一种说法为依据的。改良主义者认为生产力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现而不断进展，并且认为这些进展将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象马克思一样，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看到一种走向生产过程“社会化”的连续不断的趋势，这就破坏了工人个人的产品的特性，把他变成了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过程的一个分担者。这种“社会化”还表现为扩大生产规模，使工厂与工厂、产业与产业，市场与市场之间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他们期待社会化不断向前发展，控制权越来越集中在大托拉斯和联合企业手中，直到不久以后这些大托拉斯和联合企业被接管，成为公共财产，为公

众利益而经营。到此为止，他们与马克思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与马克思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相信，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人将能改善他们的条件并提高生活水平，这部分是通过迫使国家提高他们的实际工资，一部分是通过从他们将使之民主化的国家争取到一种不断扩大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通过赋税来完成的，征收这种赋税的宗旨在于没收“租金”，用它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

这种改良主义在政治方面的理论是：国家并不是象马克思所坚决主张的那样，就其根本性质说来是一个阶级的组织，它所以存在是要为某一个特定阶级服务，而应该被看作是就本质而言是中立的，是任何阶级或集团或能够控制它的一群人都可以利用的工具。因此改良主义者说，如果通过建立选举制的民主和责任制政府，将国家置于大多数人民的权力控制之下，它就会成为那个大多数人的工具；如果不诉诸暴力而通过宪法改革来建立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不通过革命就变成人民的国家，并且能够被利用来实行社会主义。改良主义者并不否认，国家实际上往往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可是他们否认情况必然是如此，否认国家能被恰如其份地解释成为阶级统治的机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说，对国家只能这样解释，并且说，曾经是一个统治阶级工具的国家，绝对不能原封不动拿过来就当作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旧的国家必须被粉碎，必须用一个符合新的统治阶级需要的新国家取而代之。

当然，这有几分笔墨官司的味道；因为没有人否认，为了成为不同阶级的工具，国家需要改变其性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概念的言外之意是说，这种改变必须突然来到，新国家必须突然取代旧国家，另一方面，改良主义者则是从渐进地改变国家职能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这种改变过程中不可能精确指出究竟在什么时候国

家不再具有这种性质而具有了那种性质。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渐进主义与突变主义之争，而不是关于“国家”一词的两种不同定义之争。

当然，改良主义者的见解的言外之意是说，现时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既不会产生使大部分人民“日益贫困”的条件，也不会必定使这些制度由于它的内在“矛盾”而突然崩溃。改良主义者可能提出理由说，资本主义越来越不适合于作为充分利用现有生产力的工具；但是他通常总是认为，整个说来，尽管资本主义效率低，它所提供的货物和劳务会继续以高于人口增长速度的速度增加，并且认为它能够继续增加福利而不致引起经济崩溃。改良主义者可能认为，随着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进一步的进展，福利会增加得比以前快得多；他还可能辩解说，除非将生产结构的某些部分，比如铁路，划归公营，否则就会发生部分的崩溃。但是他认为，现在的结构上的裂痕可以用零星的方法来修补——比方通过某个工业部门的社会化，保护性法律和社会服务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地将富人手中的“剩余财富”转移到整个社会手中。

因此，关于不经过革命就能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的前景而言，大体说来，改良主义者是乐观论者，革命论者是悲观论者。但是，一方面革命论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益贫困”与社会主义计划和建设下的“日益繁荣”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界线，另一方面，改良主义者却不承认有这种鲜明的界线。对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而是程度多少的问题。如伯恩斯坦在谈他自己时所说，他们想得更多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彻底的社会主义可能永远不会实现；程度较多的社会主义是会实现的而且也能够实现，并且不需要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候发生突然的新旧决裂。当然，许多改良主义者承认，事实上可能发生突然的新旧决裂；但是他们非但不欢欣鼓舞地迎接这种“光荣革命”的前



景,反而希望避免使这种前景成为现实,并且根据旨在使它不大可能实现的方针来制定他们的计划。

有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者。一个极端是慈善家。他们心心念念增加社会福利,主要关心改善社会立法并向富人征收赋税作为经费。这些人渐渐变成了这样一种改良主义者,他们认为用这些方法所能取得的成果是很有限的,除非国家至少把主要工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使自己可以无需依靠这些工业的利润刺激,可以消除追求私人利润强加给产量的限制。还存在“慈善”的社会主义者和“主张社会化”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同时,关于为了给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提供稳固的基础,必须真正社会化到什么程度,以及如果不社会化,能“控制”到什么程度——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争论。还有彻底的社会化论者,他们主张由国家或者市政当局以“消费民主”的名义接管一切,但是希望通过一系列分别与每个特定工业部门或者服务业有关的议会法案来循序渐进地做到这点; 966 并且坚持说,为公平合理起见,渐进的社会化应该给予现有的业主以赔偿。在这种社会化论者之中有些人,——如肖伯纳——又说,所付的赔偿费必须完全来自对财产的主人所征课的赋税,这样一来,他们事实上就是互相赔偿而不给社会造成负担。有些人不赞成赔偿,只赞成用可以中止的年金作为过渡时期的缓和措施;有些人则断然反对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上地——进行赔偿,理由是人们没有权利把大自然的赐予变成私人财产,只对人创造的资本资产有着有限的权利。

特别在英国,在赔偿问题上的争议常常在左右两翼的争执中占重要地位。左翼指出,除非在支付赔偿费的同时通过对于资本——例如遗产——的征税,至少使相等的财产转为社会所有,否则它将会使国有化仅仅成为把私人经营变成社会经营,因而不会使私有财产减少,而这种减少又是必需的。它只会是以支付利息来

代替利润，从而使转手企业的工人受到与以前大同小异的剥削。左翼嘲笑这样一个概念：通过对于收入或者消费的高额征税，能够使富有者付出公家购买各工业部门所需要的款项，而不致于使当局不可能在同时对富有者征收更高的赋税用于重新分配的社会服务事业的扩大；他们争论说，国营工业部门，如果要求它们赚利息来支付给以前的业主，就必然会继续用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下去。这些批评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却并没有使右翼感到多么为难，因为渐进论者大部分人十分愿意把没收有产阶级财产的工作无限期地推迟，只要允许他们经由最便当的道路走向国有化，或者某种变相的国有化。至于可以中止的年金，右翼辩解说，如果采纳这种做法，实际上将是换汤不换药，因为为了公道起见，就必须使这笔钱相当高，足以抵充所移交的资产的全部价值；另一方面，左翼否认有这种必要，希望只是在使社会化成为普遍所需要的时期内发放这种年金，并且希望这种年金被看作是事先给予整个资产阶级的要他们离开的通知；这样，就让资本家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心中有数了。当然右翼反对这种观点，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心目中既不知道社会化过程何时完成，甚至也没有料想在任何可以预测的年限内这个过程会完成，或者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会结束。

改良主义者都是渐进论者，如果他们都是政治家的话。但是，他们之中有些人并不是政治家。比方说，赫尔卡茨<sup>①</sup>打算在中非建立一个其生产者不缴纳任何租金和利息的崭新的国家，以此作为典范，使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它的高度优越性得到证明之后立即群起仿效。也许有人说，赫尔卡茨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甚至不是一个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可是无论如何他是接受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思想。建立理想社会，大体说来，不是本卷所研究的这一

<sup>①</sup> 参看本卷下册第40页。

时期的特点,只有少数几个集团是这样认为的,这些集团与其说是致力于革新现世,不如说是要过一种远离邪恶和琐屑事物的尘世的“美好生活”——例如,托尔斯泰主义者,威廉·兰恩的巴拉圭的实验是一个孤立的例子,结果并不令人鼓舞;兰恩肯定不能被说成是改良主义者。大部分改良主义者对于世界根本不厌恶,也一点也不希望逃避这个世界,虽然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愚蠢的。他们是福利国家的鼓吹者,认为如果实施民主的选举权和建立向选民负责的政府,就能够利用国家作为工具,传播过美好生活的手段。

此外,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几乎都是热忱的政治民主主义者。他们认为,没有人民的授权,他们就没有权利建立社会主义或者向社会主义前进;他们希望根据全体人民的大多数的授权,而不是一个阶级的授权,来采取行动。他们不喜欢阶级斗争的概念,即使在他们把它当作一个社会事实来接受时也是不喜欢的。他们反对单纯向一个阶级呼吁,对于阶级专政的观念极其敌对。除了在俄国以外,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很少使用“专政”一词,甚至在俄 968 国,在列宁经常使用这个名词之前用得也不多。当德国人使用这个名词的时候,他们一般并不是指任何绝对由工人阶级进行统治的制度,而只是说,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无产阶级作为人数最多、组织最好的阶级,实际上会当家作主,而毋需剥夺其他人的选举权或者歧视他们。我们已经看到,德国人多么重视利用普选权取得多数,作为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绝不要忘记,甚至布尔什维克也要求成立制宪议会,认为为选举这个议会,其他人与工人一样有权投票。列宁可能一部分是由于接受这一条件,才坚决主张区别两种革命,其中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成为多数,或者至少是在无产阶级加上它所同化了的<sup>·</sup>其他成分的人成为多数的时候,才会到来。改良主义者甚至更

加坚持说，社会主义者前进时必须完全与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东西一致。他们的确非常重视议会的投票，认为那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并且指望逐渐争取到多数以通过越来越进步的社会主义法案。

在本书所讨论的整个时期，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集团既强烈反对革命论者也强烈反对改良主义的“民主主义者”。这股反对力量也有它的左翼和右翼：它的一个极端是合作运动的自愿论者；另一个极端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的信徒。所有这些意见分歧的集团之所以联合起来，是由于它们都反对扩大国家权力来支配一切重要的社会集体活动，不论国家被设想为专政政体，还是开放的民主政体。他们认为，虽然工业家谋求利润是一种罪恶，可是，为了消灭这种现象而使国家——哪怕是选举产生的民主国家——成为无所不在的主宰也是不适当的。他们中许多人说，议会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选民没有真正的权力可以控制他们选出的任何代表，他们选出这些代表来不是为了让他们做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而只是为了让他们行使普遍的权力。这些反对议会政治的人中间有一些人希望完全消灭政府；但是他们真正的用意是，不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个地方，而希望按职能和地区把政府分割开，把它限制于行使特定的职能，而通过这样做，使政府更有义务接受它理应代表的人的控制，从而同时使政府分散权力到地方，并使它接近那些有责任遵守其规定的人，并且与那些人保持密切接触。

因此，大部分合作主义者都希望通过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愿结合，来逐渐接管社会的经济工作，在国家的干涉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的事务。另一方面，工团主义者认为工会是民主的主要机构；他们说，一个人在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中往往象他在做工时一样，除非这个人作为一个同他的最亲近的同事合作的生产者是自由和自主的，否则社会化就会导致一个奴隶国家，政客和

官僚就会以有名无实的民主的名义，在其中对普通人进行专制统治。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的侧重点不同，他们希望把权力交给地方性的友好睦邻团体，通过最低限度的官僚机构来管理他们的事务，并将尽可能直接采取行动，而不是象存在大规模社会组织的地方那样非把权力交给代表不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有别于这两个思想流派，他们非常强调职能组织，认为如果选出的代表担任的是明确而有限的任务，那就是真正的代表制，如果他的责任是起“完人”的作用，并在一切事情上表达其意志，那就不是真正的代表制。所有这些批评议会民主的人，也许除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以外，都是“多元论者”。他们都不希望建立一个无所不能的国家，而都希望成立各种各样的社会控制机构，分别担当起具体的工作，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权力压制其余的机构。

与这些多元论者和自由意志论者不同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不论右翼还是左翼，都主张建立单一的国家主权，他们中大多数还主张中央集权。布尔什维克和主张议会道路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央集权是进步的一个明确无误的特征，并且自认为是资本主义集中和现代国家的中央集权论的必然继承者。他们认为从最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来说，“社会化”的扩大与规模的扩大以及把权力集中在生产和管理的较大单位手里是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改良主义者是有分歧的；因为他们中有些人是热心的国有化论者，另外一些人赞成市政化，希望以此来减少权力的集中；他们中有些人与其说是盼望实现国家社会主义，不如说是盼望出现一种局面，国家虽然担任统筹的计划者，却利用各种各样的自治机构来完成它的各项社会目的，而不是把管理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

在前几页我曾经企图按照对于革命和改良的态度，把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分门别类，可是在进行分析时，我故意不提某些国

家,特别是奥地利和比利时。我所以不提奥地利,是因为对于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说来,这个问题是与奥地利帝国的存亡问题不可分割的,因此也就是与民族主义问题不可分割的。奥地利人不得不考虑奥地利国家被民族革命分裂的可能性,这种革命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半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中有些人,主要是属于非日耳曼集团的那些人之中有些人,希望发生这种革命;大多数日耳曼系统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倒是希望通过建立不会破坏奥地利经济或政治的统一的某种形式的文化方面的民族自治,使奥地利国家保持完整。这就往往使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成为改良主义性质;但是,面对着当时奥地利帝国的反动性质,它又不能宣称反对革命主义。因此,它甚至比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更加三心二意。比利时人所面对的情况不那么复杂,可是仍然相当困难。他们肯定并不希望使比利时国家分裂成为弗莱米国家和华龙国家;但是天主教在比利时的弗莱米地区的强大势力使他们面对一种看来多半不可能取得社会党多数的形势,因此他们不可能接受德国人关于利用议会压力,使社会主义早日取得胜利的乐观看法。这就迫使他们在当时的制度下,在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中间特别重视尽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形势引导他们在工会、合作社、互助团体与政党之间建立并保持密切联系,并且接受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他们建立这样一种结构,天主教会也必然会采取同样行动,于是就会有对立的工会、合作社和社会组织,工人阶级就会分裂。我之所以把我所写的关于比利时的那一章称作“社会党的困境”是因为在我看来,在西方的社会党人中间,认识到议会民主无助于使他们作为人民的明显多数的代表取得胜利的首推比利时人。

无疑还有别的人也可能由于不同的原因,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著作中,人们一再发现这样的假定,即无产

阶级不是已经构成了人民的多数，就是即将构成人民的多数——甚至是极大的多数。德国人就不断坚持这种说法并且在言谈之间仿佛他们希望争取到他们这一方面来的选民大多数将是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尽管这时他们正在非常起劲地拉拢非无产阶级的选民。但是，说无产阶级已经是多数，或者正在成为多数的说法是正确的吗。否认这种说法的主要是某些工团主义者，比如罗伯特·米歇尔斯、若尔日·索列尔和胡伯特·拉加德勒等人，还有许多改良主义者，他们不希望把他们的社会主义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这些提出批评的人坚决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非但没有两极化，成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而且事实上越来越分化，体力劳动者的比例日益下降，职员和行政人员比例日益上升，拥有足够的财产，除了枷锁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失去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已经看到，考茨基和他的反对者怎样在关于农民消失的事实上发生争论<sup>①</sup>，也曾看到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如何集中攻击“日益贫困化”的理论，认为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际发展进程是矛盾的。明显的事实是，如果“无产阶级”只是指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就极不可能居然会构成人民的多数，倒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十有八九会减少它的相对人数。当然，这种人数减少的情况不会在落后国家出现，在那里这种“无产阶级”的相对人数和实际人数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会继续增加；但是这种说法适用于大多数社会党人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最接近于成熟的国家。

只要重新解释“无产阶级”一词，使它包括越来越多的靠薪水为生的人，如果必要，也包括农民，而把比较富有的农民排除在外，就能够克服这个困难。但是这个新定义使“无产阶级”远不是一个清一色的阶级，而且远不能在行动中成立统一的组织和实现阶级

<sup>①</sup> 参看本卷上册第 272 页以下。

团结。根据这种定义，人们认为曾赋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热忱的那种特性成了一部分人、而不是整个无产阶级的特性。这一部分人固然仍可以被看作是“先锋队”，依靠它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和组织能力在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会把所有其他人团结起来，但是这等于说争取社会主义的力量不是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坚分子——当然就不是全体人民中的大多数。如果由这批中坚分子来发号施令，那就不是大多数人的专政，而是左右大多数人的少数人的专政。如果这里不准备有专政，而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愿望建立一个政府，那么社会主义者为了争取和掌握大多数，就不能不缓和他们的政策以满足投票动向未定的选民的愿望。

这就是 1914 年以前的那些年里社会党人的真正困境，在那些年里，在西欧出现了庞大的社会主义议会政党，但是任何地方——甚至在德国，这些政党都没有希望获得多数，使他们能够得到民主授权来实行社会主义。德国人象其余人一样，为了取得他们所取得的那一点点进展，也曾经被迫缓和他们的直接纲领，而且看来将来还要作进一步的缓和，尽管在理论上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

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情况呢？许多社会主义者，特别是那些有左派倾向的人，找到了一条出路，他们预言说，在大规模失业和消费不足的最后的经济危机中，或者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压力下，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崩溃，又预言说，这种旧秩序的崩溃不是使广大人民信仰社会主义事业，就是使社会主义者作为在旧秩序的瓦解中唯一屹立的力量，具有一种实力，不必等待人民群众的思想转变便能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能使没有组织的非社会主义者面对既成事实，从而争取和保持大多数人的支持。与此不同的是，另有一些同情改良主义者的人倾向于这样一种概



念，认为社会主义也许根本不是一种制度，而只不过是一种倾向，社会主义政党和运动的任务归根结蒂不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向福利国家的方向稳步前进。但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并没有肯定表示采取这两种态度中的任何一种，或者存有这两种期望中的任何一种。他们继续作最好的打算。

在有些国家，几乎根本没有产生革命行动的问题，虽然在所有国家，都至少可以找到小批革命论者，或者自认为是革命论者的人，正如甚至在有些尽管其现存机构不经革命几乎就没有改良余地的国家里，通常也有小批改良主义者一样。比如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关于革命谈得很多，并且辱骂费边社和工党反对革命；但是实际上从不存在哪怕是尝试革命的丝毫可能。吉尔·哈迪不是作为一个革命论者，而是作为一个热心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举行总罢工反对战争的；1910—1914年的大动乱中在利物浦和其他地方发生的混乱局面与革命毫无关系。当然，爱尔兰的情况另当别论；不过爱尔兰的革命论者是民族主义者，大多数人绝不是社会主义者，即使在爱尔兰，在1914年以前革命的主要威胁也是来自北爱尔兰<sup>974</sup>统一党人，而不是来自左翼。独立工党和费边社附属于英国工党，可是英国工党在1917年或者1918年以前，甚至不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虽然它曾通过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决议。

在美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革命问题实际上没有真正成为现实问题，虽然在所有这些国家，世界产业工人工会把革命的主张同非常激烈的产业活动结合起来。在这些国家中，社会党和工党的队伍中有革命论者；但是，除了德里昂的劳工社会党以外，它们都不是革命党。革命论者和改良主义者所以能在这些党内合作是由于革命并不是一个现实问题。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选举权都是广泛的，虽然妇女仍然没有投票权，议会制度是在责任制政府的基础上起作用的，这就不仅为零星的改革，而且也为社会制度的结构改

革开拓了道路,只要大多数选民明确表示需要这种改革,或者坚决地给要求这种改革的政治家以支持。在这种国家中,在1914年以前存在的情况下,除了对于象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这样的少数民族外,革命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政治——即使对他们说来,也绝不是很容易的。

在欧洲大陆,也有一些国家革命问题几乎没有成为现实问题。挪威发生了民族革命,但是并不是社会革命;而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余地区,尽管选举权范围狭隘,却几乎没有任何革命运动。在荷兰,革命运动比较激烈;但它是以软弱,而不是以力量为基础的,与其说它是革命意志的表现,不如说它是对于议会政治无效的反动。在比利时,革命也不是真正“现实的政治”,虽然通过罢工和示威对议会施加强大压力促进改革是现实的政治。革命论者是有的,特别在华龙人中间;但是比利时工党在它的队伍中没有强大的革命因素。在瑞士的讲法语地区有少数革命者,但是在瑞士的讲德语地区,除了流亡人士以外,革命者就非常少。在所有这些国家内,甚至在瑞士,也有激烈的劳资斗争。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劳资双方所集结的力量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有组织的冲突;但是,丹麦、挪威、瑞典的总罢工始终没有转化为革命的任何希望。

事实上,在德国也从来没有任何发生革命的真正希望,因为在德国,大部分相信革命的人已经明确地把革命推迟到社会主义赢得议会多数的一天,但是即使到那时,他们也指望用合乎宪法的议会程序来完成革命。德国人除了极少数的以外,在实践中和态度上都是与英国人一模一样的改良主义者。他们中间的主要革命论者罗莎·卢森堡不是一个德国人,而是一个波兰人,她至少象关心德国的革命一样关心俄国的革命:实际上她把这两个革命看成是一个革命。革命,或者至少是社会革命,是东欧特有的,而就其社会方面而言,主要是俄国特有的。

还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葡萄牙发生了一次革命，但是实际上没有社会主义运动。西班牙总是酝酿着潜在的革命，但是始终不能使它的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运动；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在伊格勒西阿斯领导下，事实上就同德国的党一样不是革命党。意大利总是很容易发生骚乱；但是在备受压迫的南方，社会党人没有什么力量，而且在北部城市的产业工人与那不勒斯或者甚至是罗马的狂暴的城市无产阶级之间又存在一道鸿沟。最后在法国，盖得派就象德国人一样，饶勒斯的追随者是过去的革命的捍卫者而不是新的革命的提倡者，瓦扬所领导的布朗基主义者表现了对阴谋叛乱的热衷，大多数工团主义者尽管称自己的运动为“革命工团主义”，眼下却丝毫无意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法国在左右两翼都有大批革命论者，除了布朗基有企图以外，还可能有某种发动革命政变的企图。不过这种企图事实上更有可能是来自右翼而不是左翼；工团主义革命的概念，始终只不过是一种概念而已：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共谋”。

实际上，西欧的社会主义，不管它自称是什么，终归是一种改良主义运动而不是一种革命运动。在某些国家，它仍然在争取普选权（或者至少是成年人选举权），争取建立责任制政府，同时利用示威性的总罢工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在其他国家，这些条件已经存在，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制定社会法律的要求或者工会事务。迫使它终于不得不面对革命行动问题的唯一问题是战争问题；它认为这种对峙很使人为难，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才好。最后，它被说服——可以指出，是被罗莎·卢森堡和列宁说服的——在斯图加特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表示赞成，并在哥本哈根和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重申它的决议的最后的执行部分，这些部分规定了面对着战争的威胁和在战争实际爆发时社会党人应有的责任。不过这些部分不够明确，否则它们根本就不会

被通过。不论作何种解释，它们总是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承担了更多的义务，而这是这个运动在 1914 年远远做不到，也是远远没有统一的愿望去做到的。第二国际瓦解了；只有在东欧，战争真正实现了人们常常作的预言，即欧洲战争必然意味着也发生欧洲的革命。

## THE PRINCIPAL CHARACTERS

### 主要人物表

姓名年代	出现章次
[Engels, 1820—1895]①恩格斯	—
Lavrov, 1823—1900②拉甫罗夫	9
W. Liebknecht, 1826—1900②威廉·李卜克内西	5
Tolstol, 1828—1910托尔斯泰	—
Longuet, 1833—1901龙格	7,8
[Morris, 1834—1896]③摩里斯	—
Bebel, 1840—1913②倍倍尔	5,6
Vaillant, 1840—1915②瓦扬	7,8
Malon, 1841—1893②马隆	7
Greulich, 1842—1925格罗伊利希	15
[Hyndman, 1842—1921]②海德门	—
[Kropotkin, 1842—1921]②克鲁泡特金	—
Lafargue, 1842—1911拉法格	7
Mikhailovsky, 1842—1904米海洛夫斯基	9
Ant. Labriola, 1843—1904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19
Brousse, 1844—1912布劳斯	7
Danielson, 1844—1918丹尼尔逊	9
Singer, 1844—1911辛格尔	6
Guesde, 1845—1922②盖得	7,8
Mehring, 1846—1919梅林	5,6
Nieuwenhuis, 1846—1919纽文惠斯	17
Sorel, 1847—1922索列尔	8
Axelrod, 1850—1925阿克雪里罗德	9
Bernstein, 1850—1932伯恩斯坦	5

Iglesias, 1850—1925 伊格勒西阿斯	20
Ledebour, 1850—1947 累德堡	6
Volmar, 1850—1922 沃尔马尔	5
Blatchford, 1851—1943 布拉奇福德	3
Zasulich, 1851—1919 查苏利奇	9
V. Adler, 1852—1918 维克多·阿德勒	12
Costa, 1852—1910 科斯塔	19
De Leon, 1852—1914 德·里昂	21
[Cunninghame Graham, 1852—1936] 肯宁汉·格莱安	—
Stepnik, 1852—1895 斯特普尼亚克	9
[Malatesta, 1853—1932] 马拉特斯塔	—
[Bart, 1854—1926] 巴克斯	—
Troelstra, 1860—1930 特鲁尔斯特拉	17
W. Lane, 1861—1917 威廉·兰恩	23
Legien, 1861—1920 列念	6
Briand, 1862—1932 布利安	7, 8
David, 1863—1930 大卫	6
Hasse, 1863—1919 哈斯	6
Henderson, 1863—1935 汉德逊	4
Snowden, 1864—1937 斯诺顿	3, 4
Scheidemann, 1865—1939 谢德曼	6
Macdonald, 1866—1937 麦克唐纳	3, 4
Vandervelde, 1866—1938 王德威尔得	16
Sun Yat Sen, 1866—1925 孙逸仙	26
Wells, 1866—1946 威尔斯	4
Pelloutier, 1867—1901 佩洛蒂埃	8
Pilsudski, 1867—1935 皮尔苏茨基	11
Gorki, 1868—1936 高尔基	10
Connolly, 1870—1916 康诺利	4
Krasin, 1870—1926 克拉辛	10
Lenin, 1870—1924 列宁	9, 10
Luxenburg, 1870—1919 卢森堡	6, 11

Kautsky, 1854--1938 ③考茨基	5,6
Debs, 1855--1926 ②德布斯	21
Anseele, 1856--1938 安塞尔	16
Bertrand, 1856--1943 贝特朗	16
Hardie, 1856--1915 哈迪	3,4
Mann, 1856--1941 曼恩	3,4
Shaw, 1856--1950 肖伯纳	3,4
Plekhanov, 1857--1918 ③普列汉诺夫	9,10
Turati 1857--1932 屠拉蒂	19
Zetkin, 1857--1933 蔡特金	6
Hobson, 1858--1940 霍布逊	4
B. Webb, 1858--1943 比阿特丽斯·韦伯	3,4
Burns, 1859--1941 ②伯恩士	3,4
Champion, 1859--1928 香皮翁	3
Jaurès, 1859--1914 饶勒斯	7,8
Lansbury, 1859--1940 兰斯伯雷	4
Millerand, 1859--1943 米勒兰	7
S. Webb, 1859--1947 悉尼·韦伯	3,4
Brnting, 1860--1925 布兰丁	18
Pouget, 1860--1932 波盖	8
K. Liebknecht, 1871--1919 卡尔·李卜克内西	6,11
Merrheim, 1871--1925 麦尔罕姆	8
Bogdanov, 1873--1928 波格丹诺夫	10
Martov, 1873--1923 马尔托夫	9,10
Frank, 1874--1914 弗兰克	6
Griffuelhes, 1874--1923 格里弗爱勒	8
A. Thomas, 1878--1932 托马斯	8
Jouhaux, 1879--1953 茹奥	8
Trotsky, 1879--1940 托洛茨基	9,10
O. Bawer, 1881--1935 奥托·鲍威尔	12

① 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谈到。

② 在第二卷中也谈到。

③ 见第二卷的讨论。